瓦文萨自传

東方出版社

瓦文萨自传

社

瓦文萨自传

〔波〕莱赫·瓦文萨著

彭志毅译　张金鉴校

東方出版社

Lech Walesa
A PATH OF HOPE

Collins Harvill, London, 1987
根据英国伦敦科林斯·哈维尔公司1987年版译出

瓦文萨自传

WAWENSA ZIZHUAN

著者/莱赫·瓦文萨
译校者/彭志毅 译 张金鉴 校
印刷/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44,000
版次/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190-X/D·29 定价5.60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瓦文萨先生，
您应该感到幸运

在我飘然入睡前的片刻，房间里又陷入了寂静。无论白天黑夜，客人们总是随时来访，这正成为他们的习惯。在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之后，房门才关上。我的妻子、女儿以及儿子已经上床休息，正在渐渐入睡。家庭这个舞台上已空无一人。这时我的脑海里开始浮现一整天和客人们交谈的片段：各种看法、赞美和批评、只有我才能辨别的价值、警告以及催我奋进的鼓励之词——这一切似乎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我难道是一个站在茫茫荒野上大声呼叫而孤独无助的预言家吗？我敢于对自己的前程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冒最大的风险吗？

是我母亲最早要我相信命运。然而当我一进入弱冠之年，我却开始相信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会获得成功。后来，由于经验的启示和教会的帮助，我最终懂得了“信仰”一词的含义。自己感知的这些观念指引我在生活中做出选择，始终鼓励我不断地冒险，并帮助我不致做出灾难性的决断。

我对命运的看法绝非宿命论的或悲观的，而是恰恰相反，我主动地同人民打成一片，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当然也包括参与快乐的活动，我从不注重事物的短期效果，因而我认为个人的能力完全能改变事物。

曾有人问我，波兰和波兰人是否会永远热爱戏剧。我认

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时代行将结束之际。整个世界，也包括波兰，正经受着历史性的重大变革所带来的阵痛。例如，洲际导弹的出现使保卫国家边界的神圣义务成为各国关心的主要事情；然而像我们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却不再具有以往那种重要意义，因为在今天，即使世界上最遥远的地区也会轻易地受到武装入侵。然而，对于我们，同苏联的边界仍然是日常要考虑的现实。

世界有许多有关东西方政治的谈论，但是，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地考察一下局势，便会清楚地看到每一方都对另一方持有错误的看法。西方富有且武器精良，但并不想同另一方发生冲突；而东方无疑想要得到更多的领土和资源，但却缺乏实现其目的的手段。结果是：两种不可能性发生了矛盾。一方能够却不想同别人发生冲突，而另一方则想要但又没有能力这样做。

“团结”是新时代到来的进一步标志。过去的负担沉重地压在我们身上，迫使我们去寻求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迫使我们面对那种本来并不应该存在的复杂局面所引起的问题。我们波兰人经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生活要求我们去选择自己的道路，去检验和证实事物的真伪，从而去坚持自己的权利，从自身汲取必要的道德力量，来影响当前这场变革。我们生活在一种僵化制度的桎梏中，这种制度是我们星球上已经过时的政治划分的产物，但是，1980年8月，我们废除了最强大的政治戒律，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波兰民族在整个世界面前，在没有暴力、威胁，在反对派未流一滴血的情况下取得了这一成就，从而获得了力量；我们并没有提出任何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制度或社会制度的理论，我们不过是在实现人的尊严而已。在自由的和不自由的两大阵营中，这个事

件都被认为是一项革命行动。但我们并不认为在所发生的事件中有什么革命性的东西。我们只是感到在生活颠倒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开始用自己的双脚走路。

如果我们真想理解命运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就必须摒弃毫无意义的反抗。我们以雅尔塔协议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波兰从战争伊始就是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员，它的确有权在战争结束时恢复其民族的独立地位。然而雅尔塔协议曾引起、而且仍在引起波兰人深深的悲痛，这难道是件令人惊奇的事吗？但是我们对待这件事情还有另一种看法。我记起以前同一个波兰老将军的谈话，这位将军在1918年波兰恢复独立和自由的那些事件中以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流亡政府首先在巴黎建立，尔后迁往伦敦，当时他从中东一直转战到意大利的卡西诺峰，目睹了安德斯将军指挥的波兰军队所创建的英雄业绩。雅尔塔协议后，他终于回到波兰。作为一名高级军事人员，他曾经同那些重新勾画欧洲版图的重要人物有过直接接触。这些人包括斯大林及其幕僚，他们在波兰新的政治制度上深深打上了自己的印记，这些人包括贝利亚及其在苏联秘密警察中的帮手，还有西线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以及许多英国政府官员。这位老战士直到临终时仍不肯接受自己国家边界已被改变的事实；他认为，波兰被别人出卖了，波兰同西欧的传统联系正在被切断，眼睁睁地看着波兰正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在我们进行交谈的过程中，我请他设法想像一下，如果没有雅尔塔协议波兰会是什么样子。这个国家饱受战争摧残，身旁又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邻居。当时甚至在西方，尽管那里非常注重实用主义，人们似乎也让那些来自莫斯科的革命思想给迷住了。因此，如果没有雅尔塔协议，

波兰的命运很可能先是缓缓地滑向东方，最后不可避免地被人吞并。这将会导致痛苦的幻灭，甚至更糟，将使我们的民族特征丧失殆尽。雅尔塔协议使我们避免了这种命运，它给我们带来的创伤产生了有效的免疫力，使我们很快地经历了历史的一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最大限度地进行实际工作的机会，而不是站在远处，麻木不仁地观望。这一课现在已经结束；波兰已经把所学到的东西告诉了全世界。任何一本论及世界局势的新教科书都不能不提及这一课。

我尽力用对待我个人问题的眼光看待政治事件，并以类似的方式予以解决。我对生活从不悲观，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什么都不能真正地把握，我们也不能以此为借口而放弃我们的全部努力，去寻求一种有尊严、最有可能的和最正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见过许多惨遭迫害的人，特别是见过许多被赶出政治舞台的政治家，他们执著地坚持自己的某种高于一切的观点，除此之外似乎什么都不重要，别的什么都不存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人们问及我的理论是什么、我完全赞成什么样的理论时，我总感到难于回答。说实在的，我并不完全赞成任何一种理论。这并非因为我是一个怀疑论者，而是因为我是个务实的人，不是一个学者。

今后几年里，情况会有所变化，政府以前采取的几个决定也许将表明是极其愚蠢的行为。不管怎样，有一件事情深深地感动了我，这就是我们决定为1970年格但斯克造船厂的殉难者和其他人树立一座纪念碑。为修建这座纪念碑，我自己曾被监禁过几天。最初，我们想用石头建造这座碑，后来又打算只简单地悬挂一块纪念性的匾额。即使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也被当局禁止了。但正是当局的禁止使得纪念碑在最终修建起来之后成为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社会的和宗教

的象征，成为提醒整个一代波兰人深切思考自己国家命运的标记。

当然，从根本上说，一切事物都遵循其自身固有的逻辑，我们只能面对现实的生活。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以便尽快从现实生活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办法远比从纯理论、纯民族观点和人为的观点中推论出的办法（这样做是特别危险的！）好得多、丰富得多。我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有幸受到某种直觉的引导，而这种直觉是一个降生在大家庭的人和一个大家庭的父亲才具有的。我们家生了一大堆孩子，也许正是这种生物学上的简单事实才促使我始终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我把自己在生活中获得的每样东西仅仅看作是一种借来之物。总之，从宗教的观点来看，我们所得到的一切——美貌、幸福或金钱——都不过如此。如果我们承认自己只是生活中上帝所赐各种礼品的暂时守护者，那我们便很容易避免头脑发热或是陷入绝望。

我知道我曾经历过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从现在起，每一天都使我更接近于未知的世界。我将面临更严峻的问题，更艰巨的任务；也许最坏的事情还在等着我。我就是这样来看待自己的未来的，我努力使自己为迎接可能到来的一切灾难做好准备。尽管如此，我从不希望或准备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这是荒谬的，因为我从不真想这样做，我关心的是各种不同的事物和需要解决的各种不同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自己不胜任在第一线工作，去领导别人——我常开玩笑地称之为“领羊群”。

1980年9月发生激烈论战时，我对攻击我的那些人说：“先生们，请来换换我吧！我已经领导了第一阶段的斗争；我们已经同政府签署了协议；现在该轮到你们来干了！”他们不

爱听这样的话。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再次指责我。事物的规律就是这样，当局势危急时，很少有人愿意投身于炮火猛烈的火线；而一旦局势趋于缓和，攻击和野心便会重新开始。就我个人来说，我不回避任何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然而也不会同别人抢着向前挤。我们已经使“团结”工会开始发挥作用，尽管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但人们由此认为，当时我能站出来对于他们是非常幸运的；正像有人说的那样，假如瓦文萨不存在，他们只好发明一个了。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信上说：“瓦文萨先生，您应该感到幸运。军管法对您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连教皇陛下也找时间来和您聊天。我一生举止正派，为此我又得到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当我去朝圣时，我只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模模糊糊地看见教皇。这难道公平吗？你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吗？”我的朋友，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母亲一生都渴望能去琴希托霍瓦的建于14世纪的雅斯纳·戈拉修道院，拜谒那里黑色的圣母玛利亚画像。她没有如愿以偿，而是去了美国，1975年死于一次交通事故。她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是因为她从不设法去实现它。事情的结果竟然是，我站在了悬挂黑色圣母画像的圣地前，并下榻于雅斯纳·戈拉修道院。我竟不费吹灰之力，命运便给了我曾经是我的母亲生前最希望得到的东西。我应该得到它吗？我对此表示怀疑。我一想到我的母亲是那样善良，就只能说，她比我更应该得到它。但即然我受到了邀请，我能拒绝不去吗？在我同教皇进行的为时一小时的谈话过程中，我甚至开始感到疑惑：我是否正在占有别的什么人的位置？不是有其他更多的人有比我更好的理由等着要见到他吗？

目前一段时间里命运一直在像这样地为我祝福；但也有

过一段时间命运带给我的却是不幸。情况可能会再次发生变化。也许有人将砍下我的头颅。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我最后拿到的是张好牌。每个人都将会说许多人曾帮助了我，但不管怎样，我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某些东西。

下面我就开始讲述我所取得的“某些东西。”为了使我的讲述尽可能全面，并表明相反的观点，我要经常使用我的档案材料，其范围相当广泛。这些材料包括我的来往信件、会见的记录原稿、各种声明的原稿、大量的讲话录音，最后还包括我的“行动日记”，这部日记记录了从1983年初到我出狱返家后不久这段时间里的情况。我还受益于我的同事们的帮助，在我们一起活动的几年里，他们可以随时翻阅我的文件，随时到我家去，因此他们能够提供大量的信息，能够叙述他们当时的所见所闻，提供当时重要会议和谈话的原始记录。他们提供的材料在我的讲述中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帮助那些不熟悉波兰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团结”工会发展详情的读者了解我叙述的情况的背景知识，我在下面列出一个简要的大事年表。

本书还有一张波兰草图，帮助读者确定我讲述时所提到的重要地点，并表明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实际边界。

大 事 年 表

（下面列出的波兰历史重要事件年表，是医学博士马雷克·B·扎莱斯基和耶稣会牧师本杰明·菲奥雷提供的）

1791 年

颁布宪法、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宪法对全体公民、宗教自由、世袭王位和常备军队提供法律保护。

1794 年

科希秋什科起义：美国革命战争和波俄战争（1792—1793）中的英雄科希秋什科，在克拉科夫领导波兰军队试图收复波兰在这两次战争中被瓜分的领土。结果波兰军队战败，科希秋什科被俘，波兰第三次被瓜分，随后波兰丧失了国家地位。俄国及其盟国普鲁士、奥地利瓜分波兰（1795）。

1797 — 1815 年

波兰军队服务于拿破仑：波兰军团驻军海地（1797）和普鲁士（1806—1807）；华沙公国建立（1806[1]）；波兰同奥地利的战争（1809）；波兰同俄国的战争（1812）；维也纳会议建立了在俄国控制下的波兰王国；旧都克拉科夫被宣布为受奥地利保护的自由共和国（1815）。

1830 — 1863 年

灾难性的起义：11月波俄战争（1830—1831）；反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民族之春”（1848）；（1863年）1月反俄起义，波

[1] 应为1807年。——编注

兰独立的最后一线希望遭破灭。随后而来的是更加严酷的俄国化时期。

1818 — 1939 年

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获得独立；接着与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立陶宛以及宿敌俄国（苏联）和德国发生边界冲突。波苏战争（1919—1920），在毕苏茨基元帅指挥下波兰取得了胜利，并收复了历史上的东部边界领土（1921年里加条约）。政治的不稳定和邻国的敌视促使毕苏茨基发动政变（1926）；宪法被中止，反对派受到压制，直至在毕苏茨基监督下成立新的文官政府和颁布新宪法（1935）。

1939 年

苏德入侵波兰：1939年8月23日，莫洛托夫（苏联）和冯·里宾特洛甫（德国）签订联盟条约，该条约附有一份旨在“第四次”瓜分波兰的秘密议定书。苏德条约为苏德入侵波兰大开方便之门，不久纳粹便进攻波兰：1939年9月17日，撤退的波兰军队与不宣而战便夺取和占领波兰东半部领土的苏联军队对峙。1939年10月5日，波兰军队放弃抵抗；军事领导人和政府文职官员离开波兰前往法国成立流亡政府，并组织自治军队，在挪威、英国等地同德军作战。

1942 — 1946 年

波兰武装力量转战于中东、北非（托布鲁克）和意大利（卡西诺峰、安科纳、波伦亚）；当纳粹在卡廷附近的森林里发现大批波兰官员的墓碑时，波兰与苏联第二次断绝外交关系。所有证据表明这些死难者（4000多名官员）曾是被关押在科济耶尔斯克集中营的波兰囚犯，1940年春被苏联人杀害。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和华沙犹太人起义：1942年，纳粹把所有占领国的犹太人聚集起来，送到死亡集中营，大约有600万人被

杀害。许多城市（华沙、罗兹、克拉科夫等）的犹太居民在被驱赶之前被隔绝在几个彼此分离的居住区里；波兰抵抗组织（AK）通过它的情报员（杨·诺瓦克、杨·卡尔斯基）通知西方盟国纳粹即将进行大屠杀，但盟国没能做出有效的反应。犹太人战斗组织（ZOB）发动起义，但被占绝对优势的德军击败。犹太人居住区被夷为平地，实际上所有犹太战士都被杀害。

1945 年

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西方列强试图把苏联继续当作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在雅尔塔（2 月）和波茨坦（7 月）对苏联的要求做出重大让步。西方承认苏联在中欧的政治利益，并以举行自由选举为条件承认听命于苏联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P K W N）为波兰临时政府。

1949 — 1954 年

恐怖统治时期：公安部（U B ）的检查和恐怖活动是共产党统治赖以存在的两根支柱；数百人被捕、惨遭拷打和处决；在被捕的反对派领导人中有波兰红衣主教斯特凡·维辛斯基，他过了整整三年铁窗生活。

1956 年 6 月

波兹南工人抗议示威：示威者包围该省的党政办公大楼；在同政府军队的三天冲突中，有74人被杀，300人受伤。

1968 年 3 月

学生抗议示威：官方宣传工具发动了一场让工人反对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运动，把后者描绘成犹太复国主义者，煽动反犹主义情绪。知识分子、教会甚至议会代表都举行集会，支持学生；也有许多工人听信官方宣传，拒绝帮助学生。

1970 年 12 月

格但斯克爆发抗议示威：基本商品的价格上涨在沿海城市格但斯克、格丁尼亚、什切青和埃尔布拉格激起抗议示威（12月14日）。造船厂罢工工人发动攻击：前来平息罢工的军队向工人开枪。

1976年6月

腊多姆和乌尔苏斯爆发抗议示威：政府当局宣布大幅度提高基本食品价格（平均提价47%）。全国将近75%的大型企业号召举行罢工，抗议政府提高物价。最激烈的抗议是在腊多姆和乌尔苏斯。腊多姆的罢工工人焚烧了党委办公楼：在普洛兹克、格鲁琼兹、罗兹、格但斯克，也发生了类似的抗议示威。

1976年9月

"保卫工人委员会"成立：1976年7月，一群知识分子公开捍卫那些因参加6月示威而受到当局迫害的工人：这些知识分子（其中也有党员）代表着各种政治观点；1976年9月，这些人组成保卫工人委员会。

1977年11月

"飞行员大学"建立：在安杰伊·采林斯基鼓动下，学校针对官方教程中被忽略和带有倾向性说教的内容开设讲座。

1978年3月

"自由"工会成立：自由工会创建于卡托维兹省（3月），随后又在格但斯克建立（4月）；军队和保安部队进行骚扰，许多人被捕。

1979年7月

"波兰青年运动"兴起：这是由格但斯克学生在亚历山大·哈尔领导下首创的反政府运动。

1980年7、8月

罢工：罢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废除给警察和保安人员的优惠待遇，免除迫害，解散官方工会。在格但斯克，船厂解雇安娜·瓦伦滕诺维奇和在此以前解雇瓦文萨是这里掀起罢工浪潮的导火线。在取得政府的让步后，瓦文萨（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立即宣布停止罢工，但迫于同事们的压力，他又撤销了这项决定，宣布继续罢工，同其他厂的罢工工人团结战斗。

1980 年 8 月

格但斯克、什切青和亚斯琴别协议：政府分别同什切青（8月30日）、格但斯克（8月30日）和亚斯琴别（9月4日）的罢工工人举行谈判，达成协议，此后"团结"工会合法存在500天。

1980 年 11 月

独立自治的"团结"工会登记注册，这个工会成为在苏联控制的国家中第一个合法的独立工会。1981年5月，瓦文萨与波兰总理雅鲁泽尔斯基举行谈判，促成了"团结"农会的建立。

1981 年 9 月

独立自治的"团结"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瓦文萨为工会主席，并呼吁进行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1981 年 12 月

实施军管法：到12月13日，波兰的内外通信联系全部被切断，工会、反对派组织和知识界的领导人以及一些牧师遭逮捕。

1981 — 1987 年

抵抗时期：独立自治的"团结"工会未被逮捕的领导人号召实行总罢工。罢工迅速爆发，随后遭城市民警快速部队镇压；工人消极怠工；未经当局检查的地下出版活动蓬勃发展。

1982年4月

“临时协调委员会”成立：“团结”工会地下组织于军管法实施4个月后建立。

1982年10月

独立自治的“团结”工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其财产于1982年12月被全部没收；“临时协调委员会”号召抵制新政府和全国总罢工。

1982年11月

瓦文萨获释，但仍处于当局的严密监视之下；1983年4月，瓦文萨避开当局监视，秘密同临时协调委员会领导人会晤。

1983年7月

解除军管，但原法令中的各种限制被写进了法律。

1983年12月

瓦文萨获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的消息鼓舞了波兰人民的士气。瓦文萨担心当局可能不允许他返回波兰而同仍被监禁的人联合起来，拒绝亲自前往奥斯陆领奖。

1985年11月

当局解除33所大学校长的职务；其他大学的校长联合辞职。

1986年7月

大赦：当局宣布实行大赦，（从在押的11.4万人中）释放2万人，其中政治犯225人，这些人中有米赫尼克、李斯、弗拉塞纽克、布亚克、莫杰莱夫斯基。

1986年11月

当局对未经检查的出版物实行新的限制性立法：新法律规定，对收藏未经官方检查的材料的人采取长期监禁、加倍罚款、没收汽车等惩罚措施；对上述人进行惩罚时，其判决手续可以简化。

1987 年 6 月

波兰第三次朝拜约翰·保罗二世：教皇与政府针锋相对，反复提到“团结”工会和1980年诸协议“在外部世界的重要意义”，并强烈表示支持人权。

第一章　根

我将从我的家史谈起。我要感谢我的姐姐伊莎贝拉唤起了我的记忆和更多的东西。她的记录和回忆反映了一个简朴的波兰家庭的经历；这些回忆把人带到我所熟悉的我的家族生活过的那座房屋和那片田野。

每当我的姐姐——我只有这一个姐姐——从她的卧室的窗户向外看时，总看到野绵葵。夏天，野绵葵是您早晨醒来第一眼便能看到的东西，它们是大自然在四周一片灰色的背景中流露出来的一点点诗意。这些野绵葵总使我忆起往事。野绵葵沿房子的墙壁向上生长，开花的时间很长，在我们年轻人眼里产生着富裕、充沛的幻觉。野绵葵随季节变化花开花落，好像舞台上的装饰背景，把破旧的房屋外表掩饰起来。从外表看去，我家的房子能使人产生不可磨灭的怀念之情，这是难忘的童年故乡所激起的那种情感。

然而，我家周围的那片土地却一点不使人留恋。邻居们早已离去，他们认为那里的环境恶劣，难以生活下去。在长满荒草的沼泽地的中央有一个小池塘，池塘的边缘像是人工修成，然而却修得非常笨拙，只能把它看作一个临时的台阶，正等待人们由此登上新的人生舞台。当我祖父杨活着的时候，就把家分了，父亲鲍莱斯瓦夫分到的是沼泽地，接着就商议搬家。分到坏地就迁居，这在我们家似乎成了传统。

只要一离开沼泽地，周围的景色就不同了，绕过池塘踏

上当地的小路，那里尘土飞扬、干燥闷人。从这个角度看，池塘和我家古老而简陋的小屋倒显得是风景如画了。在小路通向一片桦树林的尽头，立着一个粗糙、没有任何装饰的木十字架。夏天，你在这条小路上行走，无需穿鞋，脚底踩在细软、柔和的沙土上，令人心旷神怡。小路不时地穿过一丛丛灌木，最后与另一条出查林村的小路相接。

我的出生地波波沃，只是个没有教堂的小村子，教堂设在索波沃村，查林村有学校和商店，这三个地方以内的三角区就是瓦文萨一家的世界。从格但斯克南行，沿维斯瓦河岸到达格鲁琼兹，由此渡过河，经托伦行至利普诺，然后向多布任前行，距多布任不远便是波波沃了。

多布任坐落在维斯瓦河高高的陡岸上，这一地区自中世纪以来在政治上一直动荡不定。历史上东方的商人常常经多布任，再顺着维斯瓦河到格但斯克和波罗地海沿岸。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城镇曾先后遭受异教部落、条顿骑士、瑞典人、普鲁士人、俄国人，最后是德国人的践踏和蹂躏。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长期以来的这些辛酸经历塑造了多布任居民勇敢、顽强、易于接受新事物的性格，这种品质是那些在波兰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边疆人民所特有的。

在君主共和时期，利普诺的地区议会通过了一项多布任自治法令。18世纪末，波兰开始被瓜分，从此波兰沉沦了一百多年之久。

马 泰 乌 什

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之间的某个时候，我的曾祖父马泰乌什在波波沃定居下来。我姐姐伊莎贝拉记得，她常常在

爷爷屋里读一本很旧的黑色硬皮书，书页已经发黄，书中讲的是我的曾祖马泰乌什和他的兄弟们的故事。毫无疑问，马泰乌什来波兰时拥有可观的财产，这笔财产是他父亲在西欧某个地方，也许是在法国或意大利积攒起来的。但最有可能是在法国，因为他父亲的堂姐妹，或许还有其他兄弟们今天仍生活在那里。有一种说法大意是，马泰乌什的父亲因想要发财而移居美国，回欧洲时带回大笔财产。没人知道马泰乌什为什么会千里迢迢到波兰寻找安家之地。不过也有人说，他来波兰的目的是为了改名字（是改名呢，还是换姓?），于是在多布任定居下来。多布任远离嘈杂的大道和拥挤的城市，它的森林和湖泊未遭破坏。尽管瓦文萨这个姓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喜交周游四方之士”，但他已经厌烦“周游世界”的日子，需要安定下来，编写家史。这个说法可能比较合理。

根据家里人传说，这以后马泰乌什买了315莫尔格，即约400英亩的土地，换句话说，实际上当时他买下了整个的波波沃村。他是个种植能手，非常善于尽可能多地从土地中收获庄稼。他以保持其清洁为条件把小片的森林租给鲁蒙卡的乡邻们，还委托当地犹太人负责管理叉路口上的旅店，他因此赢得了一个精明强干的管理人的声誉。在当时，旅店兼有小卖铺、客栈和银行的职能，人们到这里来可以借钱，还可以打听到当地人之间的各种消息。旅店是大庄园和小村庄之间、地主和农民之间联系的纽带，它在这种联系紧密的乡村社会的中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马泰乌什受到当地人的广泛尊敬。他懂得如何在与人们交谈时提出自己的忠告；如何妥善处理各种事物而又不表现出傲慢。尽管他来这里的时间较晚，然而关于他的某些传说已使人们把他看作是这片土地的继承人。据家里人回忆，他

是个举止谨慎、敬畏上帝的人。在画像上，他不是正往马车上套他的马，就是手握念珠四处巡视他的庄田。他有一座带门廊的小木房，门廊是富裕的象征，且具有装饰作用。他的妻子在仆人帮助下，收拾房子和照顾孩子。在马泰乌什的晚年，这所他深爱的房子在一场大火中焚毁，因这次灾难性的打击他变得郁郁寡欢。他去世后，孩子们分掉他的财产，儿子们得到了土地，女儿们得到了谷物和剩下的家具。

家里人谈得最多的是马泰乌什的几个儿子：康斯坦丁、温森蒂和老大杨（这是家里很常用的教名）。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生活经历。在1863年反对俄国占领的民族起义失败后，康斯坦丁和温森蒂被送到西伯利亚，许多年不能返回波兰；杨为了逃避俄国人的报复，离开波兰，逃到法国，和某个远房堂妹一起生活，尽享欢乐，他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钱才偶尔回到波波沃，那里有他分到的一份遗产。每次回来，他都卖掉一部份森林和土地，留下他的妻子和逐年增多的儿女照看房子。

杨

杨的大儿子就是我爷爷，他在受洗礼时也取名叫杨。他步其老爹的后尘，在法国生活的时间多于在波兰，他经常去赌场，挥霍他的财产，荒唐到几乎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最初，在波波沃还有一个女仆照看房子，她是当地的农妇，帮助操持家务，随着家里人口的增多，都张着嘴要吃饭，杨也就没钱雇她了，这是我家迅速贫困的一个迹象。从一次法国之行返回后，杨几乎全部卖掉了被他荒废的耕地，一大家人完全陷入了贫困之中。1916年，杨的妻子在生斯坦尼斯瓦夫

时病逝，使家庭问题进一步恶化，斯坦尼斯瓦夫后来成了我的继父。杨这时日渐衰老，几年后他再次结婚，又生下5个孩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那一辈人已完全衰败。原先的50英亩土地只剩下一小部分，最后分给了他的一大群孩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波兰重新获得了独立。波兰1918年的新生和1919年至1920年的波苏战争等一系列事件直接影响到我家；我父亲的几个哥哥，即我的伯伯都积极参与了这些事件。

这是波兰现代史上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时期。当时的波兰已作为独立国重新出现在欧洲的版图上。第二共和国的边界一直是政治上没完没了讨价还价的对象。当时的国家首脑约瑟夫·毕苏茨基元帅在拿不出任何明确方案的情况下，只想要显示波兰在东方的存在，渴望恢复历史上波兰被瓜分前的古老边界，并相信既成事实胜于一切国际保证。他下令波军进攻苏俄，一直打到基辅城下，然而在那里被红军赶了回来，被迫撤至维斯瓦河一线。苏俄的威胁使整个波兰自发地动员起来，结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波兰史上和波兰人心中，此次胜利作为"维斯瓦河奇迹"受到纪念。无疑，此时正是塑造这个国家形象和维持其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的关键时刻。尽管在波兰独立的最初几年里国内存在着各种各样明显的政治分歧，但当红军用刺刀来"建议"波兰应进行革命时，我们的回答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绝不"。这一回答决定了我们的胜利和未来制度的形式，可这样的局面只维持了20年。

我家的年谱反映了这一切历史事件，但中心内容却都是我祖父和我几个伯伯的个人经历。祖父杨有"政治家"之称，据说他曾是"波兰军事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专门为与占领

军作战的部队提供军事人员。他总是炫耀自己与日后国家首脑约瑟夫·毕苏茨基元帅的关系。他声称自己曾在维斯瓦河战役中从俄国人手里死里逃生。事情是这样的：波兰军队当时正向华沙溃退，毕苏茨基也在其中，而后面却有一队哥萨克骑兵紧追不舍；杨当时也是军人，他急中生智，穿上女人的衣服，把敌人引到错误的道路上，从而摆脱了追兵，救了他自己，也救了毕苏茨基元帅。这个故事在历史学家们看来很难说是真实的，不过在毕苏茨基的经历中确实提到了一个类似的情节，并认为它是完全可信的，但它却不是发生在维斯瓦河战役中。杨在自传中还提到毕苏茨基元帅曾访问过他们甩掉追兵的地区，时间是在波苏战争早已结束的两年以后。家史中的内容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虚构的，这很难说清。但可以肯定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祖父杨的屋子里，毕苏茨基是个受崇拜的人物。我祖父和我的几个伯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保持着一张很旧的褪了色的照片：毕苏茨基元帅脚蹬军靴，身披大衣，身旁站着祖父杨。他生前常把这张照片拿给儿孙们看，这些孩子是他晚年最热心的听众，他们渴望听到各种故事，让想象去填补现实留下的空白。

杨的两个大儿子都参加了1920年8月的维斯瓦河战役，一个儿子成了俄国人的俘虏。家里人记得他寄回的两封信，他在信中谈到战俘营的生活、俄国人民的贫困和他的屈辱地位，以及苏维埃新政权对待战俘的种种不人道行为。另一个儿子是我们家的斗士，他在波波沃因力大无穷而闻名乡里。他在村子附近投入了同一股哥萨克兵的战斗。人们传说，在他正要过河的时候敌人击中了他的马，如果他不找他藏在马鞍下的金子，就可能逃之夭夭，但最后他死于敌人的伏击，这种说法至今仍在波波沃的居民中流传着。

我姐姐伊莎贝拉仍清楚地记得祖父杨：他是个终生留着大胡子的老头，不时地去看望他的儿孙们。孩子们总有些不太情愿接待他，而他一进门便舒坦地坐在炉角旁，或坐在屋前的小板凳上，滔滔不绝地讲起他在西欧城市里的放荡行为，譬如如何在赌场里胡闹，在法庭上受审，如何捉弄别人和追求一个又一个女人，没人能打断他。妇女们，特别是我的母亲则急欲把他轰出门外。他在临终前，几乎已经一贫如洗，花钱也就少了；他不再花钱买烟，而是把仔细读过的报纸撕成小条卷成烟卷来抽。

卡齐米日·帕夫沃夫斯基是波波沃最年长的居民之一，现在已达80高龄，他还清楚记得瓦文萨这个大家族的情况：

> 他们住在靠下面一点的桤木林里，离我们家不太远。瓦文萨一家生活贫穷。他们把从马泰乌什那儿继承来的土地全卖光了。1917年我认识了杨；他是个有头脑的人，对政治感兴趣，读过很多书。但他同约瑟夫·毕苏茨基元帅的那段故事纯粹是编造出来的；他只是想吹牛……据我所知，根本没那回事。他受过教育，知道如何把土地分给儿子们，他认识所有的测量员。在查林村，我们经常在杂货铺的酒店里瞧见他买好吃的，喝着烈酒；他总要卖掉一些东西来换钱。他花钱如流水，而自己的孩子连最起码的东西都没有。孩子们也不关心他们的父亲。先是齐格蒙特，后是鲍莱斯瓦夫去到邻近庄园干活，盖房子，搭牲口棚。鲍莱斯瓦夫在附近一个农场安了家，接管了他那份遗产，开始好好地使用它。他是个好孩子，非常谦虚；他是波兰的孩子，不是吗？……

父　　亲

兄弟几个分掉了杨留下的一点点财产。我父亲鲍莱斯瓦夫生于1908年，分得7英亩十分贫瘠的土地，几年后斯坦尼斯瓦夫，即我未来的继父占有这点财产。

这块土地面积太小，根本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不久，三个年长的兄弟——齐格蒙特、鲍莱斯瓦夫和伊齐多尔开始以技艺高超的木工手艺而闻名。他们在布鲁增、索波沃、查林和多布任建造房屋、乡村教堂、牲口棚和谷仓。在一张旧照片上，他们站在一座正在建造的小屋前，三人身穿短夹克，扣子一直系到脖子下，下身的军裤扎进靴筒里，看上去不像是乡村木匠，倒更像是士兵；鲍莱斯瓦夫站在中间，与房子的女主人手挽着手，手中还握有一根长长的细木条。他是三个人中的头头。如果他的两个兄弟不好好干活，他总是毫不客气。鲍莱斯瓦夫身高力大，有一双明亮动人的眼睛：坚毅、果敢、甚至有些专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送给“费拉小姐”，即他的未婚妻也是我母亲的那张照片，他在上面还签上了“瓦文萨”的名字，字体很像我的。他穿戴潇洒风雅——笔挺的黑色夹克、白衬衫、颜色鲜艳的领带——左手放在膝盖上，右手贴在臀部上，两眼直视前方，俨然一副严肃的表情。他脸庞宽阔，富有男子气概，高颧骨，头发向后梳，盖住宽阔的前额，下巴轮廓分明，小耳朵，鼻直口阔，薄嘴唇，蓄着淡淡的小胡子，浓眉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伊莎贝拉说：“我一看到这张照片，就好像我昨天还见过他。我在孩子中是老大，所以我对以前住过的房子、对母亲、父亲记得最清楚。父亲是个非常冷静而又细心的人，总是急家中所急，想家中

所想。但他也很固执，而且雄心勃勃，在处理同别人的关系时常常显得很笨拙，干活时也爱过份挑剔。”姐姐认为我长得很像父亲，只是他比我高些，身体比我单薄，而我的鼻子和嘴巴长得随他，我的眼睛则更像我母亲。

卡明斯卡，即“费拉小姐”是邻村波克日尼查的一个17岁的少女，她非常爱鲍莱斯瓦夫，并成功地冲破父母的约束，说服他们同意了她的婚事。她的母亲知道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和人生世故，她在美国曾两次结婚，两次守寡，在波兰又第三次嫁人。她博览群书，有一个自己的图书室，藏有19世纪和20世纪初波兰文学的重要著作，特别是亨雷克·显克威支、伊格纳采·克拉舍夫斯基和鲍莱斯瓦夫·普鲁斯的著作。这位妇女显然盼望自己钟爱的小女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对知识的兴趣而不是在性格上，她的父亲同她的母亲非常相配。他读书甚广，关心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对那些标志着波兰复兴的事件总是激动不已。他的一家人在多布任土生土长，是标准的本地人。儿子继承了父亲的特征，父子俩都蓄着大胡子。在他家的每代人里至少出一个教师或牧师，或僧侣或修女。他们因此而感到自豪。

另一方面，人们常常提起瓦文萨一家不是当地人，他们挥霍掉了自己的财产，更糟的是，还卖掉了土地——波兰农民最神圣的东西。我们家至今还谈到这些说法在当地人中所引起的对我们的反感，但鲍莱斯瓦夫在婚后不久便证明他不同于自己的先人，他和兄弟们一起在建筑业上不断取得成功。

年轻的鲍莱斯瓦夫夫妇最初生活很艰难，没有自己的住处，甚至没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来抚养第一个孩子伊莎贝拉。有三年的时间，小“伊莎”只能住在波克日夫尼查的外婆家。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建起了一所简陋的住房。这所房子

用木料和泥灰建成，同一个牛棚相接。在世世代代的当地人的住房中，这种房屋是最具代表性的。夫妻二人就住在这所用茅草盖成的房顶下。不久之后，牲口棚里有了一头牛、几头猪和几只小鸡。这所房子共有两间小屋，其中一间用作厨房：带罩的大壁炉上挂着几串香肠，墙上挂着几口长柄平底锅，屋子中央摆了一张很大的粗木桌子，两旁各放一只木凳——这是我家吃饭的地方。这所简陋的房子位于离森林不远的池塘边上，父亲在卜屋四周种上了杏树和樱桃树。厨房旁边还有一个花园，这在当地要算是非常稀有的奢侈品了，但却是孩子们喜爱的游戏场所。

有一张旧得发黄的照片，这是1938年一大家人团聚时拍下的。照片现已褪色，出现了裂纹。在这张照片上，外婆、外公卡明斯基、我母亲以及"伊莎"和爱德华坐在长凳上，身后是高高的芦苇。照片上唯独没有我父亲：他们那时一直等他，但他在罗基塔刚修建了一座修道院（这座建筑至今还在），没能及时赶回来。从多布任专门请来的犹太摄影师工作很忙，不能等到我父亲回家。摄影师打开箱子，支好三角架，装上带皮腔的照像机，把脑袋钻到黑布下面，叫大家都向前看着像机，然后他拍下了我们家生活的这个瞬间。我们家的凝聚力来自外婆那边而不是来自我的父亲。外婆和母亲的衣着漂亮入时，脚穿制做精巧的皮鞋；外公身着深色西服和马甲，内套白衬衫，系深色领带；孩子们都是一身白装。母亲显得美丽端庄，身材苗条，有一双亮闪闪的眼睛。她身着单色衣装，在稍稍有点敞胸的领口四周绣着几朵红色石竹花，看上去绝不像农民，而更像城里的少妇。

这张照片还反映了外婆卡明斯卡的生活世界。她的生活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她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美国，抚

养头两次婚后生下的孩子,以及在波波沃抚养她最小的女儿;第二个时期,她在波克日尼查出色地经营农场。她充沛的精力和强烈的好奇心在她的亲属以外也是很闻名的。她还有个“美国游客”的绰号。她有时越过大海,去看望她的孩子们,也顺便看望她的表姐妹和她在美国生活时结交的亲朋好友。她从孩提时便像19世纪末其他许多波兰人那样去美国谋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她第二个丈夫不幸去世后,她才在自己最小的几个孩子的陪伴下回到波兰。她身材苗条,举止优雅,神态高傲,喜欢穿着风雅,这从她的许多其他照片上可以看出来。有抱负、果断、能吃苦耐劳,她把所有这些品质都传给了她最小的女儿费莉克莎。女儿不仅在体态容貌上长得像她——她仅比母亲单薄一些——而且在性格和对生活的态度上也像她。

这张在我家房前拍摄的照片也反映了波兰当时正发生的变化。如果很容易在有几千居民的邻近小镇多布任找到一个犹太摄影师,那么这件事并非是个巧合。犹太人以前主要聚集在波兰东部地区,在波兰被“瓜分”时期,他们一部分进入俄罗斯帝国,一部分并入奥匈帝国,而此时他们已经流入波兰其他省份。波兰当时的社会环境适于小商业的普遍发展,这为从东方来到波兰领土上那些最贫困的犹太人提供了就业保障。从经济观点看,犹太人的层次不一,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有罗兹的大银行家和大企业主,也有流亡在外寻求在波兰小城镇定居的犹太平民。人们在著名导演安杰伊·韦达摄制的影片《希望之土》中已钦佩地注意到,大批犹太移民在小城镇中正建立起自己的地位,人数占到当地人口的80%,实际上他们已控制了一些小城镇。

多布任的发展明显地反映了国家迅速的经济进步,从全

国来看，横跨桑河和维斯瓦河的“中部工业区”已经出现；西南部正兴起一个重要的采矿和冶炼中心：在离格但斯克几英里远的沿海沙地上，正建设格丁尼亚城，按照设计师塔德乌什的计划，还将在那里兴建一个港口，它将完全依靠新波兰自己的力量使之成为波罗的海地区最现代化的海上交通枢纽。就这样，波兰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奠定了现代化的基础，从而使波兰民族有可能在一定的领域里赶上西方最先进的国家。波兰正在“展翅腾飞”；现代航空工业诞生了，开始制造出全部国产化型号的飞机。这个新国家用短短8个月的时间在捷克边界的波兰一侧建成了整个直通塔特拉山脉顶峰（高约6000英尺）的汽车索道，进一步显示了它的创造力。1000个类似的建设项目的成就创造了一种有着“经济奇迹”般特征的繁荣局面。就建设成就而论，今后任何时代都无法同这个时期相比拟。

现在让我们回到30年代末期……。在这一时期，我父亲过上了不错的生活：家里甚至开始谈起要建造新房和扩大土地的计划。村里所有人都十分赞赏父亲的木活，也尊重他的良知和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家里虽经常发生争吵，而且一吵就可能是几年，但起因都是些微不足道的琐事：我父亲的那些兄弟姐妹总是为争夺遗产、为田地划界和过界争吵不休。鲍莱斯瓦夫和杨常常是这类争吵的仲裁人，当杨离家去美国看望表姐妹时，鲍莱斯瓦夫就代替他成了一家之主。

将近1939年8月底时，三兄弟应征入波兰军队，不久便参加了姆拉瓦附近的激烈战斗。鲍莱斯瓦夫和斯坦尼斯瓦夫被德国人俘虏，但几个月后便获释回家。杨当时在美国，自愿参加了美国远东突击队，返回波兰后，终生领取美国政府发放的伤残抚恤金。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另一个兄弟的经历。

正是在这段时期里，“新法令”在波波沃开始实行：德国殖民者在最好的土地上定居下来，而土地的原主则变成了自己土地的雇农。瓦文萨一家遭受了同样的命运。青年人和老年人都被赶到沿维斯瓦河、德尔文察河和斯克瓦河的德军防御工事像奴隶一样干活。村庄变得空旷了；妇女和孩子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根本没法使农场免于荒芜。索波沃教区的牧师惨死在集中营里，教堂从此大门紧闭。1943年冬，德军在东方的进攻遭受了失败，他们把波波沃和附近地区的男人赶到一起，全部带走了。

我姐姐伊莎贝拉说，她当时不太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父亲经常朝普洛茨克方向去到什么地方，每次都带着一些物品。我们家聚满了来来往往的人，家里偶尔杀猪炖肉款待他们，还拿出伏特加酒请他们喝；有时人们在夜里来，聚集在小牛棚里，可能也睡在那儿，因为有几次伊莎贝拉给他们拿过毯子。她当时年仅9岁，是孩子中最大的。（爱德华比她小3岁，1937年出生，斯坦尼斯瓦夫生于1939年，而我于1943年9月29日凌晨3点30分像他们一样生于波波沃。）当地孩子给那些躲藏在树林里的男人们送去食物，有的送到布鲁增，有的送到拉盖夫尼基，孩子们因不惹人注意，能避开德国岗哨而比大人容易做好这件事。离我家不远的灌木林很难通行，有几个人就躲在那里。在德国人发动大规模袭击后不久，我父亲被抓走了。当时母亲正怀着我。在父亲被抓走之前，曾有一队骑马持枪的士兵来过；他们搜查了我家，显然找到了一些可疑之物。全家吓坏了，伊莎贝拉带着爱德华跑到树林里躲了起来；他们回到家后，父亲已经不见，斯坦尼斯瓦夫叔叔也和他一起被抓走了。

1943年冬德军大围捕时抓走的男人都被囚禁在查林村的

一个地方，这里现在建起了一所学校。许多人在那里被毒打致死；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仍然能看到墙上的血迹。绝大多数囚犯都曾经逃避去防御工事干活。他们只在查林村关了几天就被转移到他处，从此父亲和叔叔被分开关押。叔叔在押送他的队伍正要开进一个集中营——也许是达豪集中营时，成功地逃跑了。没人确切地知道他是如何逃跑的，但有一天，他对伊莎贝拉的儿子讲述了事情的一些细节：他曾躲藏在一家德国人的草料棚里；后来这家德国人的年轻女仆发现了他，并对他给予热情的照顾。她是个美丽温柔的德国女人。据我叔叔说，他们很快就相爱了。叔叔从德国回来时的打扮，很像一个盖世太保。伊莎贝拉刚一看到他简直快要吓死了！人们立刻怀疑他已同纳粹合作，但当他第二次被捕时，这些怀疑也就随之消失。然而战后仍有许多人对他抱有戒心。

父亲被捕后被强迫在利普诺附近做苦工，然后被囚禁在姆莱涅茨劳动营。囚犯们拥挤在冬天不生火的劳动营里，忍受着严寒之苦。当他们把头倚在隔墙上入睡时，头发常常冻结在一起，粘在木板墙上。父亲因严重咳嗽身体本来已很虚弱，这时又染上了肺病，由于得不到医治，病情急剧恶化。当他最后回到家时，已是骨瘦如柴、虚弱不堪，常常大口大口地吐血。他对生活已完全丧失信心，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当时，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只剩下不到两个月。

1945年5月，斯坦尼斯瓦夫叔叔也从集中营回到家。他马上开始工作，住在伊齐多尔叔叔家，但和我们一起吃饭。父亲的病情非常严重，以致家里人请来牧师准备为他主持后事。临死前，他盼着斯坦尼斯瓦夫叔叔快点回来，好安心离去。父亲一再表示，在没把我们母子托付给叔叔照料之前他

是不会放心的。他要斯坦尼斯瓦夫发誓好好照看我们，恳求我母亲照看好爱德华和我，并且说她总有一天会为我而感到骄傲。弥留之际他神志仍十分清醒。在一天凌晨大约4点钟，我们这些孩子在卡明斯卡照料下正在熟睡时，父亲平静地请母亲唤醒我们，带我们出去。然后他就悄然离去了。父亲死后，安葬在索波沃。全家人和许多邻居参加了葬礼，只有我不能去，因我那时才刚刚出生18个月。

一年后，母亲决定嫁给斯坦尼斯瓦夫。伊莎贝拉为此感到屈辱。她至今仍十分清晰地记得我们的父亲，他是那样的善良、和蔼；她也没有忘记我们家的圣诞聚会——这些都使她充满了幸福。然而母亲的改嫁却使伊莎贝拉十分难过，她不原谅我们的母亲，因为她认为母亲应该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应该自己照顾自己。现在，在我看来，这无非是孩子们的忌妒。然而她的这种情绪当时也感染了我们，致使我们一起反对继父。有一段时间，我们跑到树林里，拒绝见他。我们从没有真正地承认过他。今天，我的姐姐承认，她当时的行为是太过分了。斯坦尼斯瓦夫确实尽力照顾了我们。他也惩罚我们，但感受却有点不同于我们的父亲，他曾两次使我们很伤心。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好像并不十分幸福。继父的脾气反复无常，一会儿和蔼可亲，一会儿又大发雷霆。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对我们的行为很像我们对他的一样。母亲和斯坦尼斯瓦夫又生下三个儿子，他们是塔德乌什（1946年）、齐格蒙特（1947年）和沃伊切赫（1951年）。

我姐姐回忆起，大概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养成了一定的性格，每当我感到恼火时便表现出来：我常把手攥在身后，一言不发，显出沉思的神情。爱德华、斯坦尼斯瓦夫和姐姐给我起了个“乡村大人”的绰号。我生性十分随和，很少发

脾气，但当别人把我看成孩子时我就受不了。不管因为什么事，在家里发火和埋怨都会得到原谅。如果我们兄妹吃饭时闹别扭，母亲会立刻察觉到，我们必须马上彼此道歉。同样，在每次去教堂之前，我们也都要彼此讲和。我十分爱我的母亲，我总是坚决地护着她。虽然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我常常勇敢地反对继父，充当母亲的保护人。尽管在所有的孩子中我待在家里的时间最长，但我认为，我从未真的想要承认我们的第二个家，承认斯坦尼斯瓦夫是我们的父亲，这也许是受伊莎贝拉影响的缘故。

当我离开家乡之后，一切曾经把我与家庭以及波波沃村——我的祖先定居和生活过的地方，也是我的出生之地——联系起来的东西立刻全都消失了，我不想保留自己同过去生活的任何联系。我更关心新的生活，而不怀恋过去，依恋旧情不是我的天性。我这样讲并非嘲笑人们怀念自己的故土、描绘“故乡”的形象。有些人事事都与故乡联系起来，但我却没有这种怀乡之情。这可能是我性格上的缺陷，也可能是我不安定生活的结果。我总是认为，是我自己创造了自己，而不是我的家庭。我从不费心去收集家庭纪念品。我最近编制的相册并不很厚：几张外公、外婆、我父母和继父的照片，几张我们这些孩子和我服役时的照片，我妻子达奴塔的照片，我们的结婚照片，以及达奴塔、我与孩子们的合影。同这些照片很不相称的是，相册中有很多照片是“团结”工会时期拍摄的。

我不太了解我的祖父、祖母和外公、外婆。即使当他们年老时，他们也很少来看我们，带我们去散步，教育我们，或是带我们去做短途旅行。祖父要照料自己的农场，他必须干活。祖母也是如此，对于她，乡村生活就是洗衣、做饭

和缝缝补补。因此，在家中母亲负责教育我们这些孩子，她非常疼爱我们。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母亲的形象是唯一清楚的人。她是一个有教养的妇女，尽管她所受的教育只限于小学四年。她对历史和时事感兴趣，阅读非常广泛。每天傍晚地里的活儿干完之后，邻居们常来请教她，她的嫂子和村里的妇女也常来看她。晚上，她时常念书给我们听，她的声音甜美动听，使人倍感安慰。每当这时我们就会感到无比的快乐。她给我们读当时在乡村很流行的书《神秘的圣殿》，以及显克威支的《条顿骑士》、历史三部曲和克拉舍夫斯基的《古老传说》。母亲讲的故事都有深刻的寓意，教育人要诚实、不断改善自己，要诚实和是非分明。母亲笃信天主教。她带领人们在露天的圣母像前做祷告、唱圣诗；冬天邻居们就到我家中做祷告。几乎可以这样说，我的信念中已流入母亲的乳汁。

父亲死后，我们总把继父当作“外人”继父尽一切努力抚养我们，也许比一个生身父亲做的还要多。他还尽力公平对待我们四个孩子——他妻子在第一次婚姻中生下的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我们从未看出他更偏爱自己的三个孩子，而是管教极严。乡村的生活条件当时是非常艰苦的：由于对土地分配的争吵，叔叔伯伯们之间连续20年基本不说话，只是在出席某个伯父或伯母的葬礼时才偶尔说上一句半句。（伯伯叔叔们的生活就是如此，当时显得很凄凉。）乡村长大的孩子的经历不同于城里的孩子。在乡村，甚至最小的孩子也要干活，因为有太多的嘴要吃饭，不允许有闲人。五岁时，我们就放鹅，七岁去牧场放牛，十岁照看其他牲畜，干各种体力活，这一切都是在放学后干的。即使最机灵的孩子要想逃避一件特别困难或极为不快的工作，也要装出对学习某门功课有异乎寻常兴趣的样子。

我们有个四英亩的小农场。房子很简陋，没有电灯，波波沃在50年代末才通电。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一个个依次上了学（我们要走四英里路，时常赤着脚到学校去），留下小的做家务。每天下午至少有两个小时，我要把草切碎喂牲口，而弟弟们总是摆弄着切草机不放手。由于在牲口棚里的草堆上踩来踩去，几年后我的脚打起了厚厚的茧子，直到今天还隐隐作痛，这使我清楚地回忆起童年时干农活的情景。

我和我的哥哥们还利用额外时间去邻居的农场里干活；假期里我们四个人要去米哈尔斯基的砖厂从早干到晚。秋天，我们为买冬天需要的东西省吃俭用，节约每一分可以节约的钱。我母亲的表姐亚尼娜·布罗莱维奇姨妈常常从美国寄来包裹，这对我们帮助很大。邮包越大，我们越高兴，特别是姐姐伊莎贝拉更是兴高采烈。然而，我的母亲似乎对这种事情感到羞愧。她是个不愿接受任何人东西的女人，孩子们喜欢姨妈寄来的东西因此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就当时农村的一般条件来看，我们得到了母亲相当好的照顾。母亲一向穿着整洁，她也尽可能使我穿得漂亮些，总是把我打扮得干干净净，衣服是精心缝补和熨过的。屋子也是这样，经常进行粉刷，刷得白白的，地板总是擦洗得一尘不染，屋子里的一切都浸透着舒心的肥皂味。母亲对我们的精心照料，使我们有别于村子里的其他孩子。

今天，我几乎不知该怎样对我的孩子们讲述我自己的童年，他们对那时的事情是很难理解的。谁能想到将近收获季节时我们会缺乏面包呢？有时我们两个月连一点面包屑都尝不到。今天，我仍记得在多布任用柴火烤成的面包的特殊滋味。我八岁时第一次去多布任给家里取面包。从波波沃到多布任要走一条六英里远的小路。我沿着小路左顾右盼地向前

走，鲜花和小鸟使我着迷，我在田野上漫游；结果，当我到多布任时已经没有面包了，我只好空手而归……。在面包片上涂黄油或猪油是最好的美餐。在每年庄稼收获之前，我们每星期天都吃到肉，尽管肉极少。在冬天的午饭中，我们能吃到土豆和拌猪油的蒸面条。夏天，我们的饭食就好多了。我们是喝牛奶长大的，我们不卖牛奶，唯一的一头奶牛供我们全家享用。我们还经常吃到蘑菇和鱼：蘑菇是采来作煎蛋饼配菜的，鱼是我们用网在附近池塘里捕的。

母亲不很喜欢农村。由于我们家周围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她一直准备带我们离开。继父对农村生活也没有多大兴趣；他想到其他地方去当一名"农业工人"。他找到了一个建筑队工头的工作，学会了为他的建筑队画草图，设计砖石建筑。他们建造教堂、农场和其他建筑，绝大多数都是木制结构。战后，建筑的活儿很少，继父挣的钱很难满足家里需要。他经常去城里，像人们在德国人占领时期所干的那样，挨家挨户地推销食品。他在经营农活上并不怎么走运：在当地长得很好的甜菜在我家地里一直长得很糟，他只能在甜菜收获季节到别家甜菜地里帮忙，尽一切可能打零工。

他对政治没有特别的兴趣，但喜欢收听装电池的短波收音机。晚上我们收听外国电台，我因此成了一个热心的听众，渴望听到世界各地的消息。从那时起，我懂得了从各种不同渠道，而不是仅仅限于从单一的所谓"官方真理"来源获得消息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在罢工和暴力冲突期间，当1981年12月宣布军管法后国家内外通讯联系全部中断时，西方的短波无线电台（发射远距离传输信号）成了提供有关波兰事件消息的唯一来源。

在我们家里，对每项计划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要进行长

时间的讨论，但最后作出的决定都是无关紧要的。我因没有时间或不想给达奴塔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已经改掉了这种习惯。当我干活儿时，我总是聆听父母的指教。每当继父要去某个政府部门办理行政手续时，他总要和母亲商量每一步如何做、每句话怎么说，事先把一切都预想和安排得滴水不漏。例如他这样安排："我敲门，然后进去说'早上好，我有这样一件事求您给办……'。"我母亲就会插话说："不对，停一下，你不要开始就说……。"他们没完没了地进行着这类谈话，常常逗得我发笑。我心想："亲爱的父亲，在你进门之前你就会全忘光的！如果一个秘书撞到你身上，碰洒了她的咖啡，接着便指责你笨手笨脚，那你精心准备的那套话就全没用了。你不可能预见并安排好一切事情。"大多数情况下，事情的发展总与我父母预料的不同。他们接受既成事实，过于软弱，不能对外界进行干预，无力保护自身的利益。例如，一个玩忽职守的邮递员没能及时送来邮件。在我父母眼里，邮递员就代表了外部世界即"行政当局"。同行政当局打交道，他们是无力保护自身权益的。邮递员未来之前，他们积极做好准备，好像要参加一场激烈的战斗，可当房门打开邮递员进来时，他们却立刻软了下来，呆若木鸡。

作为孩子，我们很少争吵，从不咒骂任何事情，尽管有时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父母之间常发生十分激烈的争论。争论一起，他们就会同时互说不止。我不参加争论，因为我十分明白他们此时谁都不会听一听对方在说什么，他们甚至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有一次，我想插进他们的争论。当他们的意见突然变得一致的瞬间，我讲了话，他们还真把我放在眼里。我17岁那年，有一天我对他们说："现在，你们听我说！不论你们怎样看这件事，如果你们都抢着说，那你们谁

也听不清楚谁在讲什么。坐下来，仔细想想，每个人说明自己的观点，都不要发火。”今天，我一想起他们当时脸上的表情，仍然觉得好笑！后来，到了夜里，我听见他们又讲起话来：“他是对的，你知道，那是正确的办法……。”

我在这种环境中成长，扮演一个心中明白的旁观者的角色。我从不愿意与那种以既成事实同时宣称事情只能如此的世界妥协。每当有人想要说服我，让我相信有一种绝对的逻辑支配着人类全部行为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旅行者朝彼此不同的、常常是相反的方向走去的景象。火车驶向终点，火车的运动确定了这些终点。然而，如果你站在某个乘客的立场更仔细地观察，你就会看到，这个乘客数年一直乘坐从格丁尼亚到格但斯克的火车（这只是个例子），先是去他工作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然后返回他居住的格丁尼亚，他的住处正好与另一个造船厂相邻，上班和回家的路线完全相似。对另一个从格但斯克到格丁尼亚的乘客来说，除方向相反之外，情况则完全相同。因此在两个乘客的一生中，他们一直做同样的旅行。从早年起，我的注重实际的头脑总是想着这种荒唐事。我对童年的回忆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日常生活中支配我父母的种种动机和感情就像一本摊开在我们面前的书。我仍记得他们一再重复的那些事情、他们的观念和他们的荒唐。我可以看到所有这一切对我父母的生活产生的影响。真正不幸的是他们太软弱。他们甚至吃不饱，缺乏必要的体力和信心，离开破旧的小屋，建造一座更好的新屋。他们总是谈到离开乡村去美国生活。但当1973年他们真的去美国时，却不是出于想去那里干一番事业。做出去美国的决定是出于一种家族中的共同看法和传统，即在我们家里总要有某个人在大洋彼岸。应该有人去美国，使家里其他人能够获得某种

安全感和财政上的帮助。这种看法已经溶进了我们的血液。朴实的人按朴实的方法看待事物。

除直系亲属之外，我有表姐妹和学校的朋友作伴。我们都去查林上学。学校设在一个庄园主的小房子里，周围环绕着几个美丽的花园，房子和花园以前属于一家贵族，后来被剥夺了继承权。就功课而言，我是一种“全能运动员”，样样都通，样样稀松，哪一门学得都不精到。我的波兰文、音乐和图画就不很出色。然而到五年级时，我仍然喜欢做所有要求运算速度而不要求记忆力的算术和逻辑练习，而且成绩优异，甚至赶上了我们的老师。正是这位老师使我对体育产生了兴趣。他特别喜欢射箭，在他的指导下，我决定在射箭上一试身手，结果在地区比赛中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还赢得了一个真皮制作的球。尽管如此，同其他同学相比，我仍然不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学生，直到生活的警钟对我最后敲响，我才一举成名。我们的运动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夏天，我们常常跑到湖边，飞身跳进水里，尽力游得远些，直到气喘嘘嘘为止；我们也常去踢足球，但球是破布做成的，或者在里面填上马鬃。冬天，当池塘里的水结成冰块时，我们便在上面玩耍，从一块冰跳到另一块冰，脚下就是5码深的冰水。从湖边开始跳起，谁跳得最远，谁就是胜利者，这是对勇气的考验。在这种比赛中，我经常战胜我的同学们，但在许多其他比赛中就不行了。

我第一次离开波波沃可能是我们在学期末的旅行。在格但斯克海滩，全班同学合影留念，日期是1958年6月2日。九年后我第二次去格但斯克，并在那里长期生活下去。

第二年，我永久地离开了家。按照母亲的建议，我上了利普诺一所职业学校，在“农业机械化”部学习一门训练课

程。

我们地区的首府利普诺是一个拥有1.5万人口的大城镇，具有激动人心的悠久历史，曾有一段非常辉煌的时期 我在那里居住时，仍可看到一些记载着昔日光荣的历史遗迹：墙壁上的纪念装饰告诉人们在君主共和时期，多布任地区议会经常在这里开会；古老的教堂高耸于山巅，在它的周围各种货车正通过狭窄的街道赶赴市场 当地精力充沛的农民，包括波波沃村我的邻居们都来此地购买东西 我们的学校位于城外，同一座宽阔而宏伟的公园相毗邻，公园入口处有一块凸起的地面，上面矗立着一座圣安东尼的雕像，俯瞰着周围所有的建筑物 这座圣安东尼的雕像也许是用来保护利普诺居民，特别是年轻姑娘们免遭学生们的骚扰，因为学生在城里的名声可不太好

学校的任务是要在三年的时间里把像我这样毫无技术专长的人培养成有用人才，分配到国营农机站（POM）、或城市和波罗的海沿岸工业城市那些正在招募青年人的其他工业部门。教学内容侧重于那种结业后就能实际应用的专业训练，而像波兰文、数学、历史、地理等一般课程则只限于教授最基本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即使最平庸的学生也不感到困难 然而，有些教师总想要改变训练教程的平庸水平，教给我们更多的知识。我自己对工厂实习课特别感兴趣，各种各样的设备任我们摆布，在这里我可以说已经学会了自己这一行 我在其他科目上的成绩被认为是“满意”。我的期末成绩单上得了两个“优”：一个是商业管理课，一个是体育课；我的品德课成绩居然是“极好”，这实在令人吃惊。

然而，正是这种品德课成绩给我造成了许多麻烦，教师委员会按照我的品德课成绩不止一次地找我的错。为了接受

学校的特殊训练，我们离开家吃住在校，然而我们经常旷课，去城里寻找刺激。我们有几次违反禁令吸烟和不戴学生帽四处游逛被校方当场抓获。在轮到我做助理督导员时，我因学校给我加上了“多次吸烟、经常捣乱”这样的评语，便总想挽回自己的坏名声。雷巴茨基先生是我们的督导员，也是学校未来的校长，总想找岔儿难为我。他总是让我去做不好干的工作，可我都很好地完成了，还赢得了一个优秀组织者的声誉。我从未与同学们闹翻过。我在值日时总比平时提前半小时叫醒大家，在这段早起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干活，直到早餐的美味飘进走廊里。每当我们完成分配给我们的工作，大家总是兴高采烈。

我必须说历史课是我的弱点。有一个学年，我在期末考试中三次不及格，这真使我为难。当时我还不懂得历史知识的价值，直到很久之后才明白过来。我当时认为，历史这门课程似乎远离现实生活，很抽象，其中的人物和事件与我所知道的现实联系太小。总之，要从波兰民族的观点来理解世界历史，50年代可不是一个理想的时期。那个时代盛行的是带有倾向性或者说推测性的分析方法，这是根据外国的观点精心设计出来的，运用的是共产主义的阶级术语，从永远存在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阐述事实。我则更倾向于反对以这种模式看待世界，因为我在家里和教堂里听到的关于世界的情况与此根本不同。也就是说，我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这些看法是凭依我自己的经历和我与同学、老师以及所有我在生活中广泛接触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形成的。

我有十几张业余时间里拍摄的照片，可惜照片的质量太差，这些照片是我在技术学校学习的那段时期的见证。照片上没有注明日期，但我想是在最后一个学年，我当时即将进

入弱冠之年。这些照片上是四个男孩、两个女孩，他们的年龄不相上下，都穿着他们认为当时最时髦的服装。我穿的是瘦腿裤，浅色衬衫，脖子上系一条丝绸巾。照像机（可能是我一个朋友的）拍下的姿式显示我当时正在模仿花花公子的样子。几乎每张照片里，我都要把这个或那个女孩子拉向我身边，而我的那些男同学只是扮演多余的角色。我在照片里的姿态透着一种做作的若无其事的神情。而女孩子们看上去想要摆脱我，她们面带羞色，同时又显得愿意让我拉着的样子。这些照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我那时显得十分自信，我的表情和姿态显示着自满的神情。不过那只是一种装腔作势而已。

1961年学期末举行的舞会也标志着无忧无虑的学习生活的结束。现在我将走向工作。不久我在洛霍齐诺农机站当一名电工。这是一种维修电气设备和机器的工作，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项新工作。正是在这时，人们首次称我为维修“高手”。两年后我应征入伍；1965年，我复员回家，重新在农机站干我以前的工作，不过这次是在离波波沃更近的列宁分站。此时家里的孩子们已纷纷离去：伊莎贝拉在通过技术考试后即结婚，去了索哈切夫，在那里的一家工人自助食堂工作；现在她是个家庭主妇，仍生活在那里。爱德华也很快独立了：他进了一所建筑工程学校，毕业后辗转于许多建筑工地，最后在罗兹附近安定下来，一直经营自己的农场。斯坦尼斯瓦夫先是在职业学校学习，然后去服兵役，接着在比得哥煦定居下来，一边工作，一边读技校。就这样，我现在成了家里的老大。

在当时波兰农村的社会环境中，农机站就是变革的同义词；它表示了一项新的农村政策：建立集体农庄，没收私有

财产，以新的农业机械化代替波兰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一种新型的农业工人应运而生，他们既不归属城镇，也不归属农村。农业工人在机务站工作，固然是为了谋生，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捞到零配件、机器和用于种好自己一小块土地的其他物品。农村人按自己的旧习对这种“新生事物”做出反应：农机站的工人在本该维修拖拉机和国营农场机械的上班时间里给自己干活；各种黑市纷纷出现，视察员对此熟视无睹。他们十分清楚，私人农场不论怎样落后，仍然是当地主要的农业资源，并且需要机械设备。这对农村集体化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反抗力量：理论上的计划被扭曲，以适应现实。

该怎样形容这时的农机站工人呢？他们身穿折线清晰的粗布工作服，头上歪戴一顶旧式贝雷帽，样子十分怪诞，衣兜里总是装着工具，而这些工具很容易被丢得无影无踪。对于我们提供的小小服务，村子里全都“以物支付”，经常是用酒。农机站工人的技术越熟练、越全面，大伙儿对他的“妙手回春”和帮助人的能力的赞扬就越多，尤其是得到姑娘们的赞扬。

在农机站，我已赢得该地区，即方圆20英里内最佳技工的声誉。从耙具到电视机，从WFM到雅瓦牌摩托车到弗拉尼亚牌缝纫机，我样样都能修理。我认为我是个重要人物。每当我去参加舞会，刚一进场就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瓦文萨来了！乐队立刻活跃起来，桌上摆的有一瓶伏特加。我很趁几个钱，认识所有的人，因为给他们修过东西。我经常干些别人讨厌干的琐碎活。不是人们来找我，就是我去人们家里。我算个人物，我似乎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但就在一天的下午，我不得不彻底地摆脱这项工作——我已突然感到自己极度厌恶这种工作。农机站对我来说似乎是个死胡同，令人窒息，终于竟至难以忍受。我突然强烈地

感到，我那个农机站和全地区最佳机械工的声誉是多么地幼稚、多么无足轻重而又荒唐可笑。我无法忍受别人嘲弄——那种口中不说、目笑存亡的真正嘲弄；我亟需采取严肃的行动，做出努力，来肩负一定的重任。我自忖这种想法仅仅是由于我禀性矜夸。此外，还需要说明一下我同一个年轻女人之间的事情。那不是真正的爱情，而是一种我不能断定而又一味坚持的关系。这个女孩子出于实际目的为我们双方做出决定，尔后又解除了它。我并不感到真的悲伤，但我感到孤独和空虚。人们那时都认为我们会生活在一起的，但最终她抛弃了我。这是一次对我的骄傲的强烈打击。此后，我就决定远走高飞。我也感到羞愧，因为我母亲盼望我有出息，我必须做点事情。我已经24岁，却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就，我感到自己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因此，在那天下午，我迅速做好了离开农机站的准备，不曾感到有一丝的后悔之意。因为我对自己还没有把握，于是回到家里，然而又难于启齿告诉任何人我正在做出的重大决定。我只简单地说，我要离开农机站，我要换换环境。我带上一些钱和一件外衣，奔向多布任车站。

为什么要到波罗的海沿岸呢？在当时，这似乎是因为我到车站后第一列离站的火车是经格但斯克驶向格丁尼亚的。但今天，我更加明白了为什么要到那里去；重要的决定从来不是像那样做出的，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那里有大海；那一次学校旅行曾给我留下某种一望无垠、向远方无限延伸的东西的印象——这也许就是自由。一个大城市、一个港口、冒险，就像鳗鱼般本能地随波逐流，让我漂向大海边的波罗的海地区，漂向远方。在海边，我终将发现自己的特长而大显身手，或者被大海所吞没。

第二章　格但斯克造船厂

格但斯克造船厂在我一生中的许多年里曾起过关键性的作用，但只有四个特殊的场合令我难忘。第一个场合是在1967年5月30日我刚到格但斯克不久。当我正要离开车站，还来不及环顾四周的时候，我突然碰见我在利普诺技术学校时的老朋友塔德兹。他告诉我，这几年他一直在造船厂工作，并建议我也去那儿干活。我直接来到招工办公室，填写了必要的表格，没几天我就成了第61878号工人。我开始在莫辛斯基那伙人的第四车间干造船电工。第二个值得一提的场合是1970年12月事件——在下文中讲述——这个事件出现在三年半后。

1980年8月14日，即我因组织活动被开除的四年后，当我去造船厂时，第三个场合出现了。“自由工会”的成员们那时已经得知卢布林的工人在8月初举行了罢工。由于我在造船厂工作时间长（我在船厂断断续续差不多干了10年），于是他们选举我来领导造船厂的工人。我那天不能肯定我能否开展工作，因为保安警察正在跟踪我。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对我进行严格的监视，就像他们今天所做的那样。他们一步不落地跟踪我，甩也甩不掉。我登上一辆有轨电车，他们才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我去了船厂。我当时的看法是，当局打算实行某些与自由工会活动无关的政治改革，这种推测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当局想要在全国范围内把罢工和我们运动的力

量转变为他们自己的优势，但他们低估了我们的决心

整个造船厂从那个夏天早晨厂门刚一打开就骚动起来，因为《工人报》在社论中提出了我们的要求，其中包括给被开除的我们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安娜·瓦伦滕诺维奇恢复公职和给工人增加工资。记得我在工厂门前那一站下了车，由于没有职工通行证，我没有直接走前门。我走过位于两个厂门之间的那所学校，走到胡同的尽头，翻过厂门，跳进了造船厂。

8月16日，当时的造船厂经理格涅赫原则上同意恢复我被开除的电工职务，因为我也是被开除的人。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这一天，我们开始进入以支持卢布林和其他地区的企业和工厂工人为目的的第二阶段罢工。

第四个场合是在取消军管法后的1983年3月我来到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办公室。这一次以备万一，他们把我说的话全部录了下来，作为日后指控我的证据。

虽然我曾经是农机站的一名很有手艺的工人，但当我第一次到造船厂工作的时候，我却感到十足的茫然失措。前几年，我成天同农场里生锈的机器打交道，出于好奇心我经常拆开机器，把它们彻底修理好，我因此成了一名优秀的技术人员。但当我第一次爬进船台上的船体，我几乎立即茫然于一层层的脚手架之中了。我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只是这里其他几千工人中的一员。这是一个令我感到痛苦的事实，但我没有退缩。在造船厂工作的专业特征使我意识到，以前工作中的许多熟练技术在这里都用不上了。然而当一个专业工人、承担一点任务的念头却从未吸引过我。

造船厂工人并不像农村那样按照家族关系分成小组或集体（在农村时，我曾是我们家族的一个成员）。工人们很快就

能学会一切，彼此相识。在这里，每个人的利益和动机以及整体的利益和动机，会立刻清楚地让人知道。造船厂存在着一个等级制度，每个等级按照各自的自我约束性法则发挥作用。举例来说，工程师和专业人员构成一个等级，技术工人又是一个等级。一系列专业化职业按照等级制度组织起来，每个职业被赋予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在每个专业化领域内，等级制度建立在不同层次的责任之上：经理、监督员、工长、普通工人。最后，常年干一种工作的工人同"临时工"也有区别。前一种工人因常年工作不变因而成为厂职工委员会永久会员，而临时工却经常变换工种，就好像儿童跳方格游戏一样。

我开始在莫辛斯基那个电工班干活。我们负责给大工厂渔船安装电缆。要把胳膊粗细、几十码长的电缆从发电机接到总控制板上，这可不是容易干的活。电缆的长度，及其所有的转弯、弧度和支线都必须做到准确无误。为了正确测量电缆线的长度，我们把线轴上的电缆沿地面展开，同时考虑到要弯曲的部分。如果计算有误，那么当船上的工作全部完成之后，就会发现电缆不是太长就是太短，那我们可就为难了，因为电缆既不能缩短也不能伸长。

我最初"干的是杂活"，把电缆分成几部分，分成股线，剥去外皮。然后由别人再把这些电缆切断，我把电缆拉走，这就是当了拉线人。

我们厂级别最高的工人，即造船厂的精华是M 5机器车间的工人，他们负责最后安装发动机。M 4车间比M 5车间低一级，承担一般的工程，你在这里可以找到像钻床或铣床操作能手这样的技术工人。造船厂里最低等的工人在船壳里干活。但是我认为最苦的工作是制造锅炉，工人们要挥舞35

磅的大锤锤击喷灯烧热的金属板。直到70年代中期，他们才开始采用不均匀加热法对金属板表面进行处理，这样可以使金属板自动延伸。一车间的油漆工也被认为是工作最苦的：他们是在真正的地狱里干活。70%的油漆工是"临时工"，没有几个人会长期干下去。他们必须仅凭手里的一把锉刀把1万吨重船壳的每一个地方锉平磨光。金属板是在未经磨铣或者说刚出厂时的情况下组装起来的。直到我进厂几年之后，他们才完善了预先处理金属板的技术。现在，似乎人人都想当油漆工，但在早先这还是奴隶干的活。

在所有的装配车间中，A 4 车间要求的专业化技术最高。只有几种像拉电缆这样的活是新工人干的，其他活都需要紧密协作的装配工作，如装配零件和仪表。电缆通过的位置是固定的，因此我们首先要计算好电缆要通过的每个孔的位置。这项工作是由专家来做的，缺乏经验的工人干其它安装电缆的工作。5 车间都是焊接工，接 4 车间的工序。A 4 车间前面是A 3 、A 2 车间：A 3 车间干金属活，A 2 车间负责安装每条船上总长度为500到600码长的所有管道。一旦船体结构安装完毕，电工们就接下去干他们的活。我们从商店购进设备和物资，如果商店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去格但斯克附近的霍尔姆岛上的批发中心购买。除了M 4 车间和M 5 车间的全体工程技术人员外，电工的工作条件是最好的。

格但斯克造船厂是由三家独立的公司于1946年和1947年合并而成的，到1960年已经发展成一家大型企业。然而工厂却没有最基本的福利设施，如工人用的贮藏柜、更衣室、盥洗室，更没有供工人烘干湿衣服的干燥机了。40%以上的工人在露天干活，常年日晒雨淋。到了秋天，阴雨潮湿，工人们常常浑身湿透地回到家中。幸运点的工人将粗呢上衣或油

布衣裤塞进铁制衣橱。湿衣服一夜干不了，第二天早晨只好再穿上湿衣。这时你会真正感到寒冷的滋味！其他工厂都装上了干燥机，但几十年来造船厂却没有。至于说到洗衣服，简直……。1970年以前和1970年以后，当局没有拿出一分钱用以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当局几乎完全取消这方面的预算，使这项工作没有任何进展。70年代中期以前，波兰甚至没有一个工人自助食堂。

60年代初，绝大多数造船厂工人患有胃病。虽然最初我并不了解其中的原因，但这种情况多少是难以避免的。工人每天早晨6点开始工作，一大早起床后没有吃早饭时间，只偶而抽一支烟提神，一直紧张地干到上午9点。9点到9点15分是造船厂仅有的一次吃饭时间。工人们在现场的饭摊上吃些东西。妇女们把做的黄油面包片、三明治、泡菜和乳酪等分发给排队等候的男人们。但卖主在15分钟时间里只能应付10个左右的顾客，剩下的几十人要等在此后的45分钟里轮流用餐，干计件活的工人则无法利用这个吃饭时间。70年代，工人有了供应汤食和快餐的小吃店，但在10年以前这简直是梦想。我刚进厂时，造船工人看上去一个个破衣邋遢、蓬头垢面，他们没有可以擦洗和小便的盥洗室。工人们要到地下室上厕所至少要用半小时，于是我们只好随地小便。你无法想像那时的工作条件是怎样地令人感到羞耻。

来造船厂工作的头两年属于试工期。工作两年后合格的工人可以在厂里长期干下去。当一个人要想在这两年里熟悉工作、定级转正，他知道他必须像看管好自己的工具那样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有时医生在定期的体格检查中会发现某人的身体不合格，那么这个人只能丢掉工作或在厂里找一个较差的工作干。这确实是一个打击，特别是对一个从计件工干

起的工人，因为他将丧失一半的薪水。是的，我们都认识到保持健康是多么重要！工长知道哪些工人需要加班挣取额外的收入：是那些成家的人而不是单身汉。成家的人争着加班，没命地干活。而未婚的工人知道适可而止，不愿意用休息时间去赚更多的钱。

造船厂的生产主要依靠计件工作，这种方式是生产管理部门逃避自身责任的好办法。每个人都竭力尽可能多挣钱，可由于没人把需要的材料送到相应的工作现场，结果造船厂总是乱哄哄的，你来我往地寻找各自需要的设备。尽管厂里为解决这个问题设有所谓的供应部门，但情况依然很糟。

最有吸引力的事情是在造船厂工作可以有机会学会一门技术。一些年青人认为，他们可能有一天会在自己亲手建造的船上找到工作，好像造船厂还是通向当水手去远航的道路。这种想法并非完全想入非非，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造船厂工作过的男工很有可能至少在海军服役。那些级别较低的工人来自波兰各地，他们中十有八九的人都把造船厂看作是奔向大海的第一步。

格但斯克造船厂对所有职工提供职业培训。每年1.5万名工人中有8000到9000人有这样的机会。对于培训出来的工人，我们造船厂只雇用600名电焊工（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在这里拿到电焊工合格证的波兰工人却有4万多人。我想我可以肯定地说，全波兰一半的电焊工是由我们造船厂培养的，格但斯克造船厂据信是全国最好的造船厂。在格丁尼亚的“巴黎公社”造船厂、北方造船厂和其它从事修理业务的船厂中，最需要的工作都是由格但斯克造船厂培训出来的工人担任的。工人同厂管理部门的关系说得再好，也是家长式的，直到今天情况依然如故。管理人员都是老工人，其中许多人是

格但斯克本地人。有些管理人员以前曾在什切青造船厂工作。什切青造船厂是由德国企业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建立的，格但斯克那时叫但泽自由城。在60年代，这些人同40年代末在自己工厂受过培训的工人共同承担管理责任。三四年后，任何有独创性的工人都获许参加培训计划。

工长负责分派工作，因此也支配着工人的工资。以前，一个工人可以用工票在格但斯克一家高级饭馆——海兹·库比茨基饭馆买到一顿为几个人享用丰盛美餐和伏特加酒，工票因而被当成了一种流通货币。饭馆服务员常常再把工票卖给别的工人，像小贩们叫卖自己的货物那样喊道："我花了2500兹罗提[①]买这些工票，谁想要啊？"如果有人想要拿到自己的全部薪水，他就会买下工票。在"栗树下"饭馆或"海盗"饭馆也有同样的事情。这种作法和财务上的欺骗现象在造船厂里也是司空见惯、到处可见，而且不难发现其中的原因。

同样家长式的制度控制着工资领域。如果一个工龄长的工人结了婚，他就要在短短几个月里挣比平时多的钱，而且没有人抱怨。同事们会让他去干工资收入最多的活，他也会以很低的价钱买到工票。这种分配工作的方法是大家默认的，它影响着工作单位的气氛，既能够加强也可以破坏工人的关系。发放奖金、分派工作和安排度假也是争吵不和的起因。

对于级别较高的工人，60年代是一帆风顺又相当富裕的十年。有些人常常吹嘘，他们已经跻身于社会上层，如果需要他们的特别技能，那么四五年或者仅仅二年他们就可以住

---

① 1987年，按照官方兑换率，一个波兰兹罗提大约合半美分，即200兹罗提可兑换1美元。在黑市上，1美元是官方兑换率的5倍多，即合1000兹罗提。

进三联城（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索波特连成的城市中心）。当时的生活条件提供了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建立家庭、访亲交友、安居乐业、安度晚年——总之，提供了一个比较体面的生活前景。这对工人们来说多少是一种安慰。1800名工人住在造船厂的廉价宿舍里，另有2000人住在从当地居民那里租来的房子里。

从旅馆或当地人家租来的房子好坏不等。条件较好的旅馆具有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优越条件：对所有工人都开放的各种俱乐部和社会活动，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甚至还有一个游艇俱乐部，但只限于具有相当资格的工人参加，而且它显然也不适于普通工人的口味。

位于图维姆大街上的工人旅馆是最吸引人的，房客们知道怎样用一幅画、一本日历或一盆色彩艳丽的花草来装饰自己的房间。

克洛诺维恰大街上的工人旅馆则是环境最差的。这是几座四层高的公寓式楼房，住着600人 当后来其中一座楼房专门分给已婚夫妇居住时，我和妻子达奴塔就住在那里。旅馆入口处有一个边门和一个岗亭，颇有点像军队的营房。楼房之间有一片空地，到处是枯草和乱扔的空瓶子。

每到发薪日，旅馆里总是发生争吵，总会有十几扇门被踹坏。那种情景你只有亲眼所见才会相信：一个家伙喝得醉醺醺的，一脚踢倒房门，撞在他的伙伴和女朋友的身上！还有一些情景是我不愿描述的。这样的旅馆自然在周围名声很坏，并且常给造船厂领导造成麻烦。看门人一般是一位妇女，她必须适应所有这类酗酒和打架斗殴的事情；除此之外，她还常常战战兢兢地用自己的伏特加酒款待房客。如果看门人是个精神脆弱的女人，那她待不到两个月就得走。旅馆有三

座楼房，分别为男、女和家属使用。在每层走廊的尽头都有一个厨房和一个淋浴室。在家属楼里，每个房间里有两、三张，最多四张床。旅馆供给每家一个金属床架，一个凹凸不平的床垫，一片地板，四堵灰墙（无论地板和墙壁，都肮脏不堪，烟熏火燎，发霉发臭），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和两把椅子，每把椅子至少缺一条腿。人们可以在这个旅馆里喝酒、睡觉，但不能真正地生活。男人们在旅馆的生活环境与工厂的工作环境之间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直到70年初，这样的生活条件才多少得到一些改善：购置了新的家俱，地板和墙壁得到了修理。

在工厂和旅馆的紧张而又危险的环境中熬过来的工人，最终都得在城里找一间房子和几个朋友合住。造船厂支付租金，但房客们通常也从自己的腰包里付给房主额外的费用。合住比单住价钱便宜，但最重要的是比较文明，尽管许多工人在克洛维恰大街的旅馆居住得十分满意。

然而，只有单身汉才租得起当地人的房子，这也正是我在婚后不久不得不住在克洛维恰大街的原因。

当我还是单身汉的时候，我最初从卡尔图斯卡大街28号一家名叫克罗尔的夫妇那儿租了一间小房间，同另外三个小伙子合住了两年。我们的房间在一座旧楼房的第一层；这座楼房离造船厂不远，靠近市中心。房间里放了一张桌子，周围摆了四张床，窗户正对着一条十分嘈杂的马路，有轨电车从此经过。我们的住所算不上奢侈，但我们很喜欢它，因为我们与房东之间形成了一种家庭般的气氛。我们帮助房东一家干家务，星期六擦洗地板，有时间的话，还帮助粉刷墙壁或修理照明装置。房东家的大女儿出去跳舞时，我们总是陪伴着她。克罗尔先生在战前曾经是一名农业工程师。有时我

们在整个下午坐在一起谈论政治。他每天定时收听自由欧洲之声电台的节目，这使我想起了我的继父。我总是称克罗尔先生为“老总”，而他则叫我“主席先生”。我们一直这样相互尊重地称呼，直到他去世为止。

离我们住所不远处有一座在格但斯克臭名昭著的大楼，里面住着保安警察[1]的官员。许多保安警察机关的特务住在我们这座楼里，有一个特务就住在我和我的朋友们合住的房间上面。几年后，在我出狱时这个人出现在监视我的一队特务中。他跟着我到处走，紧盯不舍，早晨和我一起去上班，晚上和我一起回家，甚至当周末我去钓鱼或是在树林里“独自”散步时，他也和我做伴。今天，我请他代我问候过去的房东一家，可他从来没有做到过。

当一个人受雇在造船厂工作时，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在城市中找一个立足点。俨如一个孩子独自一人远离家人和传统的农村生活——教区牧师、亲属、整个村庄里相互十分熟悉的每个人，突然置身于一个大城市中。现在他可以在业余时间、星期日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可以自由花自己的钱（单就工资而言，在造船厂比在其它经济部门挣的钱多得多），但他必须依靠自己去生存。

造船厂的工作是很繁忙的，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熟悉城市和它的生活方式。在我来到格但斯克后不久，我和几个

---

1 虽然在波兰不用“警察”一词，但是有四种类型的执法机构是波兰人所熟悉的：城市民警（MO），这种警察类似于西方的警察，负责处理道路和城市交通以及普通犯罪；城市民警志愿后备队（ORMO），这是一种准军事化组织，名义上是协助城市民警的“社会组织”——成员不穿制服，没有武装；城市民警快速部队（ZOMO），这是经特别训练的暴力警察；以及保安警察（SB，以前叫秘密警察UB），他们都是便衣秘探或秘密警察。

同事一起外出，遇到一位年轻女人，她叫拉拉，这个名字在我看来似乎带有很强的异国情调。那天晚上相见的过程中，她用各种暗示向我表明，她的父亲是格但斯克一位挺重要的人物。事实上，她父亲的地位那么高，我还是不知道他的确切职务可能对我更好些。我觉得格但斯克正向我展现它最美好的一面。我在同她约会时花的钱越来越多，绞尽脑汁想要博得她的好感。我认为她不应该和一个刚进造船厂工作的小电工搅在一起，因此为了不使她对这一点感到难堪，我编造了一段假话，说我最近已被任命为一家小企业的领导。一天早晨，当突然撞见拉拉时，我玩的魔术被看破了。她用围巾把头裹得紧紧的，正在我住所附近的一条街上送牛奶。我立刻向她承认我在造船厂工作。骗人的魔术没有了，可在我们之间却留下了一点不自在的情感。从那时起，我们都避免再见到对方。我意识到，大城市的魅力可以把最普通的小小阴谋和欺骗掩盖起来。

和我一起出去的第二个女人长得动人可爱，而且头脑冷静，在各个方面都通情达理。向她讲起我的农村出身，我一点也不感到自卑。她在造船厂附近一家医院里当护士。然而，我们之间那种友好、坦率和并非胡闹的关系并不是我真正要寻找的。有一天，我路过一家花店，看见一双调皮的褐色眼睛，乌黑的长发衬托出一张秀丽的脸庞，这是我怎么也忘不了的面容。几天后，我又来到花店，问她几点钟下班。她告诉我，她和姑妈一起住在郊外的布尔泽兹诺，和我一样也是刚从乡村来到格但斯克的。她的名字叫米尔卡，但我更喜欢她的第二个名字达奴塔，或丹卡，此后不久我就这样称呼她。

我也曾认识过另外一些姑娘，她们似乎更合我的心意，但达奴塔是非同一般的人。当我一听到婚礼进行曲的头几个

乐曲时，就立刻想到这是为我们的婚礼演奏的（我们认识仅几个月就自然而然地结合了），我为这种想法感到吃惊。婚后我们的生活非常贫苦，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钱，过了几年的漂泊生活，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房东对我们总是很冷淡。每搬一次家，都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事情。最后我们在比特霍芬大街找到一个满意的地方。这是位于一家理发厅上面的顶室，理发厅的女老板是从1939年苏联兼并的波兰领土上被遣送回来的。作为对她遗弃在苏联的财产的赔偿，她得到了一所不大也不舒服的独立房子，同年轻的儿子住在一起，还做起了理发生意。但是她的麻烦并未就此结束。不久我们发现，这个女人的情夫是个精神变态患者，他的行为常常扰乱整个邻居的生活。有好几次当他为一些意想不到的小事大发雷霆时，我必须保护这个可怜的女人；他不只一次地举着斧子追赶她。我们尽力帮助她，因为她和我们一样在格但斯克没有一个亲人。在她儿子同意之后我成了她儿子的教父。达奴塔常常帮助她整理花园；春天是翻土的时节，我便拿着铲子到她的小花园里去松土，我对有机会去抚摸泥土感到高兴。尽管有种种不便，但我们在这间小小的顶楼里还是感到了家庭的快乐。

我渐渐懂得，在组织严密的造船厂工作与在像农机站那样的组织松散的企业里干活有着本质的区别。农机站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在农机站，如果说工人们中间有着紧密的凝聚力，那是因为人们彼此了解，友好相待。似乎没有什么比帮助别人或因感激而报答别人更容易的事了；即使立即要干的事也是如此。然而在造船厂，情况则完全不同：这里的每个人好像只是一架巨大机器里的一个齿牙。虽然我们确实代表着一定的集体力量（当局势不稳定时人们必须重视这种力量，

然而人们却很少这样做），但是，我们是在一种单调紧张而忧郁的气氛中工作。每个人的穿戴一样，一样的褴褛衣衫，我们的举止看上去像是呆板的军人，这样做几乎是一种精神反射。我们本能地认为我们是一个社会阶级，跟着造船厂里整天叫喊的口号跑。虽然我们大多数人认识到我们受人摆布因而对那些厂长有一定的优越感，但我们毕竟是在被别人拖着跑，几乎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当局因注意到1956年在波兹南所犯的错误，于是在60年代末开始以迂回的方式谨慎地去达到其目的；当局没有简单地减少工人的小时工资，而是让其“智囊团”，即政治经济学家、工程师、会计加紧活动。当局的目的是逼我们降低成本。举例来说，在新的制度中，工人不会简单地被派去做一张桌子，而是要求工人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这项工作。工人领取工资不是根据他们制做了一张桌子，而是根据他做这张桌子所用的时间，即工人领取工资不再以计件方式而是以计时方式来计算。这种方法使当局把原来一个工人制做一张桌子因而挣得1000兹罗提所用的 20 个小时连续不断地降到 15 个小时、10小时生产一张桌子，工资也相应地减少。结果一个工人要想像以前那样挣1000兹罗提，他现在就必须在同原来一样的时间里做两张桌子。

这种强加于我们身上的节约工资政策，使工人每年要损失大约 100万个工作日小时的收入。为了不使制造一条船的工时费用超出预算，工程师不得不缩短分配给每项工作的时间。钱是节省下来了，但我们为此付出了代价，而且工程师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只是使工人同工厂管理部门的相互不信任关系进一步恶化。管理部门试图用掩盖的模糊经济法则逃避为生产计划负责。

当我开始明白这种形式的计划管理如何损害我们的利益时，造船厂里的压抑气氛因一起22名工人的死亡事件而严重了。为进一步增加生产，厂方动员了近2000名工人为一艘船进行设备、零件总安装，其中200名工人在底舱工作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规定的正常标准；有一些人在船上已经一口气连续干了36小时，以便为超额完成本来就难以完成的计划再缩短一些时间。这条船已经加满了燃料。建造一条船的最后阶段总是极度紧张的：你会看到工长们一个个神情紧张，工人的紧张就更不在话下。一天在切割或焊接油管时，似乎肯定哪个工人出了差错。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燃料泄漏出来，立刻引起爆炸。由于船的舱口已经封死，灭火设备根本用不上。虽然工人们努力想用焊枪切穿钢板，但乙炔供应不足。结果，22名工人在"科诺普尼茨卡号"船的底舱里被活活烧死。后来在船厂的审讯中，管理部门承认，"为了减少交付这条船的延误时间而违反了技术操作规程。"

在发生爆炸几小时后，人们聚集在更衣室里抱怨缺少安全措施和其它问题。每天工间休息时，我总是同一部分工人——都是心直口快的工人——掺和在一起，就像我在学校、军队和农机站那样。在事故发生后，更多的人把我围起来听我讲我必须要讲的事情，或听别人谈我对造船厂还不了解的情况。我和我的同事亨雷克·莱纳尔恰克成了朋友；他来自比亚威斯托克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时间将证明我们的永久友谊。1980年8月，莱纳尔恰克同我勇敢地站在一起；他是修建1970年造船厂死难工人纪念碑委员会的主席。

1968年3月，波兰学生造反，后被政府镇压下去。1970年底，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对这次学生造反仍然记忆犹新。那时，许多工人都受到官方含沙射影的欺骗性宣传的影响，

官方宣传的目的在于挑动工人反对学生、知识分子甚至造船厂的工程师和专业人员——他们据认为对当时工人的低工资和工人被迫在新政策下从事无偿的超时劳动负有责任。显然，政府正在牵着双方的鼻子走。工程技术学校的一些罢课学生驾驶一辆大篷货车进入造船厂，试图说明这场学生运动的真实目的——基本上说，就是争取言论自由、废除书刊检查制度、取消报禁——但他们并没有激起工人多少兴趣。当时任造船厂经理的皮亚塞茨基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这个学生代表团。用了喝一杯咖啡的工夫，他便说服了学生。真实的情况是，他使学生避免了城市民警志愿后备队的一次毒打，他们当时正在造船厂各个门口等着学生们（这次准备殴打学生使每个民警获得了2000兹罗提的奖赏。因此当这些志愿民警到来时，学生们已经走了，他们扑了个空，美梦也随之化作了泡影。对我们工人来说，有几个人曾试图让大家明白，如果学生和知识分子成为镇压的对象，那么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支持他们——这是团结精神的微弱闪光。

大约有20名工程技术学校的实习生当时在造船厂工作。在当局同学生发生对抗后的那天早晨，有人在更衣室注意到一名实习生的后背被棍棒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我们让他脱下衬衣，簇拥着他游行通过造船厂，高喊“我们难道允许他们打我们的孩子、打我们工人农民的孩子吗？”同一天，在格但斯克郊外的弗尔泽什奇区，法律和秩序统统陷于瘫痪。一些示威者显然已经用铁蛇簧武装起来。这种铁蛇簧压紧后再松开，可以弹射出去。当民警在没有盾牌和其它防护工具的情况下发起进攻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抵抗；他们被迎面弹来的铁蛇簧纷纷击中。在被彻底击败之后，他们突然意识到，骚乱并不是知识分子挑起的，而是工人，可工人已经站到学

生一边。一个满身是血污的民警大声喊道："亲爱的耶稣，我们究竟倒了什么邪霉呀！"

格但斯克当局凭自己的力量难以平息这场反抗。当格但斯克省党委第一书记科乔奥莱克出现在工程技术学校时，他遭到了一片痛骂。这位显要人物是对党内政客的最好讽刺：科乔奥莱克的所做所为总是受一种含义模糊的教条主义的驱使。他曾几次被他的上级踢下领导岗位，80年代初，"强硬路线派"向社会改革发起反攻，他们需要一只替罪羊，科乔奥莱克这才重新登上政治舞台。

1968年3月，一场会议之风横扫整个国家，这标志着官方不赞成学生的抗议活动。几年后，官方同样"邀请"我们去殴打腊多姆和乌尔斯基的工人，因为官方谴责这些工人为"懒汉"。然而就在这时，造船厂计划举行一次会议，旨在弥补科乔奥莱克在工程技术学校受到的冷遇。组织者想让这次会议顺利进行，造船厂党委为此印发了许多简图，标明每个人在会场的位置：前排座位照例留给那些来自奥科波瓦大街[①]的贵宾，而他们同造船厂并无半点实际联系。按照规定的座位顺序，接下来分别是各车间的党委书记、各车间的工人代表和各车间的工长，等等。我们完全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意味着什么，因此我竭力劝说我的同事们抵制这次会议。但事情有自身的发展过程。科乔奥莱克刚开始讲话，一大群工人就从两个为通风而敞开的大门涌进大厅。出于好奇心，工人们在大厅外面聚集了几分钟。当他们听到"同志们，我们的党——"的时候，立刻爆发出一阵嘲笑和打嘘之声。科乔奥莱克无法控制这个场面，他再一次被证明遭彻底失败。

---

① 保安警察总部设在这条街上。

你可能会说，1968年3月是我开始涉足政治的标志。在造船厂，我看到了同以前在莱涅或波波沃所见到的一样的行为：一样的为博得当权者的好感而进行的欺骗和往上爬。实行压缩一切费用、节约开支的政策，使得一些野心勃勃的人威信扫地。但在此以前，造船厂的奖金是非常高的，官方的卑鄙行为自然带有政治色彩。

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格但斯克造船厂造的船已闻名于世界，这里造的船在《劳埃德船舶年鉴》上获得了很高评价，此时却突然改名为“列宁造船厂”。由于此举绝非商业上的明智步骤，因此人们认为这件事情背后肯定隐藏着某种重要原因，也许是由于来自东方阵营的压力。实际情况却简单得很：当时的造船厂经理皮亚塞茨基曾向《政治报》发表过一次不明智的谈话。该报由米齐斯瓦夫·拉科夫斯基直接领导编辑工作，专门善于宣扬西方式的波兰“经理”。皮亚塞茨基放肆地吹嘘他的收入如何高，吹嘘他如何喜欢乘游艇，吹嘘他的奢侈口味，因而成了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敌人，因为第一书记一向讨厌那些背离他所喜欢的生活方式的人。在一次新船下水的典礼上，竟没有一位显要人物到场祝贺，这使皮亚塞茨基十分难堪。他索性以退为进，决定把列宁的名字贴到造船厂上，以此进行反攻。格但斯克造船厂于是变成了列宁造船厂，但上级首长是不会轻易忽视为造船厂重新命名的，皮亚塞茨基为迎合上司的意见，只好又把名字改了回来。

管理形式常常按照环境发生变化：他们把螺丝拧紧，然后再松开一点。他们总想估计出工人们的情绪，但他们很少能够逾越人们可以忍受的限度。例如，在“科诺普尼茨卡号”船体事故之后，厂方发放钱款，安抚那些拒绝回到烧坏的船上继续工作的小组。差不多每个生产小组都有一名工人被火

烧死。结果，小时工资提高了，某些活儿的工资也有所增加。他们提高工资的目的是想要我们忘记22名死难的工人。

在另一些时候，工厂管理部门为增加生产制定刺激性计划，但又总是忽略必要的技术革新和增添新设备。工人并不上当，并且坚决反击：在正常的工作时间里生产下降了，而那些整天乱转寻找工具或物资的工人却要准备加班加点。这样，工人在下午和晚上长时间进行着毫无意义的劳动，因为如果组织得好，这些活儿在正常工作时间里本来是可以轻易完成的。糟糕的管理制度最后甚至把最优秀的工人也变坏了：上班喝酒的现象重新出现。为了防止我们把酒从厂外偷偷带进来，我们在厂门口受到检查。从此工人们开始在厂里造酒。在这种环境里，人类的智慧是无限的。当厂方在车间搜查秘密酿酒地点时，其它地方正生产出酒来，例如在建筑起重机的顶部。

在上级管理部门听说这种情况后，他们决定对车间的工长进行一次“整顿”，然而却不是解决产生问题的根源。结果有一天，所有的工长都相互替换；他们并没有被撤职，只是从一个岗务调到了另一个岗位。这种游戏使其中一名工长失去了职位。这就像在音乐厅抢座位一样，你必须行动迅速，否则就没有位子坐了。这位工长行动不够迅速，没有抢到一个位置，不过我认为他是个完全称职的专家。我后来听说他被解雇了，但并不是因为行动慢，而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出身。3月，厂里根据当局的命令开始了一场“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清洗。

这时，工作气氛变得愈来愈坏。人人都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到处笼罩着难以猜测的阴云。工人们想要真正的老板，想要他们能够信任和尊敬的人。为了这种人，他们有时可以

在人与人的基础上做出额外的努力，而这种努力他们是不愿意为与他们疏远的高层当权者付出的。人们再也听不到这样的话了："头儿，除您之外，我不会为任何人做这件事。"凝聚力正在消失，而且是在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期。1970年12月已经为期不远了。

1969年最后的几个月里，个人生活占据了我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在此期间，我同达奴塔结了婚；我们想恢复同我家里的关系；我们要找一个新住处，因为我们不愿意在原来的地方住下去了。达奴塔从一开始便决定我们应该有个大家庭。大家都知道，我父母家里每一代人都生一大堆孩子，我找不出什么理由打破这种传统。我们准备接受上帝的旨意，给我们多少孩子就要多少孩子，至少要有我们能够养得起的孩子数目。由于整天忙于照料这些日常家务，我不禁感到同波波沃的亲属的接触愈来愈少。我们没有足够的钱经常回去看望家里可敬的亲人，而我们在格但斯克的住处又太小，不可能邀请他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因此，生活似乎使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我们正在日益疏远。

1969年最后几个月和1970年初，我们听到的全都是生产任务没有完成的消息。开始时，我们并未非常看重此事，以为这只是为使我们工作得更快而进行的宣传。这种口号已经丧失其意义和作用。给新船命名用的是诸如"索尔德克"、"马可夫斯基"、[1]"团结"和"劳动者"等等，以便唤起工人一时的热情。现在这已成为毫无用处的老一套。特别值得一

[1] 这些都是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的工人的名字。

一提的是，“斯达汉诺夫主义”[1]在造船厂从来就没有十分深入人心，工人们很难说普遍拥护共产党制度。社会主义青年团是造船厂年轻人的俱乐部，是使工人们热血沸腾的另一个象征。这纯粹是编造，因为这一部分青年还占不到全厂工人的5%。但在举行新船下水典礼时，青年团员却出尽了风头。他们总是坐在前排，被授予许多奖章！似乎这样还不够，青年团员还享有诸如优先分到住房或建房土地的特权。青年团合作社帮助他们筹措资金，让每个团员以优惠价买下一所小房。因此，一些工人因支持这个傀儡组织的工作而得到嘉奖。其他大多数人十分憎恶这种特权和政治性的猪食；工人们明白他们正为此付出自己的血汗。年复一年，莫辛斯基班组我的同事们一直往返很长的路程上下班，而他们的辛勤劳动几乎什么也得不到；他们能在格但斯克找到房子和养起一家人的可能性很小。人类的尊严和完全掌握自己生活命运的机会还不能自由选择。我们总是被当作做散工的简单劳动力，被迫接受我们自己不能听从的口号。

每到年底，我们的生产计划总是安排得很紧，这对任何人都不是什么秘密。我们总要栽在一条没有彻底完工的船上，但我们仍然要宣布已经按计划百分之百地完成了生产任务。这条船可能还缺少某件设备；例如，其原因是铁路在西里西亚某地发生冰冻而影响了这部设备的按时交货。这样，厂方就要同客户达成某种协议：如果对方答应证实12月31日为交付这只船的日期，我们就送给他们一台彩电或类似的东西。这也是我们同最大的客户俄国人做交易的方法。这条船五六天就可完工，随时准备下水。延期交货确实要影响到下一艘船的

---

[1] 这是一场由苏联人阿列克塞·格里戈里耶维奇·斯达汉诺夫于1935年发起的运动，目的在于使工人不计任何报酬地增加生产。

如期完成，在下一年年底造成同样的情况。最严重的结果莫过如此，但也不总是这样。然而，到1970年12月时，情况则完全不同了。我们的生产计划还差10—20%没有完成。此外，建造中的几艘船在冬季到来之前还没有封闭船体。如果扫尾工作要持续一冬，那么封闭船体是绝对必要的。使大家感到吃惊的是，生产计划这次却以妥协而告终。

即使在今天，人们仍完全不清楚，像“整顿”车间主任之后的士气消沉、1970年底招收200名新工人并急急忙忙把他们分配到各班组——这一切做法和现象是出于愚蠢，还是精心的决定所致。工人们也许（只是也许）被当作政治工具，用以促使盖莱克派代替哥穆尔卡派。当后来回忆起那段时期时，一些人还记得，11月招收的200名工人中的大多数都是导致工人1970年12月罢工期间走上街头的那场运动的先锋。我当时明白这一点吗？我必须承认，我那时没有看出这种联系。波兰危机的特点似乎是社会和政府双方都同时意识到事情要发生变化。问题是每一方所希望发生的变化是不同的，他们没有共同的长期愿望，都不能把一般的权力改组进行到底。人们没有时间把各自的期望明确表达出来；事情发生得太快，致使人们惊慌失措。许多问题都任其发展，结果都搁置起来。当你开始做某件事情时，你完全不知道结果如何。各种争论此起彼伏，每个人都希望在不太晚的时候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人们知道：变化的机会是短命的 我们不久将退回到已使我们像奴隶般一样活了40年之久的束缚中，再次丧失一切有意义的讨论和真正的政治行动。正是出于这种认识，1970年12月爆炸性事件发生十年之后，工人们不是热衷于找出谁将成为最高领导人，而是更关心怎样使自己联合起来，即建立一个不论将来谁当政都能保卫自己并与之抗衡的联盟。

1980年 8 月之后的16个月里，我们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不再无依无靠，受人愚弄，不再只是别人权力斗争的工具。这在波兰工人阶级历史上实属首次。尽管波兰急需根本性的改革，可当局仍然把它 3 4 的精力浪费在高级官员的改组上，把另外 1 4 精力用于讨好莫斯科。但我自己却正在阔步向前。

在波兰，1970年12月事件代表着那种要我崇敬的旧模式所鼓舞起来的全国范围的社会革命的最后阶段。实际上，我们高唱《国际歌》是因为没有其他任何歌曲能够表达当代欧洲工人造反时的愤怒之情。我们的模式全都来自东方。当讲到1970年12月事件时，人们总是说："那是一次喀琅施塔得起义"[1]。但从场面上看，"倒像爱森斯坦拍摄的电影"。然而似乎没有一个人想使波兰事件成为别人历史的复制品。相反，我们想要的是走自己的道路——波兰的道路。我们曾渴望在权力结构中找到某个能理解我们需要的人。然而，我们碰到的却是一堵胆怯而又狂暴的墙，是权力上层软弱无力、没有一点意志的人——这就是那个完全不能理解或讨论我们的要求的政府。最后，我们别无选择，只好走上街头喊出自己的要求。

[1] 指1921年波罗的海苏联海军基地上的起义，起义水兵要求秘密投票的选举、要求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但遭到最高当局的拒绝 水兵们惨遭屠杀。

第三章 1970年12月

就在圣诞节前，当政府宣布提高包括食品在内的基本商品的价格时，我们举行了罢工。当时工人收入很低，对生活穷于应付，物价上涨因此对工人打击很大，受害最深的要算收入较低的年轻人。政府的提价措施激起了一致的抗议。

12月12日，星期六，党的官员突然来到各班组，宣读一项政治局发布的文件，然后向党员就提价问题发表讲话。他们原以为接下去会有一场所谓的辩论，但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只是一名妇女（她是机车司机）站了起来。她说现在的生活比希特勒统治时期还糟；她不知道该怎样安排家里生活；她有三个孩子，拿的是固定工资（计件工资可使人容易应付物价上涨；厂领导会说，“好了，伙计们让我们多干点，你们会再次克服困难的”）。一名机车司机每月只挣1859兹罗提（1970年时大约折合18美元），除此以外，再不会多一分钱了。听了这个妇女的话，谁都没有说什么。接着，这位妇女便失声哭了起来。

格但斯克造船厂在星期一爆发了罢工。罢工是从工程车间和船体车间开始的。这些车间的工人曾在瑞士的齐尔察尔造船厂和丹麦的鲍梅斯特造船厂接受训练，他们是造船厂的精华，有很高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是一支组织严密的生产队伍。机车司机（大约30人）收入微薄，是罢工的主要鼓动者。他们的一项任务就是在上午工间休息时去各车间送咖啡；

这是传达罢工口信的绝好机会。

工间休息以后，全厂工人涌向经理办公室，隔着窗子同厂领导开始了谈判。显然，经理只能同前几排的工人对话。当广播喇叭接通后，其余人也参加了进去。他们大声喊着，提出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厂方准备怎么办、领导人员打算如何工作等。工人们要求同格但斯克市当局的代表对话，但当局没有一个人愿意来。这样，工人只有亲自去市党委大楼了。他们一路上高唱《波兰没有灭亡》的国歌、《国际歌》和《上帝保佑波兰》。人群里这时已有几千人之多，一位市委副书记出来接待工人，因第一书记已离格但斯克前往华沙出席一次党的会议。双方在互说了几句开场白之后，便响起了一阵"给我们面包！"的叫喊声。示威的人们要求撤销负责制定经济政策的领导人的职务，并呼吁改革工会组织。这时，一辆广播车奉市委命令驶近人群。那位副书记接过话筒，劝告示威者回去上班，但毫无作用。示威者推翻广播车，将其占领，并把它作为一个自由论坛。他们先把广播车开到造船厂，然后又开到工程技术学校。工人们为没有支持1968年3月的抗议活动向学生表示歉意，并号召学生参加他们的罢工。接着发生了工人与民警的首次冲突：有人被捕，许多人受伤。

12月14日，即罢工爆发的那个星期一，我们班正好放假，因为我们刚刚完成一个船体上的工作，将被派到另一个船体上去干。我那天到城里给我的大儿子博格丹买婴儿车。星期二早晨6点半，我和大家去上班。我们车间的领导莱斯涅夫斯基在几名车间主任的帮助下正在尽力劝我们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但就在这时，其他车间的工人路过我们车间，硬要我们随他们一起去经理办公室。此时莱斯涅夫斯基也不再劝他的人回到船上了，只是说了一句"如果这是你们要想……，

那就干你们愿意干的事情吧！”随后便走回自己的办公室，砰地关上了门。我们立刻同船体上干活的工人汇合起来，向经理办公室涌去。我们大约有4000人，可能更多。罢工是以一种相当轻松愉快的方式开始的：造船厂经理扎切克推开办公室的窗户，愉快地说道，“你们好，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们……”，大家都笑了，紧张的气氛于是缓和下来。实际上，罢工的原因与造船厂的情况没有直接联系。然而，聚集在那里的人群不久便开始提出各种要求，经理站在窗口回答大家的问题，他身旁站着造船厂党委第一书记耶日·平科夫斯基。天气寒冷刺骨，地上有雪。人们开始要求释放被民警逮捕的人：原来一些工人头一天去了市委，一直没有回来，谣言于是不胫而走。

那一天上午晚些时候（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平科夫斯基宣布了一条旨在破坏罢工的消息。据他讲，霍尔姆岛上已经升起一面德国国旗。这个岛离格但斯克不远，战争期间德国人曾在那里建造潜水艇，现在那里是我们的物资供应站。他说，“德国人已经登陆，德国国旗也升起来了”，这是后来反复上演的假情节剧本的先兆。我跃上前说道：“听着，这是圈套。这是烟幕弹。什么登陆？哪来的德国人？这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吗？”很显然，平科夫斯基在分散我们注意力的同时正玩弄着什么阴谋。他发给每个船厂党委委员一套崭新的工作服。党委委员为了在人们面前装扮成工人全都穿上了工作服，这真太滑稽了！他们很容易被认出来，因为他们的工作服是新的，而我们穿的工作服则又脏又破。他们又再玩弄老把戏。

最后，我们几个人决定直接上楼去找船厂经理。我们径直走向他的窗子，以便使大家从下面的院子里看到我们和听到

我们讲话。经理问我们究竟想要干什么。我问他是否能保证把头一天被捕的工人放出来，能否取消食品提价。他回答说，他全都做不到。我又问他是否打算满足我们的要求，他的回答是“不”。

经理办公室有一个喇叭。我一把抓过来向人群传达经理刚才的回答。然后我问道，“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下面的人们喊道，“到市委大楼去！”整个人群开始慢慢向外移动。我这时还在经理办公室（我们有五到八人在那里）。当我们正要离开时，经理赶忙用脚把门关上对我们几个人说：“我看这伙人不太听我的，倒愿听你们……我们来个协议吧。我们会给你们几个人钱……你们想法去把他们叫回来；如果他们仍坚持罢工，就想法管住他们。”

“你要给外面所有人钱。如果漏掉一个，你就不能同我和我这里的几个同事做交易。”我回答道。对此，经理的回答是：“我们会给你们几个人报酬的，但不会给下面那些人。”

我打开门，跑了出去，追赶上人群，最后挤到行进队伍的前面。

造船厂后面是市运输队的车库。当我正在队伍前约5码远的地方行进时，我突然发现一队民警正向我们冲来。他们大约有30人，手里挥舞着警棍。我暗想，这回我可要吃苦头了：我手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卫自己，也无路可退。我敢肯定身后的人们已经看出我在犹豫了。我呼吸紧张。突然间，我感到像是一股强大气流的东西从身后的人群中向我的背部袭来。似乎难以置信的是，我的身体感觉到了这股气流，它好像把我向前推去。两三分钟后，那些民警已被人群打倒。只有其中的三四个转过身去，试图跳过一道栅栏，逃离正向我们冲来的人群。

我们继续前进。到达市委大楼时，我们看见从大楼里跑出四个人来；他们钻进汽车（我想是伏尔加牌轿车）后，汽车就以最快的速度急驶而去。来到大楼前，我们发现市委办公楼的大门紧闭——已经被最后一个逃跑的人紧紧关上了。我隔窗向楼里扫了一眼，看见一些士兵一动不动地在里面站着，手里端着机关枪，但枪口不是对准我们。大门紧闭，而且连一个可与之谈判的人也没有；我们待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于是人群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人开向斯维尔切夫斯基耶戈大街的民警总部，另一部人回到来时打垮民警的地方。当我到达民警总部时，我看出，这些民警表面装出一副战斗的姿态，实际上他们犹豫不决，正在等候上级指示。因此我就从人群里向他们喊话，鼓动他们撤走；免得受到人群的冲击。他们静静地听着，然后慢慢地撤退了。

几分钟后，第一批抄近路的工人到达了铁路桥，民警紧紧跟着他们；但情况还好，没有发生任何严重事件。我跑到一伙民警前面，劝说他们离开。他们大约有40人，早些时候在造船厂大门前设防的也大约是这么多人，我们那时占着上风。我问他们，为什么还要阻拦呢？我们要求的只是释放我们的工友，我们不要任何暴力。在我向他们叫喊的时候，我就站在他们的总部前面。我想，既然来了，我就要找出谁是负责人。有人告诉我指挥官的办公室在四楼。我跑上台阶，一头冲进去，突然发现大楼里全是民警；他们还有一台无线电发报机。我声明我们是来领我们的人的；如果能在此时此地释放他们，我们就不会引起任何麻烦。他们显然同意了。

与此同时，聚集在大楼前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开始扔石块，砸窗户上的玻璃。一个民警递给我一个喇叭；我走到窗户前，把我的安全帽和计时卡扔出去，好让下面的人知道我是

工人。这时，一名站在下面的工人认出了我，大声地喊着鼓励我的话。我叫大家停手，告诉他们民警已经同意和平释放我们的人。由于我不知道被拘留的工人是谁，我因此请求上来一个人帮助我。

当许多民警和我一起站在窗前的时候，楼下的情况发生了可怕的变化。指挥官可能还没来得及下达撤退的命令，结果其它楼层的民警一下子冲进了我下面的院子里，把工人团团围住。我听到人们在骂我"叛徒，狗杂种！"他们以为我欺骗了他们。几秒钟内，数百个石块飞向窗户，使站在我身旁的民警大惊失色。不少民警被打伤，鲜血直流。我没有被石块击中，但我意识到我的努力失败了，必须赶快离开这里。四周一片混乱，令人胆战心惊，楼道里到处都是碎玻璃、石块和受伤的民警。

人们仍然在叫喊着我欺骗了他们，骂我是双重特务、是间谍。这时，民警开始投掷烟幕弹，而工人们则在空中接过来，再扔回打破的窗子里。到处浓烟弥漫，令人难以喘气。我必须出去，可我身后的门被出去的民警锁上了。我突然想起我身上的万能扳手；我先把另一边的窗户框拆下，这使我呼吸容易些。接着，我拿着喇叭，靠我的扳手悄悄地溜出了房间，来到楼下。楼下的大门锁上了，但门上的玻璃已被打碎；这扇门直通大楼的后面。我于是从门里爬了出去。我没走多远，正经过一个报摊时，有个人喊道："你们看那个人，他不是楼上那个工人吗？他欺骗了我们。"我明白他是在说我。

在我逃离现场时，我看见一个民警已经失去理智。他在走向市政大厅的路上，一个造船厂的年青工人拦住了他的去路，民警于是拔出手枪，威胁那个工人，并向他开了枪。人

群立刻蜂拥而上去揍他，打死了这个民警，制造了又一个牺牲者。后来还有更多的人牺牲。

由于被人痛打和极度精疲力尽，我于是动身回我居住的苏哈宁大街。在回家的路上，我拦住一辆大货车，哀求司机把我送到我家附近。这个司机像一片树叶一样浑身哆嗦，说刚才有人用手枪威胁他。他问我是不是也有枪，我说没有，并说我快累得只剩一口气了。他显然不相信我，但还是摇着头，把我送回了家。

与此同时，示威者与民警的冲突还在继续着。在攻击市委大楼几个小时之后，军队和民警全都投降了。工人们放走了士兵，却把民警装上卡车，挥舞着波兰红白两色的旗帜把他们押到造船厂。民警变成了俘虏，他们的皮带、帽子和象征着他们权力的徽章全被取掉。然后，他们全被押到经理办公楼前，但没有人知道如何处置他们。我后来听说，正在这时，党委书记来了。他利用当时混乱的场面，悄悄地把民警们领进办公楼的隐蔽处躲了起来。这时即使在那些可能还存有怀疑的人的眼里，造船厂领导究竟站在哪一边也是十分清楚了。同时，不断有消息传来说，越来越多的工人正遭到逮捕和殴打。厂领导此时已经完全站在与工人对立的一边，这一事实在骚乱开始时还不是那么明显。

中午刚过，工人们开着两辆军用坦克在造船厂内转了一圈；其中一辆坦克在格但斯克车站前曾撞倒一个男人。工人们事后讲，当时缴获这两辆坦克有点像参加拍电影。人们把泥巴糊在坦克的瞭望孔上，坦克因此像瞎子一样前进一段距离后便停了下来。驾驶员被迫打开顶盖，这正是示威者们所等待的。他们冲上去抓住驾驶员。制服坦克还有其它一些办

法。市中心有许多连着沉重金属输送管的宠大垃圾桶，把拉圾桶放在坦克履带的前面，再抬起垃圾输送管，坦克碰到垃圾桶就只好在难以呼吸的地方做无用的挣扎了。服过兵役的一些人在这样或那样的破坏行动中也显示了非凡的才能。在装甲部队服过役的一些人接过这两辆缴获的坦克，驾驶着它们来到造船厂的第二个大门前。

我不能在家里一动不动地呆太久。下午1点半时，我已经回到民警总部，或是民警驱散了示威者，或是示威人群自动散去，总之，那里已没有示威者了。总部大楼正在熊熊燃烧。我注意到一家食品店的门已经砸坏。当我经过那里时，看见许多人挤在里面，正在胡吃海喝。情况正在变得危险起来：如果人们喝得太多，那么一旦出现煽动者，他会毫不费力地鼓动人们从事暴力活动。必须快去想点办法。我回到斯维尔切夫斯基耶戈大街的民警总部，找到一个主要负责人。我问他当局有什么打算。他说不知道，但把我介绍给了另一个人。他说这个人能回答我的问题。这是一个一般打扮的人。我向他问了同样的问题，并指着那些开始酗酒的人叫他看；我告诉他有些人正等着制造混乱。"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他一边回答，一边指着他正在分发的弹药：一包一包的纸板盒，每盒24发子弹。这种情况把我吓坏了：波兰人难道要向波兰人开枪吗？这个人想知道他们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来应付这种局势，同时也想知道我有什么别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必须当机立断，于是我说我们需要的是把我们自己组织起来。派一些造船厂的工人和老警卫队员，他们拿着喇叭，步行或乘车，到城里各处去宣传，告诉其他工人都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去，准备选举能与当局公开谈判的代表。这个平民装束

的人听我讲完之后，同意停止他的行动准备工作。

在回造船厂的路上，我撞上一个正在奔逃的朋友。他是我看到的正在狂奔乱跑的第二个人。第一个是我在医院附近遇到的。当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时，我从他那里得知，四处都在谣传说我在民警总部被杀害了。我请他帮助我，去城里转转，把我们班的人集合起来。他没有同意，并说我准是发疯了。由于这个建议，他要我用瓶子猛击我的喉咙。我一个人向造船厂走去，没有人与我同行。与此同时，民警内部正在传播我的建议。他们用广播喇叭宣布，我们必须选举代表。所有车间于是都迅速召开了会议。当我回到自己那个车间时，同事们立即选我作他们的代表。之后，各车间代表全都来到经理办公室，准备成立一个罢工委员会。大家提名我为这个委员会的人选。该委员会只有三名委员组成。我记不得另外两个人是谁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介绍自己在造船厂的经历，阐述自己的观点和对今后的设想，以便大家最后能从我们三人中选出委员会的主席。我认为，我能够说出工人们的心里话；几小时后他们真的选我作了主席。但当我起身对代表们投我的信任票表示感谢时，坐在我左边的经理扯住我的夹克，在我耳旁低声说："你年轻又没经验，会犯错误的。别让他们只选你一个人。你们三人要共同负责。只靠你一个人，只能把事情搞糟。"似乎满屋子的人都在窃窃私语，说我干不了。在我没法解脱自己的时候，我对大家的信任表示感谢，并说我们三人应共同负责，还加上了经理悄悄对我说的那句话：我太年轻，是在冒犯错误的风险。这是我走错的第一步。我当时年仅27岁，害怕承担责任。经理这只老狐狸让我犹豫不决，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去了，真够厉害的！我拒绝自己一个人承担领导罢工的责任，而应该由三人委员会共同领导。

这个委员会总是改变观点，举棋不定，从未拿出过任何始终如一的策略，而且在谈判中证明过于软弱。总之，我们遭到了一次失败。

选举之后，我们一致同意第二天上午在经理办公室碰头。一些人留在厂里，其余人都回家了。那个星期四深夜，当我正向我的车间走去时，突然有人抓住我的手，把我拖进旁边一间小屋，接着对我说："明天你不要去罢工委员会。如果去，你知道会得到什么……如果你不顾一切非要去，那么除了我们要你说的话外，什么也别说。但最好是根本不去。"我回答说，我要照安排的去那儿；我还说，我要在众人面前逐字逐句重复我刚才听到的话。我猜想他们是保安警察的密探。

由于我们担心可能有人挑起事端，所以罢工委员会和各车间负责人已经开始来厂值夜班。我作为委员会的代表同车间代表马里安·菲尔曼特一起在我们车间（四车间）值班。午夜时分，万籁俱寂。我们俩人找出几件旧羊皮大衣和工作服盖上躺了下来。大约凌晨2∶00过后，我们车间主任向我们喊道，"凌晨3∶00各车间领导和代表都到健康安全办公室去。"几分钟后，我们匆匆赶去。经理扎切克和整个造船厂领导班子、各车间负责人，当然还有罢工委员会成员都在那里。有人递给我们一打刚刚出版的星期三《海岸之声》报。报上刊登了当局对暴力事件的观点。会议仅仅开了15分钟。"军队把造船厂包围了"，扎切克告诉我们。"当局决定见人就开枪。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随便罢工，但只许在船厂围墙以内，不许你们到外面去。否则军队会开枪，你们要流血的！"

我断定他只是想吓住我们。在回车间的路上，我和菲尔

曼特来到工厂主门，那里有军队。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们不可能再睡，坐着等待天亮。

星期三早晨5：30左右，我按照约定来到经理办公室，但选出的罢工委员会的另外两名委员却没有来。他们也许是被吓住了。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又回到了车间。我一点也不知道如何领导一场罢工；我感到力不从心。

工人们开始陆续到来。他们证实军队在一号门、二号门、三号门把我们包围了；造船厂同外界的来往已经中断。军队还占领了附近所有街道。市区和铁路医院附近的道路，以及通向内务部办公楼的道路均被坦克封锁。工人们对军队的反应各种各样，但大多数人开始向外面的士兵吹口哨。我后来听说，有一名妇女走到士兵面前大声喊道，“你们这帮孩子要把我们都打倒吗？哎哟！”这时，我们身体的某一部分似乎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我很难描述人们当时的感觉：绝望和复仇的渴望混为一体，慌乱和无罪交织在一起。绝大多数人不相信军队或保安部队会真的正准备向工人进攻，也不相信当局真的会做出开枪的决定。在我们车间，我们竭尽全力阻止工人离开厂子。但在其他地方，情况则不同。大批大批的工人已经聚集在一个门口的附近，打算突破大门冲上街头。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车间的领导莱斯涅乌茨基、莱纳尔恰克、苏什科和我一起去找扎切克。我们要同市区的民警和保安部队的指挥官谈判，阻止他们的部队开枪，但扎切克没能与他们通上电话。不管怎样，经理是不会采取任何主动的，而宁愿离此事远远的，一点责任也不承担。

我刚回到车间，就听见一阵枪响。大家全都惊呆了。从楼上面向下看，人群就好像一条不断蠕动的变形虫突然停住不动了。

我开始以为他们只是放空枪，于是我又向经理办公室走去。当穿过通向二号门的道路时，透过烟雾我看见好像一群羊正在奔逃的情景；烟雾中，工人们正像羔羊一样弓着身子用四肢在地上爬行，躲避飞来的子弹；还有一些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目睹事情发生经过的人讲述的情况既不全面又令人生畏。一次辩论激烈的会议在经理办公楼前的路上召开。一部分工人显然非常想知道会议正在怎样进行，于是就挤那些站在人群前面的人，这样前面那些人就被挤得愈来愈接近军队的警戒线。这时，一名工人走出人群，向士兵讲起了话。他身后的人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于是人群又向前推了一点；这样看起来好像前几排的人一直都在前进。工人们尽力想要看清些，确信穿军装的人是波兰人而不是化装的俄国人。一名军官下令士兵向前冲；人们顿时变得惊慌失措。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一阵机关枪扫射回答了工人们惊慌的叫喊。

我最担心的事情已成现实：波兰人已经向波兰人开枪。三人被打死（其中一人是我们车间的），另有一人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仅仅几分钟后，我们就升起了一面四周镶着黑色丝线的旗子，以表示对死难者的哀悼，并且在厂大门上悬挂半旗和系着黑纱的死难工人的安全帽。然后我们唱起了国歌；在“我们要用利剑收复敌人从我们手里夺走的东西”这一句上特别加重了语气。为了让政府的走狗们听到我们要说的话，在厂门上安上了喇叭。我们开始喊道：“杀人犯！杀人犯！……”

我们慢慢开始设法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以混乱的方式选举了一个又一个的委员会。工人因来自各个不同班组，因而互不相识、互不信任。我们列举了几十条工人不满的单子，之后才意识到，厂方唯恐我们不这样做，以便在他们组织进

攻我们的力量时使我们处于忙乱之中，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扎切克不断重复说如果我们那天上午10点或11点不撤离造船厂，坦克就会冲进来，炮轰船厂。

我们听说装甲车、坦克和步兵也已包围了三联城地区的其他造船厂。这时军队的枪口指向了我们厂的车间，迫使工人开始采取自卫措施。电焊车间的工人甚至发明了一种用乙炔瓶炸毁坦克的方法，其他车间的工人用截断的钢管制造出发射器。附近的北厂中心区就架起了一门这种土造迫击炮。

尽管激愤的工人不顾一切的讽刺咒骂，但我们中间真正想要同军队交战的人则没有几个。我们此时有一台无线电发报机，正在考虑向西方发出呼吁。我们甚至想致电苏联，请求他们前来帮助受害的工人。然而这两件事我们都没有做。

民警把我们包围起来，隔断我们与城里的联系，但焦急的家属已经开始在船厂门前聚集起来。这是一个无法忍受的局面。工人们士气低落，因为我们没有组织起来。这一事实在经理最后一次巡视各个车间时没有逃过他的眼睛。当我们提出对罢工进行表决时，大家的呼声很高，最后做出了撤离船厂的决定。民警总指挥宣布，“所有不满和意见都将予以考虑，但大家必须离开。”在举行罢工表决的大厅里，工人们失声痛哭。大多数人把撤离工厂的决定视为背叛之举，虽然他们也明白这也许能使更多人免遭牺牲。我们2万名工人——不是官方说的六个人——从士兵和民警排成的夹道里走出了造船厂。如此众多的工人在走出船厂时几乎用了好几个小时。

我回了家，我的“影子”也紧跟而来。

距格但斯克不远的格丁尼亚的人民更有理由记住12月事

件，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他们在暴力冲突期间蒙受了最大的伤亡，而且也是官方极其阴险欺骗的牺牲品。人们总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在格丁尼亚，签署了波兰整个历史上第一个罢工委员会同统治当局的协议。12月15日（星期四），一群罢工工人聚集在格丁尼亚市委办公大楼前。由于等候向官方诉说不满无人理睬，他们又来到格丁尼亚市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驻地前。市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主席扬·马里安斯基同地区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主席塔德乌什·贝伊姆取得了联系，后者同意把罢工开始时起草的请愿书完整地报送副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科齐奥莱克。之后，马里安斯基又同工人代表签署了一项协议。同一天午夜，格丁尼亚厂际罢工委员会（这个名称后来才为众人所知）的成员遭到逮捕。

接着又发生了一连串的戏剧性事件，它们已经深深铭刻在格丁尼亚人民的心中。工人们在上班的路上被机枪打死人们用门板抬着一个被杀害青年的尸体在城里四处游行——这在后来拍摄的影片《瓦伊达》中是个令人鼓舞的场面；人们纷纷被捕，囚禁在市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办公大楼的地下室里；到了午夜，民警秘密掩埋死于他们之手的牺牲者。

从那时起，在每年的12月17日，希拉雷·亚斯塔克神父都要在圣心教堂作弥撒。这可能是全波兰唯一如此虔诚地纪念这一天的地方。

12月17日在什切青，瓦尔斯基造船厂的工人听说格但斯克发生流血暴力事件之后走上街头，大约一小时后，邻近的格雷菲亚造船厂的工人也走出了工厂。什切青地区党委第一书记瓦拉塞克在此前曾多次警告工人不要罢工。他和他的同僚匆忙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在工人到来之前离开了地区党委

办公大楼。工人们洗劫了这座无人的大楼，并把它付之一炬。然后，他们又攻占了地区民警总部和省工会大楼，并将它们放火烧毁。商店遭到抢劫，群众与军队和民警的冲突一直持续到深夜。这时，坦克开进了城市的敏感中心地区，强大的增援部队也开到了附近的瓦尔斯基造船厂门前。

12月18日，两个船厂宣布举行罢工和静坐示威，工人们选举出罢工委员会。他们提出21条要求，其中包括：

1．废除工会中央理事会；

2．建立独立工会；

3．将物价降至原来水平；

4．提高工资30%。

当时，整个城市都在进行罢工，瓦尔斯基造船厂成了罢工者和支持者的中心。12月19日和20日，这两个造船厂的代表代表全市其他所有工厂同地区当局进行了谈判。谈判地点设在造船厂外的地区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大楼。12月20日，双方达成旨在结束罢工的协议，但达成的协议没有完全接受工人的要求，因而遭到绝大多数罢工工人的拒绝，结果罢工再次爆发。在瓦尔斯基造船厂，工人分成两派。大约有1000名罢工工人回了家 。（当天夜里，罢工委员会增选了五名新成员，其中之一便是埃德蒙特·巴卢卡。）

然而，瓦尔斯基造船厂在22日上午10点结束了罢工，因为罢工工人已精疲力竭，且圣诞节正日益临近。在工人们看来，这次罢工也是完全失败的。

1月11日和18日，瓦尔斯基造船厂工人曾两次试图再度罢工，但一切努力均告失败。1月20日，瓦尔斯基造船厂工人派出一个代表团赴三联城，想同那里的罢工工人取得联系，

但被格但斯克市当局制止了。1月22日，在埃德蒙特·巴卢卡领导下，瓦尔斯基造船厂再次罢工，并立刻得到了什切青市民的支持。地区当局决心镇压这次罢工，于是派军队包围了这个一直被视为反对派主要据点的造船厂。直升飞机在市区上空抛撒传单，扬言一小撮极端主义分子正在以武力挟持工人。1月23日，瓦尔斯基造船厂罢工委员会向波兰统一工人党新任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递交一封信，说明罢工运动的目的，并邀请他到造船厂来。1月24日，盖莱克在内务部长什拉赫齐茨、总理雅罗谢维奇和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陪同下来到瓦尔斯基造船厂。双方会谈进行了长达9小时，讨论内容由发言人向全厂传达。双方以口头协议，尔后以书面协议确认，该厂罢工委员会变成了一个负责监督重新选举工会和船厂党委的工人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将在2月14日停止其活动。虽然盖莱克降低了12月物价上涨的一些指数，但他使瓦尔斯基造船厂工人相信，进一步降低物价是不可能的。然而，罗兹儿家纺织厂女工在2月举行的罢工终于扭转了形势。在罢工的第四天，最高当局被迫做出让步，同意把物价恢复到1970年12月12日以前的水平。

达奴塔的回忆

在我的记忆中，1970年12月的那些日子是与我们的孩子即我们的第一个儿子联系在一起的，当时他才出生几周。那个星期一，莱赫去给儿子买了一辆婴儿车。星期二，他在午饭时回到家。我们那时同普伊晓娃夫人一起住在苏哈宁大街。他当时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裤和工作夹克。他告诉我格但斯克正发生各种各样的戏剧性事件，街上在流血。第二天他很晚才回来（在四点以后），

说他正在被人跟踪。我记得我们要去邻居家看电视播放的一部影片。正当我们要出门时，两个男人来到我们住的公寓带走了莱赫。他取下结婚戒指和手表，告诉我如果钱花光了就把这些东西卖掉。他还安慰我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的，人们会帮助我的。

那个星期六，莱赫的一个同事来到我家，说政府内部要发生变化。他还说，如果这种事发生，莱赫肯定会获得释放。星期日，莱赫和我们又在家里团聚了。他没有说他们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也没说他被关在什么地方。他只字未提此事。我想他这样是为了不让我担心。

我什么也没有对我的妻子讲。我对任何人都只字未提。实际上，他们审问了我。我当时郑重地说（我当时说的话都有白纸黑字的记录）：如果他们不同意建立真正的工人组织、如果不能说明和控制真正发生的事情，他们不久将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我的手也不是完全干净的，这也是事实。这时，他们把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说，“签字！”我于是在上面签了字。这个文件是一份对国家的所谓“忠诚证明”。11年后（1981年2月）的军管期间，每个被拘留的人获释前都必须在这种文件上签字。

1970年12月对我们是一场灾难。十二月事件首先是一场冲突，一场由力量决定的冲突。但对于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什切青的造船工人，也包括我自己，这次事件提供了无比宝贵的经验，使我们得以明白当局为什么在一场危机中会如此行事。它使我们确信，我们必须寻找其他解决问题的途径。

许多问题还无法回答。我们不知道被拘捕的人遭遇如何，

也不知道谁应该对“和平解决”在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埃尔布拉格和什切青发生的事件负责，或者说对那里发生的大屠杀负责。根据国家检查官发布的官方声明，这四个城市有45人死亡。但当时流传的死亡人数要高得多，说有几百人；报纸也暗示说医院里还躺着几百个受伤者。

自从12月悲剧开始以来，波兰教会一直竭尽全力支持工人。各地的牧师在布道时都要朗读波兰主教团致“我们所有爱国者”的一封信。一个月后，主教们号召全国人民“为他们的国家祈祷”。在拥有大批工人的教区和省份中，牧师积极搜集有关那些失踪、被杀、受迫害或被监禁的人的消息，并设立基金会救助死难者及其家属。他们整理出一份有关保安部队秘密掩埋死者的材料；只是在死难者家属的紧急请求下，牧师才被许可到现场参观。

甚至在“领导层变动”之前，格但斯克造船厂和格丁尼亚造船厂的领导就已奉命开除了全部参加罢工的工人。在格丁尼亚的“巴黎公社”造船厂，就有多达800人被解雇，而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只有18人因被查出藏有抢来的商品而被开除（其中一人拿了两瓶白兰地，另一人抢了一顶毛皮帽子。他们把这些东西藏在工具箱里）。造船厂的气氛达到了爆炸的程度。1971年1月，厂方宣布我们要为定于在华沙举行的一次有盖莱克参加的会议选举代表。每个车间在车间主任和副主任的领导下都组织了各自的选举，不受经理的约束。经理只限于发表新闻公报。我们车间选出了三名代表：莱纳尔恰克、莫辛斯基和我自己。

我们从造船厂集体乘车被送往首都特区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大楼。大厅里已座无虚席。前排坐着工厂总经理和管理人员，接着是党员，其中有各车间代表，大多数是工人。知

识分子中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在出席会议的人中占少数。时间是1月25日。当盖莱克、什拉赫齐茨同格但斯克省党委第一书记塔德乌什·菲什巴赫、地区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主席塔德乌什·贝伊姆一起进入会场后，会议便开始了。

会议首先由内务部长讲话。他开始像个小孩那样哭泣，而实质是在说，一个工人的儿子本不应该看到暴力冲突事件。他说，在他的内务部控制下，再不会发生这个波兰人枪杀那个波兰人的事了。高贵的人并不一定有头脑。他解释说，在开枪射击格但斯克造船厂二号门的那个星期三，他是如何站在士兵和民兵的警戒线后面而又无法干预。他还告诉我们，一个12名工人组成的代表团怎样在格但斯克某地同当局举行会谈，假如不是他什拉赫齐茨亲自干预的话，他们会被轻易打死的。接下去是更多的自我表白。

我们列出了一个我们依次发言的名单。然后亨雷克·莱纳尔恰克站了起来，他省去一切政治大话，只提出了一个具体要求：造船厂工人要求允许在格但斯克的普日莫尔泽区建造一所教堂。该区是大多数造船工人居住的地方。盖莱克这时插话，当即表示同意。这将成为许多年来在格但斯克兴建的第一所大教堂，而在此以前，官方一直反对——虽然不是明确反对——在这个城市的“社会主义”新区建造教堂。当局常常不能恪守许下的诺言，但这一次是说到做到了。普日莫尔泽区的教堂动工兴建了，莱纳尔恰克被任命为建设委员会的主席。

大约十年以后，即1980年8月，当我们计划为纪念1970年12月死难工人修建一座纪念碑时，我又想起了这件事。今天，我能够更清楚地看待事物了。有些历史往往自我重复！纪念碑建立起来了，它的主体部分由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和一

支硕大的锚构成，底座四周雕铸着痛苦的人们的金属塑像这一次，又是莱纳尔恰克担任建设委员会主席。在我们庆祝1980年8月事件一周年的那一天，有人说道："这座纪念碑像一把鱼叉插在鲸的身上。不管鲸怎样乱蹦乱跳、拚命挣扎，她永远不能甩掉身上的鱼叉。"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真理。

莱纳尔恰克发言后，格但斯克的其他工人依次发言。当轮到我发言时，却被来自格丁尼亚的工人打断了。他们站起来直接批评政府，其中一人大声说，他的女朋友残遭杀害，而她的名字甚至都没有列入死难者的名单。这时，大会主席团陷入一片混乱，人们要求对此进行解释。他们当即决定派人去调查——他们似乎最关心的是赢得时间。当我正在注视这一场面时，另一个青年突然起身说："盖莱克同志，你在这次会议上看到了大量死人的证据，我对此不想再说什么了：这里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究竟死了多少人。我只想说，我能够理解我们的格但斯克工友刚刚说过的话：街头冲突总是要死人的 但在格丁尼亚，我们面对的是没有纪律的暴徒……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是波兰人！"主席团再一次乱成一片。这个青年人讲述了下面这个事件：他在铁道附近行走时，突然看见一群人打着红白两色国旗在行进。他们被人追赶着，子弹从头顶上打过来。但他们并没有扔掉国旗，而是一边跑一边骄傲地把旗帜高高举起。追赶的人死死盯住国旗不放，他们把旗子扯下来，撕成碎片。"第一书记同志，我想问一个问题"，他继续说，"那些以这种方式对待国旗的是什么人?谁教育了他们？我不是问他们曾在哪里上学，而是问谁培养的他们？"大厅里的人全都吓呆了。盖莱克急忙站起来，瞎扯了一阵爱国主义。

这个时刻对盖莱克是少有的。他发表了对哥穆尔卡批评

性评价的讲话。他说:“哥穆尔卡同苏联人的关系是不好的,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如此。从现在开始,他就要同皮奥特尔·雅罗佐维奇一起去同苏联改善关系。是吧,皮奥特尔?”我同周围的人互相看了看,我们这时已清楚地知道,我们的“伟大”总理原来不过是俄国人的工具。

在盖莱克做完这个总结后,我们至少应有一个人站起来说,“同志,这很好,你请我们帮助你,但请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帮助谁?”但无人这样问;我们只是齐声高唱波兰国歌。不管怎样,人们不会简单反驳这种口头上的问题:“你们愿意帮助我们吗?”因此他们答道,“我们愿意帮助你。”实际上,我们对此深信不已;热情的火焰在我们胸中燃烧,我们准备采取积极行动。我还保留着盖莱克的一张在造船厂的照片,代表们簇拥在他的周围。我们成了议论的中心,一些记者也跑来采访我们。他们想要把我们描绘成新的工人领袖。但不久人们明白了,那正是当局极力要避免的事,因为那些在1970年12月事件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是不能出名的。

1月,我们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其职责之一是调查工人认为是非法或不公正解雇的工人问题。我们在造船厂组织了三次会议,结果都发展成了针对经济局势的抗议示威。经理办公楼前,聚集了一群身穿脏工作服的粗壮工人和工作服溅满红点的油漆工,我们给经理的印象似乎比12月事件还要深。

在市区,零星的战斗和抢劫持续了几个星期。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就发生在造船厂前。然而此间生产并没有下降,甚至还有所增长,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例如,在K—3车间,老工人总是要年轻人当代表,并且说,“去和他们吵,你们这些孩子,这里的活我们替你们干。”在我们车间,总

是我和莱纳尔恰克去。一天上午工间休息时，我们只是到厂长办公室前转转，而不是受任何人特别召集去的。刚到那儿时只有我们两三个人，但几分钟内就有几百人到来。最后我们竟召集到1500到3000人。我们的集会总是使厂长和经理猝不及防。我们想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东西是具体的经济计划。头两次集会时间很短，从上午工间休息开始到10点左右结束；第三次集会时间最长，是在午夜时分结束的。这一次集会期间，整个造船厂都停止了工作；工人的情绪带着敌意，结果造成大批汽车被毁坏，三名工人被扣压。这三名工人明显想要挑起冲突，把人们拖进去，煽动普遍的抗议。这种局面会使政府一个一个地把我们收拾掉，最后使我们的全部事业彻底完蛋。

在这段时间里，造船厂现代化的计划开始实施。造船厂当时濒临倒闭；70％的设备和机器近乎于废铜烂铁，工作方式陈旧过时。仅几天之内这种局面突然发生了逆转：上级命令对造船厂进行现代化，还计划为工人建造一个娱乐中心和度假旅馆。大家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弥补罪行的姿态而已，其目的在于“擦干我们的眼泪”。当时人们都说，“他们先杀死我们的人，然后送我们一个游乐场！”当时的口号是工人生活将“越来越好！”工人生活在“幸福时代”。我们一到工作现场，厂长的广播电台便播放音乐欢迎我们；在更衣室里，天气预报告诉我们是否要穿棉工作服或油布工作服。在接下去干活的一个半小时里，我们可以听到一个广播节目，这个节目是根据社会学原理为造船厂的“人性化”工作而编排的。它报道船厂里的逸闻趣事，对工厂各项发展的评论，文化动态甚至甲、乙队足球赛结果。尽管有这些装潢门面的变化，但在工人们看来，事情根本没有什么变化。

1971年“五·一”前夕，发生了一些反政府的抗议示威。木器工人抬着黑棺材跟在“五·一”游行队伍的后面。官方对此反应强烈，不少工人遭到逮捕。尽管如此，游行队伍里还是出现了要求惩办1970年12月事件杀人元凶的标语口号。尔后，在工人被杀害的二号门附近的造船厂围墙上挂起了花圈。这次游行在当局实行不干预政策的70年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次事件的另一个结果是：每年工人死难日这一天，船厂经理、工会主席和党委书记都要去买花圈，然后步行到墓地向死难者献花。这已成为一种固定的作法。造船厂电台明显地报道说，这些鲜花是全厂工人献给死难者的。然而，在每年的纪念日这一天，总有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停在二号门前，等着某个鲁莽地表示同情的工人出现。官方纪念活动总是像其他大多数纪念活动一样排除工人参加。第一个因表示同情死难者而遭逮捕的是一名车间主任，时间是在1973年。他把一束仙客来花摆放在墙下，伏尔加轿车里的人立刻抓走了他，后来又遭到工厂的解雇。但大多数工人似乎已经忘记了1970年12月的死难者；他们更关心挣钱。只是在1977年，“波兰青年运动”才开始重新纪念1970年12月大屠杀。

然而，各车间的一些工人仍继续为1970年12月死难者的家属、死于“科诺普尼茨卡号”船大火的工人和那些被民警打伤的工人筹集资金。有一个特别残忍的事件。一个名叫科帕奇的技术员在超时劳动后，因筋疲力尽而跌倒在车站站台上，造成脑震荡。人们把他扶起后，被送到“醒酒室”而不是医院。在那儿，他被活活打死。人们总愿意下班后到“栗树下”酒吧喝上一杯啤酒，因而这个酒吧也是民警特别喜欢

袭击的目标。这些人被民警带到“醒酒室”，遭到殴打，有时被打成终身残废。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民警一直以这种方式对1970年12月暴力事件进行报复。所不同的是，那些碰巧搬入多数工人传统居住区的人却有安全感，尤其在黄昏以后。

对于1970年12月事件，其经验是与1980年8月发生的事件无法相比的，尽管它们都是戏。从各方面讲，1970年12月事件只是一出没人捧场的戏。我的印象是，它完全缺乏在格但斯克甚至许多工人家庭那种各界人民之间的团结，自始至终让人感到孤独、恐惧，对我们运动的前景捉摸不定，只是可怜地认识到自己的起义是必要的，也没有任何国际间团结的迹象。人们常常问我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子，问我们是否感觉到其他国家的工会成员对我们的事业感兴趣。没有感到，对于我们，1970年12月是黑暗而孤独的日子；我们的事业是那种事先就已输掉的事业；在这种事业中，人们不能指望任何东西、任何人。就我所记得的而言，波兰没有一个人意识到应该发表任何有关国际看法的公告。你可能会说，我们简直就在西方的兴趣之外。3270万人民在一定意义上已不在欧洲的版土上，虽然这个欧洲没有忘记1956年对匈牙利的武装入侵，以及之后在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入侵。

尽管如此，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升起一道帷幕。这道帷幕既有象征性又是暂时的，甚至有些荒唐。12月16日星期三，即格但斯克造船厂发生大屠杀的那一天，副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科乔奥莱克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呼吁人们全都回去上班。他是在格但斯克的弗热什奇区的一个演播室里发表这篇讲话的。他的讲话突然被一声撞击的巨响打断。这时演播室里匆匆搭起的一块用于演讲者背景的屏风倒下，闪出一个士兵的身影。那个士兵站在那里，一身军服，手握机关枪。

科乔奥莱克的呼吁是说给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造船工人听的。但这个呼吁与其他决策机构，特别是军队和民警的意图和指示并不协调。12月17日早晨，数以千计的工人乘火车去上班，但在格丁尼亚造船厂站和附近的“巴黎公社”造船厂，由于通往船厂的道路被坦克封锁，以致聚集了一大片人。由于来的人越来越多，人群根本无法后退。这时，坦克开炮警告，紧接着是一阵密集的机关枪扫射。大屠杀就这样开始了。

沿海报纸开始刊载各种政治公告，其中包括一项实行宵禁的公告——在傍晚到黎明期间禁止人们离家外出，但后来，报纸屈服于压力，不再刊载真实消息，而只登被认为是描述了“事件真实画面”的报道。这只是一种反映暴力冲突期间工人经历和新政治领导层想要表达的“官方”画面的综合纪事表。一个月后，检查官发布了一项死难者名单的公告。中央的宣传工具又大谈为克服“政治危机”已经开始的艰苦工作，以及“需要同工人阶级建立牢固的关系……”。必须对当局的新领导班子留有余地，给他们一个机会，信任他们。

工资确实提高了，但这仅仅是因为附加的工作时间也增加了。1972年，造船厂每个工人平均一年要多工作200小时；1973年是300小时。在以后的几年里，这个数字一直增加，结果有的工人每年平均要多干六七百小时。这中间的真实含义是，人们必须在早晨四五点钟起床，乘上拥挤不堪的火车去上班，然后像奴隶那样一直干到晚上6点或8点，回到家仅仅是为了在一碗汤或电视前的椅子上睡一觉。工人们每天从黎明一直干到黄昏，而工作环境却是可怕的：风刮、雨淋，不是严寒就是透不过气的高温，呼吸着加铅油漆和电焊气中有毒物质发散的气味，铁锤的敲击和机器的运转震耳欲聋。不

知道“老鼠人”是什么意思的人应该到造船厂看看，看看工人们是怎样在仅有人身粗细的长长管道里手拿生锈的扳子、满身铁锈和汗水用腹部向前爬行的，也看看工人们是怎样拿着乙炔焊枪爬着在油船的石油罐下干活的。那时他们就会明白摧残健康、使人筋疲力竭的非人劳动是什么滋味了。仅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医生每年都要诊断出数百名暂时的或永久的伤残病症。波兰的造船厂肯定是实行了现代化，但其目的只是为了提高生产能力，而不是为了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健康状况。

1975年，一场新的危机又爆发了。这场危机并不是因为缺少船只，而是因为国际上原料短缺。巴西停止支付美元，而以咖啡来换取我们的船只。在我们国家，“鹅下金蛋”的时代已经过去。外币支付的款项全部停止！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同我们的邻国进行直接贸易。我们不得不以便宜的价格出售船只，而政府也开始寻求以工人为代价的节约措施。一段时期内，当局也曾准许甚至默默鼓励工厂自行稍稍增加工人的工资。此后，情况又令人不快地发生了变化。工人们看到，当局以前给予他们的东西又被全部拿了回去。人们计算了一下，如果工资以当时的速度继续下降，那么到2016年，一个造船工人将拿不到一分钱。人们开始跑到各个车间找更多的活干。憎恨和抱怨的迹象也开始出现。任何一个设法找活干因而比别人挣得多的人都会成为那些经常被迫待着或被取消加班的人的攻击对象。一个人无须是经济学家也能做出下面的比较，而对于一个工人，用一年的时间也就够了：从一年的圣诞节到下一年的圣诞节，他会十分清楚地看到他桌子上的食品比上一年少了。就我本人而言，我从1970年12月事件

中得到的唯一实实在在的好处以及随之而来的变化，是我作为我们车间工会选出的卫生安全科的代表所作的工作，我们这些代表想尽最大努力为工人做些事情。我为发给工人防护衣、肥皂、毛巾，为采取各种各样轻微的改进个人生活的具体措施而同经理争执不休。这是一项艰苦无比的工作。到任职的第一年年底时，我已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下面不能取得任何成就，而在“上面”继续进行争吵。工会一向只是一条传送带：把党的指示以最快的速度传达给工人，而绝大多数工人并不是工会会员。工会的全部作用，多少年来一直是迫使这支几百万人的工人大军更努力地工作，默默无声地干活，必要时，还要强迫他们投票支持党的候选人。

要理解工会是如何工作的，只须看一下工会中央理事会历任主席的政治履历表就行了。工会中央理事会这个机构建于40年代末，其作用在于限制工人的任何自治倾向。爱德华·奥哈布是一名战前的老共产党员，1949年担任该理事会主席职务。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他从党的一个领导岗位调到另一个领导岗位，最后成为国务委员会主席。

因此，官方工会已经成为用以消除工人阶级对公共事务发挥任何可能影响的工具了，而且这是在一个被认为由无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国家里！工会原被人们指望参与国家生活。但如果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必须是党的最高领导集团成员，那他就一点不代表工人。

我一刻不停地思索着局势。“我们愿意帮助你”这句令人作呕的话使我极为愤怒！另一方面，莱纳尔恰克却稳如泰山。他负责为自己那个班寻找食物供应，解决各种出现的问题。他搞来一台起重机，帮助我们吊起一条很重的电缆；按时设计出钻孔的方法；为工作中要求的各种改进出主意想办法。

我们总是为他收集工票，来补偿他在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上所化的时间。他为人随和，然而从不巴结别人。他知道如何利用车间主任和经理的良心。在任何情况下，他们任何人从不敢像对待大多数工人那样轻视他。

但是，莱纳尔恰克对于缺少活干这个问题也是一筹莫展。我们电工比船台上的工人有较多的机会讨论形势，因为后者总是处于监督之下。我们只须下到一个船舱里，用一块木板封住门道，这样就没人能在这个迷宫里发现我们。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是需要建立一个能保卫我们自己的组织。不幸的是，我们有时在工会的办公室里仍继续这种讨论，原以为我们的谈话不会被人窃听。例如，1976年秘密警察逮捕我时，他们逐字重复了我对莱纳尔恰克说过的话，我立刻怀疑莱纳尔恰克出卖了我。但随后他也被抓了起来，并且同样也怀疑我出卖了他。他们就是这样想方设法地分化我们，我们建立新工会的决心因而动摇了。我叮嘱自己，时机还没有到来，我们首先要巩固力量。

在我的记忆中，70年代中期和晚期是一个失败的时期，从社会、工作和道德等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如此。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得到工厂管理部门的任何支持。1970年12月事件，实质上是一次工人阶级的抗议行动，其结果只是稍稍吓了一下白领工人：现在他们要报复我们了。厂领导逐步把那些最积极的罢工工人开除掉。我总是被分去干最差的工作，从来不给我任何形式的提升。1976年，我看到情况正在恶化，新的反抗不可避免。我于是决定在工会选举运动中讲出自己的心里话。但我讲得太糟了，愤怒占据了我的一切。在我那个车间的选举会上，我称工会是傀儡，谴责加快船只下水的作法是叫我们干“无偿劳动”。一条船比预计期限早两星期下水

仅仅意味着我们要用三个月的时间来修理因粗制滥造提前下水使船发生的损坏。这样做仅仅使某些人得到十字勋章和奖章。我强调指出缺乏稳定的经济计划。在讲到整个国家的形势时，我说1970年12月后许诺的改革从未兑现过，凶手依然逍遥法外，甚至连提都不提。我怎样知道我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工作？也许他正是一个罪犯。我说，盖莱克没有信守他许下的诺言，他向人民撒谎。当我讲到这里时，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但随后我的话便扯远了，开始大喊大叫起来。我的目的是想用一种恰到好处的方式向听众演讲，以赢得他们的支持，从而得到在总选举时当选为代表的机会；但是我做过了头，没有控制住自己。

在正式场合，我仍然是我们车间推选参加总选举的代表，证明信就放在我的兜里。但随后我的工会生涯突然结束了。我被叫到经理办公室，秘密警察正在那里等着。他们要我放弃我的讲话方式。他们问我如果在工会总选举中当选为代表，我是否愿意按他们的话讲。我回答说，不，我什么时候也不会改变一个字，我要讲出我的心里话。然后他们又以“患病”、需要“度假”相威胁，使我不能出席工会总选举大会。但我说，“即使我发烧，我也要去。”谈话就此结束。他们立即打了一个电话，随后警卫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拖到造船厂大门口。

我想试试另一个办法，即找位于卡利诺夫斯杰戈大街的地区工会领导谈一谈。负责处理造船厂工会事务的地区工会代表告诉我他会为我干预此事的。我还能要求什么呢？当我又回到地区工会大楼找我拉下的香烟时，我听他正在同我们厂的工会主席卢宾斯基通话。他说道：“我说，有个叫瓦文萨的人到这儿来见我……他会把事情全搞砸的。你认为我们

应该怎样对付他呢？”我知道他们的阴谋。我没有立即被开除，只是受到警告。在4月接到解雇信之前，他们一直付给我钱。同时，还发给我相当多的补助费。

正式在开除我的通知书上签字的是接替莱斯涅夫斯基经理职务的皮耶茨科，但这项决定是由某个重要人物做出的，可能是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每次工会会议的记录正式打印前都要先经厂党委书记、车间主任和厂工会理事会秘书阅读。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他们之中有人不同意其中的某段话，就干脆把这段话从会议记录划掉。这次，他们三个人都同意开除我，并决定引用我的全部讲话来对我进行惩罚。莱纳尔恰克当时仍在船厂，想要为我采取行动，但不值得为此费事了。我现在已离开造船厂；我生活中新的一章正在开始。

我自己生活中的这些东西正好与1976年6月政府宣布基本食品提价同时发生。造船厂的气氛是激烈的。然而，此时影响波兰事变发展进程的却不是格但斯克，而是腊多姆和乌尔苏斯。那里发生事情的导火线同1970年格但斯克是一样的，但这次事件的规模较小，而且很幸运，军队没有向群众开枪，但许多工人遭到民警的殴打。在事件发生的当晚，总理雅罗谢维奇在电视上出现，他低着头，宣布撤销未来几年里计划的全部提价决定——按官方的说法，每项提价决定都公然破坏了政府“同工人阶级协商”达成的协议。然而真正的忠告者，腊多姆和乌尔斯基的工人却被当作“闹事者”和“街头流氓”加以对待！官方的这项命令迅速传遍波兰的工厂，以寻找和谴责类似的闹事者。

第四章　达奴塔与家庭：一个新家

我在斯托吉区住了四年。这是工人阶级的聚居区，位于格但斯克市的东部；一个工业区和莫特拉瓦运河将它同市中心隔开。这个区是真正的城中之城。我们住在弗若塞大街的公寓大楼里，那里住满了像我们这样的人，大家都盼望着生活能有所改善。公寓大楼边上有几小块空地，但在这贫瘠、多沙的泥土里什么东西都难以生长。工人们在这里搭了许多棚子，喂猪、养鸡。一条几码宽的林带把这个工人居住区与格但斯克的克隆代克海滨分开。在这个海滨，几支勘探队经常秘密地用水泵寻找小块琥珀。他们似乎和民警展开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游击战，而一些警官常常同勘探队的秘密活动有关。随着一座炼油厂在这个海滨的建立，这种开采琥珀的活动也就停止了。这座炼油厂是盖莱克的一个投资项目的一部分，由油船从波斯湾把石油运送到这里进行提炼，是准备修建一个新港口——北方港——这个大型计划的工程之一。按计划,这个新港要修建两个码头,一个用于装卸煤炭，一个用于装卸燃料。这样,我们将独立于苏联,保证波兰在进出口方面发挥自主的作用。然而这项美好的计划从未坚持下来。阿拉伯国家停止卖给我们石油时,油船全部搁置起来,燃料码头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在西里西亚,巨大的卡托维兹钢铁厂正在全速兴建。这项工程耗费大量投资，使波兰在以后许多年

里一直欠苏联的外债。沿海地区的投资热也正在把整个格但斯克城变成一片废墟。以夏尔科波尔硫化厂为例，这个工厂排出大量含有剧毒的黄色烟云，因而逐渐把周围地区变成黄色荒地。格但斯克的汉塞亚蒂茨老城正遭受酸雨和磷的沉积物浸蚀。从前，斯托吉海滨一直是三联城整个海滨最优美宜人的地方，现已对游泳者关闭。统计数字显示，波兰人的平均寿命正在下降，尽管这个平均数在欧洲国家中一直就是最低的。在“对成就进行宣传”的掩盖下，这一切几乎是不知不觉发生的。官方的这种宣传只讲党和国家想要我们听的东西，而不给人们提建议和辩论的任何机会。

正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腊多姆和乌尔苏斯爆发抗议示威不久，一批知识分子建立了“保卫工人委员会”。他们要争取我们在造船厂没能得到的东西，即建立一种组织，使之有效地保卫工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否则，不可避免的灾难就会再度降临到工人头上。国家的一切由永久执政党中的一小批精英僵化地控制并非易事。那些1970年至1980年期间掌权的人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好景不长，因此就纵情地享乐。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便是由生活奢侈豪华的广播电视部领导人马切伊·什捷潘斯基以及党中央第一书记重用的这些纨袴子弟败坏的。总理雅罗谢维奇的儿子常常带领一群歌星和影星招摇过市，驾驶豪华轿车四处兜风，他在华沙有“红色王子”之称。住别墅、乘游艇、成群结队地狩猎、周末乘直升飞机旅行等等在他们中间已蔚然成风。波兰正走向崩溃，而这些人却醉生梦死，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那时，我从未想到过有一天我会成为政府的这样一座豪华住宅的“客人”，同高度警惕的卫兵一起享用丰盛的美餐！

对于达奴塔、我和我们的家庭来说，在弗尔佐塞大街居

住的那几年是非常幸福的，虽然我们当时手头很紧，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多年以来，我从达奴塔那里得到了无穷的力量和支持。我们刚结婚时，她很容易情绪低落、处处被动，有时甚至很悲观，但几年之后，她的勇气和决心却大大增加了，她的勇气和决心已经成了保护我的屏障。有好几次，当秘密警察闯进我们家时，她愤怒异常、反应强烈，致使我不得不为这些不速之客说话。这就是从外表上看到的达奴塔。另一方面，她又是个极为温柔、极为文雅的女人。她的每句话或每一个轻微的动作都流露着仁慈；对另一种没有斗争、充满人性的生活——一种充满爱和满足的生活——的向往。达奴塔属于那样一种人，她观察敏锐，不需要别人任何解释，单凭直觉就能看到事物的本质，从而对解决大多数问题提出正确的建议或方法。我做出的多数重大正确决定都归功于她。这并不是说她具体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她只是以一种帮助我从新的角度看问题的方式同我讲话，从而使我更全面、更正确地看待问题。我从不想使达奴塔成为我的同志，但不久她便显示出对我谈到的问题具有惊人的洞察力。在我被关押在阿尔拉莫瓦期间，她实际上完全代替我在公共场合进行演讲，而且可能比我本人那时讲的还要好。

当我们搬到斯托吉时，我们已经是四口之家了：我和达奴塔，以及两个儿子博格丹和斯拉韦克；斯拉韦克当时只有两个月。我们似乎每隔两年就要生一个孩子。我们记忆重要政治事件时，总是把它们同我们家庭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联系起来。例如，博格丹生于1970年12月，12月事件正发生在此时；普热梅克出生时，我被工厂开除；玛格达同我一起关在民警总部时，她还坐在婴儿车里；阿尼亚出生恰好是大罢工和“团结”工会诞生的时候；玛丽亚—维克托丽亚生于我被关押期间，

达奴塔带她到阿尔拉莫瓦时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当时她只有几个月。我们家最小的孩子小布雷吉达生于军管取消之后。

我看着孩子们长大，常常想他们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孩子们个个生龙活虎、精力充沛，从刚刚出生几个月就开始为在家里和在生活中获得自己的地位而斗争。每个孩子在这样做时都有自己的方式。我认为，最小的儿子最像我。就表演技巧来说，玛格达在家里的女孩子中最为突出；她七岁时就很像个少妇了，而且长得非常漂亮。当我一想到普热梅克十分顽强，斯拉韦克聪明敏锐，博格丹沉默寡言（这可能是由于他在1970年12月事件期间护理不当引起的，当时大街上正在流血）时，我便有一种快乐和忧虑交织在一起的心情。每个孩子都使我们既感到骄傲又感到担心。

我很少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我总是和达奴塔一起给孩子洗尿布、给他们洗澡和喂饭。家务事真是太多了，根本说不清哪些是妻子应做的事,哪些是丈夫应做的事。我同孩子们从他们最小时的这种亲密接触使我们永远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我不能给予他们足够关心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牢固的。

我们既年青又幸福。我们经常带着五个孩子去散步，不是穿过小树林到海滨（夏天干完活，我常去这儿游泳）去，就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去市中心看望达奴塔的姑妈，或者去纪念碑前的韦泰尔普拉特广场。我们遇到的难题是在晚上。当我和达奴塔给五个小家伙洗过澡、喂过饭，然后送他们上床睡觉时，我们每天晚上都得把床打开搭一遍。当他们稍大一点时，被褥和枕头几乎占了整个房间。这间房子由两个小间组成，最小的一间只有5英尺宽。在较大的一间屋子里，我们的日常生活主要集中在一个沙发、一张吊床和一张桌子上。

屋子的一角放着一部缝纫机，后来印传单时它被用作老式油印机的支架。

但那时，我还几乎没有想到我们的组织和我们工会的活动。造船厂开除我之后，我十分担忧收入问题，于是立即和离我的住处不远的一家机器修理厂签定了合同。我在斯托吉区的一个部门干汽车大检修的工作。这个工作不错。我是很少在汽车上干活的几个电工之一。我常被派到格但斯克的奥鲁尼亚区的经理办公室去，在那里我又有了结识人的机会。

自我离开造船厂以后，时间已经过去两个月，秘密警察至少不再跟踪我了；他们只是从很远的地方对我进行监视。然而，我没有任何使他们感兴趣的社交活动。我驾驶专为自己用的旧零件装配的汽车去上班。修理厂隔壁有一个废铁仓库，里面堆放了几辆老式的华沙牌汽车。这几辆汽车年久失修，没人问津。我用4500兹罗提买了一辆，并修理得能够使用。假日里，我们开着这辆破旧的华沙车去达奴塔的老家。我的收入状况已经改善，因为我利用干临时工、为朋友修理汽车能得到额外的收入；我的这些朋友再把我介绍给其他人，结果我手上一直有活干，额外收入也就一直有。

1978年第一季度，独立工会双月刊《工人报》的第一期开始问世。该报是由一些敢做敢为的人编辑出版的（报纸上登有全体编辑部成员的姓名和地址）。我通过该报知道了韦什科夫斯基兄弟——布拉泽伊和克日什托夫。通过这个途径，我还知道了一大批年轻大学生和后来称之为“波兰青年运动”的成员。这个组织当时的一部分活动是纪念1970年12月事件，以及其他一些为争取波兰独立的历史事件。结识这些人丰富了我在造船厂得到的经验。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提及独立工会运动是在1977年5月1日纪念1970年12月悲剧事件的大会

上。同年12月，我再次听人谈及此事。当时，运动还没有蓬勃发展起来；其成员只是组成了一些同群众不发生联系的小组，因此很少有人知道它们，工人实际上几乎没有参加进去。在同韦什科夫斯基会面以及此后不久同安杰伊、约安娜·格维亚兹达的会面中，我告诉他们必须做些不同于以往的事情。

我们的时刻正在到来。我们每个人正按照自己的道路接近共同的目标。当这些道路开始汇聚为一条大道时，这个时刻也就要到来了。

第五章 “自由工会”的诞生

要想准确地说出一条河流从哪里发源，这是很难的事情。河流很少发源于一个源头。一条河流常常从许多山间小溪开始，逐渐汇集起来，绕过大自然的各种阻挡顺流而下，时而隐没于地下，最后找到正确的方向，一泻千里，滚滚向前。在上游，你很难断定某条小溪就真正是一条河，但如果向下走出数英里，就会看到河水冲溢两岸，形成轮廓分明的河道，毫无疑问，这已经是一条河了。

70年代，格但斯克好像是无数小溪织成的网，这里的各种思想后来汇合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洪流。

我们正经历“盖莱克的十年”，即1970年12月至1980年9月这十年的后半期。当局于1972年发出的建设“第二个波兰”的命令仍在执行，但3/4的西方贷款收效缓慢，在工业项目上的投资没能收到预期的效益。在每个人看来，“第二个波兰”是不会到来了。在一项大规模的消费计划中，政府提出了“人人有一辆菲亚特轿车”、“家家有一套体面的住房”这样的口号，但这项计划能否实现则很成问题。我们继续前进，是好是坏，地平线上没有指引我们的明确目标。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一向是既缺乏效率又执行困难，靠贷款、技术或偶尔同西方签订的协议是不可能得到挽救的。

正是为了对付这种困境，政府宣布“对宪法进行一系列的修改”。这些修改的结果不过是在法律上同其它东方集团国家所做的宪法修改保持一致。我们正为我们对西方的经济

“开放”政策付出代价，代价是昂贵的。我们的宪法要体现党的最高统治的原则，体现同苏联更加密切的联盟，以及体现对人权的种种限制。这使任何人都明白党在未来的意图。

1976年6月，当局宣布提高商品价格；这样，哥穆尔卡在经济上的失败又死而复生，从而对盖莱克政府造成了极大损害。腊多姆和乌尔苏斯的工人立即起来抗议这次提价，从而打碎了盖莱克已经获得的全部信誉；尤其在西方，盖莱克政府被许多人认为是东欧最“自由”、经济上最进步的政府。然而在苏联人和东方集团领导层的眼里，波兰局势正是盖莱克同西方银行家冒险行径的失败证据。

抗议示威导致了政府的报复，教会因而再次感到应该站出来说话。波兰大主教和主教们反对修改宪法的计划，并且成功地对政府已经进行的修改给予了限制。在腊多姆和乌尔苏斯发生骚乱后，主教团于1976年11月又发出一封信，信是这样开始的：

> 自去年6月全国由于许多工厂的事件而陷入混乱以来，主教团一直恳请当局赦免工人，因为他们只是要求得到体面的生活条件和恢复他们合法的社会权利。波兰大主教和主教们曾几次以公开信的方式提到工人有权捍卫他们个人的和集体的权利。然而我们的呼吁没有得到官方的反应。因此，主教团认为有责任再次呼吁波兰当局，为维护社会安定做些必要的事情，因为社会安定是保障国家利益的根本所在。为渡过目前的危机，政府的行动纲领必须重视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保障公众广泛参与国家公共事务。我们在此提到的是所有公民的权利；不管他们的哲学是什么，属于什么社会阶层，对

党的态度如何，我们都应一视同仁。毫无疑问，只有扩大并保障全体公民的自由，才能克服包括经济困难在内的我们的一切困难。

对于每个人，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他们都能看懂这封信所用的语言。1976年9月，“保卫工人委员会”也使用过类似的语言，只在个别强调的地方有些改动。“保卫工人委员会”的一些人行动的动力来自纯道德方面，而对于该委员会的其他人，则是纯道德与他们个人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他们采取行动。主要是由于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方面的各种困难，“保卫工人委员会”才很快碰到了问题。“保卫工人委员会”的影响和哲学是伴随着过去的事件发展起来的：1968年3月，该委员会主要是进行一次知识分子运动；1970年12月，其策略主要是加强同工人的联系；而现在它试图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效的运动，以便通过有意识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语言阐述自己的主张，来利用官方宣传所设置的潜在陷阱，而不是落入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堆模糊难懂的术语，其中包括对党、“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有着神奇意义的陈旧公式。就像作弊的牌手那样，当局已经在牌上做了记号，而“保卫工人委员会”则像个诚实的牌手，坚持使用干净的牌。他们谈论“工人”，于是建立了一个“保卫工人委员会”；他们尊重社会主义的同时，坚决要求改善全体工人的工作条件。“保卫工人委员会”不用简单的口号，而是利用官方的话倡导人民要真正参与公共事务；“保卫工人委员会”要的不是党的干部进行的一般调解，而是要求对政府的全部重要公职进行全国性的民主选举。总之，我们是无产阶级，政府领导

人落入了他们自己设置的陷阱。

“保卫工人委员会”决定正面地同最高当局对抗，其主要成员愿意在非官方出版物上公开自己的身份：姓名和住址。目前，他们仍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由于“保卫工人委员会”最初只是一个“支持”工人的知识分子团体，而不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因此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在开始时都报以怀疑的眼光。“保卫工人委员会”还没有起到赢得我们敬意的领导作用。

与此同时，教会继续倡导人权和有道德的法律。最初，教会的宣传带有严格的传教色彩，但不久，新教皇在他首次回国朝圣期间使教会的活动成了一个包括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实际道德纲领。对于波兰日益教条化的社会主义思想，教会倡导建立道德秩序是当时所能采取的最革命的行动。这场唤醒道德的潮流广泛影响了人民，每个人在工作岗位上或在家里，在工作交往和个人交往中都以各自的方式谈论它。

这条将在1980年8月形成洪流的河水还由于其他溪流的汇入而更加汹涌澎湃。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发现，在盖莱克统治下的波兰根本没有他们的位置。这些人中就有格但斯克的韦什科夫斯基兄弟。老大白天干木工活，晚上则秘密出版维托尔德·戈姆布罗维奇的著作。几年后，他成了《团结》周刊的编辑部主任。他的弟弟布拉泽伊在投身于我们的事业之前在格但斯克一所工程技术大学工作，曾获得世界帆船锦标赛少年冠军。兄弟俩后来在一家为波兰建造了许多宾馆的法国公司里一起工作。这是个挣大钱的机会，但并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远比共青团里他们的那些同龄人能干得多。尽管如此，被提拔到重要岗位行使政治权力的人全是这个国家支持的青年组织的成员，而不

是韦什科夫斯基兄弟这样的人。他们在现政权统治下的波兰没有半点位置，就像倡导社会改革的人权活动家安杰伊·格维亚兹达和他的妻子没有任何存身之地一样。

这些人对政治感兴趣，但他们并不是把政治当作战后波兰存在的那种本身僵化又具局限性的制度中的勾心斗角的游戏，而是当作一种具有共同目标的强烈追求，这就需要知识和文化，需要个人的经验和能力，同时也需要热情。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在盖莱克的波兰是不存在的。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哈尔和律师莱谢克·卡琴斯基是持这种态度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人以及他们的年轻朋友（其中大多是高等学校的学生）在1968年3月的表现特别感人。当时，政府曾以开除学籍、不分配工作以及其他报复行为相威胁，致使许多大学生惊恐万状、呆若木鸡，然而哈尔、卡琴斯基和他们的年轻朋友却一点没有害怕。年轻大学生们期望利用盖莱克政府"低层次的稳定"所提供的机会在这个制度中建立自己的地位。政府的"人人有一辆菲亚特轿车"的口号就是对他们提的，并答应给他们贷款购买家具和电视，并许诺他们在不太远的将来就可得到自己的房子。这种诱惑的目的在于不使学生提出有关生活的目的和意义这类问题，使他们忘记刚刚发生过的那些事情。政府取得了部分成功。但高中学生又提出了令人烦恼的问题。

官方意识形态的价值究竟如何在年青人的心目中变得一钱不值，格但斯克第一中学的情况可以很好地给以说明。这所中学位于造船厂二号门的前面，1970年12月事件就发生在学生们眼前，给他们上了永远难忘的一课。那时，学生们定期参加教会组织的布道集会。这种场合不许讨论政治，但活跃的学生却试图寻求各种有关社会、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问题

的答案。这些问题是官方的青年组织禁止议论的。在党内，有人已经认为党将在控制青年人的斗争中失败。他们的担心并不错，因为这些青年正准备掀起一场被称为“波兰青年运动”的反政府运动，这场运动后来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波兰青年运动”这个名称来源于一个重视波兰文化精粹的文学艺术流派。亚历山大·哈尔后来成了这个流派的领导人，毕业于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的青年历史学家博格丹·博鲁塞维奇（后来被秘密警察称为“天生的阴谋家”）是他的得力助手。

1976年是格但斯克和其他地区改革道路上的转折点。完全独立于党的各种组织开始出现。其中“保卫人权民权运动”最为引人瞩目。这个运动致力于公开揭露人类的错误以及各种违反《赫尔辛基最后协议》所保障的个人权利的行为；我们国家于1975年在该协议上签字。“保卫人权民权运动”还提出建立独立工会的想法，独立工会的使命是同“保卫工人委员会”一起捍卫工人的权利。

人类的主要自由之一是表达的自由（这是赫尔辛基协议得出的一个直接结论）。没有这一基本自由，人类生活便失去了意义。当我认识到这一真理时，它立刻成了我全部思想方法的组成部分。从此时起，我开始把自己看成一个宽阔画面的一部分，这个画面是由我们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以及人们在1970年12月悲剧中日日夜夜的经历描绘而成的。

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问题所具有的国际意义，并知道国外有许多人权组织。我们可以呼吁它们给予支持。我们也知道，教会以其新近唤起的社会价值提供了一种积极的、非暴力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使我们在处理整个波兰爆炸性的局势时避免发生破坏性的对抗。

起草宣告成立格但斯克"自由工会"的宣言时我不在场。把我们的各种想法和期望写成文字，这项工作是由其他人做的。成立自由工会的想法也在波兰其他地区成为现实：卡齐米亚日·斯维通和他的朋友们在西里西亚工业区已经组织起第一个这样的工会。由于造船厂开除了我，我实际上不仅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我的同事。当我们刚刚开创的运动遭受挫折时，我集中精力在造船厂外面发展关系。我十分清楚，我不能直接参与建立独立工会的工作，因为我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并被官方报刊说成是"有领导罢工的丰富经验，知道如何表达工人利益的人"。这是个极好的评语，但保安部队里的人却善于从别人说话和写文章的调子和方式中找出特别的意思来，他们已整理出一份厚厚的有关我的档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出现在实施组织反对政府的计划的现场，那肯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时我偶然看到了一份《沿海工人报》，上面刊有宣告"自由工会"成立的宣言。编辑者的名字和住址白纸黑字地写在上面：我几乎相信这是一个骗局。与此同时，我还听说了"波兰青年运动"这个团体以及它同工会活动的关系。当该组织1979年5月1日在造船厂大门前献花时，这条消息得到了证实。运动的许多组织者，包括工人和造船厂外面的支持者正面临着严峻的危险。这时布拉泽伊·韦什科夫斯基已经被捕，我开始怀疑运动能否长期存在下去。然而，我还是决定必须和他们同命运、共患难，特别是当造船厂工人安娜·瓦伦滕诺维奇参加了"自由工会"之后，我更感到应该这样做。安娜具有天才般的组织能力。

成立"自由工会"的背景是，1956年10月，当局想要扭

转工人中间愈来愈严重的骚乱情绪，于是在大企业中建立了“工人自治会”（KSR)。这种组织是哥穆尔卡时期建立的，纯粹是他想表明合法的工人组织是存在的。这种组织基本上是由党和工厂管理部门的代表组成，致使工人自治会徒有虚名。从理论上讲，工人自治会应该实施一定程度的工人自治，但直到70年代，这种组织仍没有任何目标。由于这种机构的成员主要是党的领导部门的代表和官方工会的代表，因而显然要排除工人真正独立地管理企业的任何机会。

当我在汽车修理厂工作时，我那个部门的工人选我当了“工人自治会”的代表。在一次联合大会上，代表地区党委的联合大会主席提议各单位党委书记担任各单位工人自治会主席，各单位工会主席担任各单位工人自治会秘书，等等。显然，一切都遵循着老一套。这样，“工人自治会”只不过是各单位党组织的孪生兄弟，对我们工人几乎毫无用处。我们只被要求做一件事：代表官方批准正在进行的工作，并同意这样做。就在这次会议上，我站起来问道，一切似乎都已事先安排好，那我还到这里来干什么？然后我又引用雅采克·库龙——他后来是“保卫工人委员会”和“团结”工会的关键人物——的话指出，“工人自治会”是个十分荒唐的东西。他们对此毫无准备，无言以对；看来我已击到了他们的痛处，因为此后不久我又被开除了。我的职业——一个电工的职业被剥夺了。

当然，即使没有宣布，我也非常清楚开除我的真正原因；经理只是说要“重建”工厂，他们厂不再需要我干的工种。我想起诉寻求公正的裁决，但却找不到地方。我的政治档案越来越厚，当我参加纪念1970年12月悲剧事件九周年活动时，我的档案就更厚了。

我已决定庄严地庆祝这个日子。但就在一切准备就绪，一束束鲜花已送到造船厂的时候，警察发动了袭击。他们甚至把那些想把鲜花送到附近墓地的人也抓了起来。他们搜查我们，然后把我们全都推进牢房。抗议活动结束之后，我的同事于当天下午获得释放，而我一直被关了48小时。

三天后我刚获得自由，我们便准备再干一次。我们拿着鲜花刚走到造船厂的围墙，便再次落入保安警察之手。我们被再次送回监狱，这一次是我的朋友博鲁塞维奇被关押了48小时。我被指控犯有“流氓行为”，被带到附近法院的法官面前。但此时，我们的组织已经发展得相当强大，够当局费心对付的。在1979年最后几个星期里，民警在三联城地区共进行了70次搜查，逮捕了140人。

五天后，我收到了工厂的解雇信。这封信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收到的。达奴塔再过几星期就要生孩子了，我们最小的孩子仅仅两岁，最大的孩子也只有九岁。我们凑合着过一天算一天，几乎达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我最近的两次被捕更加重了达奴塔的苦恼。因此，我面临的是一种困境：要么从积极的活动中退出来，把全部精力用于养家糊口，要么继续干下去，全身心地投入运动。结果是当局为我做出了选择。我已经克服了心理上的障碍，摆脱了身陷囹圄的囚犯应该感到羞耻的有害偏见。每次在黎明从监狱出来返家时，我总是身无分文，因为我的口袋在被捕前就已空空如也。这时，每当乘上公共汽车，我总是对车上的人讲述我的各种遭遇。我告诉他们因纪念1970年造船厂死难的同事以及因纪念当局保持沉默的那些传统爱国纪念日而在监狱度过的时日。人们对我的话先是感到吃惊，接着就做出强烈的反应：多数人都很亲热，总是为我买票，使我能顺利回家。许多人总是进一步询问事

情的细节。那时我就告诉他们，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可信赖的组织，使之能够捍卫人权、捍卫波兰。

我清楚地记得这以后三个月发生的事情。我决定利用我没有工作而每天要到招工办公室的这个机会。我已暗自选定了想要去的地方：埃利克特朗塔兹工厂。这里离汽车修配厂不远，而且交通非常方便。我可以三个月不干工作，但必须在其他方面找些便宜或声望。我决定按我自己的办法利用这三个月。我常常到招工办公室领取求职介绍信，凭着这种求职介绍信，我走遍了从格但斯克到格丁尼亚的整个三联城地区。我从从容容，也不特别担心，我知道凭我的技术终会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我每天早晨身背工具箱出发，里面装满了各种地下出版物，其中有《沿海工人报》和各种传单。我常常拿着招工办公室签发的求职信出现在某个工厂，要求与人事干部、负责某一方面工作的主任或者甚至厂长见面。我并不向他们隐瞒我被开除的真实原因。我总是谈起我对当局日益感到不满；不管他们高兴不高兴，只要他们看上去愿意和我继续交谈，我就会以更激烈的言辞说下去，警告他们我并不打算放弃反政府活动，暗示他们很快会招来带着窃听器的保安警察，把整个工厂全都监视起来。最后我向他们承认，我根本不想在这儿工作。四处找工作的过程中，每到一处，我总要散发传单，总要把一份《沿海工人报》放在老板的办公桌上。然后我又回招工办公室再拿一份求职介绍信。我用这种办法把传单散发到三联城地区的许多工厂，直到这三个月结束的前一天还在这样干。那一天，我来到位于米亚尔基·什拉克大街上的波尔莫兹贝特工厂。助理经理的名字和教皇的名字差不多，他叫沃伊蒂拉。我一走进工厂，那里的一切似乎都有点冷冰冰的，他们好像正期待着我的到来。我把我

的各种表格和介绍信交给他看，刚说到我的名字，他突然打断我说："你被录用了。"我告诉他我是一名主张建立独立工会的反政府运动的战士。"我已经录用你了，"他重复说。我取出传单给他看，他一边镇静地看着这些传单，一边抬起头对我说："你知道吗，刚才这儿来了两个人。他们告诉我，一个疯子会到这儿来，他是个熟练的电工，是周围一带最好的电工之一，我必须录用他。他们说，'他总是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尽管如此，他却是无害的。他将同你谈起反对派的事，这是他爱谈的东西，不过他不是任何反政府运动的成员。你必须录用他，答应他提出的条件。'"

住在招工办公室附近的民警显然决定结束我在各个工厂的这种朝拜活动。

几分钟后，这位助理经理开始仔细看我递给他的材料，并说道："我敢说那个疯子决不是你。我们谈点什么呢？"我们讨论了工资之类的问题，但我最后拒绝了他提供给我的工作。我回到招工办公室拿了另一封介绍信，在1979年5月1日这三个月的最后一天，我被埃利克特朗塔兹工厂录用了。

这以后是我们的运动以及其他一些运动的创立和发展时期；对于其他运动，有的我已取得联系，有的将要取得联系。我们开始拟订一项行动计划，这项计划把每个组织都包括了进去。在纪念那些体现了我们民族思想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我们也纪念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亲身经历的事件。我们已不再把搜查、逮捕和监禁放在心上，我们把这些看作奋斗过程中的职业危险和干扰。对我们来说，现在这些确实是平常小事。有时我所经历的这种并非自愿的"失业"也给人带

来放松的机会，你可以放心地睡上几天，想一想自己的未来。在1970年12月事件九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许多人遭到逮捕。博鲁塞维奇是第一个被捕的人，在监狱里呆了两个星期。除了一些“波兰青年运动”的成员外，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被捕。纪念日前一天晚上，我避免睡在家里，因为保安警察正在那里等着我哩。第二天当我正在上班时，他们包围了工厂，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搜寻我。工人们把我藏在一个集装箱里，利用集装箱外运的机会我逃出了工厂，不顾严密的监视来到造船厂门口。

我及时赶到二号门前参加纪念活动。在我到达时，达留什·科布兹德伊和马雷拉·普隆斯卡刚发表完演说。轮到我讲话时，我呼吁大家在下一年的这一天为1970年的死难者建立一座纪念物。我请每个人都献上一把鹅卵石，最后堆起一座石丘，就像克拉科夫人民为纪念18世纪末叶领导反对俄国和普鲁士的起义的爱国者塔德乌什·科希秋什科而修建的那个石丘形的纪念物一样。由于我们是首次纪念这个日子，所以我们还请来一些牧师；他们带领我们祈祷和沉思。结果包围我们的民警没有进行干预。

我工作的埃利克特朗塔兹工厂的一些同事也来参加纪念活动。结果都被厂方开除了，于是我们决定举行罢工。这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参加的第一次罢工。我们正要开始罢工时，厂长突然宣布因工厂停电，全体工人可以回家；公共汽车已经等在外面。他们用这种手段解散了全体工人，并抢在了罢工开始之前。没有人被捕，虽然我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保安警察的钉梢。如果说我们的目的是想要造成停工，那我们的这次罢工几乎可以说已经取得了成功；但随后我再次被工厂开除。

我决定去各个工厂找工作，直到再次被雇用为止，而不管是用三个月还是更长的时间。实际情况是，直到这年 8 月我才重新找到工作。

这是我一生中事情特别多的时期。不久我发现有人在监视我的住所。我曾在家中向一群可靠的朋友透露，我要做一次深思熟虑的关于“社会正义”的演说。结果保安警察却一字不漏地知道了此事，这显然是他们在我住所的墙内安装了窃听器。招工办公室不再发给我任何求职介绍信；他们显然不想把我（和我的宣传）送到任何一个工人多的大厂。我的几个孩子在挨饿，于是在这天下午，我决定带他们去商店，让他们去拿他们喜欢吃的东西。然后我来到收款台，拿出身份证说：“夫人，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我们没有一点东西吃。请把我的姓名、住址以及欠您的钱都记下来，我一找到工作有了钱，就会把欠您的钱付清的。”

但当我来到招工办公室时，负责人迎上来叫我等一下。过了一会儿，出纳员拿来6000兹罗提对我说：“给您些补助金，我们知道您的情况。”

这一时期，我们在格但斯克地区到处举行集会。斯托吉海滨、弗热什奇树林和格丁尼亚的莫雷纳区都是我们举行集会的地方。民警总是追踪我们，设置各种圈套，而我们则设法避免上当。在民警的指挥总部，格但斯克地图可能很像一张战斗计划图，或者更确切地说，很像一张城市作战地图。在整个地区，几乎没有不举行秘密集会或进行秘密活动的地方。

1980年 3 月 3 日，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这一天，“波兰青年运动”和“保卫人权民权运动”的几名成员在杨三世·

索别斯基国王的纪念像[1]前讲演之后被逮捕，其中有达留什·科布兹德伊和塔德乌什·什丘德洛夫斯基。我们开始公开散发传单，要求尊重人权和承认全体波兰人的政治权利；我们呼吁：在公共事务中要诚实，对经济进行全面治理，停止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真正实现“全体波兰人都有体面住房”这一在“盖莱克的十年”里提出的目标。“没有自由就没有面包”——这一口号是我们运动的主题，格但斯克已经形成两军对垒的局面，一边是我们工人，一边是民警。当局对我们的要求置若罔闻，而以民警来同我们对抗。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形成了僵局。

1980年8月，帷幕再次拉开，波兰历史上的一场重大的戏剧性事件开始了。政府内部乱作一团。我们当时获悉，以省委书记塔德乌什·菲什巴赫和省长耶日·科沃杰伊斯基为首的格但斯克派因首都的盖莱克派就如何解决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日益恶化的局势问题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前者的看法是，1970年12月事件使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工人阶级能咬牙坚持到底，就会迫使当局作出重大让步。”格但斯克当局知道自1976年以来该地区的局势日趋紧张，盖莱克的办法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因此只能以减少争论的办法来缓和矛盾，以便尽可能地延缓新的危机的爆发。他们决定从两方面来着手工作：在增加工资的同时集中力量增加生产，尽力缩小沿海地区工人与内地较发达的工业中心工人之间工作条件的差距。

[1] 这是位于格但斯克市区一座骑马者的雕像，专为纪念杨三世·索别斯基（1629—1696年）修建的。他于1674年成为波兰国王，1683年土耳其军队进攻维也纳时退位。

1979年，在一次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菲什巴赫和科沃杰伊斯基曾提交过一份关于格但斯克地区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十分令人震惊的报告。然而用政治术语讲，他们的努力却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几乎无人理睬。他们在报告里已经触及到共产党政府的固有弊端，“中央知道的更清楚；中央领导人什么不知道。”但中央领导人看待问题的方法却纯粹是从权力的观点出发的；在他们眼里，这份来自格但斯克危言耸听的报告只能解释成有人企图挤进享有特权的决策者的圈子。总之，这份报告对问题的看法同官方的宣传——“波兰正在一天比一天强大，并能给人民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的乐观景象是完全不同的。

格但斯克当局听到了要为1970年死去的造船厂工人建立纪念物的传言，并报告了政府。虽然盖莱克理论上表示同意，但他并不在乎信守诺言。华沙方面的回答总是一句话，忘掉那件事吧！格但斯克领导人试图指出，建造这样一个纪念物会提高中央推行的改革纲领的信誉，并有助于改善同工人的关系。但他们的话是没人听的。

由于被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事情——逮捕、搜查和开除公职——所困扰，我们几乎不了解中央政府与格但斯克地方当局之间的这些分歧。我们很难相信像莱赫·邦德科夫斯基这样的同情者告诉我们的消息。有的同情者告诉我们，省当局希望我们成功，但又不能太多地帮助我们。他们无疑是在等待我们修改我们的行动方案，如果我们这样做，他们保证不对我们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虽然我们考虑过这些条件，但我们还是很难接受。

格但斯克省当局特别想要我们改变的，是在示威和纪念诸如波兰取得自由（1918年）、1791年5月3日宪法、“维

斯杜拉河奇迹”和1940年数千名波兰军官在卡廷被处决[1]等事件的活动中频繁出现的反俄口号。省当局建议我们避免使用那些可能惹恼苏联驻格但斯克领事的口号。我后来听说，苏联领事馆的官员曾给格但斯克当局施加压力；这些俄国人对我们的观点了如指掌，谴责我们是“反革命分子”。他们详细记录下我们的活动和口号以及全体示威者的名字和住址，并强烈要求开除我们的公职。

在过去的40多年里，还没有人设法在我们国家里建立一种使人民与政府直接联系的制度：这是我们特别不幸的困难处境。在我从事政治活动的许多年里，我从不想与政府代表多费口舌，除非在我们面临灾难的极端情况下。1970年12月，我代表造船厂罢工委员会与当局进行接触，他们把我看作“有权威的发言人”；另一次与政府接触是在我第一次被民警逮捕时，当时他们以相当大的兴趣听我讲话。在其他多数场合，我面对的都是冰冷的牢房，1979年和1980年我就是这样。从过去可以知道将来，当我们不久再次面对同一个政府时，我们十分清楚会发生什么事情；当局使用的方法对我们已不再是什么秘密了。不过我们现在已了解我们的波兰和我们自己；我们的知识和经验决不会使我们后退。

事情就是这样，涓涓细流积聚成小溪，无数小溪又汇聚成一条河流。这条河有时雄伟壮观，不可阻挡，有时却受到阻拦，被迫隐没于地下。我们的运动就像这样的河流。

---

①　苏联当局对这次大屠杀负有责任，而斯大林则把这次大屠杀归罪于希特勒的军队。波兰现政府至今未把这种评价纠正过来。

部 分 见 证 人

安杰伊·格维亚兹达

莱赫第一次参加散发《沿海工人报》和传单是和我们一起干的，我们事先研究了行动计划。我们挑选星期天做弥撒的机会准备在教堂前散发传单。我们乘莱赫的汽车出发，在距教堂不远的地方停下。我妻子约安娜和他留在车里，我一个人向教堂走去。我走进教堂，发现周围全是保安部队的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特务埃德文·梅什克已经打入我们内部。（今天，梅什克因倒卖偷来的汽车而锒铛入狱，可能被关在库尔科瓦大街。）

他们显然正在教堂里等着我们，我于是赶快返回车里，然后我们便开走了。他们当时没有乘汽车。我们一口气来到格丁尼亚的德姆普托沃，把车停在一座教堂后面，散发了大约100份报纸，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莱赫还散发了传单，只有经验丰富的老手才可能察觉到他的手有点微微发颤。这在刚开始时是很正常的，因为紧张和激动会使你这样。第二次、第三次干时，你就会习以为常，可第一次你只是个刚参加战斗的新兵。

每个人接过报纸或传单，藏起来，悄然离去。根本没有时间犹豫，我们站在人群中立即干了起来。这件事进行得非常快，因为人们害怕被看见在这儿停留，这对我们几个人也有好处。

干完之后，我们放松了一下，感到呼吸顺畅多了。我们到底干成了！干这种事并不是那么可怕……。我们感到非常满足，因为将有许多许多的人看我们的报纸，

讨论、传播报上的消息。而且，几个造船工人居住区都在德姆普托沃教区：我们真走运，这个教堂比我们第一次挑选的那个还要好，这附近有几座新建的公寓大楼，不少新住进来的人都纷纷参加到我们中来。

我们想使这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能比较快地独立工作、独挡一面，积极参加他们工作单位的各种集会。莱赫参加过这些集会。有几次他可能还是主持人。他肯定组织他那伙人在斯托吉和其他地方举行过集会。

我们向他推荐过几本书，特别向他推荐过社会学家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的著作和一本关于经济学的书，但他对理论并没有真正的兴趣。

我们从不强求他多写文章；他只写过他在这一时期的简历。最让我们吃惊的倒是安娜·瓦伦滕诺维奇。我们从没指望过她能写出好的文章来，因为知道她只读过扫盲课本。犹豫再三，她终于写出一篇文章。“安娜，别怕，我们会帮你改稿的。”我们这样告诉她。我记得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篇文章，我们连一个字都没有改。但我也必须承认，这种令人惊喜的事情并不多。

我们没日没夜地干。我们甚至说不出1980年8月罢工期间的气候如何，我根本没注意过。我只记得一天清晨，天下着雨，我倒在一个墙角睡着了——只记得这些。

1979年和1980年建立“自由工会”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夜里我们很少能连续睡上四个小时。作为地下出版者，我们必须做印刷方面的一切工作，如准备油墨、丝网印框，刻写蜡板等等，而我们只有几个人。我们是否感到自己发挥了一些影响或感到自己一方有力量呢？是的，我们确实有这种感觉。

有时我们每天要参加两次集会，一连几天不吃东西或不喝水，因为我们还要设法使参加集会的人摆脱保安警察的追赶。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我们去参加集会，可惜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参加不过来。只有几个支持者参加我们的集会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这段时期，华沙反对派的活动已完全停止，这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在我的首都之行期间，一种普遍的压抑之感使我震惊；反对派正在原地打转转，找不到出路。他们需要新的观念，却又找不到——正像今天……。

通常来说，如果一种观念一再重复，那么处于狭小范围里的一切东西都会枯萎死亡。我真不敢相信格但斯克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快要累垮了，几乎不能再干下去。有许许多多有趣的事情，有许许多多人支持我们。生气勃勃的新发展太多了，以致我们不能把所有找我们的人都安排进来；因为没有时间，我们甚至还放弃了一期报纸的出版。

我们并不真正知道推动我们的人权运动这样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我们纪念1970年12月事件是人权运动发展的原因还是结果？实际上，1976年，我们只有 6 个人；1977年，我们发展到30人，还有大约100名同情者；1978年，积极支持我们的人估计达600人左右；1979年，支持者最终达到数千人。每次示威都受到公众的同情，并明显扩大了我们的影响。

1977年 9 、10月以来，我们曾讨论过建立“自由工会”的问题，我想是在马留什·穆斯卡特家里。我记得当时宣布说，建立这样一个组织是至关重要的，但发表讲话专谈它的作用没有必要，我们必须马上着手建立这种

组织。然而当时没人考虑如何使这样的组织开展工作；我们最后讨论了“自由工会”的活动可能包括的内容。一个没有罢工权利的工会又有什么意义呢？然而当时在我们国家里还没有出现能够发动罢工的工会，即使有，人们也不会响应，但1970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我们在几个场合重新讨论了这个问题。建立“自由工会”的计划最后在西里西亚变成了现实，在那里，第一个“自由工会”诞生了。

阿莉娜·平科夫斯卡，格但斯克造船厂护士，博格丹·博鲁塞维奇之妻（他们在军管期间秘密结婚）

莱赫在组织之外继续走他自己的路，竭力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在他的倡议下，他和亨雷克·莱纳尔恰克一起去会见主教团的代表，在组织中扮演“外交官”的角色。这是一次私人性的会晤，其目的是要向教会通报目前的局势和反对派的情绪。我们虽然经常见面，但莱赫从未提及过他同主教团代表的谈话。他拒绝向任何人透露任何事情，今天仍是这样。他的性格就是这样。

他给“自由工会”带来新的生命，使我们对自己重新充满信心；他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大量信息，特别是给我们带来大量关于1970年12月事件的情况。我们比他年轻，渴望知道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的详情。我曾听我父亲讲过1970年12月事件，但莱赫的观点和旁观者讲的不同，因为他曾作为造船厂罢工委员会的成员站在斗争第一线。他给我们全面讲述了那次事件，他的讲述对我们非常有价值，使我们感到他应该就这一事件写一本小册

子——《十二月回忆录》。他向我们讲述他同格维亚兹达举行的一次工作会晤（有录音）的情况，但没有能够讲完，被1980年8月发生的事件打断了。

对未来他非常具有独到的看法。我记得我们去会见雅采克·库龙和亨雷克·武伊埃茨的那次华沙之行。那是在1979年初，安娜·瓦伦滕诺维奇和莱赫乘火车，格维亚兹达夫妇可能是乘飞机。我由于被医院警卫留住，因此最后到达。当着大家的面，会议一开始瓦文萨便同库龙吵了起来，可惜我想不起他吵架的理由了。在我们这些第一次见到库龙者的眼里，他享有绝对的权威。瓦文萨总是以反对别人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我们尽量不注意他们的争吵而继续开会，可他们两人却争吵得没完没了，且激烈程度超过了一个工人同一个知识分子的对阵。

我参加了“波兰青年运动”在什丘德洛夫斯基家里举行的一次会议。博格丹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于是便早早离开了。对大事业进行大辩论与我们无关！我们的目标更为实际。我们每天努力要完成的任务是非常具体的，那就是为即将出版的每一期《沿海工人报》做好准备，并保证每篇文章的水平（我们当中无一人是专业记者）。尽管许多合作者因同我们一起工作而失去了固定职业，我们仍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坚持工作。回首去看当时，我们的编辑工作质量真使我感到羞愧。但当时重要的是要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当时发疯似地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这样他们就需要看到诚实的、未经官方检查的报纸。

我们的另一项任务是搜集书籍，开会时再借出去。在安娜·瓦伦滕诺维奇家召开的一次会上，有40多个人

参加。在一两个月中，只有两本《古拉格群岛》供他们传阅。

博格丹对莱赫很有好感。莱赫则对博格丹这位工人活动家很感兴趣，但必须强调指出，博格丹敬重一个人是因为这个人值得敬重，他从不单单以激烈的反政府观点来判断任何人。外国记者渴望同工人谈话，博格丹于是常常把他们带到莱赫在斯托吉的家里。"独立工会"的建立和《沿海工人报》的出版已经引起轰动，吸引了成群结队的外国记者。莱赫还接受过一次英国领事的访问。所有这些会见都是在莱赫那二居室的家里进行的。一开始接触外国人，莱赫就显得十分轻松自如，似乎很善长公共关系，记者和外交官总是满意而归。

我常去看望瓦文萨一家。他的狭小的住处并不使我吃惊，因为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同样的条件里。我自己租了一个9英尺长6英尺宽的房间，每月租金1300兹罗提，我每月还要为我日托的孩子付700兹罗提保育费。这种情况的人家很多……莱赫的情况也是这样，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我对他的看法是那时形成的，并一直没有改变；即使他的地位变了，甚至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金，我对他的看法依然如故。

那是个非常时期，当局没完没了地抓人。我虽年轻，但我想我可能被捕，后来真的被抓了起来。妇女当时很少被捕。在华沙，妇女从未被捕过，这使得格拉齐娜·库龙、佐霞·罗马谢夫斯卡、海拉娜、鲁特卡和其他同志能比我们更安静、更有效地工作。

但我们的监狱生活也有它的好处：48小时除了睡觉别无他事可做，我们正需要恢复体力，人们可能想象不

出我们当时疲惫不堪的情况。工作太累了，我们简直要垮了。

达留什·科布兹德伊，医学博士、青年领袖

1979年12月，在我们纪念1970年12月事件时，我在这种相当不同寻常的场合遇到了瓦文萨。我们准备这次纪念活动的过程中，“波兰青年运动”的全体成员、“自由工会”的全体成员(可能除了三四个成员以外)以及“保卫工人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均遭逮捕，被押送到法官面前受审。他们之中有博格丹·博鲁塞维奇和从华沙来的阿达姆·米赫尼克，可能还有雅采克·库龙。我设法躲过追捕，化装来到造船厂。那时，从二号门沿马路的围墙顶上有一道4英尺高的铁丝网。我到达时，围墙前不远的地方站了大约1000人，那一片人的后面是民警用汽车围成的半圆形的包围圈。人群似乎很乱，显然没人领导他们。有几个喝得醉醺醺的人正在叫喊，但人们都不理睬他们。我穿过大街，来到围墙前。有人帮助我，把我推了上去。人们递给我一个功率不大的扩音器和一个话筒，然后我掏出草稿开始发表演说。人群更加靠近围墙，在我下面围成了一个半圆形。

不久，耶稣会牧师布罗尼斯瓦夫·斯罗卡神父来到我们中间。他是特地从他的斯维耶塔·利普卡教区赶来的，他最近才从格但斯克教区转到这个教区。他身披法衣，过了一会儿开始带领人们做祈祷，从而使人群安静下来。

瓦文萨是在我发表演说时来到的。他请我帮他爬到墙上。我把他拉了上来，接着又让他站在我的肩膀上，

这样开始了他的演讲。我听见他在讲什么．但不知道他没有稿讲。他讲话充满信心。当后来这次示威活动中讲话的讲稿（除瓦文萨的以外）全部刊登出来时，我才知道他那次是即席讲话。瓦文萨的讲话让人感到好像他与听众之间建立了一种牢固的联系，人们的情绪十分激动，以致一时间保安警察竟不敢进行干预或挪动一步。

然后我们出发向车站方向行进。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尾随而来的民警似乎不敢阻止我们，也不敢检查我们的传单；他们能够感到我们的决心。几分钟后，他们撤走了。

瓦文萨没有同我们一起离开。他让我们不要跟着他。

当我从监狱出来时，我受到瓦文萨的热情欢迎。我真正感到了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他极力保护我们而不掺杂任何个人动机或其他自私的东西。我们于 8 月初获得自由。安娜·瓦伦滕诺维奇这位长期以来工人爱戴的女英雄不久也获得释放。造船厂的气氛愈来愈严重；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中，罢工已迫在眉睫，马上就要爆发。

约瑟夫·德罗贡，工人

罢工前两天，瓦文萨对我说："当你听到汽笛响时，就是罢工开始了。"次日，我去找他，对他说我没有听到汽笛响。

"如果你明天听到，那就是罢工了，"他回答说。第二天，在我去上班的路上，我听见了汽笛发出的鸣响：罢工已经开始。时间是1980年 8 月14日。

第六章　罢工与八月协议

那一天，我乘有轨电车去上班。我独自一个人。我这个人总是在紧要关头出现。我十分从容，脑子里正琢磨着一件事：我为什么没有被捕？我可以看见不远处的民警，他们并没有玩忽职守。他们能够以任何借口抓走我。早晨6点，造船厂开始罢工，到8点时，每个人都知道了正在发生的事情。

离家之前，我已经听到汽笛的鸣响，我立刻知道罢工已经开始。但我还不能马上出去，因为家里还有些活没干完：达奴塔几天前刚生下一个孩子，她还几乎不能站起来。这是我们的第五个孩子，是个女孩，取名阿尼亚。生这个孩子可把达奴塔累垮了。正是因为我的女儿阿尼亚，也是为了她、我才决定出去看个究竟。

达奴塔将要分娩的那天晚上，民警曾来抓过我。我当时对他们说，我不能撇下我妻子一人和几个孩子在一起，我必须送她去医院，我必须照顾孩子。她冲他们拼命叫嚷，不让把我带走，她的喊声传遍整个大楼。民警不想听，但又没有办法。“把他带走！”这个命令至少重复了五次，但他们仍然站着不动。看着他们如此尴尬，我决定帮帮他们，因为我不想使他们感到为难。劝我妻子安静下来，并请邻居来照顾她。然后，我主动和他们走了。当我48小时以后回到家里时，达奴塔正在医院里。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时刻，我发誓，从现在起

我不会向任何事情屈服。但到了1980年8月14日这天，我并不认为我能去造船厂。

我们发动的罢工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但这并不是波兰仅有的罢工。在卢布林，罢工示威早已于7月1日开始。那里的铁路工人阻拦了一列开往与苏联接壤的边界地区的火车。他们抗议肉类的严重短缺，这对波兰是个严重的打击，因为当时波兰的肉类正在大量出口，而且食品价格也在上涨。到处都在传言说，国营商店的物价将与自由市场拉平。自由市场货物比较充足，但价格昂贵，实际上是为少数富有和享有特权的顾客服务的。即便如此，自由市场的商品最终也销售一空。

我乘上电车，到造船厂需要35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我考虑了各种猜测和怀疑。我知道保安警察正在跟踪我：我看见那辆没有牌照的汽车跟在后面。如果这次罢工正是他们所盼望的，怎么办？他们究竟在搞什么阴谋？他们准备改变策略对付我们吗？当局想要引诱我们暴露自己，然后一网打尽，是这样吗？党中央负责宣传事务的书记卢卡谢维奇曾发表过一份对波兰反对派力量估计的报告。根据他的说法，在格但斯克，估计有1.2万人属于反对派，当局对这些人都很了解，已记下他们的名字和住址。只须几个小时就可以把他们统统关进监狱。

我在造船厂前下了车，向大门走去。那天早晨，上班工人还未签到之前，有人已将特意准备好的传单和《沿海工人报》散发到了大多数工人上班要经过的市郊线或乘坐的电车上。我们散发的最重要的消息，是安娜·瓦伦滕诺维奇在8月7日，即她再过五个月就要退休时被厂方开除了。我们的抗议内容如下：

致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们：

这篇东西是写给安娜·瓦伦滕诺维奇的同事们的。安娜自1950年起一直在造船厂工作：她干了16年的电焊，后来又在2号车间开天车。她得过铜质十字勋章和银质十字勋章，并于1979年获得金质十字奖章。她的工作质量总是最好的，并且经常同非正义和不平等的现象做斗争，而这也正是她决定参加“自由工会”的原因。但因此她的麻烦也接踵而来：由于参加散发《沿海工人报》，她的工作曾两次被调换，并受到处分。尽管这很令人不快，但还不足以构成伤害。厂方今天甚至不顾及法律的体面。正当安娜·瓦伦滕诺维奇休病假期间，她收到一封解雇信，生效日期是8月7日，开除她的理由是她违反了规定……。

如果说安娜·瓦伦滕诺维奇是当局不受欢迎的人，除了因为他们害怕她的态度会影响别的工人，还因为她捍卫同事的利益，并鼓励其他工人也像她那样做。当局总是想方设法孤立那些有潜在领导能力的人。1976年6月罢工的第二天，许多工人正是因为领导罢工而被开除。如果今天我们不能触动我们的对手，那么今后将不会再有人站出来反对官方增加劳动时间、破坏安全规程或强迫工人加班加点等种种做法。捍卫我们自身的最好方法就是保护别人。正因为如此，我们呼吁你们来保护安娜·瓦伦滕诺维奇！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你们中的许多人不久也将陷入同样的困境。我们已经指出厂方的做法愚蠢之极，因为这件事发生在罢工浪潮业已席卷全国的时候。

"自由工会"成立委员会及《沿海工人报》编辑部
博格丹·博鲁塞维奇、约安娜·杜达-格维亚兹达、
安杰伊·格维亚兹达。

三个20岁的支持者：尤雷克·博罗夫琴克、卢德维克·普拉增斯基和博格丹·费尔斯基把传单、报纸和新闻公报带进工厂。由于他们的努力，全体工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并深感震惊。

当我到达工厂前面时，二号门前挤着一大群人；厂保卫人员正在仔细检查每个人的通行证。我已经有几年没进造船厂了；要想进去，就只有从附近的墙上爬了。

我们已经说好，一旦造船厂出现罢工，我便是主要"领头人"。在我制定的计划中，包括恢复安娜·瓦伦滕诺维奇、安杰伊·科沃杰伊和我的工作，允许为1970年12月事件死难者建造纪念物，以及给每个工人增加2000兹罗提工资等条件。其他要求将在以后我们赢得造船厂工人的支持后再提出来；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考虑我们的根本要求：有权组织独立于厂方和政府的自治工会。

然而，我的脑海里总有这样一种感觉：8月来得太快了，我们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进行艰苦的准备工作。在我个人的预料中，我已经考虑到会发生类似1980年8月事件的事件。但"自由工会"的成员却没有充分看到这一点，致使我们不能正确地解决即将发生的问题。宣布独立的工会组织的存在意味着我们已经制定出其成员必须遵循的纪律和指导方针，以避免我们的领导造成的失误。事态的发展已超过我们的预

料：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向前……。

在与厂方的交涉中，我们要明确地提出一些重要问题。事先我们对这些重要问题（天知道会有多少重要问题！）进行了辩论，这些问题包括工人自治、民主、工会的各种自由、承认卡廷大屠杀以及我们民族近代史上其他被歪曲或被掩盖的重要事件。我们的纲领基本上是教育性的，其基本目的是要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像"飞行员大学"[1]所做的那样），而不是要推翻现有制度。我们的组织是诺亚方舟式的，能容纳所有人，目的在于把整个波兰民族带到较为平静的水域。但在第三天的一次公众投票后，罢工似乎有瓦解的可能，我于是不得不宣布暂停罢工。从此以后，我们必须对罢工采取新的态度，找到确切表达"团结罢工"热望的形式。我们距离这一目标只有一步之遥了。

在同厂方的会谈中，我们坚持把给每个工人增加工资2000兹罗提作为进行所有谈判的先决条件。我们想把条件提得简单明确，以免使怀着各种复杂心理参加罢工的广大工人感到不安。我感到相当多的工人并不清楚他们想要什么，因此必须首先使他们明确这一点。我知道他们正注视着我，我仿佛站在拳击场中，如果我在第一个回合被击倒，那他们将只有一半人能坚持到第二回合。我必须坚信他们正坚定地站在我身后。

在此之前，我一直都在高谈阔论，虚张声势，甚至"沽名钓誉"。我们虽然装出好像拿到所有好牌的样子，但实际上我们的对手对我们的游戏清楚得很，他们几年来一直都在

① "飞行员大学"始建于1977年，在安杰伊·策林斯基鼓励下，这所大学连续开设官方忽视的课程。

设法对付我们！但他们却不了解我们最后一张牌的性质，即自三个工友死于船厂二号门前至今的10年中我们形成的决心。这是我们谈判期间厂方回避的话题。他们想要给我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好像我们举行罢工是出于一种“错误的理解”，因为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建立纪念物或以其他适当的方式悼念死者都是毫无问题的事情。他们鼓励我们同他们在“共同担负责任的气氛”中进行谈判。

罢工委员会的第一个决定便是要求得到造船厂的广播站。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取决于让每个人都能听到谈判的进展情况。那样，每个工人都会感到自己是谈判的一员，都能拿起话筒说出自己的观点。从一开始，我们便在举行谈判的劳保办公室接了一个话筒，在屋子外面也接了一个。这样，我们就能够把谈判情况传送到每一车间和每一生产现场。接着，我们又安排了能使邻近造船厂和瓦洛瓦大街上的工厂都能听到的辩论会，后来我们还派代表拿着谈判的录音去其他工厂播放。而造船厂领导人却忙着与省委、国家电台和国家电视台这样的政府机构取得联系，以便使格但斯克造船厂的谈判同华沙的谈判协调一致。罢工的序幕终于拉开了。

造船厂举行谈判期间，格但斯克的生活逐渐放慢了节奏。星期五，即罢工的第二天，公共交通基本陷于瘫痪，人们外出只能步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人们很不舒服。唯一还在运行的交通工具是联接三座城市的高速电气火车，终点站离造船厂不远。

越来越多的人蜂拥到造船厂围墙下，整个格但斯克都渴望亲眼看到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由于港口已陷于瘫痪，船只只能呆在停泊区，按照国际惯例，凡不能使过港船只按时启锚必须向船主支付赔偿费。当局为避免支付巨额赔偿费不

得不将罢工的消息通知船主。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的港口里停满了船只，从海滨和城市其他地区都可清晰地看到。电传和电话也已中断，三联城附近地区的交通堵塞日益严重。

官方的报刊仍以晦涩难懂的词句谈论说："停工停产是真正令人忧虑的事，这恶化了本来已经很困难的经济形势，减少了基本商品的生产.致使商店愈来愈无法供应这类商品。人们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完全在于工厂本身。某些合理的要求正在得到满足，一些要求则需要仔细的分析，还有一些要求，尽管在目前以及也许在将来分析都是重要的，然而不幸的是却不能得到满足。政府实在没有办法。

造船厂一片混乱。星期五，罢工委员会又增添了新的血液，一些工人参加了进来，而在此之前，其成员全是各车间发动罢工的代表。同厂方的谈判在劳保大厅举行。新加入罢工委员会的工人除了考虑影响自身的问题外还没有想到其他事情。在谈判过程中，工人们只提出三项要求（其中两项实际上已经解决）：恢复被开除职工的工作，为1970年12月的死难者建立纪念物，以及提高工资。他们要求得到厂方增加工资的承诺——每人增加1500兹罗提。

星期六，在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已经增加，罢工者也已得到由省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兼省委第一书记塔德乌什·菲什巴赫签署的不对他们实行报复的保证书之后，罢工似乎要结束了。至于其他要求，例如控制官方工会在造船厂的活动，改进食品供应状况，废除"浮动"价格，统一家庭补贴标准，罢工期间照发工资等，厂方答应提交有关政府部门进行考虑。

从这时开始，罢工的形势急转直下。劳保大厅里参加同厂方谈判的代表把他们的要求归结为几点，在他们看来，这

几点好似胜利的宣言。

我察觉到了代表们的这种情绪，于是站起身来对着话筒说，罢工结束了。当我走向门口时，我向"自由工会"的支持者们挥着拳头高喊道："我们胜利了！"

但此刻其他工人并不这么看。下面是一个在场人对当时情况的总结：

当时，我同兹德齐赫·兹沃特科夫斯基站在劳保大厅的主门旁边。当在中间的桌子上（并排有三张桌子，"自由工会"的代表和厂领导全挤在中间的一张桌子边）签署协议时，大厅里的人已经走了一半。瓦文萨一看到我和兹德齐赫站在门口附近时，便立刻向我们摇手致意，并再次说道："我们胜利了！"我回答说："笨蛋，你输了！"我向他解释说："你好好瞧瞧造船正在发生的事情：电缆线被切断，广播喇叭被斧头砍成碎片；他们正往墙上写'叛徒'和'告密者'呢！一提到你的名字他们就要啐吐沫。如果你走出大门，他们就会用石头砸你。"

莱赫·瓦文萨完全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上帝，我干了什么了？"瓦文萨自言自语说。

兹德齐赫回答："你干了什么了？你把我们全都出卖了，这就是你干的好事。你只关心你自己。增加1500兹罗提工资的人中有你吧？可别人呢？"

"那我该怎么办？"莱赫问道。

"进行一次真正的罢工，保卫支持你们的小厂。"

莱赫·瓦文萨低声说道："请帮帮我！"

"站在造船厂二号门旁的人看见一辆电瓶车开过来，莱赫·瓦文萨站在上面。瓦文萨抓起话筒，开始向大门

口的人群讲话。他像以前一样告诉我们他将是最后一个离开船厂的人。“如果你们想要继续罢工，那就继续罢下去！”

“谁要求继续罢工？”

“我们！”

“谁不想继续罢工？”

没有人回答。

“那么罢工继续进行！我最后一个离开船厂。”

工厂大门于是重新关上。

罢工者的情绪并不是始终一致的：热情过后，随之而来的是妥协，甚至是恐惧

罢工是一群人以自己可变的和无法预料的方式所做出的群体反应。我了解这些人，我生活在他们之中。在他们还没有变成一群乌合之众的时候，我凭直觉知道他们大多数人想要得到什么。这是个经验问题：你必须经常深入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一眼看去，似乎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说不定这时裂缝已经出现。个别人开始胡来，像野兽一样四处乱闯，过不了几天这种人就坚持不下去了。当裂缝出现时，你必须知道如何补救，知道小心什么，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什么，以及你要说些什么。如果要我重新开始，我的做法可能完全不一样。我误解了工人的心情。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人才能明白他所犯的错误。

不管怎样，我在1970年12月和在汽车修配厂获得的经验对我非常有用。我现在知道我要避免什么：我要警惕自己变得过于自信。1980年8月罢工期间，我对自己在造船厂二号门前演讲的水平感到惊讶：我第一次按照我的思路和我要传

达给听众的方式来进行演说。以前，我总是讲得比我打算的要快。我往往开头讲得很好，论点也不错，但到后来便逐渐离开了我要讲的主题，结果我的演说曾是失败的。

同时，我还必须注意各个具体的方面：造船厂至少有四次都差一点复工；各车间罢工的工人都可能因支持不住而陷于瓦解；各造船厂之间存在着激烈争论——这些都需要我去解决。通往船舶修理厂的道路被堵住了，我们必须采取各种办法加以解决，如站在电瓶车上用喇叭向司机喊话，指挥他们把车开走，尽快使道路畅通。什么事情都很难办。尽管听起来可能有些狂妄自大，但我的确感到，如果我们能够取得什么成就的话，那恰恰是由于我的缘故。

令人感到荒唐的是，第一个使用"团结罢工"这一说法的人竟然是接替扎切克担任船厂经理的格涅赫。"团结罢工"一词听上去好像是对我们对厂方警告的指责。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把我们同厂方的谈判局限于那些仅仅与造船厂工人有关的问题上。后来，正当造船厂的工人从本厂罢工的胜利，向支持和保护其他大大小小工厂企业的罢工发展的时候，"团结"工会诞生了。道义上的理由迫使我们同邻近的工厂以及我们的合作者在各个方面团结起来，统一行动。结果，尽管已经宣布罢工结束，但我却在星期六下午向人们再次宣布：我们的运动将继续进行，下一个阶段即将到来。

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我们厂罢工的第三天就已失去动力。我一直是同经理打交道，人们普遍认为，他相当成功地处理了他简直无从料想的局势，而我也只能把我们的斗争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我们的运动曾经是非常有秩序的：我们的每一个要求都提请公众来裁决；我不能不这样做。同时我也告诉经理，我们必

须恪守达成的协议。

次日，我看到一份传单，上面有经理自己对局势的看法，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这是您写过的最好的一篇文章。但对于我们，斗争必须进行下去，因为这是大家的看法。"我们建立了厂际罢工委员会，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新阶段的开始。我应该着重指出，在一次同经理的冲突之后，他已开始同情我们的事业，我们之间因而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造船厂有一位作家，他生于索波特附近，是京特尔·格拉斯的朋友和翻译，1950年进厂工作至今，参加过1980年的事件，并在事后把这次事件写了下来。他这样写道：

> 谈判从星期四持续到星期六。8月17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真是少见的好天气，看来这是一个愉快的周末。人们都盼着去做自己的事情：钓鱼、收拾花园、开车兜风、徒步旅行等等。"要是瓦文萨能和我们一块去玩就好了！不管怎么说这次罢工是个胜利！"一些工人说。人们擦洗干净，收拾好东西，都站在厂大门口，等着附近的大喇叭宣布最后的决定。最后的决定终于宣布了："我宣布罢工结束。大家星期一回来上工！"这真让人感到轻松！然后，瓦文萨带头唱起了国歌（他唱走了调）。"他唱歌不行，"一些工人说。"可他能讲呀，"另一些工人回答。"是的，你不能否认这一点：他没有让我们失望……"
>
> 大多数人回家去了，但瓦文萨的麻烦这时却来了。他不喜欢说起这件事。事情是这样的，在他身后的会议厅外面，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会议厅外有一堵矮墙，上面安有麦克风和喇叭，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公共夜总会"。人人都可以登上去，讲出自己的心里话。你

还可以在上面朗颂诗歌，有些人的确这样做过。我记得有一个人一拿起麦克风便说起没完，拉也拉不下来。一个来自奥利瓦附近运输站的通信员，也设法登上了矮墙，想讲讲自己要说的话。他一上矮墙，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样子非常尴尬，不知该怎样说才好。最后大家还是明白了他的意思，他那里的工人也想参加罢工，但不知怎样进行。大概也就在这时，瓦文萨宣布了结束罢工的决定。随后，站在劳保办公室门口的一个运输工人代表被人们推上了矮墙，一支麦克风伸到他面前。他成功地讲述了他们奋斗的目标，并在结束时请求大家给以支持。片刻之后，几个电车工人走出大厅和他一起站在矮墙上。矮墙四周围满了年青人——100人，200人，最后增加到500人，他们齐声高喊“团结!”“团结!”“团结!”这时又有几十人来到会议大厅外面，高喊“两千兹罗提!”“两千兹罗提!”“两千兹罗提!”这是在质问谈判中做出的让步。应该说明的是，罢工已在造船厂外面的工厂展开。造船厂工人对瓦文萨同厂方达成协议是满意的，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罢工的胜利就是他们所有要求得到满足的证明；相反，他们觉得造船厂的罢工应该成为格但斯克其他工厂的榜样。到星期一，他们将看清自己的未来，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将看清当局的真正意图，看到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罢工者的力量是何等的强大。我们——至少是造船厂的许多工人都准备于星期一再次举行罢工，支持电车工人和其他产业工人的罢工斗争。

瓦文萨刚一走出大厅，便立刻注意到造船厂的罢工不能这样结束。分裂正在出现，到星期一，罢工成果将荡然无存；瓦文萨于是决定恢复罢工。

“好，我们继续罢工，对不对？”

这个问题纯属形式：此时留下斗争的人几乎不到一千多人。那个星期六的夜晚对于留在船厂的人来说是很艰难的。他们事后告诉我们，那天夜里，在大门口和围墙下站岗的人不多。到了星期日，情况开始好转，一部分工人已经回来。在此之前，瓦文萨肯定有过一些痛苦的时刻：那天夜里，有人在墙上写字，骂他是“叛徒”。星期六下午，在船舶修理厂，两名“女通信员”当众以粗野的语言攻击瓦文萨和一些罢工工人，指名道姓地谴责他们“只知为自己好”而不关心其他工人，她们的丈夫都参加了格但斯克的罢工。她们刺耳的语言使船舶修理厂的工人感到特别不舒服。这是一个令人感到遗憾的插曲（它发生在星期六与副总理佩卡举行对话期间）。诚然，这两名妇女的本意可能是好的，但由于愤怒和失望，她们的行为却是很错误的。但这并不是指她们讲了什么，而是指她们讲话的方式。

在任何情况下，瓦文萨都不会以这种语言来对待别人。这是他讲话的特点。他在听众面前从不讲粗野难听的话；甚至在他以最激烈的情绪谈论问题时，他的话也从来不带脏字；他从不侮辱人，也从不骂人。毫无疑问，这是他文明地对待生活的结果，同他信仰基督教密切相关。

一般说来，人们是不会为他人对别人的侮辱和咒骂所感动的。但在好几天里，船舶修理厂的工人对我们失去了信任。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在星期六离开了造船厂，而是因为我们没能以正确的措词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他们。

8月17日，星期六，瓦文萨像塞利尼的西门那样拿起一根木制十字架，并把它搬到造船厂二号门前我们打算建立纪念物的地方。十字架一端固定在地下；它在许多天里成了凝聚罢工者共同感情的标志，这些罢工者来自数百家不同的单位，其中有造船厂、工厂、机关、学校，也有各种联合会、协会和团体。星期天夜里，我们停止了某些工人对瓦文萨的诽谤。当晚，他正式担任了代表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埃尔布拉格、普鲁什奇、特切夫、莱博尔克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各种企业利益的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从而巩固了他的地位。

星期一上午，经理再次呼吁工人信守诺言，并责备瓦文萨擅自撕毁他们两人于星期六共同签署的协议。瓦文萨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说“你的呼吁书是你写过的最好的东西，”接着又不无讽刺地说，“可惜没有签字啊！”他和蔼的性格就是这样，发火时仅仅带着一点怨气。经理垂头丧气地说：“这不再是针对我了。这也不是什么造船厂的罢工，而是一次团结罢工。”

此时，因“技术性的故障”，双方都暂时停止了在造船厂广播站发表任何公报、声明、呼吁或演说。在发生“技术性故障”前，经理已向工人们发出了新的呼吁。此后他便沉默了。工人们也不再理会他说的话。

人们不相信广播已经坏了，因此要求经理让他们到广播站去。经理这时对什么都无能为力，但群众有办法，数千人齐声喊道，“瓦文萨！瓦文萨！瓦文萨！”他们在厂部大楼前或是坐下或是站着。这样的喊声持续不断，有时也喊“莱赫！莱赫！莱赫！”他们认为莱赫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办成。他已经成了神话和传说中的人物。这种

朴实的信念来自这样的事实，即莱赫通过他的个性、他的存在、他的言语和他的行动已经把以前四分五裂的运动重新凝聚起来，实现了似乎是不可能的团结。弱小的幼苗已成长为粗壮的大树；雏鸟现已羽翼丰满，能冲破云层搏击长空。在他口中，含糊的和不确定的字句变成了神话魔咒。

瓦文萨把人们聚集在厂部大楼前，这并非第一次。但这一次，人们的恐惧都已烟消云散，代之以昂首挺胸，扬眉吐气，似乎有一股力量从人群中喷射出来。这股力量几乎可以感觉到，它从一个人传向另一个人，最后传遍了所有的人。

瓦文萨必须和经理一起想办法使广播站重新工作，以便让罢工者使用。他走上二楼，准备“会见”什么人。那些知情者早就知道，经理对修理广播站起不了任何作用，他没有进行干预的任何权力。他也许已经被当局抛弃?或许别的什么人正在代替他的决策？即使有100个瓦文萨，对此也会一筹莫展。但人们却坚信瓦文萨会有办法的。他必须经受这第二次考验。我注视着他。他一脸愁容地回来了。他将怎样解释他的失败呢？发表一通人的努力如何有限这样的演说显然是毫无用处的；事实是，造船厂的决策机构已没有真正的权力了。他爬上电瓶车，做出人人都熟悉的手势，示意人群安静下来。“听着！我解决不了修理广播站的问题！解决不了，我确实解决不了！”（突然间，全场一片可怕的寂静。每个人都盯住了他们的领袖。）“我去找经理。我要求到广播站去，经理把双手举过头顶对我说：‘瓦文萨先生，你可以把我抓起来，但我做不了这个主。我什么也干不了。’”瓦文

萨的音调这时变得激动起来，“我能那样干吗？我几次被捕，在我妻子就要分娩时被人抓走，我能抓别人吗？不能，我当然不能那样做！”当他说到这儿时，他用一个引人注目的手式捂住双眼，好像干什么卑鄙事情的想法使他感到浑身无力。“我能干这种事吗？你们愿意我去干吗？”“不愿意！”大伙儿众口一词。

是由于瓦文萨善于处理问题呢，还是经理的简单手势深深地影响了他？不管怎样，他已经受住了刚才的考验，维护了自己的威信。

“厂际罢工委员会”建于8月17日和18日，这个关键性的组织使得“团结”工会能以具体的语言表达各种类型的工人提出的许多要求。政府立刻意识到了这个组织的重要性，威胁说一旦得知该委员会确实存在，便要以武力结束造船厂的罢工。政府不想承认一个最终会为波兰大多数劳动者讲话的独立罢工委员会存在的合法性。

格但斯克省当局得到指示，只许“同‘罢工者’，而不许同‘厂际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早在“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之前，中央政府就意识到自己正在对局势失去控制，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害怕局势变得更糟，中央委员会开始寻找替罪羊。第一个被当作替罪羊的便是格但斯克当局。中央政府指责地方官使罢工失去控制、指责他们在后来能以武力制止罢工时没有使用武力。第一书记盖莱克因决策失当作了另一头替罪羊。他派遣他的私人特使副总理佩卡去格但斯克，企图搞垮罢工。盖莱克—佩卡的战术是不同“厂际罢工委员会”进行会谈，而只直接同造船厂每个车间进行谈判，以此瓦解罢工队伍。这种战术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当佩卡

神情沮丧地离开格但斯克机场回华沙时，他清楚地知道他在政府中享受特权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中央的一些人建议把盖莱克作为罢工的下一个牺牲品。

8月18日夜，政治局委员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和政治局委员兼国务委员会主席亨雷克·雅布翁斯基抵达格但斯克。在同地方党政官员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两名政治局委员谈到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紧张局势，并指出党的领导已经失去了同工人和波兰社会的普遍联系。这些话敲响了盖莱克政权的丧钟。党内强硬路线派在会上指责罢工者是反社会主义分子，罢工领袖是恐怖分子。这伙人攻击的一个具体目标是博格丹·博鲁塞维奇，他是"保卫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被强硬路线派人物认为对工人提出的过激要求负有责任。不久，造船厂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博鲁塞维奇从他的一个采访党的领导人在格但斯克召开的会议的记者朋友那里，听说政府官员中存在着对罢工的各种看法，于是他通过造船厂的广播向人们讲述了这次党的会议的详细情况。这样一来，工人们直接听到了政府对罢工反应，并了解到有些官员认为罢工是工人合法的抗议活动，有些官员则把罢工工人视作反革命分子。最为臭名昭著的一个政府官员是政治局委员、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希德拉克。他清楚地表明，他没有兴趣同任何人分享权力，更没有兴趣同独立工会代表的工人分享权力了。

在"厂际罢工委员会"开始考虑提出哪些提交当局的最后要求时，我清楚地知道这必须依靠许多专家的主意，他们早先都不是"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成员。有一些我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担心，一个由精英组成的委员会正在取而代之，原来的罢工者将会有意地被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在我们制

定“21条要求”时，几名新成员严肃地对我的领导能力表示怀疑。一天夜里，在我快要入睡时，我想到整个委员会的活动充斥着许多个人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曾组织过罢工，我们完全凭自己独特的感受和经验行事。因此，当我们中间一些人感到他们以及他们的地位和经验正受到排挤而深感痛苦时，这并不使人吃惊。尽管人们的某些需要是如何地无可非议，但我认为领导者本人不可能考虑到每个人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我在这关键的时刻知道，罢工领导人，即“厂际罢工委员会”必须做到有节制，正像我们制定准备提交给政府谈判代表的“21条要求”时所做的那样。我们有许多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我们不能以不现实的要求把它们降到次要的地位。幸好，“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持这种观点。被认为观点激进的博鲁塞维奇也提醒我们，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要求废除书刊检查制度的努力是怎样因操之过急而遭到惨败的，他劝告大家要有节制。亚历山大·哈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领导人，他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提出自己的要求，同时也要给当局留有回旋的余地。我们拟订好了“21条”之后，又按照博鲁塞维奇的建议，加上了一项附加条款，要求在广播电台的日常节目里转播教会的弥撒。一些成员担心这项条款会成为谈判中的一个主要障碍。

正当我们准备与政府代表举行谈判时，我们向工人们特别强调了在造船厂遵守纪律的高度重要性。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主动把自己的伏特加酒从围墙上扔了出去，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高度的纪律性。我们的要求刚一写好，便立刻散发到工人手中。又过了几天，我们同政府官员谈判的条件就完全确定下来了。在确定这些条件的过程中，我们广泛地征求波兰各地各行各业专家的意见，这一点人们是可以理解的。

8月22日，“21条要求”的罢工公报张贴出来了，全文如下：

罢 工 公 报

“厂际罢工委员会”代表参加罢工的各种企业、机关的职工提出要求。

“厂际罢工委员会”也代表那些因其工作对社会至关重要，不应陷入瘫痪而没能参加罢工的企业、机关的工作人员。本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全体罢工工人而进行谈判。我们与政府谈判的先决条件是，他们同意恢复所有电话和电信线路的畅通。“厂际罢工委员会”代表全体罢工工人提出的具体要求如下：

1. 根据波兰人民共和国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自由建立工会的第87号公约，承认独立于党和企业主的自由工会。
2. 保障罢工权利，保障罢工者和罢工支持者不受惩罚。
3. 保障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从而结束对独立出版物的压制，保证群众性的宣传工具向一切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团体的代表开放。
4. 恢复下列人员原来的权利：1970年和1976年罢工后被解雇的人员；因政见不同而被开除学籍的学生。释放一切政治犯（其中有埃德蒙特·扎德罗任斯基、扬·科兹沃夫斯基和马雷克·科兹沃夫斯基），停止因政见不同而实行的迫害。
5. 通过群众性的宣传工具发表“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公布其要求。
6. 采取以下有效措施引导国家摆脱经济危机：公开关于

社会经济形势的全部情况；让社会各界、各阶层参加改革方案的讨论。

7. 全体罢工者在罢工期间的工资按休假办法发给并从工会中央理事会基金中支付。

8. 将每个职工每月的基本工资增加2000兹罗提，以此作为对迄今为止物价上涨的补偿。

9. 保证工资随物价上涨、币值下跌而自动相应地增加。

10. 实现国内市场食品的充分供给，出口仅限于多余部分。

11. 对全部肉制品实行（凭票）定量配给制（直到市场趋于稳定时为止）。

12. 取消政府批准的“浮动价格”，取消在特别的“外汇商店”用外币购买紧俏商品（即所谓的“内部出口”）。

13. 实行按能力而不是按党员资格选拔领导干部的原则。通过拉平家庭补贴，取消民警、保安人员和党员的特权。取消“特供”制度。

14. 降低退休年龄（恢复到革命前的年龄）。

15. 增加退休金（恢复到革命后的水平）。

16. 改善工作条件和卫生保健服务，对全体工人及其家属实行全部公费医疗制度。

17. 为参加工作妇女的孩子开设足够的托儿所和幼儿园。

18. 实行三年带薪产假制。

19. 缩短等候分房的时间。

20. 旅游交通补贴由40兹罗提增至100兹罗提，发放旅游生活补贴。

21．对于不能间断工作的职工和三班倒的职工所缺的星期六公休日，应以增加休假日或其他带薪休息日予以补偿。

厂际罢工委员会
1980年8月22日
于格但斯克

罢工期间，专家们经常在各种场合出现，他们来自波兰各地，为我们同政府的谈判出谋划策。例如，莱赫·邦德科夫斯基自宣布罢工之日起便和我们在一起，他在罢工后的第九天便以“波兰作家联盟”在格但斯克省代表的身分正式加入我们的行列。当邦德科夫斯基后来参加“厂际罢工委员会”领导工作时，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且成了罢工者的第一个发言人，随后，他还是“团结工会”的一个重要喉舌。他在同政府谈判中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其他许多专家也是如此。

8月22日，星期五，当新任副总理米耶奇斯瓦夫·雅盖尔斯基接替信誉扫地的佩卡来到格但斯克时，罢工出现了转折。他于当晚会见了我们的代表；政府正准备以“21条要求”为基础和“厂际罢工委员会”谈判。仅从这一简单的事实来看，我们已经赢得了重大的胜利。我们开始为谈判作准备，又仔细研究了那些要求，设法消除漏洞和任何可能使我们陷于不利地位的措辞。换句话说，专家们正和我们一起研究劳工谈判的正式做法。第一次会议之后，几名专家向我建议谈判过程应分步骤进行，每次谈判例会只限于讨论某几条要求。一旦开始提出的几条要求被接受，我们就可以接下去谈判另几条要求。他们明确指出，如果在任何一次例会上当局被逼

得太紧，它就会以接受一些要求而反对另一些要求的方式来结束谈判，造成一种讨价还价的局面。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而每次例会只谈判几条要求则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一点。我们在一座对外界保密的楼房里对谈判所要采取的全部战略和策略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这座大楼里我们的讨论不会被外人听到。在我们讨论过程中，我们中那些疑心较重的人坚持认为，政府决不会同意我们建立独立工会。这些人认为，如果我们坚持提出在形式上由工人控制工会的保证条款，情况则会好些。“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另一些成员认为这种保证会像过去那些保证一样毫无意义。回想到1970年12月的情况，大多数人还是主张建立独立工会。

8月23日，星期六，谈判开始。早晨8点，政府代表乘坐的汽车开到，一群工人很不情愿地让这辆汽车通过二号门，驶进造船厂。汽车在厂内行驶途中，受到一群工人的阻拦，他们身穿蓝色工作服，双臂抱在胸前，默默地站在车前。在汽车停下来之前，工人们曾冲上去高声喊道：“滚开！给工人跪下！”在我看来，这自然不是个好兆头。我和经理莱涅赫迅速走出劳保大厅，挤进人群，向汽车走去。当雅盖尔斯基从车上下来时，脸色苍白，面目扭曲。我走向这位副总理，伸出手，向他表示欢迎。人群立即齐声喊道，“莱赫！莱赫！”同时挥动着双臂和紧握的拳头。他们让开路放我们一起来到劳保大厅。当副总理和我步入大厅后，保卫人员也已把其他政府官员一个一个从人群中解救出来，带进大厅。谈判地点设在劳保大厅主门左侧的一间会议室里。我没有把他们直接带进会议室，而是领着他们，排成单行走上台阶，来到大厅里，代表、记者和一些混进来的人已经聚集在这里。站在一排座椅四周的“厂际罢工委员会”成员向政府官员做自我介

绍，同他们一一握手。雅盖尔斯基极力表现得轻松愉快，并走向一位妇女——一名电车司机，名叫亨雷卡·克日沃诺斯，弯腰吻了她的手，想以此把代表们争取过去。双方在很得体地说了几句打趣的话之后，便在楼下会议室里开始了谈判。

达奴塔在罢工开始后的四天里一直没有见到我，到星期六她再也沉不住气了，便乘一辆在造船厂工作的邻居的汽车来到船厂。邻居在造船厂附近停下车，让达奴塔一个人走进船厂。据她事后讲，她那时发现我很疲劳，嗓子哑得厉害，但对胜利充满信心。以后几天里，她不是和大儿子博格丹就是和二儿子斯拉韦克一起又来过几次。从那个星期六起，她便去造船厂做弥撒，参加不那么正规的祈祷，据说造船厂每天都举行这种活动。

达奴塔的回忆

每次去看过莱赫之后，他总是把我送到大门口。大门口的人一听说他来了，便马上喊起他的名字，他于是爬上大门向他们致意。大门下面有几条排水沟，其中一条排水沟上边横着一块木板，木板的两端各支在一块石头上。一些坐在木板上，其中有一个50多岁的妇女。当她看到莱赫爬上大门时，便从木板上站起来。当时我没有看莱赫，而是看着这个妇女。她不顾年龄大、身材小——她可能忘记自己正站在什么地方，像个十来岁的女孩在跳翘翘板一样开始在这块木板上跳起来。莱赫的讲话明白好懂，不时地开着玩笑，人们一会儿大笑一会儿鼓掌，个个兴高采烈；有些人甚至叫喊起来。我置身于一个不同的世界——只感到害怕，但现在很难说清我当时的确切感

受。我意识到莱赫正在离开我，他和那么多的人在一起。我也意识到生活从此将变得不同。无从预料的生活领域正在我们俩人面前展开。将来是好些呢，还是更坏？

同政府代表举行的第一轮谈判结束后的那个星期天，我们从华沙方面获悉，党的领导层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出现了人事变动。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尽力理解这些变动的含义，但是很困难，我们只能胡乱猜测。我们之中没人认为我们有责任支持政府中的某些领导人，也没人试图要对党内事务施加影响。在当时形势下，如果我们支持某个领导人，那只会损害他的地位，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集中力量于我们自己的事情，让政府领导人自己设法摆脱自己的困境。

谈判伊始，雅盖尔斯基就对我们提出的要求采取了一种合理的立场；他在谈判中得到了格但斯克省当局的菲什巴赫和科沃杰伊斯基的支持；他们结成了真正的联盟，好像是在同一个协议上签字的盟友。格但斯克省领导人认为，政府必须顺应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进行诚挚的谈判，支持建立独立工会。问题在于"21条要求"的措词，有几个地方的含义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关于电台转播弥撒的附加条款也已成了问题。当宗教部长从什切青赶来说附加条款根本站不住脚、宪法对此没有提供保障时，对这项条款的异议就更大了。部长认为，教会本身也会反对该项条款，因为无线电广播会使去教堂的人减少。当有人建议可以就这件事征求红衣主教的意见时，部长暴跳如雷地说道，就格但斯克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而政府同什切青早已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博格丹·利斯回敬说："我想我们的谈判进行不下去了。我要通知'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和代表们，我

们与政府代表的谈判已被政府代表中断。"格但斯克省长科沃杰伊斯基平静地说道，弥撒可以由无线电转播。他做出这个决定，事后可能给他带来麻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通常不对一项如此重大的决定负责。这样看来，这项决定给他带来麻烦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不管怎样，这个问题看来已经不存在，另外几个棘手的问题随后在双方都满意的情况下也迅速获得解决。我们对"21条要求"的谈判就此结束。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华沙进行的另一场谈判不久将会导致新的党政最高领导人上台。在我们谈判的最后两天，新闻报导谴责我们使港口陷于瘫痪，造成"在等候驶入格但斯克港的船只上的香蕉全部腐烂"。政府显然在恫吓我们，"香蕉"因而成了他们经常指责我们的话题。次日，我们交给副总理一份"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声明，大意是说延长罢工的责任在于政府，而不在于我们。我们知道党的宣传机器已再次开动起来，我们要确保协议在新政府上台之前签署。广播里和电视上的一则扰乱人心的报道引用了红衣主教维辛斯基最近在雅斯娜山布道时说过的一段话。这段摘出来的引言支持政府的立场，认为"厂际罢工委员会"已丧失了理智。我们后来看到红衣主教的未经官方检查的布道词的原稿时才发现，他根本就没支持过政府。实际上，红衣主教曾于8月28日接见过一个罢工代表团，并交给代表团成员波兰主教团的一份公报和教皇的一份声明，这个公报和这个声明都完全赞同我们的要求。然而这条消息却被官方宣传工具删掉了。

最后一次谈判例会是在星期六，即8月30日举行的。显然，雅盖尔斯基正急于结束会谈。他表示，他希望拿着经党中央委员会"政治上同意"的协议在当天稍晚时回到造船厂。他甚至愿意讨论一份作为宣布我们协议的最后公告的措词。

他离开后，我注意到我们还未在释放政治犯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当星期日我向雅盖尔斯基提出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当作最后通牒，不如说是当作简单问题）时，他回答道："一切政治犯将于明天全部释放。"

虽然一切迹象都是积极的，但我们委员会里的一些人还是担心：看起来盖莱克政府会批准雅盖尔斯基谈判达成的协议，可如果新政府撕毁协议，那将怎么办呢？结果，我们放慢了确定协议最后文本的工作，但其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打字员出了点问题。雅盖尔斯基对此并不知晓，以为我们的拖延是背信弃义的征兆。当博格丹·利斯告诉他我们正在进行，只是稍稍比预定计划慢了一点时，显然有点紧张的雅盖尔斯基立即回答说，"对不起，可我不知道我能否在一小时内签署协议。"我们认识到，现实存在的危险性比我们知道的更大，而雅盖尔斯基此时却做到了言而有信。他肯定知道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斗争是非常严峻的，但他在不知道党内斗争会有何种结果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谈判——这一点很值得称赞。全部"21条要求"和协议的签字仪式定于星期一，即8月31日在大会议厅里举行。在非常简单的仪式上，双方在两个文件上签了字，好像谁也没有注意在他们身后紧闭大门外的华沙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刚刚签署协议的墨迹未干，便听到盖莱克已被迫辞职的消息。

第七章 500天

如果让我找出一个比喻，来说明当“团结”工会于1980年夏末合法化以后波兰所面临的局势，那么我会把波兰社会比作一个贫民。这个贫民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只占有一所漂亮房子的一个小小角落，后来突然获悉他实际上是这所房子的主人，而不是它的房客。

现在我们的贫民怎么样了呢？一夜之间，他从一个不了解自己的权利、神经紧张的房客一下子变成了他的财产和命运的主人。他着手弄清这所房子在他父辈和祖辈时的样子，弄清家俱摆在哪儿，银质器皿以及其他传家宝摆在哪儿，以及土地原来的情况。作为主人，他要以他现在看到的自然的秩序代替目前这种暂时的秩序；他要使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去办。他把家俱搬回原来的地方，铺上地毯，挂上古老的油画。在他命运发生变化之前，他作为房客已经注意到房子有许多破损之处，但当时不太关心，而现在他要开始仔细修补这些破损之处了。

至于那个显然利用了机会的这所房子的暂时的主人，他现在能做什么呢？对我们的贫民如此热心地照料现已属于他的房子进行斥责吗？还是制止这位贫民对自己财产的关心呢？都不可能，因为如果他要继续待下去，他就必须写一份令人信服地说明他过去仆人身分的报告，以此确立他在这所房子里的新身分，并以这种新身分效忠于他的新主人。

乍一看去，这种恢复原来身分的事情，从心理学来讲，无论对于以前的仆人还是对于现在的新主人，都是难于办到的，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他们各自的性格将决定他们对彼此成功的反应和机会。这就是我在1980年秋冬雨季所看到的局势。格但斯克协议开辟了工人与厂方、公民与政府之间可能和平共处的新阶段，并已显示出权力共享的必要性。

在格但斯克拍摄的一部不长影片显示了一点工会总部初期的气氛。这是一部黑白片，它的无数部拷贝肯定不会改进其技术质量。镜头向下对准走廊，通过门，然后推进到我就坐的那张桌子。有个人把一张布告放到桌上，指着它问我罢工决定是不是不可改变。这是我们在1980年9月和10月举行第一次象征性罢工期间拍下的场面。这次罢工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对于我们自己都是一次考验。"八月协议"会奏效吗？我们常常琢磨这个问题。当局则怀疑我们是否代表着应认真加以对付的力量，8月风暴会不会在秋末自动停息？

坐在桌子后面的那个人无疑就是我，但看上去太年轻了——年轻了10岁，甚至15岁。拍摄这部片子到现在，差不多5个年头过去了！

一切都静静地开始了。在"团结"工会成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下午和夜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总想着一个问题：这只是刚刚开始。

星期一早晨，设在弗热什奇老区的马尔赫莱夫斯耶戈大街的第一个工会办公室正式开始工作。我们的房间在一座办公楼的二层，房屋破旧不堪，地板嘎嘎作响。10点钟，我们领到钥匙。有人在楼门外挂了一面红白两色的国旗。将近晌午时分，人们陆续到来，不到一小时便排起了长长一队人，

一直延伸到街上。很显然，我们在这儿无法工作。幸运的是，我们很快就得到了新的办公地点，这是一座位于格伦瓦尔兹卡大街（弗热什奇区一条主要大街）的原莫尔斯基旅馆的两层楼房。

刚才提到的那部影片再现了独立工会刚刚成立时的情况。我在格伦瓦尔兹卡大街的办公室位于走廊的尽头；每个走到那儿的人都要进去待一会儿，人流、各种事务和建议似乎总也没个完。

全国其他地区还要等几个月才会接受自由工会的观念。许许多多的人带着各种抱怨和要求源源不断地来到格但斯克，要求我们对全波兰其他试图建立新组织而遇到阻碍的城镇给以帮助。在一些地方，当局根本不愿承担与工人进行对话的艰巨工作。有些人竭尽全力试图召来“老大哥”的幽灵，扬言要尽快进行报复和恢复旧秩序。

格但斯克必须对这些各种各样的呼吁做出说明、给以支持，并对要求帮助的人加以保护和组织。工人阶级的新波兰的首都已经迁到波罗的海沿岸。格但斯克当局真正理解这场运动，曾参与过使“团结”工会合法化的那些事件。它最近的声明既明确又坦率，没有丝毫自我辩解的口气。这种坦率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经理克莱门斯·格涅赫的态度中尤为显著，尽管我们同他在罢工最初几小时里有过不愉快的会谈。在首次会见造船厂独立工会的代表时，格涅赫说道：

> 像有人告诉我的那样，你们现在代表着大约1.2万人。因此，在我眼里，你们是我们厂职工的真正代表；我将和你们合作。每个造船厂、工厂或企业的领导都需要有人以负责的和可信赖的方式来代表他们的工人；如

果没有这样的代表，没有对造船厂发展的研讨，尤其是没有对有关工人的各种措施的磋商，那么，我现在就无法设想如何工作。我们的造船厂已经成为罢工的象征。全国每一双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我们这里的做法将是其他工厂的榜样。因此我要向你们强调一点，我们在做出每个决定时，都意味承担着巨大的责任。

我们同格但斯克省省长[1]耶日·科沃杰伊斯基保持着联系。凡是提交到"团结"工会常委会面前的关于批评一些工厂工会分支机构的困难问题都由这位省长处理解决。对这些工厂工会分支机构的批评引起了这些工厂，特别是这些工厂中小厂领导的长期的、不公开的谩骂，因为这些人从来不愿接受任何形式的社会控制。这些谩骂，加之组织方面的问题阻碍了我们工会机构的发展，同时也使一些难对付的强大的鬼魂得以再现。

工会分会的数目在工厂、学校、医院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迅速增加着；工会会员自然想要在决定工资、生产以及解决个人不满等问题上发挥影响，但大多数厂领导都反对他们这种做法。我们没有可用以解释八月协议的先例，协议中许多条款是用一般性语言写成的；有几天，人们对宪法赋予工会会员哪些具体权力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虽然宪法在广义上提到了这个问题，但实际结果是，解释宪法有关条款的含义和应用这些条款的权利却仅限于政府。现在，政府必

---

1 波兰划分为省，各省的行政首脑由中央政府任命。地方政府的立法机构——省人民代表会议、或市人民代表会议——的成员由代表选举产生；各人民代表会议都有自己的主席团。每个省还有各自的党委书记。盖莱克政权为限制各省党委书记的权力和各省的自治倾向，把波兰原来的17个省增至49个。当"团结"工会建立全国性组织时，为避免受到地方组织的控制，也采用了相似的做法。

须逐步放弃其全部特权，因为这些特权是它在过去35年中违反宪法和各种协议用武力得来的，既不合法也不公正。与此同时，教会（其权力作为“团结”的象征正在增长）极力宣传以往被政府蔑视的人权的本质。

“厂际罢工委员会”必须处理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厂际罢工委员会”领导班子只有18个人，却担负着眼下急需改造整个社会的重任。面对这样的重任，我们唯一的经验就是建立“自由工会”那几年的活动。当我们以前的经验显得明显不足时，我从最活跃的教会领袖那里和我在罢工的最黑暗时刻产生的信念中找到了新的力量源泉。

无论每夜我睡得多晚，第二天早饭前我都要去普日莫尔泽区的教堂参加7点钟的弥撒，这座教堂是为纪念1970年12月流血事件由莱纳尔恰克负责建造的。我的每一天都是从寂静和安逸中开始，这半小时的祈祷帮助我面对一天的时光，面对我们从不会满足的希望和期待。

9月上旬，我得到了一个来自华沙的消息，大意是说红衣主教维辛斯基希望会见我以及那些领导罢工并参与同政府谈判的人。最后，我面对面地见到了他，他是波兰教会的化身。他曾做过三年忏悔，代表着我们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

这是我自罢工以来第一次离开格但斯克，受到了红衣主教的热情接待，他像父亲拥抱忏悔的儿子那样紧紧抓住我的手臂。斯泰凡·维辛斯基是个权力很大的红衣主教。他的每个姿势、每个动作似乎都在表明教会两千年的历史，红尘中的一切忙碌好像都停止了，仿佛一切东西在他面前都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色彩。这种和谐而有秩序的气氛也洋溢在我们的会见中。会见是在星期日；我们同红衣主教的会见从早晨的弥撒开始；在作弥撒的过程中，红衣主教对我们这些人说：

“做任何没有意义的事情都不能取得自由。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求得工人们的幸福，他们正在为我们的祖国做出巨大努力。但我们必须明智；我们曾为使自己的同胞获得自由徒劳地奋斗多年，而现在这次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努力可能获得成功。为此，我们必须证明我们自己能够拥抱我们亲爱祖国的现在和将来。”

在我们个人的交谈过程中，我能更清楚地理解红衣主教的教诲。他认为在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存在着一种死抱着某些观点和偏见不放的危险。稍后他又说：“这不是要改换领导人的问题，而是必须换掉他们。我们一定要知道——让我做个明确的比喻——一伙强盗不会从另一伙强盗手中偷窃国库大门的钥匙。真正的当务之急是人自身的新生。”

这是个重要的观点，我们在 8 月也曾意识到这种看法。当时，我们没有采纳包括记者在内的专业人员的任何意见，记者关心的只是了解格但斯克发生的事情。我们中的强硬路线派常常指责我说，一个人应该让人民得到“确认”接纳一些人，拒绝另一些人。正在他们说这说那时，我们正通过坦诚的态度以及劝导每个人都去“改变自己”，而不是在我们的行动下“被改变”的做法，显示出我们对人的乐观态度和信念。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我感到自己接近于红衣主教。

此后不久，我很有兴趣地获悉红衣主教对政府高层领导人的态度。红衣主教把他们视为寄生虫，谴责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傀儡。在红衣主教眼里，他们应该受到同情，因为他们像我们其他人一样毕竟也是他的儿子。我知道红衣主教1978年 1 月在教皇首次访问波兰之前曾会晤过爱德华·盖莱克，他当时曾面对第一书记说：“您应该改变信仰，改变自己。否则您将身败名裂；您会被砸成齑粉，彻底失败。”

尽管当时没人公开说，但人们已预感到盖莱克的垮台。红衣主教毫不畏惧地提出了自己的警告，以示当局注意。他们对人民担负的道义上的责任的失败以及他们行使政府权利责任的失败导致他们最后走向了灾难的深渊。

红衣主教说道，不论政治家们的思想立场如何，人们都应宽恕他们。他还说，不管怎样，哥穆尔卡的手是干净的，他是个热心肠的政治人物，内心深处坚信自己走的是一条正确道路。哥穆尔卡因公开反对斯大林主义者而被捕，他只是在赫鲁晓夫巩固了自己权力之后才重新受宠，掌握大权。当盖莱克的政治生涯因八月协议的签署而突然结束（正像哥穆尔卡10年前因1970年罢工而结束其政治生涯一样）时，继任其第一书记职位的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请红衣主教谈谈这个幻想破灭的盖莱克。"也许，我们在谈话过程中，我可能会给盖莱克先生一些他所需要的安慰。"红衣主教回答说。他1978年1月会见盖莱克时，悲痛地发现盖莱克已经神魂颠倒、陷入精神崩溃的状态。

我听到过大量有关红衣主教的传闻。他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对正义有深切的理解。我时常为他的仁慈和慷慨感到惊叹，因为这种仁慈和慷慨是那样地远离即使对他来说也有诱惑力的世人的态度。1970年12月流血事件之后，教会的立场是向一个因动乱而受到削弱的政府提出要求。红衣主教当时说，一个人不可能靠工人流出的鲜血而"赢得"光荣，教会本身应该强大起来，但这并不是因为对手现在很虚弱。对于我，这番话是一种看待生活的新方式，给了我许多需要思考的东西，它表达了一种人人都必须关心的道德观点。

虽然此时我还是个新手，但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我才得以建立人们后来称之为的"瓦文萨路线"。同时，我们的事

业还是一场“世界性”的事业，为克服面临的各种障碍，我们还需要其他技巧。

如果非要我讲出帮助我应付1980年8月之后波兰复杂现实的最有价值的做法，那么我要说就是我指出的第三种办法。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认为只能有两条出路。在生活中，对一个问题能想出不同的解决办法，这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玩某些游戏时那样——如台球、网球，你不可能总靠直线大力击球得分。有时你要靠技巧，甚至要些花招，才会达到目的；如果你打出一个旋转球，球的路线并不是最短的，但它能够落在得分的位置。

8月，我们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停止罢工，制定出我们的要求，并使政府同意。我们完全实现了这个目的，没有犯明显的错误。当协议签署时，人人都一样清楚地看到，这些协议是“发展的产物”；它们开创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时代，体现了人们要在具体的、一直阻碍一切变革的政治条件下决定一个国家发展前景的努力。

政党政治不是我们真正的兴趣所在。我们从不想亲手掌握权力，也不想凭借我们自己的政府重建社会秩序。我们争取的是在现政府中来一场内部变革。我们以前经历过多少有些相似的情况，没有任何能使一个政府比另一个政府好些的保障。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使当局认识到人民的需要和热望的问题，是一个建立避免权力腐败的法律保障的问题。新工会的责任就是从背后去推动这场变革。这场变革能够改造整个波兰社会。

我们的想法立刻为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教授所接受，他当时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几个月后，他在一次格但斯克造船厂

的集会上告诉我们："如果你们是一个想要得到权力的政党，那么世界对你们的看法将同对待其他从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活动的政党一样。这样，你们将失去每个国家、每个种族、每一阶层的人民的注意，一句话，你们将失去一切希望！人们希望社会生活的僵化形式能被一种符合人的真正需要和尊严的新形式所替代，希望由一种共同愿望团结起来的千千万万人民能够找到本国的公民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新形式。由于僵化的社会生活方式正以可怕的冲突威胁着我们这个星球，人们的这种希望就更加强烈了。"

我们努力不加拖延地实施各项计划，尤其是为1970年造船厂殉难工人建造纪念碑的计划。我们已经使政府明确许诺要建造这座纪念碑，政府没有机会再收回诺言。我们拿出由博格丹·皮耶特鲁什卡起草的初步设计方案。皮耶特鲁什卡以前曾为我们自己的造船厂制定过建设计划，并亲身经历过1970年12月事件。但在方案最终得到批准以前还有无数要克服的困难。政府为同我们讨论这个方案，特意派来文化部副部长，巧的是，他以前做过建筑学教师。这个可怜虫仅仅使我们感到哀叹，因为他愚蠢地试图用建筑学中的象征主义手法代替我们原有的设计，而他的象征主义手法是会抹杀纪念碑的深刻意义的。然而，我们通过在政府领导层里寻找同盟者，最终使我们自己的方案付诸实施。但这只是一次例外的成功，其他计划则复杂得多，也更容易使别人以歪曲我们寄于希望的最初设想的手段加以破坏。

要回答的问题多得难以胜数。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波兰？什么样的波兰才有可能实现？我们如何解决给党重新命名的问题？在我们国家的制度中，由党一家决定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命，以及不只是政治领域的民政、警察以及军队（在

军队中，党的话就是法律）的重要任命。我们如何改变这种制度？我们如何解决影响所有发明创造和交往活动的出版检查这个棘手问题？我们怎样处理当局一手垄断大众传播媒介的问题？怎样改变这种天生就是效率低下的经济必须顺从计划，而不是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经济体制？对于一切被剥夺了真正参与本单位决策权利的人，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罢工期间，我们一直是动力，提出要解决的问题；运动按照一个决定事态步骤的计划发展。但现在情况变了。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竞赛，我们不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优势已经转移。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才能赶上形势；我们必须十分机智灵活以便绕过一切暗礁，避免灾难；我们必须在我们提出的要求威胁到某些权力机构的存在时扮演缓冲剂的角色，以便减少磨擦、减少矛盾。在召开大量会议的过程中，我必须同那种同企业老板、妥协的工厂领导以及政府代表算账的普遍倾向做斗争，工人们由于一时冲动想要立刻解决一切问题。

冲动的工人首先把进攻的矛头对准那些与他们常来常往的人，特别是对准那些可能已深感内疚的政府官员。可他们能够对谁诉说自己是比别人好还是坏呢？我在我最后工作过的汽车修配厂的一次演说中曾这样说道："我自己也有可指责的地方，你们呢？一个秘书拿走一支钢笔，另一个人从走廊上摘走一只灯泡，我偷走一个我需要的但在商店里又买不到的螺丝。人们都成了这个样子，这就是我们的制度：一有机会，每个人都要偷走他所需要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难道要永远地这样报复下去吗？我要告诉你们我们目前的处境。有一堵支撑整个房屋的墙；如果每人都从上面偷走一块砖，整个屋顶就会塌下，砸在我们头上。那时，我们是有罪的，尽管事实上不是我们建立的这种制度。

现在我们必须携手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好的工会，这才是重要的事情！”

可是要建立什么样的工会呢？罢工几天后，造船厂的女英雄、我女儿马格达的教母安娜·瓦伦滕诺维奇来看我。那时我家刚刚搬进皮洛托夫大街的新公寓（位于新建的扎斯帕住宅区）。这套房子实际上是省长一夜之间决定分给我的。我们长年等待，写过许多申请，盼望有一套大一点的住房，满足一个人口越来越多的大家庭的需要，现在我们总算有了幸福的结果；这时我们已是八口之家了。分我住房的决定可能是在一群西方记者到斯托吉采访我之后做出的。这些记者对两个大人、六个孩子生活在每人平均不到20平方英尺的住房里的情况写了一篇报道，还拍摄了一部电影。报道和电影很有作用，也许作用太大了；因为立刻就有人建议我们搬到索波特的一所房子去，索波特是三联城地区最时髦的地方，大战期间纳粹军官曾占据那里。但我想要的是所有波兰人都应像我那样能得到的好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得到100平方英尺左右的住房面积。一天夜里，当局派人来到扎斯帕住宅合作社，找到合适的房间，又抢占了一个连接房间的走廊，组成了一个单元分给了我。这套房子比起我们刚刚搬出的地方简直就是一座真正的宫殿。（顺便提一句，当我另外两个小女儿马丽亚-维克托丽娅和布雷吉达出生之后，家里最大的房间又用作“团结”工会的办公室时，我们的房子再次变得又小又挤了！）

安娜·瓦伦滕诺维奇作为朋友来看我，还带来一项具体建议，她认为我应辞去罢工委员会主席职务。在她看来，我没有足够的能力担负这项工作，“厂际罢工委员会”需要一些像安杰伊·格维亚兹达、雅采克·库龙或莫泽莱夫斯基这

样的人物。

她讲这话的意思十分清楚。她认为我太软弱了，在我提出的要求中没有足够的“革命性”，同当局交涉也过于无力。这不仅仅是她的看法：她身后有一个很有影响的小集团，这就是当初自由工会运动的全部成员。他们提出这种建议对不对呢？只有时间会回答这个问题。

显然，“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成员在争夺我的职务时遇到了很大困难（我得到这个职务乃是罢工的结果，这一点是公认的）。在某些人眼里，我的职务是抢来的。这种看法只限于很小的一伙人中间，在公众集会上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伙人可能对造船厂以及独立工会波及到的地方的反应特别害怕。我知道绝大多数人无疑是支持我的，因此能够对这种极少数人的观点置之不理，不过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这种观点的存在。

那部描写我们工会的影片一点也没有记录下内部的这些紧张和摩擦，而只是反映了工会活动的外表和作用。现实则复杂得多，它记录着一些人的希望和野心，这些人决心影响事态的发展进程，在其有生之年留迹于我们的事业。

例如雅采克·库龙，他无疑是个有坚定信念的人，也是各种激进观点之源。当我最初对“自由工会”发生兴趣时，我和他进行过一次没完没了的辩论。我也非常感激他，尤其感激当我失业和遇到个人困难时“保卫工人委员会”给予我和许多其他人的帮助。现在，还债的时候到了。

早在1980年8月之前就已形成反对派的人现在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抉择：要么凭自己的力量继续努力，在波兰建立一个公开的政治反对党，要么参加到变革的潮流中来，在“团结”工会的范围内工作。例如博格丹·博鲁塞维奇，就其本人来说是赞成我们的事业的。可雅采克·库龙却不然，他于

签署协议的第二天才从监狱释放回来。在格但斯克“保卫工人委员会”的一次工人朋友聚会上，当有人问他如何看待自己在新形势下的作用时，他却简单地回答说：“我是工会专家。”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真的不知道有一个正式的专家委员会和另一个不很正式的工会问题咨询机构，前者的成员包括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塔德乌什·科瓦利克、安杰伊·维耶洛维耶埃斯基和扬·斯特热莱茨基；后者是根据红衣主教的建议而设立的，其成员中有库库洛维奇和蒂什基耶维奇。如果让我处在库龙的位置，我就会明白他有理由认为自己已被人轻视：多年的艰苦奋斗和监禁生活，为波兰的未来苦苦思索、奋勇战斗，结果却被专家委员会忽视了，这也许使人恼怒。

其他活跃分子的反应就像人分三流九等似的各式各样。在同样情况下，阿达姆·米赫尼克以讽刺的语调说：“好了，我不打算在《人民论坛报》（党的官方报纸）上写东西了！”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后来他写了一篇为自己观点辩护的文章，题为《革命的自我约束》：

> 事实上，如果没有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协议，这个国家就无法管理。而且，尽管官方也就国家职能发表声明，但这个国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事实是，波兰人应该承认他们的主权受到苏联国家利益及其意识形态的限制。归根结底，只有苏联领导满意的波兰政府才是共产党人统治的政府；人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个国家的事情会在一夜间改变，这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的事情。
>
> 由此引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结论是任何违反人民意志进行统治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要招致灾难，但还有另

一个结论，即任何要推翻波兰政府的努力都是对苏联利益的直接打击。一个人可以不喜欢这种结论，但必须承认这种结论。

我知道我的许多同事都公开指责我，说我已经放弃对独立和民主的追求 我坦率地回答他们：在我们现在的地域条件下，我认为实现独立和建立议会制度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我们只能从国内组织我们的独立，也就是说，通过建立一个日益组织良好的社会，通过日益提高效率，我们才能以我们提供的东西先使欧洲再使全世界其他地方富裕起来；与此同时，我们提供了一种选择，显示了我们的宽容和人道。当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时，我们将走上独立和民主的道路。

一切公共生活领域里的多元化是可能的，废除现代新闻检查制度是可能的，合理的经济改革和公正的社会政策是可能的，出版、电视从属于竞争的法则并报道真实的情况是可能的，科学研究独立和大学自治是可能的，对物价实行社会控制、建立消费者委员会、法庭独立审判和禁止警察打人等等都是可能的。

但没有一个国家是以接受馈赠的方式得到自己的权利的，因此，我们必须要以武力从政府手中夺取这一切。当我们不得已这样做时，我们要谨慎地使用这种必要的暴力，不要也把波兰国家撕成碎片，使它像现在这样丧失主权。

阿达姆·米赫尼克后来加入了负责马索维亚省的“团结”工会专家组，库龙被邀请加入了“全国委员会”专家团（他的影响更小了，只限于理论领域）。

在当局要求我而教会方面也很想要我提防“团结”工会中的“极端政治化”倾向时，我不可能也不会“坦白承认的”。为什么呢？因为我阐述问题从不过于绝对。如果我套用政府使用的词语，严格区分什么是政治的，什么是工会的，哪些是政府仍然喜欢的，哪些是“反社会主义的”，那么我就会陷入一种政治上易受攻击的困境，最大的危险也就离我不远了；我也许就会使用与政府同样的战术。“团结”工会的力量在于克服政治上的划分，这种划分是波兰和整个东方集团的特征。

另一方面，激进团体不断要求我采取更加不妥协的行为来反对政府。对于这种要求我自然有我的考虑。但是，重提波兰政府的合法性这个问题却是必要的。这个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原因，它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版图的变化密切相关。今天，这次大战的一些鼓吹者仍然活在波兰的土地上。毫无疑问，除非军人想要发动一次侵略战争，否则改变疆界就是不可能的。

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一直存在。战争期间，德国人为他们膨胀的人口要求得到生存空间，如果我们拒绝屈服，他们就以消灭肉体的方式威胁我们。来自东方的威胁则不同，它要消灭的不是我们的肉体，而是我们的心灵。面对这个长期存在的难题，战后的波兰共产党当局选择了东方的建议，照搬苏联人的全部理论和经验。正是在此时，政府开始制定其丧心病狂的目标。为了改造我们的民族，它要消灭我们最悠久的传统，切断我们与西方在文化上的联系，试图把我们的宗教信仰连根拔掉，以改变波兰人民的心灵。正因为如此，国家复兴和独立的进程才显得既艰巨又缓慢。

现在机会既然来了，证明对于曾经违背广大人民的意志、利用当时政治和军事状况的有利时机而夺取了国家政权，这

样做不是一个好主意吗？

通过参加工人抗议示威，自由工会的活动家们都在深思这些问题。不幸的是，政府采取的行动迫使人们把它的合法性这个令人不愉快的问题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政府总是说，“如果对话证明富有成效”，“如果已经宣布的改革付诸实施”，如果，如果……。正是政府这种如此僵硬的态度，使它没能利用罢工谈判期间发展起来的有利形势。如果我们的运动要想成为变革与改革的动力，我们就需要在分享权力方面得到政府的支持；如果在分享权力方面得不到政府的支持，我们就要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能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怎样组织实施这种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办好一个独立自治的工会吗？

我们的工会刚刚成立的10天里，好像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我们简直忙得不可开交。然而我从不知道如何以一种人人称道的方式来行使我的职责。但当我们一搬进莫尔斯基旅馆，我们立刻感到清静了些。在没有搬到这儿以前，几乎人人见到我就要拉住我的胳膊，向我诉说他的生活经历，求我为他说情。搬到这儿以后，这种情况少多了。我们搬进新总部标志着我们工作状况的一个转折点。两名秘书轮流和我们一起工作，她们是博泽娜·雷比茨卡和马格达·沃伊齐克，后来还有安娜·科娃尔奇克。专家有的住得远，有的住得近，他们继续组织编写参加我们组织的人员的花名册。他们的生活十分不安静，对自己工作的环境感到很不习惯。罢工委员会成员的不友好态度、必须忍受的愤怒叫骂和许多侵犯性的争吵交织在一起，使专家们认为这是欢喜了几天之后的一个困难时期。我尽力保护他们，意识到他们正在做出巨大牺牲，

一天接一天地坚守在第一线。

最初，我们每天召开两次全体会议。在晚上的会议上，造船厂领导扮演东道主的角色，他们热心注视着正在发生的一切。这些会议开得很艰难，但我认为这是任何一场“革命”初期都具有的特征。在每次会议上，我们都要做出应做的决定。为了做出这些决定，我们每天都要商议5个小时，其余时间用于走访各个工厂。我们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轮流主持会议，有的成员能够很好地阐述工会的路线，但有的成员则对工会的路线一无所知，对存在的困难置若罔闻。除主席团成员以外，还有一些积极分子和我们一起去工厂，帮助建立工会分会。大学生此时也伸出援助之手。我在这一阶段所获得的是这样一种印象：拼凑起来的许许多多东西不可能溶合一个巨大的整体。事实上，难道所有这些东西应该形成一个整体、应该形成一个铁板一块的组织吗?

9月16日，一个弗罗茨瓦夫的代表团来到格但斯克，其中有莫泽莱夫斯基和一名律师以及许多专家。代表我们主席团参加会谈的莱谢克·卡琴斯基告诉我们这是给我们出主意来了。第二天，从华沙又来了一个代表团，其中有法律事务代理人扬·奥尔谢夫斯基和另一个卡琴斯基，他是莱谢克的孪生兄弟。他们以法律语言表达的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会，如果这样，他们可以给予联合会的法律地位。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如果我们不统一起来，政府就会有充分机会操纵不同的工会组织。

9月17日，“鱼尾”俱乐部挤满了人——这个俱乐部就在我们总部所在的那栋楼的底层。令我震惊的是，虽然到场的只是来自大企业委员会的代表（每个企业出两名代表），但他们已聚集成一次盛大集会（而且举行这次集会仅仅是在

格但斯克协议刚刚签署17天之后）。集会主持人莱赫·邦德科夫斯基要求每个人的发言简短而明确。哪一位超过5分钟，他就结束他的讲话。这些发言不是特意准备的，而是对格但斯克、对我以及对造船厂工人的“发自肺腑的祝愿”。国内外许多家报纸的电讯都报道了几个工会机构在什么地方成立的消息，并报道了这些工会机构包括多少工厂、有多少注册成员的情况。从这些报道中，一个新工会组织的画面渐渐呈现出来，虽然这个新工会组织还没有注册登记，但它的会员至少有大约300万人。人们经常呼吁团结。他们高呼“团结就是胜利！”“团结就是力量！”“让我们有一个团结的阵线！”每个高呼这种口号的人都会受到人们的一致鼓掌欢迎。

律师扬·奥尔谢夫斯基提出一个建议说：“为了向政府登记注册，我们就说我们是波兰唯一的工会组织，其分支机构遍及全国各地。”他得到了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的支持，后者说：“格但斯克已经取得胜利，但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全国罢工者强大支持的结果。沿海地区如果把自己同全国其他地区分开，这无疑等于自杀。”

但是，我提请大家注意建立一个巩固的地方工会组织的必要性，因为这样一个工会组织能给其他工会组织一种坚强有力的感觉。“不对，还不是问题的要害。”他们说道。我坚持认为新的工会组织不能退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我反对建立新的中央工会的想法。我指出以前工会制度的弱点，但这只是白费口舌。最后我大发雷霆说：

>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在我去见红衣主教维辛斯基时，政府的中央工会理事会召集了一次全体会议并建议让我负责，因此我有充分机会得到你们谈论的这种统

一。但我不这样做。我不要这种统一。很显然，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咨询委员会，但我们工会与工会之间是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这样才不致于互相剥夺行动的自由。强大的工会核心组织和强大的厂际工会委员会可以帮助那些弱小的工会组织，使它们有敢于采取罢工行动的靠山，但这些强大的工会核心组织，甚至包括格但斯克的工会组织在内，不应对全国其他工会组织施加一种中央组织的影响。当然，我们要在一定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但这是全国委员会的事情。这个委员会必须把一切讨论过的事情传达给各地区的工会组织，各地区工会组织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做出决定。这种决定才是有效的，而全国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对地区工会组织是无效的。我们绝不能轻率地去搞什么统一的工会组织，这种统一的组织只会把我们的一切毁掉。

大厅里的气氛又一次活跃起来。人们不再发出各种呼吁，他们要求共同斗争。一些人表示，虽然格但斯克的工会组织是强大的，目前能够享有一定的自治，但这只是暂时的。如果其他比较小的工会组织被扫除，那么很快就要轮到格但斯克的工会组织了。

我们慢慢开始设想我们工会的蓝图。它应该是多样性的，并且必须同基层联系密切，即必须同工厂、机关以及其他部门工作的人们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一定形式的统一也是至关重要的。

有人提出另一个建议，在“团结”的旗帜下，各地区的厂际工会委员会应该一起去向法院登记注册。如果各自进行登记，我们就会失败，政府会很快找到除掉我们的办法。

实际上，代表们讲的情况是各不相同并且多少有点令人沮丧。当局在工会建立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在各地区是不一样的。在有些地区，不但没有公开的敌对，而且双方还有一定的合作。来自这些地区的一位代表说："他们给我们一间办公室，然后站在一旁观望。"但在另一些地区，情况就不一样了。来自这些地区的一位代表告诉我们："他们连一间办公室也不给我们，只是等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可以说是在看热闹。"有些人甚至说得更邪乎，他们把波兰分为自由区和占领区，有一个人说："沿海地区是上帝赐福的快乐之乡，格但斯克是自由之城——这里现在是真正的自由。但当我们回到我们那里时，我们就感到好像回到了铁丝网里面。"

有些人被恐惧吓傻了，官方的宣传机器则保持沉默。最后的结果是，当局认为情况正在好转。我们举行会议几天之后，卡托维兹省委第一书记安杰伊·扎宾斯基在一次党的积极分子参加的秘密会议（我们已得到这次会议的录音）上谈到党员加入我们工会的必要性、他说：

> 如果我们不参加新的工会组织，我们就会使他们轻而易举地把一个新的"保卫工人委员会"式的组织发展壮大起来。毫无疑问，"保卫工人委员会"是这些新工会组织的后台。所有这些组织实际上完全是一回事。牧师们是同情他们的。这一切将怎样结束呢？从理论上说，所有这类工会应以最后的统一而告终，但这要花几年的时间。我们第一个目标是要防止他们把那些忠诚的党员拉出去；其次，要想法迫使他们把"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员挤出去。如果做到这两点，那么整个工会运动的逐步瓦解就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必须想法子干扰

他们——办法有的是……。我为他们感到遗憾；他们都是好样的，许多人还很年轻，但是他们既然做出选择，要与政治打交道，那就别无他途了。必须教训他们，让他们尝尝权力是什么味道。每个地方都要给他们办公室，摆设装饰要尽可能奢侈。我曾一再说，并且在这里、在这个会上要再次说：我还不知道有人能经受权力的诱惑而不腐败？权力导致腐败仅仅是时间和程度的问题。在他们中间，你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点了。很容易地拿到钱、乘出租车去格但斯格旅行、各种电话直通省委书记、副总理……他们四处旅行，开始大把大把地花钱。事情已经开始变化。

政府的意图一下子变得一清二楚。但问题是：有多少政府官员赞成这种方针？又有多少政府官员赞成八月协议所承诺的那些改革？目前，“团结”这个词是我们唯一的指路明灯。“团结”一词首先出现于罢工期间，是我们罢工新闻公报的标题，格但斯克的年轻艺术家尤雷克·亚尼谢夫斯基根据“团结”一词的含义，巧妙地为我们工会设计了永久的标志。这个词从此有了具体的含义，就像过去造船厂工人纪念碑的设想和形式有了具体的含义一样。现在“团结”一词永远属于我们工会。

我们在华沙的顾问和专家小组正在制定我们工会的章程，章程将总地反映我们工会的历程、1980年八月协议和波兰的传统。这将是一部工人宪法，指明我们的目标、方式、思想和组织形式。在最近事态的冲击之下，波兰的一切都在骚动之中，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人们摘掉带了多年的假面具，吐露自己的真实看法；权力正在发生转移，双方形成了暂时

的停战状态。这场巨大的骚乱将产生出新的领导人；工会的基层组织——工厂委员会——将建立起来。将近9月底，制定工会章程的工作——在安杰伊·斯泰尔马霍夫斯基、维耶斯瓦夫·赫扎诺夫斯基和扬·奥尔谢夫斯基指导下——刚一完成，我们便马上动身前往华沙，按照法律规定的登记程序，将章程提交主管法庭。

各“省厂际委员会”的所有领导人按预定日期在华沙举行首次会议；会议地点设在罗马教皇使团以前的办公楼。我认为，这次会议能开成是很不容易的。在别人看来，我们是一个由同一“团结”观念而团结在一起的团体，然而实际上我们彼此根本不认识。我们只有几星期的共同经历，我们之间存在着互不信任的鸿沟：在波兰这个国家里，民主实践不是自然产生的，人们不能在短时间内了解他人的思想、观点、性格和道德价值方面的情况。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是处境相同的人：整个国家都在注视着我们，希望我们教给人民长期盼望的民主知识，希望最终会出现奇迹。但我们的相互了解过程才刚刚开始，还会有许多足以令旁观者感到震惊的时刻。在我们中间，争吵、深深的怀恨、野心、忌妒和怀疑应有尽有。我在电视上手握一支特大的钢笔，签署与当局达成的八月协议，与此同时，在什切青和西里西亚也签署了类似的协议，但却没有受到大肆宣扬。

我们同政府对章程的谈判用了整整一个秋天。这是讲不同语言的两个阵营之间的艰难对话。“团结”工会不会再用官方政治宣传毒害的语言来进行谈判。解释新工会及其活动的一切条款，政府都坚持使用东方集团专有的那套标准术语。政府对偏离，哪怕是只有一点点偏离固定模式的地方都表示

怀疑，把它们一律当作“反革命的”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结果，双方对章程中的每个词、每个定义都得进行一场令人筋疲力竭的斗争。政府一步不让地坚持要把我们的章程变成他们那套晦涩难懂的东西，而我们的专家则努力使协议采用人民说话的方式，即“团结”工会的方式。开始时，一切都使我们认为这是可能的，但后来，这场文字斗争表明还是一场体现文字含义的斗争，是建立在两个阵营之间的一堵墙。

在这堵墙后面，他们仍然摆脱不掉那套“僵化”的形式。除个别人之外，他们绝大多数人没有能力参与这次新的对话。在私下的交谈中，他们显得非常理解我们，但在公开声明中，他们却不能以任何形式回答人民的期待。他们总是炫耀党的观点，生怕离开支撑他们如此长久的意识形态的生命线。他们不是尽力地进行对话，而是争取保持沉默的大多数人的支持；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沉默的人将越来越多。对于他们，这场对话只是如何制造争论，使人感到厌倦，耐心等待公众舆论的减弱或分化。

我知道我们必须不停地播种，不要考虑是否能够收获：我们播撒的种子将在土地里成活，热情不会白费，或早或晚总会长出植物来。正因为如此，我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加紧了同外界的联系，不惜时间和精力在全国各地辛劳奔波。我们在格但斯克得到的东西，到了一定时间，毫无疑问也将在别的地方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我向人们谈我自己时，并不是想增加我的知名度，相反，我是要他们明白：我和他们怀有同样的愿望，我也要为自己孩子的前途操心，我也希望我家的生活水平高一些，我也有一个希望我办事讲理的妻子，不希望她时常为我操心。

在一次船厂的集会上，我对工人们说：

务必使你们的莱赫手脚干净。请你们盯着他，别让他做任何坏事。像你们一样，我也有七情六欲。我也把圣母像别在夹克的领子上，但这仅仅是为了使我别忘记你们，不要脱离大家。我有妻子和一群孩子，他们使我很幸福，但我还有一双眼睛。我就是这样，同你们没有什么区别。我知道一个人不应去伤害他人，一个人做事不应以牺牲别人为代价。请相信我，我确实不是一个疯子，我也不想成为疯子，因为那样你们就不会了解我了。

同新的人、新的环境进行接触对我是一种教育。如果人们把我看成他们希望的化身，那么我知道自己就要诚实，不应向他们隐瞒任何事情。为此我常常自我“解剖”，看看自己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时，我开始懂得了一些事情，为此我要衷心地感谢上帝：我是一个和上帝在一起的人。

这是一个美好的时期；这一时期一直到1981年年中。

我认为，工会转入地下不再正式存在是在1981年3月。这与比得哥熙危机正好是同时发生的。这次危机是由民警攻击比得哥熙省“团结”工会领导人鲁韦夫斯基和一些人试图在省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独立农会的问题而引起的。3月危机后来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我们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平息这种紧张的气氛时，我遇到了极大困难；这次危机在“团结”工会的事业中好像是一次总动员；根据政府所持的态度，这次动员有使我们所有的人走向灾难的危险。三月危机平息之后，我有一种免除巨量炸药爆炸和阻止了某种看来不可避免的东西发生的感觉。“团结”工会再不会遇到如此有利的局面了，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同这个绝望的政府发生全面冲

突危险的可能性似乎不是那么大了。

三月事件是理解工会发展史的关键。我认为在这种爆炸性的气氛中，我们虽然不能继续进行像波兰权力关系颠倒那样复杂的活动。我仍把希望寄托于渐进的结果，但奇怪的是，政府从我们的动员中仅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是它自己受到了威胁，在24小时之内全体波兰人民都会起来反对它。不管怎样，在这次事件之后，有一点我是肯定的，那就是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方向，只要"团结"工会继续存在下去，就有可能慢慢地巩固所实行的变革，就能使人民隐约地看到波兰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如果说不能给人民别的东西的话。

这便为什么从这时起我感到每过去一个月我们的命运转机就快一个月的原因。不过总的说来，局势的发展是令人不舒服的。有时候，我们似乎要大难临头，但如果我们采取明智的行动，我们还不致于完结。如果必要，我们还可以往回走……。总之，我一直把"团结"工会的未来看作是逐步进行的长征，而不是笔直的坦途。

我们取得1980年8月那些目标的机会肯定没有消失，至少可以选择一个机会，但从多少个机会里选择一个呢？尽管我们有着巨大的希望，但此时此刻成功的机会却是很小的——实际上几乎是没有的。我们成功的机会取决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1980年八月事件是每一个波兰人的事业。我们成功机会的基础在于人们希望政府至少能在理解他们的期望这一点上能代表人民，希望它愿意参加到这场和解的艰难进程中来。政府当前面临的危险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是一种意义重大而又独特的东西。政府自掌权以来首次可能赢得人民的真正支持，有可能做出历史性的妥协，从而很可能使波兰变得好一些，而这正是我们波兰人在当时的特殊政局中所

能指望得到的最好结果。政府本来可以赢得这种支持，而不是像在哥穆尔卡和盖莱克时代有时把政府同社会联系起来的那种戏弄。但从现在起，政府似乎已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支持了。

人们也许会说使政府丧失这种支持的原因是国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从财政方面讲，我们缺乏使经济再次腾飞的足够力量。不管别人怎样想，“团结”工会的态度从未导致国家经济困难的恶化。即使在那些为政府利益辩护的人中间，这也是最流行的看法。虽然罢工者在1980年8月以前的谈判中总是要求增加工资，但他们1980年8月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建立自由工会。造船厂工人在工资问题上作出让步，只增加了几百兹罗提。他们赞同注意事物的本质，不再纯粹考虑罢工的经济方面。我们了解国家的困难，准备并且愿意做出牺牲。我们甚至提出这样的建议，凡有条件的人应该拧成一股绳，共同偿还波兰的国债，哪怕只还一点也是好的！这种与国分忧的精神还不曾有过先例，人们只能把这种情况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所显示出来的那种牺牲精神相比。

那么为什么这种声势浩大的动员，这种甘愿做出自我牺牲的精神一直没有产生效果呢？为什么政府不利用工人的奉献呢？这是因为，如果政府这样做的话，它就必须和我们一道实施一项真正改革的长远计划；也因为政府认为，这些改革的要求是最最危险的事情。政府谴责这些改革是反对社会主义秩序的“政治”企图，因而阻碍朝这个方向前进的一切努力。然而政府也使人们明白了一点：不断施加社会压力能够使一定的要求得到满足，只要这些要求来自“团结”工会的“厌恶政治的”纯粹工会派。这种情况使人们看到了一些希望，并且为协议谈判、为工人的福利待遇、工资标准和有关工资的其他问题的会谈打开了大门，工人提出的要求因而

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在这一阶段，政府的一些行动和一次所谓的“政府罢工”使工人的工资要求有了新的突破。政府避重就轻，只注意人民的反应，而不采取任何制止工人总在收入上打政府的主意的倾向。我把问题想得复杂了点，预感到这样下去将会出问题。我认为，单纯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将会削弱我们的运动，使政府的日子变得轻松起来。政府可以指责“团结”工会挑起了所有的麻烦，把未来任何灾难的责任都推给我们。实际上，政府正是这样干的。它将造成一场危机的责任全部强加到我们工会头上，而这场危机实际上是政府在整个70年代的管理不善的结果。政府的这种做法使它一举两得。

1980年11月，我们同政府对抗的范围扩大了，这是很危险的。这是由两个事件引起的：一个是我们工会的注册；一个是扬·纳罗兹尼亚克案件。纳罗兹尼亚克是华沙大学的数学家，曾把国家检察总长的一份秘密备忘录公诸于世。

关于“团结”工会注册的事件引起了人们第一次对政府合法性和波兰法律公开的、措词婉转的讨论。事情是由华沙法院的一项决定引起的；这项决定对“团结”工会为注册而提交的章程进行未经我们认可的修改。法院单方面加进了几段强调“党的决定性作用”的话。这就是说，这几段话从此将成为我们章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几段话任何人都能在宪法中找到。我们的人将此举视为独立自治工会要被共产党官员控制的一个迹象，也就是说，我们的人把此举视为我们将退回到原来的地步的迹象。不过罢工期间，我们已在格但斯克协议中加进了“党的指导作用”的原则，以此表明我们在政治上的现实主义立场。

法院的态度立即引出了这样的问题，即法庭的作用是制

定工会的章程的呢，还是仅限于保证该章程同法律保持一致？总检查官因间接地否定参与创建“团结”工会的无数积极分子和一些团体的工作人员的公民权利而引起了骚乱。他以精心挑选的法律术语宣布，“团结”工会的人将是“监督措施”的对象，法院将对他们实行监督，不许他们“参加非法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我们的人问道：“如果我们随时都可能被关起来，那我们的协议还有什么用处？”用一定的方法，可以把一个绝对诚实的对手变成一个不屈不挠的死敌，他被迫为自己的荣誉、安全和公民地位而战。这就是工会运动逐渐政治化的过程。

与此同时，一股表达人民一般要求的声浪席卷全国：在山区、在别耳斯科-比亚瓦、在耶累尼亚-古腊。人们要求政府各机构归还所霸占的公共建筑。政府将这些公共建筑据为己有，将其改造成疗养院和设备豪华的休养中心，专为政府人员使用。人们指出各种紧迫的社会需要，如缺少医院、诊疗所和教育设施，更没有供他们自己使用的休养中心了。谴责之声迭起，各种贪污和其他违法行为被纷纷揭露出来，但政府一点也不急于处理这类微妙的问题。这样，一场罢工浪潮又在全国各地爆发了。

在这一时期的全部时间里，我忙于四处走访，出席罢工者与当局的各种会谈。我们的顾问和工会专家与我同行，走访举行辩论的每个场所。在一次我们出访的路上，社会学家扬·斯特里泽韦茨基向我们扼要地说明了目前的局势：

> 一种社会要求已经从下面提出来。如果发现国家的钱被用于满足少数特权者的目的，那么这些钱就必须要回。我们面临的既是一场反抗运动，也是一场把国家归

还给人民的运动。这场运动不久将冲击新闻检查制度和行使权力的方式，产生经济活动的自治原则。这样，我们就能发展一种新的国家观：国家不再是人民的替代物，而是行使其职能时为共同反映一个积极社会的全部社会组织所使用的工具。一种新的现象出现在国家的舞台上——过去那种“虚假参与”的情形已经结束了！所有这些因素组成一个整体，如果我们能找出这个整体的引力中心所在，那么这个整体最终能够代表某种崭新的东西。

一个人曾对我说："如果叫我拍一部反映你在‘团结’工会正式存在的16个月里的活动的影片，那我会把它拍成像美国影片《尽头》那样；在这部美国影片里，您能通过一个男人的眼睛看到整个美国。这部电影一开始，那个男人就坐进一辆汽车，影片其余部分展示的是这个人旅行的情形。"

为了了解我的国家和我的同胞在国外生活的情形，我准备在国内外做一次长途旅行。1980年10月，我驾驶那辆汽车开始了我的旅行生活，一直到1981年12月12日宣布全国戒严这次旅行才算结束。车子开动了，沿途什么奇怪的事我都碰上了。我就是这样来了解我的国家以及我那些在异国他乡，特别是在梵蒂冈、法国、日本、瑞士和瑞典的同胞的。我的行程达数万英里，解决了数不清的问题。这次旅行的影片，如果有的话，是那种老式的，画面上的一切都快速地一闪而过，一个人很难记住那些闪烁不定的图象；我只能记起几个静镜头。

有一些道路是波兰几世纪以来一直使用的，人们在这些道路上去旅行或去朝圣。我像我的祖辈那样行进在这些道路

上，而不是像乞丐那样到国外去寻找繁荣。我不是空手而来；我是要在全世界面前为我们的工会运动作证。

1981年1月，在达奴塔和我的孩子们的陪伴下，我首先赴罗马拜访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我们带来了“团结”工会致教皇的信件。他对我们的看法所给予的公开支持既宝贵又重要。他在向我们发表讲话时说道：

> 我认为，你们1980年8月在波兰沿海地区和其他大工业中心所开展的冒险事业是人们普遍要求促进社会道德利益的情不自禁的行动。如果没有这种行动，就谈不上真正的进步：波兰能够像其他国家一样要求得到进步的权利。同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权利是波兰所特有的，因为它的赢得是以波兰历史上多少代人前赴后继的斗争，尤其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所遭受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波兰的这种权利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波兰人民自己的事。你们在整个秋天做出的巨大努力不是针对任何人的，这种努力必须继续下去。你们付出的努力不是反对而是为了全体波兰人民的共同利益。付出这种努力的权利，实际上也是一种责任，是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具有的。这种权利为各国法律承认和批准。

在这次讲话中，教皇一定程度地表达了他在后来给教会的《论人类劳动》的通告中系统提出的思想。因此，我可以说，这个文献产生时我就在场，它对劳动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指出了永久的解决办法。

从许多方面讲，我对意大利的访问具有特殊的意义。首

先，这是我的首次西方之行。其次，还实现了我自己在1980年8月许下的诺言，即如果我能活下去，如果工会得以诞生，建立工会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得到承认，那么我平生第一次长途旅行将是去罗马晋见教皇。

我的继父从美国赶到罗马同我们团聚。我已多年没见到他了，过去的怨恨仍然郁积在我们各自的心里。这种怨恨正像我已说过的那样，可以一直追溯到我的童年，但最近发生的事情又使我们之间的怨恨雪上加霜。我继父斯坦尼斯瓦夫没有回索波沃参加我母亲的葬礼（她的灵柩已于1975年从美国运回家乡）。大家都认为，如果他那时回到索波沃，就可能被迫一直待下去，这是波兰法律的规定。因此，我对他的态度也许过分严厉了。在我们见面很僵的情况下，多亏达奴塔帮了忙，正是由于她，我们才能重享某种程度上的天伦之乐。

我们与教皇会面那天是从罗马郊外一个波兰移民旅馆里的弥撒开始的。然后，我们乘车穿过市区来到梵蒂冈。我与教皇的首次会晤是在私下进行的。他的接待充满热情和慈爱。然后我必须在公开场合向他致词，全世界都将听到这次正式讲话。我决定不按照我的顾问事先写好的讲演稿去讲；我要用自己的话说出我心里的东西。我还可怕地记得在造船厂工人纪念碑落成典礼上那次结结巴巴的可怜演说。每当我要用外语进行演说时，若按照事先写好再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讲稿去念，结果都是一样的糟糕；这就好像事先准备了半天，原来为自己准备的是一个陷阱，结果不可避免地掉了下去。因此，我决定在梵蒂冈做一次即席演说，相信到时候会找到表达我的思想的措词。我承认那是一个令我惊慌的时刻：灯光一下子全都对准了我，照像机开始拍照，每个人都等着听我说什么；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害怕的念头：我会让教皇失

望的。然后，我以尽可能简单的词句讲起来，告诉人们我们为什么而来，什么样的理想鼓舞了我们，我们准备借助“团结”工会保护什么样的人权。

在将近访问结束时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再次接受邀请参加早晨的弥撒，并在教皇的住处同他共进早餐。同教皇一起度过的这些宝贵时刻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我再次见到他是在两年半之后（与达奴塔和孩子们同去，那时的局势已完全不同）。

这次访问意大利是由三个大工会安排和组织的，这三大工会是基督徒工会、社会主义者工会和共产主义者工会，因此也可以说我们是受这三大工会联合邀请访问意大利的。在同意大利“社会主义国际”聚会时，我们也唱圣歌！我向这个组织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即存在着把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是不受他们忠于的其他思想支配的。我看到的无数迹象都表明全世界各地的人民深感需要国际团结。正是在这个方面，一个新的使命正期待着我们去完成。卢恰纳·拉马、彼得罗·卡尔尼蒂以及乔治·本韦努托在同我们交谈中所表示的热情和理解将经受住时间和后来波兰发生的各种事件的考验。意大利人总是给予“团结”工会衷心的支持，他们那种与我们分担责任的情感一直持续到今天。对我们来说，没有比这更宝贵的礼物了。

此后，我们对瑞典进行了短暂的访问，我在那里接受了《劳动者》杂志颁发的和平奖金。两年以后，我又获得了诺贝尔奖金，这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给予我们的巨大支持。

日本是一个令人十分惊奇的国家。波兰人在描述这个国家时所使用的奇异词句，使你很难觉得那里的人真正跟我们一样。在来造船厂详细观察我们罢工的首批记者中就有日本

记者。他们对罢工意义的详细而认真的分析，对“团结”工会很有帮助。我问他们为什么对一个如此远离自己祖国的国家这样感兴趣，他们回答说，他们发现两国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譬如，两国都面临世界大国的压力，两国都缺乏自然资源，其生存主要依赖对外贸易。因此，日本像波兰一样，都不得不密切注视世界局势的发展。

日本人对我的访问安排得就像列车时刻表一样准确。我在日本逗留的每一分钟都做了计划，这种计划也许是用计算机编制的。我们受到日本最大的中央工会组织“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简称“总评”）的接待；我们向他们表达了我们的信念，即工会事业是我们共同的事业，他们对此表示赞同；我们还告诉他们，我们希望像访问意大利那样能会见日本其他工会组织。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访问不应成为任何人在竞选中使用的王牌；如果这种难得的会见的意义受到损害，那将是我们极大的耻辱。

结果，日本人把我看成了真正的武士！他们十分清楚“团结”工会和波兰所面临的各种威胁；在他们看来，我是为别人而战的那种人的化身……但也许还是个冒着失败危险的人。

他们在演说开始时，总要提到他们敬佩的肖邦（其中有些人甚至还知道这位波兰音乐家的出生地泽拉佐瓦·沃拉），总要提到他们去过波兰，非常赞赏瓦伊达拍摄的影片和波兰绘画。当轮到我谈日本时，我谈到个人的权利因进步而受到践踏，计算机进入家庭固然是令人羡慕的事，但同时也带来激烈的竞争。我的讲话要达到什么目的？在哪儿停下？像在以前类似的场合一样，我看到人们理解我，比起他们自己那些带着高级干部神气的工会领导人来，他们更愿意听我讲话。

我想以开玩笑的方式告诉他们我对于他们的错误观念的看法，于是在一次招待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拿起一把剪刀，剪断了“总评”书记长田中良一先生的领带。这个玩笑开得漂亮得体，但却没有被很好地理解。

日本的经济和劳工组织无需别人再加以赞美。我对日本工会活动家的经验似乎更感兴趣。我了解到，日本主要工会经常进行自己的调查研究，并根据自己得出的结论，向资方提出根据充分的工资要求。所有谈判都是以这些要求为基础而开始的：假如谈判失败，工会将使用最后的武器——罢工。工会的竞选活动在确定的日期开始，一般在每年春天进行，4月是罢工之月。

在日本国会，我们会见了主要政党的领导人，他们表示支持波兰潜在的变化，并许诺给予我们巨大的经济援助。这使我非常尴尬，因为我显然不能代替政府行事。后来，我们在国内也遇到过这种令人难堪的场面。政府官员告诉我们：“不要把我们推入日本人的怀抱。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比你清楚得多。我们不打算把波兰建成第二个日本！”

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日本为我们停滞不前的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日本这个火车头会把我们的经济拉上一条稳定发展的轨道。日本人提供援助的愿望是吸引人的：它准备帮助开发在波兰受到忽视的那些经济领域，如铁路、农业、化学、汽车工业和计算机设备，等等。我问日本人怎样设想波兰会履行一个贸易伙伴的责任。他们认为，作为互惠条件，波兰应向日本提供进入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的机会。

在日本，我们听到有人企图刺杀教皇的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是在1981年5月13日午夜。当时，我们正在长崎我住的旅馆里讨论那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和次日我们

将参观的为纪念原子弹爆炸中的死难者而修建的博物馆。最初传来的消息真令人毛骨悚然：教皇死了！接踵而来的消息又予以否定，说教皇没有死，仍然活着，但生命垂危。一种巨大的孤独感笼罩着我的全身；整个世界似乎完全颠倒过来。由于教皇身遭不幸，我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变得六神无主，十分绝望。罗马教皇的不幸也是波兰和“团结”工会的不幸：他们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才刚刚开始啊！接着，消息又有了变化，变得不那么怕人了：希望还是有的，但教皇的伤势严重，医生们正在全力进行抢救。我们请求在早晨做弥撒，长崎主教为我们的代表团主持了仪式。当我在长崎纪念馆的金色留言簿上写下“人啊，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时，那个刺杀教皇的可怕时刻也就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日本人立即做出反应，加强了对我们原已很严格的保安措施。他们给我又增派了一名保镖，我们只能做为一个整体活动。

也是在日本，我接到去日内瓦出席6月初举行的“国际劳工组织”下一个年会的邀请。我并不十分想去出席这次辩论会，政府想必为此行设置障碍。但当我知道教皇将在这次会议上讲话时，我于是做出了去的决定。此行是在教皇遇刺前就已计划好的；既然我已接受邀请，现在便不希望再取消了。

我们于6月从华沙启程，同行的还有总理耶日·奥博多夫斯基和他的一个顾问小组，他们代表“雇主方面”参加会议。陪同我的人有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安杰伊·斯泰尔马霍夫斯基和负责工会国际联络工作的雷沙尔德·卡维诺夫斯基。从飞机起飞时起，我们之间的气氛一直是良好的：

我们毕竟在这次国际会议上一起代表波兰，人们将密切注视我们。除“团结”工会代表外，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当局公开支持的两个工会的代表，他们声称依靠当局的支持要和我们进行竞争。在下面这个棘手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章程，我们代表团本身有一次发言权（我在这次会谈上发表了讲话），在小组里有一次表决权。我们的1000万支持者强烈反对这种做法。我们在访问日内瓦期间得到了整个国际工会运动的极大支持。我尤其记得同全世界各种工会组织的140名代表握手的情景。他们之中有一位长得异常漂亮的年轻女士，每逢拍照时，我总是请她站在我的身边。在当时拍下的大部分照片里，您会看到这种情景——这再次显示出我的平凡而又并非圣洁的本性。

接着，10月来到了，我访问了法国这个政治实验场。访问法国不同于访问意大利，在意大利，教皇的波兰籍增加了我们的声望。在法国，人们对“团结”工会的兴趣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工会方面的，一个是政治方面的。我在1980年8月那些难忘的日子里就已开始接触法国的工会运动，法国人当时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他们在当局极力要消除罢工的政治意义的紧张时期公开表示支持我们。法国的支持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它消除了人们以为“团结”工会正在走向失败的误解，从而揭示了波兰领导人的难堪处境。法国的支持还把“波兰的夏天”的真实气氛和重要意义传达到国际政治舆论中去。因此，我要在叙述我的法国之行以前，先表达我对法国人民的感激之情。

法国的5个主要工会组织当时代表着该国从基督教鼓动的运动到共产党发起的运动的全部思想潮流。然而它们都强调波兰试验对国际工会运动的意义，它们和我们的这种一致

性是极端重要的。每个工会组织自然都强调最适合它的方面，但又不离开共同赞成的精神。

我的朋友、“法国劳动同盟”主席埃德蒙·梅尔说道：“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联系超过了一般友谊，甚至超过了共同利益：这种联系指出了我们大家共同的命运。”

“法国总工会”是同法国共产党有联系的组织，这家工会的总书记乔治·塞居伊说道：“对我们所有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你们的试验应该成功。”他回忆说，正是由于“团结”工会的态度，“法国总工会”才从“世界工会联合会”退了出来。“法国总工会”是总部设在布拉格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创建单位之一。他继续说道，“我们今天在波兰亲眼目睹的一切证明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工会作用的看法。这种作用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是可能的。我希望，我们将完全能够从你们目前的经验中得出结论。”我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已同那些曾拒绝与我们直接接触的人建立了对话联系。

在同法国总理皮埃尔·莫鲁瓦的早餐会见中，我们就法波关系的各方面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讨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次讨论是我们在此之前同法国外长克洛德·谢松会谈的继续。法国政府显然想要了解波兰的真实情况以及“团结”工会在波兰的潜在作用。我们在这年10月所进行的各种接触，肯定对法国在波兰实施军管极其困难的几个月中决定给波兰以空前规模的援助，以及法国工会对这时已被宣布非法的“团结”工会的支持起了一些作用。当时任巴黎市长的雅克·希拉克后来也实践了他对我和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发表的友好声明。

在这种马拉松式的对工会访问的过程中，我仍坚持每天早晨参加在波兰人教堂里举行的弥撒。访法期间，我仅仅乘

客轮游览过一次塞纳河，仅仅在奥林比亚度过了一个轻松之夜，这还是在伊夫·蒙唐和西蒙·西格诺尔的邀请下去的。他们后来还请我们喝过香槟酒。

我们要去法国北部访问波兰籍的帕洛坦神父的住宅。当在夏尔·戴高乐机场登机前用早餐时，我们遇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一群要去波兰访问途经此地的美国商人围住了我，连珠炮似地向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使我根本无法用餐。他们对下述问题特别感兴趣：西方银行以前提供给波兰的信贷的结果如何？加强波兰经济需要哪些条件？“团结”工会作为一个能影响国家和经济运转的真正的社会运动，它的作用和态度是什么？我告诉他们，只有改革才能保证积极的变革——第一个阶段将是工人自治；而保证变革取得成功的条件将是波兰人民的意志；除此之外，靠任何东西都不能达到目的。我至今仍坚持这种看法。

随着这类谈话的不断继续，建立国际团结应采取的方式更加清楚了，正如这种团结表现得最多的领域让人看得更加清楚一样。这种团结不仅愈来愈符合东方的需要，而且也愈来愈符合西方的需要。西方许多政党获得的支持相当一部分来自工会。在日本，我们已注意到“政府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现在由于“团结”工会提出了自己的理想，这种距离似乎可以消除。如果说波兰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日本人则会很快认识到，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十分关心这个问题。

对我来说，这些国外之行为我提供了一个以新的眼光看待我们的事业和那些与我们直接有关的事情的机会。这些访问也是对1980年8月所有那些支持我们的人的答谢。我的脑海里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解决波兰一切问题的钥匙就在我

们自己手里，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势力，在波兰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红衣主教维辛斯基的看法。

我在波兰国内的旅行是从1980年10月开始的。南方之行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尤其是10月的一天，我在克拉科夫市苏金尼策集市广场发表演说，发誓一定要坚持“团结”工会的事业；我站的地方就是200年前塔德乌什·科希秋什科对祖国发誓的地方。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有一天我会站在这个18世纪神圣的地方如此地充满愤怒和希望。我记得这次集会之后，在克拉科夫附近的新兴工业中心诺瓦·胡塔的运动场，有人向我提出了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我与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我回答说：“我们正在开创波兰式的社会主义。我们正在要求政府服务于人民，而不是领导人民。我们国家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应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大多数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不同于理论家和政治家。每个社会团体都以自己的方式看待社会主义。一些人完全否定社会主义，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是有些用处的东西，但总的来说，大多数人都认为最好以社会主义方式工作而享受资本主义的成果。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社会主义归结起来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如社会福利、医院、学校等基本条件和设施；我们对这些东西的不注意就像我们不注意自己血管里流动的血液一样。当然，要得到这些东西，还必须有钱；诚实必须成为人们生活的准则。为使社会主义为人们接受，我们认为，在经济领域和社会福利领域最好的东西就是社会主义，即使这只是我们至今所知道的社会主义（坦率地说，这不过是一种假社会主义）的一部分。

在我走访波兰各地期间，有些时刻是同政治集会完全不同的。例如，我在亚斯纳－古腊坦率地承认我信仰琴希托霍

瓦的圣母。罢工期间，由于我们在许多问题上不能得到满足，但又要坚持共同的目标，因此，我们就必须更好地了解自己和保持信心，并从我们自身以外的各种势力中寻求帮助。我在亚斯纳－古腊停留的重要性正在于此。波兰大主教曾经说过：“波兰的心脏在这里跳动。”因此，如果亚斯纳－古腊是波兰的心脏，我就必须去那儿，成为一个有着这样心脏的人；我要让整个国家随着这颗心脏一起跳动。

我还保存着一些旅行笔记，这些笔记是由我的秘书和“团结”工会周围的独立新闻机构的许多记者匆匆写下的。最初，我打算按时间顺序有条理地整理和改写这些笔记，使人们对“团结”工会正式存在的16个月有个清晰的概念，但后来我改变了主意。尽管这些笔记显得支离破碎，注重细节，有些笔记甚至对那一时期斗争的肤浅判断是错误的，但读者对这些笔记的本来面目可能更感兴趣。正因为如此，我才把这些笔记拿出来。在我眼里，这些笔记具有独特的价值。

米奇斯瓦夫·瓦霍夫斯基

首先，莱赫特别喜欢旅行和群众。对他来说，群众好像是粮食，他从群众那里吸取他所需的能量。我保存着他在每次群众集会上的讲话的录音以及讲话后群众的提问和他的回答的录音。每去一个新的地方之前，他都要重放讲话录音，静静地听着，留心出现的错误或确切表达他要说的话的方式；他很善于分析这种事情。从集会回来时，他一路上总是打瞌睡，但在旅馆里休息上一小时后，他便准备参加别的集会；他几乎没有恢复体力的时间。在听完自己最近一次讲演的录音之后，他总要

继续考虑讲话的内容，考虑怎样在下次集会回答上一次人们提出的问题。人们有时被他弄得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确切要说明什么问题。这常常搞出些可笑的事来。

当莱赫发表演讲时，他好似处于人的波涛的顶端，像一个冲浪者那样驾驭着波涛前进。他能表达出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感觉到的东西。他就是这样使听众聚精会神地听他讲下去。在这里，终于有人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这就是他干得如此好的原因。

在每次同政府会谈或磋商之后，他总是感到疲惫不堪；他真正做到全力以赴了。然后，他就休息一下。他经常是还没恢复过来，就从一个集会地点赶赴几百英里以外的另一个集会地点。每当离开一个集会时，他知道他说过的每句话都产生了作用。

我注意到他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事情打扰。一边是全国委员会打扰他，一边是政府和让他去华沙的电话打扰他。为了进行各种可能的会谈，他经常被叫到华沙。

人们称他为"灭火的莱赫"。他是那种到处熄灭罢工之"火"的人。有一次，我们去热舒夫同"独立农会"接触，然后前往华沙，同波兰大主教会见之后，我们又返回格但斯克。我在回家的路上因车速过快让警察拦住了。我对这位警察说："我很着急。我刚把主席送回家，现在我要回家睡觉，我都快累死了。我有点东西给你。"我把热舒夫省的和格但斯克省的"团结"工会新闻公报递给他。他问我："这是什么？""这个吗？代替罚款，是我送给你的一点礼物。"我回答说。他没有再说什么，我于是开车走了。当晚，我又回到莱赫家，问他"我们去哪儿？""我们要去耶累尼亚－古腊，"他回答说。"莱赫，

咱们别再去那儿了！我开车跑了整整一夜，是整夜。我们再不这么干了。我累的真够呛，现在什么地方都不去。”“我们必须去”,他坚持说。我让步了。

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各种各样的工作对他来说真是过于繁重了，他开始变得不知所措。只有在教堂，他才能恢复失去的力量。我想，连他也可能说不清他自己的感觉；对于他，去教堂是去摄取另一种食物；他真正需要这种食物。他毫不理睬周围的照像机和摄影机。做弥撒时，他好像离开了人间。你向他说话时，他一点都听不见。他只是默默地祈祷，完全忘记了自己。你觉得他是全神贯注的，他的肉体和精神全都溶进对神的祈祷中。有一次在教堂，一位妇女可能是犯了癫痫病突然摔倒，发出很大响声，可莱赫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离开座位，帮助把她抬进圣器收藏室，可莱赫毫不在意，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的思想上了。但弥撒一结束，他便好像上紧了发条一样，精神能立即恢复过来，突然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好像他刚才去了另一个世纪或另一个世界。

他知道这种繁忙的情况总有一天会结束，但他希望这种情况结束在他预料的时刻。他1981年6月曾经说过，如果事情照当时那样继续发展下去，运动就会崩溃，陷于停顿。

莱赫的经历就像是障碍滑雪赛。他的第一次跳跃是从造船厂开始，接着是一阵激烈的速滑，时降时浮，孤零零一个人不顾一切地向前猛冲。有一天，策林斯基对他说："莱赫，你是个如此复杂的人，你将没有任何朋友。你不让任何人接近你；没人能和你谈论同志之情或

友谊。”

莱赫认为这种情况早已结束。后来在一次旅行中，我们再次谈到这一点时，他也认为这是真的。实际上，在国外我们中间没有人对他有任何帮助。

安娜·科瓦尔奇克

我们一起乘车走了几万英里。旅途大部分在夜间，每次长达几个小时。旅途中莱赫几乎一直都在睡觉。我们总是把一块垫子铺在双膝上，莱赫像狗似地蜷缩着身子，把头放在垫子上。（“天啊，我把什么放在腿上了！”我们经常这样说。）

他从不惊慌失措。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返回格但斯克的路上，米耶泰克已经像疯子一样驾车连续跑了几个小时：当车子驶到埃尔布拉格附近时，一只鹿突然窜到汽车前面，打碎了水箱。我们一下子给难住了。米耶泰克示意过往车辆停下，但却没有一个司机停车；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最后，一辆载重卡车停了下来，当车上人看清谁在车里时，他们都大吃一惊！卡车司机正要去埃尔布拉格，但他一直把我们送到格但斯克。当我们在路边等候时，莱赫没有显出一丝一毫的烦躁，他没有抱怨也不发牢骚，他非常镇静。当我们停车吃饭时，唯一使他感兴趣的就是菜单上有没有炒猪肝。他喜欢吃猪肝和薄煎饼；他总坚持说谁做的煎饼也没有达奴塔做的好吃。

在齐拉尔多夫，我们曾去看望正在罢工的女工，当他从集会中走出时，道路被汽车和电车堵住了，到处都是拥挤不动的人群。莱赫在集会上一出现，人们便开始

唱起“波兰决不会灭亡”——不是喊“祝您长寿!”、也不是喊“莱赫!莱赫!”而是高唱“波兰决不会灭亡”。他停下来，低下头，站在那里，陷入沉思。他事后告诉我，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深深地感动了”他，他当时激动不已。就在同一天，雅鲁泽尔斯基声称，人民为了各种目的正在任意滥用国歌。

我也记得去波兹南的情形，以及为纪念1956的6月26日波兰第一次工人起义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6月25日，我们从腊多姆驱车前往波兹南，我们刚在腊多姆庆祝了乌尔斯基、腊多姆和普洛茨克的工人示威。这种庆祝活动一个接一个。在去波兹南的路上，莱赫说我们将不去策盖尔斯基工厂，而直接去旅馆休息——他太疲劳了。我们在波兹南郊外一个加油站前停了车，这时我们听到广播正报道策盖尔斯基工厂当时正发生的事情。莱赫马上说道，“我们”必须去；人们正期待着他的到来。米耶泰尔斯基猛踩油门；这里离波兹南还有好长一段路程。我们终于到了那里，但米耶泰尔斯基却不知道工厂在哪儿：我们只好向首先遇到的一个民警问路。

在去工厂的路上，他说道：“我要先给他们讲这个问题，然后再给他们讲那个问题。”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为讲演做准备。我认为他是在设法了解我；他好像在向我试讲，好让我谈我的看法。我们第一次在一起旅行是很沉默的——虽然我总是很高兴同他在一起，但仍有点害羞。一段时间后，我开始不那么拘谨了，我们讨论起他在最近一次集会上是不是表现得很好；虽然在我眼里，他总是很好的。就这样，我们彼此熟悉起来，他开始信任我了。

莱赫过去是，现在仍是一个引人瞩目的人物，但对我来说，他身边真正愿意帮助他的人不多。例如，我非常喜欢安杰伊·策林斯基，并且十分尊敬他，在许多方面我们二人都相处得特别好。但我们对帮助莱赫这一点却有不同看法，我曾对他说："安杰伊，你是莱赫最好的朋友，你应该为他多做些事情，帮他处理些棘手问题。"他却回答说："这就是说，你要把他变成一个木偶，是不是？他应该像现在这样。不要把他变成木偶，别人拉动绳子，让瓦文萨先生手舞足蹈！"这当然不是我想要干的。我倒希望有人能从精神上、从内心深处帮助他。

他喜欢集会。他喜欢被他称之为"乒乓"式的问答。集会使他着了迷。有些人说，在集会上，我们把写有各种问题的纸条搜集起来，交给他回答。所有的纸条上都写得满满的。我们把人们递来的纸条按内容分类整理出来，然后他像专家那样回答这些问题。他镇定自若，使回答切中要害、无可辩驳。这种集会一开完，他总是饥肠辘辘，饿得不行。他认为，一个人集会前不要吃东西；他空着肚子能讲得更好；他不想为他的肚子操心。

"团结"工会的各种组织现已经建立起。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人、各省领导机构和工厂委员会都要求证明，八月协议所承诺的全部条件都正在付诸实施。但是，与当局谈判达成的一切条件都是相互矛盾而又含糊不清的，同时又由于双方相互妥协使达成的条件大打折扣。因此，要实施谈判达成的协议是非常困难的。

我作为"团结"工会和政府间的中间人是个特别复杂的角色。我不能按照传统的观点把一方说成"正面"角色，把

另一方说成“反面”角色。双方的对话按照双方尊重的惯例进行，而对话的结果则决定于各自辩论的能力。使对话能够顺利进行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希望双方能够这样。双方对话过程中，我一般说的很少。我知道，谈判桌上的斗争要持续很长时间；既然我们最终赢得了一点参与经济决策和谈判的自由，我们就应该从谈判桌上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既然我们已经尝到我们所得东西的甜头，我们就不想再退回到过去。如果这个阶段终将结束（事实上也是如此），那么我要尽可能地多学一些民主知识、谈判艺术以及35年来对我们一直封闭的或我们自己从未接触过的领域的知识，直到最后一刻。

在这一阶段，为什么纯策略的考虑如此重要呢？为什么作为一个国家的波兰——这一点全世界看得十分明显——的利益没有压倒其它因素呢？因为实际上，我们国家过去几年爆发任何大规模冲突都没有产生具有鲜明态度的两大对立阵营。波兰多数人对其命运并不感到不满，急于扑灭动乱之火的政府也不想走极端，哪一方似乎都无意对局势做全面的分析。双方只是相互反感，彼此不信任，因而不能对国家的未来提出合理的建议。1980年8月，这种建议被首次提出来了，但波兰人还没有做好接受这个好消息的准备。一些人不愿听到它，多数人不理解它。在那些过高估计八月协议真实意义的人心里，这个协议激起了空中楼阁式的希望。这个消息好像是一条教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利益解释它——有人害怕丧失自己在人世间的财富，有些人为最终能够复仇而感到满足。这条消息也确实像一条教理，正如有些传道者不能理解耶稣的话一样，这条消息所包含的真理只能逐步地为波兰民族接受；人们要想接受它就必须逐渐成熟起来。

现在当我回首去看那时的当权者时，我没有任何仇恨或厌恶之感。当时有些当权者认为，他们自身的前途是与我们运动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几乎也是在这时，有些当权者则做出了危险的决定，这是我们很久以后才听说的。我们现在知道，副总理雅盖尔斯基在格但斯克协议签署前那段紧张期间一直坚持自己的建议。他仅有的支持者是以菲什巴赫和科沃杰伊斯基为代表的格但斯克当局；陪同他从华沙来的高级官员全都退出了谈判。这种姿态也许挽救了他们的政治生命。

不管他们怎样看待我们的运动，但那些在政府中担负最大责任的领导人为了阻碍我们的运动确实是不遗余力。有些政府官员只是快速露个面，便立刻消失了，他们好像被微风吹灭的小火苗。总理平科夫斯基就是这样的人物。他是这样一个演员，在演完一个简短而又令人厌烦的插曲之后便退出了舞台。

那个时期的主要人物是第一书记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1981年12月13日宣布实施军管时最后具体化了的观点和解决办法听起来不像是他作为当时政府里的一些高级干部试图在可能的范围内，帮助有关人员在八月协议中取得的成果具体化。他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我认为卡尼亚是其中之一。

尽管如此，我每次同卡尼亚谈判之后总感到失望。我对他没有很高的评价——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而是因为我们二人在我们讨论的任何问题上都没有取得重大成功。我们经常讨论“团结”工会使用新闻传播工具的问题；由于官方宣传工具，特别是电视的侮辱性腔调，我们这一要求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支持。我们还讨论教育、医疗、教师和医生的地位，以及要求实行根本改革的专业人员

阶层中的不满情绪等问题。但是，要使这些会谈取得成功，我们还需要两个有决策能力并具有贯彻有关决定权威的人。卡尼亚似乎是孤军作战；他神情紧张，会谈艰难地进行着。顺便提一下，所有政府领导人当时的态度是：他们在会谈开始时先要描绘一下当前总的形势，抱怨国家财力不足，还要忙着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这是他们每次会谈前必要说的开场白。我来到华沙，负责与政府就具体问题进行详细的会谈；在我们会谈的问题上，我被"团结"工会授权发言。会谈开始时，卡尼亚向我简要介绍了我同他一样清楚的当前局势，看不出他有半点解决我要解决的问题的意思，会谈于是便停止了。我们的讨论十分令人心灰意懒，这使我常常发火。我不会因一个政治领导人发觉自己陷入政治困境而对他感到怜悯，除非是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

1981年2月，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人事变动。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接替平科夫斯基担任波兰总理，并兼任自1968年以来一直担任的国访部长。在电视转播他担任总理之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多数人都觉得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我们注意到，他把波兰说得完美无缺。他那让深色眼镜部分遮住的毫无表情的脸，他那僵硬的身躯和立正的姿态都令人十分好奇。人们对他了解甚少，只知道他出身于一个庄园主的大家庭，1939年同全家一起被赶往苏联内地，在那儿他失去了父亲。他在斯大林大恐怖时期的生活经历似乎使他对生活像石头一样冷漠。

另一方面，这位将军讲话的语言却很出人意料：充满生气，完全不同于那种我们听惯了的声音。他首先办理的一件事情就是任命《政治家》月刊主编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

作为他的副手。拉科夫斯基多年来一直努力使自己成为欧洲的一个重要政治人物，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表面看起来，拉科夫斯基同当时掌权的领导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的任命激起了普遍的乐观情绪。

在任总理后的第一次演说中，雅鲁泽尔斯基呼吁"团结"工会与政府之间停战90天，同时提出一项旨在消除危机的10点纲领。拉科夫斯基几乎一上任，便立刻同"团结"工会开始了谈判。政府为防止发生全国性罢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热舒夫和乌斯齐基，政府与当地农民签署的一项结束农民抗议活动的协议。当局保证不侵犯农庄的权利；还解除了对买卖土地的限制，并对一系列违反个体农民利益的法律做了修改。当局许诺改进农庄设备的供应工作。当局还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工会组织，但这个计划从未得以实施。在上面提到的协议中，删去了"团结农会"一词；农民代表将建立一个国家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筹备建立农会的工作，但这个农会将采取何种形式仍然悬而未决。

在罗兹，政府也同罢课的学生达成妥协；学生当时要求有权建立一个像"团结"工会那样的学生自治组织。"团结"工会能保证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改革，学生自治组织则能保证大学生活的改革。大学生想把他们的学校变为纯学术性机构，摆脱政府的政治影响和政府对学生组织章程和纪律规则的干预。正是在罗兹，"独立学生联合会"（NZS）最终获得官方承认，但其他一系列问题还要等待进一步的谈判解决。虽然学生对政府处理他们要求的方式远非满意，但他们在"团结"工会的压力下答应尊重90天停战协议。

耶莱尼亚-古腊的根茨亚纳工厂的罢工也很快得以平息。那里的一所度假疗养院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最后被指定为公

众使用。

不管这些成果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但舆论认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已经表明了他的善良愿望，我们因此应该与他合作。

1981年2月18日，即雅鲁泽尔斯基出任总理一周之后，所有罢工都停止了。与此同时，政府颁布一项相当严厉地限制罢工的新法令。按照新法令，只有政府有权裁决罢工是否符合新法令规定的条件和罢工预定期限是否至少应7天的条例。如果罢工具备所规定的条件，工人将得到相当于他们一半工资的补偿；否则，他们就是非法罢工，将得不到任何补偿。

几天后，我从官方消息来源获悉，当局正继续利用法律程序反对"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某些成员。总理已经呼吁在恢复平静的气氛中努力工作三个月，但在暗中，一颗定时炸弹正发出嘀嘀嗒嗒的声响。

我们正目睹一股针对"团结"工会积极分子的新的复仇浪潮。罗兹发生了意外解雇工会成员和不指名攻击"保卫工人委员会"成员的事件；警察对"保卫工人委员会"领导成员和"团结"工会顾问实行严密的监视；在某些党的领导人的煽动下，一个名叫"格伦瓦尔德爱国联盟"的团体挑起了一场针对他们称为"反对派"分子的闹哄哄的运动，他们喊的完全是"反犹太人"的口号。各种指责不仅针对像库龙和米赫尼克这样一些1968年3月学生抗议的领导者，还指向了文化界像电影剧作家安杰伊·瓦伊达这样的著名人物。这股不能容忍的复仇浪潮唤起了人们对往事的痛苦回忆。它暴露出政府内部的严重分歧，并暗示某些类似斯大林时期的特别机构可能会在暗中施以决定性的作用。

拉科夫斯基和我这时正忙于会谈。他作为负责与工会谈

判的政府委员会的首脑；正处在赢得他自己选择的政治游戏的理想位置上。在我们会谈过程中，不久便清楚地显示出拉科夫斯基与“团结”工会交涉的用意只是在于使自己能登上高层权利的宝座，他利用向政治局提出我们的要求之机，正在想方设法为自己在政治局中捞到一个享有特权的地位。

但“团结”工会的特殊作用——它作为一个运动而独立存在——远不是拉科夫斯基最初想象的那样。即使我也不能对工会行为起决定性的影响，“团结工会”所追求的目标也远不是政府想要我们在现有秩序的框架内扮演的那种角色。对于拉科夫斯基，我可不是轻易就能对付得了的对手；我绝不会让自己被这种形式的谈判所击败。

然而，拉科夫斯基为我和雅鲁泽尔斯基成功地组织了一次会谈。当我听说这个消息时，我禁不住开玩笑地问，我是不是破格得到了提拔？（实际上，我一见到军服便肃然起敬，这已成了一种本能。）

1981年3月10日，在华沙中央人民政府办公楼总理办公室隔壁的一个房间里，我大吃一惊地发现我在军队服役时的指挥官瓦迪斯瓦夫·伊瓦涅茨上校就站在我的面前。

我钦佩这样的人，他们能事先把事情安排好，预见到一切情况，直至最小的细节。这次难以置信的会见也许正是这样安排的。伊瓦涅茨上校也许看过我的档案，了解我在军队服役时的表现；他也许是要唤起我对服役生活的回忆。我们的会谈证实他完全了解我的经历。

面对我以前的指挥官——他那时是中尉，我不禁想起过去的岁月，它们是那么遥远，那么与现在不同，但已经带有我这时思想的痕迹，好像我们二人都是受命运支配的。我所在的部队那时驻扎在科沙林的一座大兵营里，负责警卫那里

的至少十几个单位。当时发生的一件事，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所在的那个连队，有个和我一样的叫尤雷克的下士。他在巡逻时喝醉了，跌跌撞撞回到营地。这个人很有力气，手里还端着一挺机关枪。他向所有走进机枪射程内的人开枪，已经打倒了我们连队的 3 个人。因此，我们的排长问我能不能对付他。我当时说，如果不判他刑，我就去；他们可以把他关进营房，但不能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排长同意了我的要求，我于是向尤雷克走去，他站在练兵场当中，正与一大群士兵对峙。任何人只要走到他认为合适的地方，他就用手里的机关枪猛烈扫射——他的枪里装着实弹（对于巡逻的士兵，这是正常的事）。我走上前，警告他正给自己招惹严重的麻烦，非常温和地劝他放下武器，我愿意送他上床休息。他同意了。

除了这次事件外，我在部队的生活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我幸运地在获得射击比赛奖后离开了部队，被送进斯维耶别士官学校学习，九个月后，我重新回到原来的连队，当上了班长。我不注意部队的纪律，班上的战士没有给我带来什么麻烦。我用幽默和开玩笑的方式同他们来往，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只知道大喊大叫。我在连里教战士们学习摩尔斯电码，开设有关电气和无线电导航的训练班。我记得我们的将军曾授与我中尉军衔。当时他看了我好一阵，然后说道："我能想象老毕苏茨基就是你这副样子。"我已在上唇蓄了大胡子，看上去可能很像老毕苏茨基——我是这样想的。

我不想详细地讲述我与雅鲁泽尔斯基首次会见的情况。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会见的背景和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

雅鲁泽尔斯基的表情看上去相当焦虑。对他来说，同一个领导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地地道道的工人交锋是一种史

无前例的事情。我们会见时的气氛很难说是令人兴奋的，但在我们两人之间却有一种我与卡尼亚首次会见时所完全缺少的相互理解的情感。同卡尼亚的会谈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战斗，特别是因为我对他作为谈判对手没有一丝一毫的敬意。而我对雅鲁泽尔斯基却怀有一定的敬意，这完全不是因为他当时身穿军服的缘故。两个人谈话的腔调似乎也不同；卡尼亚说话呆板抽象，从这一点来讲，两个人可以说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谈到责任的问题。我服役不久便当上了下士，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雅鲁泽尔斯基完全了解我档案里的内容，并立刻说出了我当上班长的全部理由。我们每个人都多少谈了点我们担负的责任、当前存在的困难以及在当局与“团结”工会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必要性。我向他强调指出，“团结”工会既然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我们就绝不会退缩。

我们的谈话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似乎感到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一步；看来雅鲁泽尔斯基也相信这一点。但我们每个人无疑是在按各自的方式理解问题。对于我，这个起点是我们的目标与当权者的利益之间的一次妥协，是一条明智的中间道路，它能为所有人接受，并且为解决我们的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办法。另一方面，它只不过是战胜对手的希望而已。

如果一个人纵观一下波兰最近的历史，就会发现波兰曾不断出现表达人民愿望的民主领袖。但一段时期之后，他们便被当局争取了过去。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只能扮演当局让他扮演的角色。雅鲁泽尔斯基可能预见到在将来某个时候我会以议会发言人的身份出现。这种勃勃雄心无疑可以得到满足，但正是在这时我们的思想出现了分歧；我猜想，他没有理解我的这一信念，即我们1980年8月播下的种子最终会

结出丰硕的果实。

我自己对我的事业是信心十足的，但我从未想过要在这个制度中建立自己的威望，得到像太阳那样光辉照人的地位。如果我愿意这样做的话，那我本可以当上官方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然后再去政府中捞个大官当当。他们会同意给我个人任何东西；这是让持不同政见者保持沉默的老办法。1970年，他们曾对巴卢卡极力使用这种方法，在此以前的1956年，他们对戈兹齐克用的也是这一套。每一次，这些使政府感到头痛的人总是这样考虑问题："不管怎么说，如果我到他们那边去，还可以做些积极的工作。我还可以在内部起作用，否则，我就要彻底失败。

在另一次较为秘密的会晤中，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向我许诺说，如果政府实施任何会影响我的重大决定，他会提前几天前给我打招呼。这个许诺像其它许诺一样也没有兑现。

比得哥熙事件

我与雅鲁泽尔斯基的会见刚刚过去几天，便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表明双方的良好愿望多么容易地遭到挫折。即使我们能够成功地控制事件的发生，那也只是很有限的。

从广阔的角度来看，比得哥熙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一起日常发生的事件。但比得哥熙事件却反映了这一整个时期存在的分裂、政治混乱和各种内部矛盾。如果忽视真正的问题，它们就会以意想不到的戏剧性形式出现。

事件的起因是当局拒绝承认一个独立农会。农民向"团结工会"发出呼吁，非常合理地要求我们像以前他们支持我们那样支持他们。比得哥熙省的亲农会积极分子表现最为活跃，他们这些老战士仍然记得战前的农民自治团体的种种活

动。该省的政府委员会发表一项声明说，今后这个所谓的“农民促进联盟”的一切活动都将受其控制。

当时，为了在下一届省人民代表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比得哥熙省“团结工会”主席扬·鲁韦夫斯基与省当局进行了交涉。于是，独立农会合法化的要求便成了这次大会议事日程上的主要问题。与此同时，农民们已经停止干活，并占领了“联合农民运动”（一个政府支持的派别）当地机构的总部。当省人民代表会议最后召开时，会议出人意料地中断了。由鲁韦夫斯基领导的积极分子抗议当局中断会议的决定，并得到了许多代表的支持。此刻，危机出现了。负责主持大会的副省长命令警察把“团结”工会积极分子从会议大厅里赶了出去，鲁韦夫斯基和另外两人遭到毒打，被送往医院。

在比得哥熙省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前，有人曾告诉将出现挑衅行为。显然，当局打算挑起争端，激起我们做出鲁莽的事来。局势非常严峻，次日晚，“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团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

在波兰北方，华约国家此时正在举行军事演习。有人警告我们，随时都可能宣布实行军管。我们还了解到，当局已列出积极分子的黑名单，他们正在受到监视。围绕比得哥熙事件而引起的混乱不符合雅鲁泽尔斯基先前与我达成的谅解。我简直不相信，曾同我一起坐在谈判桌前的那些人竟会撕毁同我达成的协议。在政府内部，其它有影响的集团也许要在暗中用武力对我们进行报复，必要时甚至进行大屠杀。

我们没有准备战斗。我坚信我们的人民是有理智的；我一刻也没有想到过我们甚至会依靠外援进行武力对峙。我们手无寸铁，我们不想打仗。我们只是想继续走我们自己选择的道路。

安杰伊·策林斯基的回忆

瓦文萨已经把全国委员会成员召集起来;他很清楚,我们正面临自1980年8月以来最严重的冲突。他预料,目前的紧张形势很容易导致总罢工,他对委员会讲话的唯一目的是要延缓罢工的时间。他意识到目前的冲突可能以全国总罢工而开始。但如果找不到其他解决办法,他也准备同意罢工。“团结”工会再次面临“是死还是活”的挑战。瓦文萨有时也考虑别人的建议,采纳别人的意见,以便更好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时,他再次忙碌起来,时时保持警惕,好像一个战士。他赢得了所有人的选票,稳稳当当地再次当选为“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但大家对比得哥熙事件发生了激烈争吵,致使瓦文萨离座而起,摔门而去,因此触怒了全国委员会。莱赫似乎在争论中占了上风,但他付出的代价是对任何有关比得哥熙事件的具体决定都不能进行干预。接下来我们的议程是决定谁去华沙谈判以及谁留守格但斯克。当有人提名瓦文萨为谈判的一个代表时,雅采克·库龙立刻提议,不经全国委员会事先批准的协议,谈判代表都无权签署。我对雅采克这种态度的解释是他明确赞同举行全国总罢工——事实也是如此。瓦文萨尽管一肚子不高兴,也只好接受这个条件。

孔拉德·马鲁什奇克的回忆

3月下旬,我们正处在一场灾难的边缘。在我看来,另一个阵营已经做出自己的决定——武装部队在全国布

防的地点足以说明这一点。我们听到各种警告：波兰必须警惕；波兰绝不能成为第二个布达佩斯；绝不许回到1956年！在比得哥熙事件发生时，莱赫曾向鲁韦夫斯基提出明确警告："亚休，别陷入这场事件，它是一个陷阱，这非常明显！"可鲁韦夫斯基回答道："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莱赫从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愤然离去，把门使劲关上，结果使总罢工计划流产，只决定进行初步的警告性罢工（当时在场的绝大多数人最初都赞同立即实行总罢工）。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莱赫对事情的利害关系有很好的判断力，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他并且还意识到全面妥协、一味退让的危险。有些人凭直觉感到危险正降临到他们——他们自己和他们那个阶层——的头上，莱赫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工会领导人在1981年3月只能采取十分谨慎的政策，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3月被普遍认为是结束的开始。这种看法使扬·奥尔谢夫斯基把当时的局势同1863年反俄起义前的局势做了比较。

3月这个转折点是了解工会历史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正如格但斯克省工会委员会重新将瓦文萨当作运动领导人的决定肯定了他在1980年9月17日那次著名会议上对建立全国性工会组织所采取的极其谨慎的态度一样。瓦文萨在那次会议上指出，没有充分准备和事先筹划就建立中央工会组织只会导致内部纠纷。他在自己那个地区看到的纠纷已经够多了。

一个人如果不理解这次事件的意义，就很难理解莱赫当时对待同事的那种态度；这就如同不了解1981年3月发生的事情，就不可能理解工会内部后来发生的冲突

一样。

安杰伊·策林斯基

根本的问题是鲁韦夫斯基在比得哥熙事件中扮演的蛮干的角色。较早时，他曾有过一些胡乱的猜测，如人们想让他扮演默默无闻的角色，人们把事件的全部责任都推给了他。不管这看起来多么荒唐，但某些事实显然证实了这种猜测。

由于正面临一场极为损害国家政治局势的冲突，政府不能很快拿出人民希望解决问题的办法。要找到正确的对策还需要等一段时间。只有到那时，我们才或许有可能从政府的行动中得出结论，并根据我们对局势的分析采取行动。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就是一般性的指示也要等到局势稳定时才能下达，这样我们只能在暗中摸索。

全国委员会要在比得哥熙开会，立刻处理一切能处理的问题，甚至没有对政府——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手，在一定程度上是伙伴——面临的局势进行合理的分析，好像这是全国委员会最不忧虑的事情。瓦文萨完全意识到了这一切。他也知道，他的立场不同于他周围的人（全国委员会成员），不是由某一特定的事件决定的。在他以前处理过的无数事件中，这向来是他的王牌。

1981年 3 月，瓦文萨和库龙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尽管这次意见分歧没有导致公开的冲突。

在我看来，瓦文萨对一件事是深信不疑的，这就是，波兰不是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如果以为仅凭我们自己的努力就能使波兰的地位稍有变化，那纯属白日做梦。

瓦文萨在这个问题上从不表达自己的看法，从不使用上面这种语言，但我认为他的谨慎直接来自于这种认识。正是一个人的这种谨慎，总使他注意倾听“团结”工会不要鲁莽行事的劝告。

然而，在雅采克·库龙眼里，1981年3月是波兰必须决定其命运、两大阵营必须动员各自全部力量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库龙当时必定期望“团结”工会取得胜利。他仅仅是说，进步已不再可能，但现在我们有一个机会，不管这个机会多么微小，但我们可以同政府进行公开对抗；如果我们失去这个机会，我们将永远失去它。时间证明库龙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瓦文萨竭尽全力避免这种对抗。他认为修补这个制度的机会是有的；他希望，只要有时间，我们就可以重新确定我们国家共产党政府的各种思想。

米奇斯瓦夫·瓦霍夫斯基的回忆

我们在护送下离开比得哥熙前往华沙。有12辆汽车负责运送各省“团结”工会主席。我们在大白天开车全部打开车头灯。路上，我们遇见成串的挂苏联牌照的汽车：军事演习的规模正在扩大。我看到远处有一些运送干草的马车，就对马佐维耶茨基说：“看啊，培德乌什，这是他们在监狱里给我们准备的稻草，难受的时候还在后面呢！”

我想起西拉—诺维茨基事后说的一段难忘的话，他指出，1981年3月与同年12月之间的区别在于，12月之后，我们还可以接触一些囚犯，而在3月之后，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会再见到他们。顺便提一下，拉科

夫斯基在华沙说的更加直率，他当时对我们说:“你们以为我们扩大军事演习只是闹着玩吗？你们真是开玩笑！所有这一切都已进行好长一段时间了。”

我们所有人感到痛苦的时期现在开始了。我们距离如此渴望实现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但现在这条路似乎显得更加漫长了，究竟有多长，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只能沉重而缓慢地向黑暗隧洞的尽头走去。那是一个暗淡的前景。1980年8月那段好时光过后，一切都变得更加难以忍受了。今天当我回首往事时，仍然发现这段时间并非没有意义，甚至还有一种满足感。如果农民不种地，士兵不为他们的国家站岗，如果人们的想象力没有使他们认识到最后的威胁，那么，除了空洞的理论和抽象的词句我们就一无所有了。

河流的尽头

河流的尽头在哪里呢？现在它的水势很猛，不得不对它进行控制。为了利用河水的力量和开发它的巨大能量，需要采取理智的行动和某种计划。如果只是莫名其妙地害怕，而不去发挥我们的想象力，那会有什么用呢？是修建一座大坝控制河水，以便有可能利用其能量呢，还是干脆堵塞河道，引发淹没无数房屋田园的洪水泛滥？当然，最明智的办法还是修建大坝控制河水。今天回头看时，我们可以说，当汹涌的河水冲向大坝时，大坝断裂了：一部分河水流入地下，一部分河水绕过障碍，随意奔流，其余的河水仍在控制之下，流过大坝的水闸和河道。

1981年6月，政府有意发动了一场“制造动乱宣传战”。各商店外都排起了长队，实际上，商店里根本没有货物。一

名记者报道说：

1981年秋，医学教授在报告中说，波兰人正接近严重的蛋白不足。定量配给制已经以失败而告终。政府因在分配现有食品方面的失败而显示出它的无能；政府是由同一类人组成的，他们已经摧毁了波兰经济。定量配给卡结果证明只是没有用的破纸片。货物再也到达不了应去的地方了。

“团结”工会被迫尽可能地进行干预，试图恢复国家的元气，但经济改革只是纸上谈兵。举例来说，经理们老是没完没了地争论他们应该被任命呢，还是应由选举产生。自治观念是改革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反，政府却死抱着经理任命制不放。不论出于经济理由还是政治理由，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阻止开始经济改革的人进行工作，与此同时，“团结”工会则被谴责企图夺取政府的权力。

由于这股谴责之风全都来自一个喇叭筒，因此更具危险性。“团结”工会得不到新闻传播工具，只感到有口难辩。没有任何权威力量能够少许使两个阵营取得和解；红衣主教维辛斯基已经去世，教皇远在千里之外，雅鲁泽尔斯基也不是毕苏茨基。于是所有人的眼睛都转向了瓦文萨。

瓦文萨已经战胜了来自谈判双方的挑战；人们都知道他使自己摆脱困境的天赋。他亲手扑灭了多次火灾，指挥过几次灭火战斗，但对要求迅速改革的民众，他似乎太温和、太顺从、太仁慈了。对于每一个人，瓦文萨都尽力看到他人性的一面；当所有的人都已对副总理拉

科夫斯基深感失望时，他甚至仍然相信他的好意。“嗯，他是有点累了。”他就是这样原谅拉科夫斯基的傲慢态度的。当时，这种做法并不受欢迎。工会里的一些人以及自以为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对当前局势发表意见。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发起冲锋。在他们看来，波兰早应该仿效芬兰或南斯拉夫的榜样，或者同俄国达成暂时的妥协。当然，他们知道波兰的特殊地理位置，它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他们知道苏联的西部边界在易北河沿岸，而不是在奥得河或布格河。他们说，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才白天黑夜都注视火车不断从东方驶来，但没有看到对他们来说是不愉快的事情。他们不断谈论“走廊”。他们说，我们提供给俄国人军事基地，又提供给他们“走廊”，忘记了走廊的概念在历史上曾给波兰造成致命的后果。除了斯大林主义时期的经历外，他们对历史上那悲惨的一页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是在军事力量受到控制时期长大成人的。他们带着波兰人那种典型的骄傲坚持认为：“我们绝不会看到匈牙利或捷克的悲剧重演。”

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态下，“团结”工会于1981年9月至10月在格但斯克的奥利瓦体育中心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虽然瓦文萨对现实的看法与他们完全不同，但他再次被选为领导人之一；他得到了大多数人的选票，即使他的当选是为了把某种妥协与当局的最新名词“内部民主”联系起来。选举他的人也知道这一点。

在“团结”工会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我设想会议将讨论三个主要议题：工作计划，理论上讲，它将由专家们提供；

组织机构，这将由来到格但斯克的代表组成；以及实际行动——这第三个议题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以及如何与政府实现和解，使“团结”工会有可能作为独立的和不受党控制的群众性力量进入波兰政治舞台。

要想知道如何解决问题，首先需要了解具体的情况。代表大会期间，选举和提名主席团成员一事就说明了这一点。鲁韦夫斯基的提名勉强通过，但他最后还是失败了。一名工人自言自语说：“先生，你讲得好听，但对不起，我不认识你。只有那些和我们一块在一个车间干过10年、8年的人我们才了解。”另一名工人说：“他和我一样笨，没有什么鬼点子，也许连我都能骗过他！”还有一个工人说：“让这个聪明的家伙下去，我们知道他的观点是从什么人那儿来的。如果他们以前就认识，那他们可能背着我们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我认为这些情况是您必须要了解的；如果您来自社会底层，您就会明白这些，只有亲身经历工厂的生活才会知道实际情况。

问题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只想出风头，想飞得比实际更高。其中一些人确有要说的东西，也能很好地说出来了，但其他许多人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最时髦的东西是口号，为一点芝麻大的事便提出一个口号。

为避免大会只讨论和决定选举问题，我建议大会分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个阶段，我们只决定职务分配问题，而不讨论其他事情，这样有些人将没有机会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借以大肆炫耀。每个候选人先提交一份书面的个人简历和工作表现、他的计划、支持者名单等等，然后我们才表决。在第二个阶段，人们可以讨论计划，而不会受到任何人想在全国委员会或主席团得到职务这种企图的干扰，因为这时所有职务都已选好。这个程序不会阻碍任何人在其中

一个委员会得到职务，但判断他们胜任某个职务要根据其他标准，而不是根据他们是哪个团体或地区的代表。

不管你是否相信，总之，我的建议被认为是不民主的、是不利于我们的新运动的！

结果，大会的两个阶段自始至终给人一种乱哄哄的印象。在我看来，大会做出的决定和提议只具有理论价值，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考虑我们能否在波兰建立一个由政府、教会和"团结"工会三部分组成的制度。我在大会辩论期间和几次沉不住气的时候提出了这种观点。当我承认自己并不详细地了解发给大会成员的长篇纲领性建议时，有些人声称他们对此感到震惊。

在这次冗长乏味而又争吵不休的代表大会结束时，我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再次提出建立由政府、教会和"团结"工会三方面签署一项协议的看法。在1981年最后几个月（这是我们最紧张、最困难的几个月）举行的"三巨头"——雅鲁泽尔斯基、格莱姆普和瓦文萨——会议上曾正式提出过一项建议，按照这项建议，"团结"工会在三者中不具有一票的表决权，最多只能在"七票"表决权中有一票。根据一项建立"民族协商阵线"的计划草案，我们强大的"团结"工会只能同其他社会组织享受一样的权利。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有影响的强硬路线代表人物斯泰芬·奥尔晓夫斯基打碎了我要签署一项包括"团结"工会在内的协议的希望，他当时说："'民族协商阵线'这个组织是以'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和'民主运动'三方合作制为基础的。我们欢迎所有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社会力量都来支持这种合作。"

正像历史学家耶日·霍尔泽尔所说的那样，教会和“团结”工会都不是这个“阵线”的合作组织单位；它们只能批准按照党和党控制的团体制定的方针而起草的决议。

在“三巨头”会议的前几天，出现了疯狂反对“团结”工会的气氛。这种气氛首先出现在党中央全会上，接着出现在10月底议会举行的一次例会上。雅鲁泽尔斯基在党中央全会上谈到罢工已完全失去控制，有人发动仇恨国家的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和波兰的天然盟友。议会的报告则说，政府已向议会提出一项议案，要求赋予它特别权利，用以确保公民的安全和国家的利益。如果“团结”工会不遵守法律，不命令工人停止罢工，雅鲁泽尔斯基便要采取措施，使这项议案立刻生效。

“三巨头”会议是11月4日向外界公开的，这个消息一公布，立刻受到国外报刊的好评，记者们认为这次会议为将来创造了新的机会。从实际情况来看，局势显然与这种分析不符。然而，一些来自党内领导集团的消息确实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即他们似乎要用两个月的时间同“团结”工会达成一项协议，但“这项协议只能在政府能够控制全社会的前提下达成”。

这是一种错综复杂、很难进行正确分析的局势。美国人正通过他们在波兰有其金融利益的银行家间接地提出贷款条件。显然，宣布军管对波兰接受外国信贷援助是不利的；只有在波兰恢复正常的情况下，外国银行家才会在贷款方面提供援助。人们可以理解，在这种形势下，我不可能像已宣布的那样访问美国。如果在不实行军管的情况下我能如期访问美国，我将在大洋彼岸受到盛大的欢迎，然后像忏悔的浪子那样归来，带回巨额而可靠的信贷，以挽救波兰经济。如果

我在实行军管的情况下访问美国，即使受到光彩的欢迎，也不可能为外国贷款给波兰创造良好的前景。

当地的政治观察家认为，如果这次“三巨头”会议举行，它只具有历史意义，因此可以说，它是在其他一切可能都已消失的情况下召开的。我的一个合作者这样描述事情的经过：

> 11月4日下午，莱赫·瓦文萨受到红衣主教格莱姆普的欢迎。他们马上要与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会晤，后者不仅担任国防部长和总理的职务，而且自10月以来还是党的第一书记。从米奥多夫大街红衣主教住所到政府总部是要乘车的。但在离开主教住所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瓦文萨该不该乘坐红衣主教的汽车呢？实际上，一些人认为这样做很不得体，另一些人则认为没有必要再去注意几个月来人人皆知的“团结”工会与红衣主教的冷淡关系。瓦文萨最后还是乘了红衣主教的车。在教会最近的声明中，每个人都听得出教会不赞成“团结”工会“极端政治化”的倾向。但在一个你所接触到的一切都带有政治倾向的国家里，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人人都知道，红衣主教从未参与过全国委员会的辩论，在这个委员会里，有人竟和“团结”工会主席争夺去同雅鲁泽尔斯基举行会谈的权利。（“团结”工会主席是个知名人物，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讲话。我们经常请他向我们详细说明他对一切与我们有关的问题的立场！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我们，不能超越全国委员会！瓦文萨决不能独自行动！”瓦文萨的回答是：“那样的话，我打算召集一次新的代表大会，重新选举主席。”他对鲁韦夫斯基说：“扬，如果我的脑袋没有让他们砍掉，那么也许要被你砍

掉。”）

当瓦文萨随红衣主教走出汽车同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会面时，他似乎显得很紧张，将军则是一副殷勤好客的主人姿态。雅鲁泽尔斯基向他们表示欢迎，带他们走进一间私人会客室，然后关上房门。红衣主教的秘书布罗尼斯瓦夫·皮亚塞茨基神父同莱赫的助手米奇斯瓦夫·瓦霍夫斯基和雅鲁泽尔斯基的顾问维耶斯瓦夫·戈尔尼茨基一起在大厅里等候，戈尔尼茨基胳膊下夹着一份档案坐在那里。“三巨头”的会谈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大厅里等候的几个人极其自然地进行着漫无边际的轻松交谈。当那间私人会客室的房门再次打开、有人探出脑袋时，将军的顾问戈尔尼茨基猛地从座位上窜起来，迅速将档案递过去，然后又回到座位前坐下。

这次会见没有审议由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起草的一份关于建立“团结”工会与政府之间联系的建议。这项建议完全是工会同主教团协商的产物。雅鲁泽尔斯基早已确定了会谈的具体议程。他很有礼貌而又十分坚决地提出了他的最后要求：以“七分之一”表决权为基础加入“民族协商阵线”。欢迎是非常热情的，但除了以后再举行一次这种会谈的可能性外，会谈没有取得任何预期的进展。

瓦文萨显得很不愉快。记者们从他嘴里得不到一句话。他按照以往的习惯，独自离去，思考着这次会谈，想法找出积极的观点，从中得出对下次会谈有用的结论，他在脑子里分析着各种情况，思索着未来。正是在他的计划受阻时，他才再次活跃起来，出现在公众面前。

红衣主教格莱姆普准备飞往罗马，瓦文萨则返回格

但斯克。与此同时，全国委员会已经通过许多决议，准备为可能的社会联合建立基础。全国委员会一边提出毫无新东西的要求，一边威胁说，如果政府在三个月内不满足要求，它就按工会章程采取行动，包括举行总罢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把这些决议的含义解释为对刚刚举行过的一系列会谈精神的攻击。

瓦文萨刚一回到格但斯克，省长塔德乌什·菲什巴赫、耶日·科沃杰伊斯基和省党报总编辑塔德乌什·库塔便立刻来到圣·布里吉德教区，即扬科夫斯基神父的那个教区同他会面。根据雅鲁泽尔斯基的命令，他们劝说瓦文萨迅速采取行动，以解决这种不幸的争端。他们认为，工会主席也会因此恢复声誉。他们争辩说，全国委员会通过的决议给党的强硬路线派提供了武器。强硬路线派声称，与"团结"工会的会谈不再有任何用处，必须采取激进的和明确的态度。

在当局的三位代表说明这是他们维护政府与"团结"工会之间所有协议的最后努力时，这次在圣·布里吉德教区的夜间会晤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他们想要瓦文萨起草一个由当局和全国委员会联合签署的声明，改变一下全国委员会决议的调子。由于两面受夹，瓦文萨发现自己面临着异常困难的任务：他要被迫反对"团结"工会的最高领导机构。

红衣主教在去罗马之前已经获悉全国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他从罗马向瓦文萨发来电报说，他感谢瓦文萨"能够参加华沙的会谈"。然而突然而至的电报仍然令人迷惑不解。显然，在当前的局势下，瓦文萨本指望得到比这更为明确的支持。格但斯克当局也是欢迎这种支持的。

他们也许向罗马打了长途电话。但当时午夜已过，罗马方面没人回答。这一天将近黎明时，双方终于以下面的方式取得了一致意见:“‘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坚决认为，在同国家当局举行的一切谈判中，为了波兰社会的最高利益，全国委员会愿意，并将继续愿意做出让步与妥协。我们的工会一贯强调，它无权自称是全体波兰人民的唯一代表。全国委员会最近通过的决议显然与以上两个观点相左，不论怎样解释，这些决议都违背了格但斯克、什切青和亚斯特热别协议，都违背了我们工会的章程，而我们工会的章程是与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宗旨相一致的。”为使当局急需的这份公报能登在当天报纸的头版，双方取得一致意见之前，格但斯克各报已经停印。

这是瓦文萨第一次如此明确而又强有力地向他自己内部的强硬路线分子发出警告。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如果必要，他会与他们分道扬镳，以保住仅有的一线对话希望。

政府长期实行的冷战终于结出了果实。在工会内部，瓦文萨被指责放弃了“团结”工会纲领，而政府也谴责他没能控制住工会而丧失了工会发言人的全部信誉。政府的打算是什么呢？基本上来说，他们想要达到两个目的（他们对此曾一再重复）：瓦文萨应该把他认为的全部极端分子赶出“团结”工会；按照已确定好的原则，他应该使“团结”工会加入“民族协商阵线”。

“三巨头”会议是一个终点，它没有产生任何结果。然而这并不是说我没有注意到政府内部的争吵。直到12月12日，

政府中仍有人呼吁停止一切罢工。最后一次罢工——实际上是一次学生罢课——在琴希托霍瓦的亚斯纳　古腊教堂以神圣的弥撒而结束。我们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当局；我还告诉他们，解决罢工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建立代表双方的委员会：只有在所有调解的可能性都丧失之后，才会号召举行总罢工或地区性罢工。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省和每个企业。不经事先调解，将不会实施任何罢工，除非工会本身可能受到公开的进攻。

自从“团结”工会代表大会以来，我也参与了同所有被当局指明为“政治团体”的会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他们认为是容易引起争端的那些最重要的问题。

当局攻击工会任命“顾问”的做法。这种谴责是相当不公平的：专家们曾多次站出来干预和阻止工会内部激进势力的发展，但他们并未因此博得当局的欢心。在同政府会谈的过程中，我提议明确专家的地位，以便使他们有理由以工会代表的身分处理各种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履行普通公民的各项义务。

我还提出一整套类似的建议，其中一个主要建议是改变全国委员会的职能，当局对此不置可否。我请求得到一座楼房，让全国委员会搬进去，为的是让它同格但斯克省工会分开，这样可以使全国委员会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工会的各种问题。全国委员会应成为一种智囊性的机构，而不是充当那种保护人的角色。这个问题过了很长时间后才引起讨论；决定此事那时属于拉科夫斯基的职权范围。直到12月13日，即宣布军管的前夜，当局才给予肯定答复，把阿克文俱乐部交给全国委员会使用。

面对12月13日的军事行动，“团结”工会采取了低调门的

态度，这可能是代表大会期间对全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所做的调整的结果。由于这种调整，主席团不再是以政治上刺激政府的眼睛为特色的“人物”了。顺便提一下，我因建立了一个这样的主席团而受到谴责，但在困难的局势转变的时候，这样做决不是什么坏事。主席团成员现在都是些能干的人——他们尽管不是罢工领导人，但这些人都能胜任艰苦的工作。重要的是，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离去而把全国委员会搞垮。

在军管实施的最初几个小时里，我在华沙同军方和工会事务部长乔塞克会见时提出了我认为最紧迫的问题。但我感到时间正从我手中流逝。由于预见到自己在这条特殊的道路上已到达尽头，因此我开始思考要摆脱困境而必须做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按照类似政府提出的原则构思一个协议。根据我们所获得的经验，我认为，只要需要，我们就能继续干下去，并且能够避免1956年后工人委员会的遭遇和1970年后工人自治的遭遇重演。但有一天，我开始考虑工会合法存在的短短几个月中我们提出的全部建议，例如关于工会法、工人自治、书报检查制度等方面的建议，以及1980年8月提出的一系列要求。这些建议和要求是逐步成熟起来的。但是，当我们最后把这些建议提交当局时，便被窜改得面目全非，以致这些建议完全失去了实际意义。政府对改革毫无准备，怕得要命，这是我们的建议被大杀大砍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将这种修改过的建议付诸实施，允许越来越多检查，让我们的建议和要求越来越严重地被窜改，那么我们最终将与政府达成自取灭亡的默契。

第二件我必须要做的事是考虑政府即将发动攻击的可能

性。在政府发起攻击、进行大清洗的情况下，我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向“团结”工会领导班子和红衣主教提出辞职，让那些认为还有行动可能的人去干，要么挺身而出，去挽救还剩下的东西，并宣布“团结”工会将在我的保护下继续存在。

这些都是很难办的问题。以这种方式去考虑事情可能不合适，但我必须面对当前的局势。我不会同意第一种选择，即使我只有5%成功的机会我也不会这样做。有人劝我也不要按第二种选择去做。最后，我做了第三种选择，为此我在腊多姆发表了一次演说。这次著名的演说提到“不可避免的冲突”，这句话曾被波兰电台和电视台反复引用，以此证明“团结”工会正在鼓动人民准备打内战!

在各省“团结”工会主席在腊多姆开会的前一天晚上，乔塞克到我在华沙的下榻索莱茨旅馆来看我。他是个非常健谈的人，但这次我得到的印象却是，他似乎隐藏着某种动机，有意拖长谈话时间。事情果真是这样。当乔塞克被叫去听电话时，他在椅子上落下一个字条，上面简单地写着：“不惜一切要把瓦文萨拖在旅馆里！”

不久我们获悉，就在这次谈话进行期间，特别警察部队在坦克和直升飞机的支援下，对消防干部学校发动了一次惊人的攻击。当时有几百名学生正在罢课，抗议当局将学生划归内务部管辖的决定；这所学校在此以前一直是文职学校。我因预料到政府正准备在那里显示一下武力，曾打算抢在当局行动之前设法悄悄结束罢课。但有人却说瓦文萨不想结束这次罢课。

我那时确信，我们正目睹政府实施军管前的最后准备工作，我们刚刚看到的不过是武装进攻前的一次彩排；罢课已

被武力迅速镇压了，而我当时的行动受到限制，致使当局可以毫无阻碍地实施一项大规模的镇压计划。乔塞克曾来到我住的旅馆，让我哪儿也去不成。他粗心地留下一张纸条——或许他是有意这样做，想让我感到泄气，或是想吓住我，让我意识到他们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我。

下面我讲的已是很晚的事了。我选择了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可能，我从华沙来到腊多姆，与该省“团结”工会主席一起出席集会。我在这次集会上有意使用强烈的措词——为的是不使已经受到攻击的工会瓦解。这些话被当局断章取义地加以引用，被赋予不同的含义。

军管现在已经是势在必行了，当局为宣布军管而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找一种合适的借口。不论我们做什么，他们不久都会宣布军管，但他们还需要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我在腊多姆成了激进者中最激进的人，使自己溶化在会议厅的激烈气氛之中。很显然，如果我不做这次演讲，我在12月就不会被捕(我后来听说政府在腊多姆集会前发出了一项指示，大意是说不许逮捕我）。但我那时如果不去演讲，我就会背叛出席集会的全体代表，使自己显得对“团结”工会的未来无能为力：像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双臂抱在胸前，作个旁观者，而这正是政府高兴看到的。

我放弃了以前的想法，俯下身子，不顾一切地向前猛冲。如果在以前，我可能会反对代表们的那种激烈情绪，但在做最后的分析时我已别无选择。在公众眼里，如果工会运动在这种危急时刻陷于分裂而削弱，那么人们就会纷纷对我进行谴责。如果半个多世纪以来波兰最有希望的观念消失了，那这将是我的责任。如果我一言不发地解散集会，那么许多代表就会立即被捕入狱（后来军管期间，许多代表仍然没有逃

脱入狱的劫难），而我也只是一个失败事业的无能鼓动者——一个分裂的而不是团结的鼓动者。

我们已经失败了吗？如果仅凭我们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以武力对付武力这一点作为标准来判断成功与失败，那么我只能回答说："是的，我们失败了。"虽然在这500天里我们创造了一个有选择机会的社会，整个波兰从长期的睡梦中已经醒来，但是我们还是失败了。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房子的主人；房子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属于我们的，但我们再次沦落为贫民，而掌握权势的人重新占有了我们的房子。人民已经尝到了自由——它曾经是波兰全部希望的基石——的甜头，我们现在必须等待时机。

第八章 军 管

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以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角色出现在国家舞台上。前天夜里当局已宣布实施军管；这样，以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和其他地方谈判达成的协议为开端的工会与政府之间的对话时期也就随之宣告结束。

军管状态最初并不具有任何特定的政治形态，似乎像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实施军管的全部意义只是后来才显现出来，并超出所有人的意料。军管的后果不仅仅限于政治方面：它导致了一场巨大的变动，使社会和个人生活彻底陷入混乱，并使人们对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表示怀疑。

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我们现在可以更客观地来评价当时的局势。像“团结”工会这样的运动决敌不过政府为使波兰公民就范而采取的强硬措施，这种说法也许是正确的。我们陷入了一种内战状态，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对话的波兰”已经结束，“战争的波兰”现已开始。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看来是个既精明又有条理的幕后导演：宣布军管之前发生的各种事件造成了一种使人们普遍认为军管势在必行的气氛。希望和热情的岁月已经过去。曾激励我们社会的巨大活力注定在挫折中消退。未来的前景显得暗淡无光。

商店无货可卖，门前的队越排越长。那些最基本的消费品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短缺。“总发货人”好像锁上办公室度假

去了，一直要等到另行通知才能发货。官方的宣传暗示，"团结"工会对造成这种形势应负全部责任。但根据我所得到的消息，也许仓库里储存着大量生活基本必需品，多得几乎盛不下。

当人们问我这个问题时，我总是回答说："我们走着瞧吧，过去一个月，对我有利的局势就近一个月。"但就目前来讲，还没有任何与当局和好以及恢复对话的机会。工会的特征和生存依赖于对话——这曾经是工会的力量所在。

许多当权者颇喜欢使用强权，声称有必要"施加压力，把'团结'工会领导人投进监牢，使他们的组织分裂，让他们在自己内部争吵不休。"相对说来这些强硬路线派分子组织得还不错，而党和政府中的"自由派"已经走失阵地。那些一直持观望态度的人在宣布军管前好几个月就已闻到风声，开始躲避起来；他们逃跑了。

当华沙的警察忙着为一次国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做准备时，"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在格但斯克正进行着历时两天的辩论会。

到午夜时，除了休息时间对在场记者做些解释外，我还没有在会上发言。我竭力要澄清"对抗"一词的含义，我在腊多姆演讲时曾使用过这个词，而官方宣传机构对此做出错误的解释，因此我在会上说："当我们谈到对抗时，指的是我们在辩论中的对抗。我们没有可以调遣的军事力量，我们也不打算使用这种力量。我们没有坦克，也不想要什么坦克。即使我的话听起来很生硬，但要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进行的是非暴力的斗争。要让当局考虑我们的打算，不歪曲我们说过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证明我们的动机是

正直无私的。”

在下午6点休会前不久，我曾给省长打电话，询问格但斯克附近军队的集结情况以及斯伍普斯克、什奇特诺和什切青方面民警的调动情况。他告诉我，他不知道军队部署的情况。他在向有关当局询问时被告知，三联城地区正在进行一次代号为“墙”的大规模攻击行动。按官方的正式说法，“墙”行动包括对建筑物集中地带附近的空地进行全面搜查，并检查流氓小偷常去的地方——这是当局实施的一次只有警察参加的行动。我在格但斯克的助手孔拉德·马鲁什奇克在那天夜里稍晚时从民警司令那里得到了同样的答复。马鲁什奇克当时问道：“你们对‘团结’工会搞什么‘墙’的行动了吗？”但却没有回答。

午夜刚过，一封交给我的电报说：“所有电话和电报通讯都已中断。”

此时，我宣布会议结束。5分钟后，会议室里便没有人了。外面正下着雪，在通往造船厂大门的路上，两旁的路灯发出昏黄色的光，雪花在灯光的映射下一闪一闪的。在回家的路上，下起了大雪。一切都沉浸在寂静之中。

我知道我们的运动目前已经停止。我必须像承认比赛规则那样承认这一点。当你的对手发起进攻时，你必须知道如何退却，审时度势，保持士气，用全部力量对付以后的事情。惊慌失措的应战比按兵不动更糟。

在“团结”工会合法存在的那段时期，它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争取时间解决问题：多争取一个月是好的，多争取一个星期也是好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最终使“团结”工会存在了下来。他们不是从一开始就想摧毁我们的运动吗？

1980年8月，在造船厂的气氛最紧张的那一天，我们全都预料部队会随时从海上登陆（这是签署协议之前）。当时一名亲临造船厂的保安警察高级官员告诉一名西方记者，他自1967年以来一直注视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因为这样做有助于理解自己的职业利益所在：

> 我一向严格执行上级分配给我的任务。人们所称的“政治上的异端”实际上只是个观点问题。它同报刊、作家和宣传有关，而同保安部队无关。我还是要在保安部门工作。另外，我是一名党员，我选择这种职业是为了同那些真正要“改变”这个国家的性质的间谍做斗争。

接着，他开始对局势在短时期内将如何发展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在他看来：

> 除掌权者外，国家的所有政治力量都期待着协议的签署。协议签署之后，执行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那些对真正民主无任何要求的派别将利用这些协议满足自己的计划。他们很快将削弱人民的士气以致公共舆论要求一个铁腕人物掌权，那时这个人将以“波兰的戴高乐”的面目出现。

我们当时自问这个“波兰的戴高乐”会是谁。当卡尼亚不久被任命为第一书记时，我们对这个问题就更加好奇了。

那名西方记者把他同警察官员谈话的录音送给我们，我们又复制了一盒。在宣布军管前的整整一年里，警察和政府官

员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这显然不是哪个孤独狂人的发明。

那天夜里，我家的门铃一直响个不停。第一批来访者是在大约凌晨一点来的，他们是“波兰青年运动”的成员，说他们的一些朋友已经被捕。隔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告诉我城里正发生的事情，并征求我的意见。我把讲给我妻子的话告诉了他们：我们必须耐心等到天明，因为这时很难对局势进行估计。我还听说，我的司机也已经被捕，他的妻子在一名《团结周刊》记者的陪同下来找我们。达奴塔尽一切可能安慰她。“别担心，马任卡，”她说道，“他们抓莱赫那么多次，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使我感到害怕的了。你瞧，我们都还在这儿，你不会出什么事的。”

宣布军管也使格但斯克当局大吃一惊。负责那天夜里行动的军事人员对行动严格保密。省长科沃杰伊斯基被已开始实行军管的通知惊醒；接着，这个消息又传到了格但斯克省委第一书记菲什巴赫那里。他们二人的普通电话像全国其他地区的普通电话一样均已不通，但菲什巴赫家的一条直通党中央的电话仍然畅通。他们叫通华沙的电话，先和巴尔齐科夫斯基，然后又和拉科夫斯基通了话，后二人证实军管法已经开始，并告诉他们的当务之急是要说服我无条件地去华沙同政府谈判。华沙这二人说明，这一决定是由雅鲁泽尔斯基做出的，他正等着亲自和我讲话。

菲什巴赫与科沃杰伊斯基一起驱车来到扎斯帕区我的住所，他们发现皮洛托夫大街的公寓大楼已被民警团团包围。这二名政府特使走进房门时便开始同我们讲话；一进屋，他们立刻传达了要我去华沙按当局的建议同雅鲁泽尔斯基进行谈判的口信。

我当时指出，在所有被捕的人没有释放之前我拒绝考虑

他们的建议。这二人于是离开我家，去用他们的直线电话向党中央汇报我的答复。与此同时，一支手拿铁棍的“防暴部队”开到我住的大楼前面，要求进入大楼，经交涉，他们同意等到菲什巴赫和科沃杰伊斯基来时再说。这两个政府官员在“特别”部队的一个主要指挥官的陪同下于大约凌晨3点钟返回皮洛托夫大街。当科沃杰伊斯基告诉我最好是主动到华沙去，免得被强迫拖去时，我意识到已别无办法。“在那儿不会停留太长时间的”，省长接着说道。“如果有助于使您平安返回，我高兴地愿意同您一同前往”。

“先生，我看您还是回家为好”，我回答说。“我觉得您在一些问题上改变了自己原先的看法。军管不是那种只实行18小时或1个月的东西。没有什么事情比军管更严重的了，我认为军管将持续很长时间。我一会儿就走，我要等我妻子给我收拾点行李。”

塔德乌什·菲什巴赫也许对形势知道得更清楚。他几乎什么都没说，也很少建议什么。我有一种印象，他几乎被突然发生的事情吓呆了。最后，我向他们二人道了晚安：“先生们，我要一个人去了。你们回家去吧！你们有自己要办的事。”

我总是注意人们的态度、说话方式和眼前局势总的方面。我记得人们所说的一切，在这方面我妻子更注意那些常常证明有特殊意义的细节。下面是她在12月那个不寻常的夜晚注意到的事情：

达奴塔的回忆

凌晨3点钟，门口来了很多人，我起来去看是谁。莱赫还在床上睡着。来人是菲什巴赫和科沃杰伊斯基。他们想找我丈夫讲话，说明雅鲁泽尔斯基愿意请他去讨

论局势。莱赫气愤地回答说，现在还空聊什么？我们不再谈了。然后我同他们二人讲起来。“先生们，你们知道外面正在抓人吗?”菲什巴赫说他不知道。莱赫说道：“那好，只要释放全部被抓的人我就去谈判！”我们的两位客人于是回去汇报莱赫去华沙的条件。

5分钟后，门铃又响了。我从房门上的猫眼里看到5个警察和3个穿便装的人。他们手里拿着铁棍子，这种铁棍子是用来撬门的。他们要我让他们进去，说他们是来抓我丈夫的。我拒绝开门，他们便在门外等了大约1个小时，一直等到省里的两位领导来到。我请菲什巴赫和省长以及随他们一起来的警察进到屋里。莱赫这时已在穿衣服了。一个官员和我待在门厅里，其他人和莱赫一起走进厨房。他始终镇静自若，为的是不使我感到害怕。我那时正怀孕。他们告诉我的一切就是，莱赫必须去参加一个谈判。5点30分，他下楼上了汽车。

9点钟，两名官员再次来到，告诉我莱赫已经到达华沙，他与乔塞克（工会事务部长）见了面，还要在那天较晚时同雅鲁泽尔斯基会见。他们问我有什么困难，并答应帮助我。两个人看上去很紧张，而且垂头丧气。菲什巴赫甚至连帽子也忘在厨房里了。科沃杰伊斯基当时一只脚穿着棕色袜子，另一只脚却穿着黑色袜子。他们似乎被所发生的事情弄懵了；他们显然事前没有得到通知。记得我当时认为，我丈夫同他们一直处得不错，既使在形势很困难的时候也是这样。

星期日下午大约6点钟，我在省长家里和莱赫通了电话。“他们真的干了，军管可能持续一年，”他告诉我。

“他们要留你很长时间吗?”我问他。“我不知道。但军管法——至少要持续一年。”

外国政府对此有什么反应呢?根据我后来听到的消息说,宣布实行军管使世界各国政府全都大吃一惊。难以置信的是,在当今有着间谍卫星和极尖端信息系统的时代,这次使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欧洲国家陷于瘫痪的突然行动竟能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得以计划和实施。但这正是实际所发生的事情。

从理论上说,这次行动纯属一次内部行动,但实际上,苏联的部队为避免波兰的反抗转变为暴力还是做好了随时出动的准备。有些人担心现在是否可能爆发一场流血起义。但这只是格但斯克1980年那次危急时的情况,正象杨·穆尔在巴黎出版的地下刊物《囚犯》上所写的那样:

> 12月13日,电台广播了许多官方声明;从中午起,电视台也开始播放这些声明。播音员宣读了国务委员会发表的公告、实施军管法的通告和所有的补充规定,如实行宵禁、暂停旅行、中断所有电话和电报的通讯联系、禁止言论自由、暂停一切报刊的出版、减少电台电视台的节目、大中学校停课、强制公民向军队捐款、对许多企业和民防机构实行军事化管理、暂停所有学生组织的活动以及冻结银行全部存款,等等。
>
> 这种广播持续了一整天。人们开始明白目前发生的事情。他们意识到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已被剥夺了一切权利,那已经向这个国家宣战的人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
>
> 在当地工会总部门前聚集了一大群人,有个年轻人

在楼顶升起“团结”工会的会旗。两个身穿夹克衫、佩戴臂章的青年人正在用一句话回答所有人的问题：“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请大家不要在此停留。”大门前的人群使我们想起了1980年8月的情景。喇叭正广播着大楼里的声明：“我们预料军队就要到来——请大家不要停留在大门前。妇女和儿童应回到家里去。”人们开始叫道：乌鸦，乌鸦。这个词在波兰语里与“救国军事委员会”——该组织被用来使雅鲁泽尔斯基政府合法化——这一名称的缩写形式（WRON）同音。几天后，人们唱起了德国占领时期流传的一支古老歌曲，但添上了新词：“在这个月可怕的13日，乌鸦钻出了红色的壳……”

三联城的居民受到了可怕的打击，但比起“团结”工会积极分子遭受的打击来便显得微不足道了。当时没有人料到这种事情。他们开始问自己：“我们怎么会让人们对这一突然事件毫无准备呢？运动领导人对此有错吗？”

实际情况是，工会曾制订过一项特别计划，但只在议会投票赞成赋予政府特别权力的情况下适用。我们的计划原打算用以对付议会所采取的公开威胁公民权利和工人权利的法律行为，而不是针对这种阴险的背叛行为。我原以为如果发生这种事情，那将是议会所为，而不会是军队和民警。我们认为，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公开宣布的法律，而不会是张贴在墙上的新闻公报和声明。

没有可以浪费的时间，我们在造船厂设立了一个当地罢工委员会的临时办公室。每个人既紧张又沮丧，我们获悉附近地区集结了大批民警。我们因不能与全国罢工委员会成员取得联系，于是决定尽可能地自己组织自己。

在一楼的一个房间里为委员会设了一个备有茶水和三明治的小卖部。尽管天气严寒刺骨，但仍有1000多人等在外面。每当看见民警的汽车从造船厂前经过时，这1000多人便尖声叫喊起来。1980年8月我曾经历过这种神经战，此刻我们并不为此担忧。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莱赫没能同我们在一起。

我们听说计划在那天晚上6点举行一次有全国罢工委员会、格但斯克省罢工委员会和造船厂罢工委员会成员参加的会议；我们大约100多人正在等候，罢工领导人出现了。当达奴塔·瓦文萨和扬科夫斯基神父来到时，人群一下子骚动起来，会议主席把话筒递给扬科夫斯基神父，神父告诉我们，他已经同被留在华沙的瓦文萨谈过话。"他请你们等着他的决定，"神父说道。"他将在今晚或明早同政府代表会谈。"

接着，一个人站起来喊道："为什么要等？工会不是有章程和规定吗？有的！'团结'工会领导人被捕了吗？他们被捕了！因此，对于这一切的唯一回答就是——总罢工！"

瓦文萨夫人开始发言。"我也和莱赫通过话。他的士气同往常一样高，他不会屈服的。他在精神上是同你们在一起的。他请你们不要做出鲁莽的决定。"

有个人高喊道："工会不是瓦文萨一个人的！我们必须按我们自己的章程行动！"

一个站在他旁边的码头工人气得脸色通红："你是说瓦文萨不是工会吗？"

看来就要发生一场格斗时，瓦文萨夫人进行了干预。"你们要冷静下来！莱赫要在华沙同他们谈的，你们应该

想一想他要你们做什么，你们知道做什么吗？我作为一名妇女，像你们的妻子和母亲那样向你们讲话。我们必须避免一场真正的悲剧！”

又有一个人喊道：“对暴力和专制的唯一回答就是罢工！”

扬科夫斯基神父再次呼吁大家暂时不要做出任何决定。他讲话时数次被打断。人们喊出了他们的愤怒。他不得不停止讲话。扬科夫斯基神父最后对全国罢工委员会成员简短地讲了几句话之后，就和瓦文萨夫人一起离开了会场；临走时他说，一得到华沙方面的消息就立即回来。

他们走以后，有人建议对举行总罢工进行表决，但人们不再想听到“表决”这个词了——决定已经做出。全国委员会有权就它关心的问题做出任何决定，每个人都想要立刻行动。

造船厂工人决定在船厂过夜，而其他人都回了自己家。有十几个商业方面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表示赞成举行总罢工；会议一结束，他们必须一个一个地溜出去，借助人多的有利条件避免被捕。

我们决定第二天把所有上班的工人动员起来举行一次罢工，占领各自的厂区。三联城地区的所有工厂到时候都要挂上红白两色的国旗，以抗议当局强制实行军管和逮捕“团结”工会领导人及其顾问。我们派出通讯员传播这个消息，市民开始走出家门。现在我们必须决定，一旦民警在夜间冲进船厂，我们要做哪些事情。经过一番讨论，我们决定进行消极抵抗：“软弱的地方也是我们最强大的地方，我们要用满腔热血和赤手空拳同坦克和

警棍相对抗。”我们停止开会高唱国歌。

大约7点钟，造船厂门前仍然围着一大群人；红白两色的国旗和花束耀人眼目。格但斯克在工人的保护下再次显得岿然不动，但目前的局势远远不同于1980年8月了。现在的普遍情绪是悲观而不稳定——人们都想念着一个人。

人们看得非常清楚，某些罢工领导人缺乏经验、优柔寡断。他们怎么能控制住船厂里那么多紧张而愤怒的工人呢？我们开会的有150人，而聚集在船厂门前的人大约是这个数字的10倍。他们那种既悲伤而又焦虑的表情说出了他们心中的一切；他们不相信工人的抗议会再次取得胜利。

离宵禁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在造船厂不远处的建筑物墙根下有人影在不断晃动，好像正有小股小股的民警潜入造船厂为一次大的行动进行准备。

我们离开开会的房间，到一个车间里过夜，我们有的躺在长凳上，有的躺在地上，尽量挨近散热器。寒冷的气温使我们想到8月份早已过去。我们知道，现在是12月的一个漆黑之夜。

午夜后不久，从二号门跑来的通讯员给我们带来一个坏消息：民警已进入造船厂。他们逮捕了守卫大门的8个年轻工人，撕碎国旗和花束，还在船厂抓走了几个倒霉的工人。我们立刻跑上二层楼躲起来；天亮以前，我们一直待在那里，没有受到骚扰。

早晨大约6点钟，我们走出车间，发现工厂前门的各种装饰均被拿走，大门大开。工人们开始陆续到来，我们以有些恐慌的眼神相互对视着。

"我们在罢工吗？"

"当然了！这是总罢工！"

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我们周围。

"如果我们是在罢工，我们就必须好好干！"一名工人坚决地说。"把大门关上，给我旗子！"

工人们把事先准备好的红白两色旗拿出来。人们不断提出各种问题："询问处在哪儿？谁在领导罢工？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我们很难回答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一件事：已经号召进行罢工，罢工要一直坚持到莱赫、全国委员会和所有被捕的人都来到造船厂和我们在一起时为止。

当所有这一切正在进行时我却在华沙。民警曾开车把我从家里送到机场，一架飞机正等在那里。黎明时，我来到首都郊外黑利策的一所别墅，这所别墅原是党中央前书记卢卡谢维奇住的地方。

最初的会见简直就是拘留我的序曲。在场的人有斯坦尼斯瓦夫·乔塞克部长和几位我不知道姓名的将军。他们的态度似乎由于歉意而感到有些窘迫："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我遇到麻烦因而拖延我的计划时，我总是对遇到的问题耐心地加以解决；然而当涉及一场旨在改变社会基本秩序的运动时，一个人早一年达到目的和晚几年达到目的没有多大差别。

蹲大狱使一个人脱离日常生活和全部责任，特别是消除了想要行动的需要。监狱和我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团

结”工会兴盛时期，形势急速地发展，我常常开玩笑说，我真正需要的是48小时监禁，好好睡一觉，恢复一下体力。从一开始我就是这样看待这次对我的拘留的：当作休息和睡觉的机会——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用以消除自“团结”工会获得合法地位以来一直伴随我的极度的疲劳和紧张。

当卫兵告诉我副总理拉科夫斯基早就来了、正等着和我谈话时，我是处在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我由于还未完全清醒，因此以为卫兵说的是“马可夫斯基”。这个名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所以我咆哮地说：“把他扔到楼下去，我不和他谈话！”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把我说的话原封不动地向拉科夫斯基副总理作了重复，但我记得在我完全清醒后有人对我说：“瓦文萨先生，拉科夫斯基离开时曾大发雷霆。他狠命地摔门，差点把门的合页震掉！”

处于监禁下的我，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我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拉科夫斯基后来又来过一次，同他的辩论把我搞得晕头转向、精疲力尽，他把一切责任统统扣在我头上。拉科夫斯基无疑是经他的上司的授意来找我谈话的。

这件事之后他们改变了主意，允许我的司机米奇斯瓦夫·瓦霍夫斯基像个随从副官那样来陪伴我。他们曾把瓦霍夫斯基关押在斯特热布利内克监狱，10小时后又释放了他，他获得了行动自由。后来，以半官方的身分帮助我的妻子。

我在黑利策的那座别墅开始了监禁生活，这种情况要持续一年。我的房门外没有一名必不可少的警察；厨房的那些人在楼下为我们几个人做饭炒菜。来这里两天后，我获准接待了两名主教团的代表。达奴塔获准在第三天来这里看我。

达奴塔的回忆

我在星期三去看我丈夫。坦白地说，他似乎很乐意被关在那儿；他告诉我他正在休息。我当时心烦意乱、情绪沮丧，可他却说我们必须以此为荣，因为即使是在这种处境下，我们仍然占有优势：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正在创造历史。他还告诉我，在被监禁的第一天，当局曾要求他在电视上露面，以安定人心，但他拒绝了。

当他们把他转移到奥特沃茨克时，我被告知可以去那儿看他，我听到传言说有人会在路上绑架我，我因此把孩子们也带上。我吃惊地发现莱赫有一台短波无线电收音机，用来收听西方的波兰语广播。他经常收听自由欧洲之声、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以及其他能收到的电台的广播；他常常弄得守卫们烦躁不安，他刚听一会儿，他们便扬言要砸掉收音机。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我知道莱赫摆弄收音机时声音很大。那种噪音简直要把你的脑袋炸裂。一个卫兵抱怨说，他因此患了周期性偏头痛。莱赫整天地坐在收音机旁，不停地鼓捣旋钮。

我同乔塞克会谈的意图从一开始就是模糊不清的，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当局始终认为“团结”工会没有我就不能生存，但同时他们又提出种种使“团结”工会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继续生存的方案。由乔塞克代表的官方路线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一点：我们必须把当局认为是政治敌人的那些成员开除出去。这些“敌人”的名单最初只包括1980年8月罢工期间参加到我们中间的“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员，现在又加上了所有参与“团结”工会领导工作的人。在这份名单的前面是参加“团结”工会运动的全部顾问和专家的名字。

在最初的会谈中，他们从没有谈起过我处在什么地位。据我所知，我还没有受到正式的谴责。他们似乎把我看成了一个重要政治人物；由于实行军管引起了困难，因此他们必须把我同外界隔开。

此后不久，我被转移到奥特沃茨克的一所与外界隔绝的别墅里，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以前曾住在这里，他当时曾受到严密监视。我把这看作是吉祥的标志，因为1956年10月哥穆尔卡正是从这座别墅胜利地重新返回政治舞台的。

此间，我听说西里西亚的武耶克煤矿的工人占领了矿井，军队已奉命去那里对付急剧变化的局势。我在被捕后曾建议当局允许武耶克的矿工返回地面上来，几天后我又提过一次，但都被当局有意驳回。12月16日，警察向矿工开枪，当场打死数人。新领导人需要这次流血，以向他们自己和公众证明他们决不后退。他们毫无顾忌地对我说："瓦文萨先生，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害怕流血。"对此我不能否认。

使工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继续存在的看法，在我同乔塞克最初的会谈中一直是反复争论的问题。显然，"团结"工会只能在严格的约束下发挥作用。自1981年初开始，当局总是同我纠缠，企图让我把某些人排除在运动之外，我也曾同当局想要我处理的那些人谈过这个问题。我对他们说，我早晚要面对这样的选择："要么'团结'工会继续存在下去，要么赶走你或他，甚至赶走一批人。"当然，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我们不会受骗，也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除了羞辱和丧失信心以外，我们的牺牲能为"团结"工会和作为领导人的我带来任何东西。我不可能像政府要求的那样抛弃任何人。我完全能够责备某个人，或者亲自把他打发走，但我决不会允许

政府把他赶走，因为他曾和我一起工作过。来访的政府官员总是指着名单说:“这个人可以留下，那个人不行，他是叛国者”。我于是回答:“先生们，请你们拿出证据来，然后我们再做决定。”接着他们只好说:“你是一个政治家，但毕竟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因为你不知道如何为了重要的事情而在小事情上做出牺牲。”

我接着回答道：“我不会那样理解牺牲。我不能让任何人在不知道其原因的情况下做出牺牲，我不那样看待政治。”

“这正是我们一直所说的——你不是真正的政治家。我们给你分配任务简直是浪费时间！”

当局尽管说不再给我“分配任务”，但实际上仍在这样做。哥穆尔卡原来的这座别墅坐落在一片森林的中央，并不怎么适合我的大家庭的需要。当孩子们和达奴塔到来时，他们感到好像来到专为好静的同志准备的度假疗养所。当我被转移到奥特沃茨克的布拉尼茨基宫时，可能是想把我和我的一家人安置在那儿两年左右，由当局支付一切费用。孩子们将得到所需要的一切，包括请家庭教师单独授课。正像西方报纸当时刊登的照片明确显示的那样，布拉尼茨基宫是一座建筑的瑰宝。有传言说，有人曾试图把我救出去，然而布拉尼茨基宫是一座进不去的城堡，四周有一条护城河环绕，外面有军队守卫，里面有保安部队巡逻。尽管他们警告我四处都是警犬，但我从没有放弃过逃跑的念头。

囚禁我的地方与其他宫殿建筑彼此隔开，保管人员可以继续干自己的修复工作。我几次试着同他们接触，或是通过我住室的窗子扔给他们一把钥匙，或是抛过去我的戒指但都没有成功。站在这个窗前，可以看到枝叶茂盛的花园的一角。

下午做完白天的工作之后，我被允许去钓鱼。西方报纸刊登的一张照片显示出我似乎营养良好，坐在护城河边卷成包的大衣上专心垂钓。这张照片与大多数人想象的我被拘留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人们的误解不仅限于这一点。瓦文萨被造船厂工人举在肩上，瓦文萨站在会议厅里向人群讲话，瓦文萨被他的顾问簇拥着——所有这些人人皆知的情景表明我总是处在人群的中心。许多人，包括我妻子在内，都认为我目前的隔离生活对我是个沉重的负担，甚至比同其他囚犯一起关押在残酷监狱里的生活还要难以忍受。

正是我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团结”工会必胜的信念帮我渡过了这一时期。应该承认，我在心灵上是个孤独的人。无论做什么，我总是按照自己的决定去做，尽管同别人交谈以及聆听别人的意见对我是重要的，就像凡在有人的地方我就应该学习我能学习的东西对我是重要的一样。

我有很多事情要思考。我想到了将来，想到了不久前那些发生过的事情。几年来，我第一次真正有时间来思考了。

当然，“他们”也常常来这里说明他们对各种事情的看法，如运动为什么失败等等。我并不以“团结”工会领导人的身分回答他们，而是向他们讲述我个人的看法。我对他们说，只有工会领导机构，即我们的主席团和某些起关键性作用的顾问才能代表“团结”工会，并向他们说明，同全国委员会全体成员进行磋商也是重要的。

我在向当局提出的临时建议中经常把这些条件考虑进去，而当局作为选择似乎想要召集主席团开一次会。他们也许觉得“团结”工会主席团比起全国委员会来更有可能就最新局势达成协议，因为他们认为全国委员会可能由于实行军管而进行公开的抵抗。然而无论是我还是当局都无法确切知

道全国委员会究竟会采取什么办法。当然，我一旦最后决定只要军管还在实行就不可能有任何妥协，那么我就会尽最大努力举行一次全国委员会会议。我一直希望再过三个月左右当局势稍稍缓和时，当局能意识到实行军管给社会结构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和损失，因而会放松对社会的控制，采取较明智的态度。

乔塞克继续每周来看我一次，通过简短的谈话判断我的情绪。1月26日，即宣布实行军管大约6星期后，他们拿出拘留文件让我签字：我对此加以拒绝。作为回答，我在奥特沃茨克住室的墙上匆匆写下一段说明，这段说明后来登在法国《世界报》上：

> 我没有在1982年1月26日交给我的文件上签字。他们的行为违反法律程序。如果他们开始对我散布荒诞的谎言——这些谎言全是事先准备好的，完全是没有证据的——那我是不会吃惊的。他们声称没有拘留我，以此企图欺骗国内外公众舆论，但要我签字的文件不是把问题说明得再清楚不过了吗？这份文件早在12月12日就起草好了。请公布这个简单的事实，这是他们背信弃义并继续坚持不诚实态度的最好例证。我们决不后退！决不把任何人从运动中驱逐出去，这样做就是向他们的手段屈服。

尽管已经实行军管，但教会继续扮演调解人的角色。虽然罗马天主教在波兰的代理人完全赞同“团结”工会的最终目的，但却避免采取和发表过激的政治行动和声明。当局对此表示感激。作为对教会的报答，政府允许我会见某些牧师

和主教，其中有波兰主教团的发言人阿洛伊齐·奥尔舒利克神父，我的朋友、顾问、格但斯克牧师亨雷克·扬科夫斯基神父，以及普热米什尔的波托茨基神父。他们在我家人的陪伴下的来访，使我暂时摆脱了孤独的处境和抓我的那些人的严密监视。

从短波无线电收音机收听的西方记者在波兰的现场报道以及来访者带来的消息中，我对当前的局势有了清楚的了解。当局打着军管的幌子，不仅决心夺回“团结”工会和波兰人民已经赢得的全部权利，还想在寻求我们作最后妥协时获得他们的全部优势。在我看来，局势是令人绝望的。军管最终给当局带来了它一直想要的东西：通过使用武力得到赤裸裸的权力，这是权力最纯粹的形式。

既然我成了他们的囚犯，他们便对找我谈话和对我进行观察产生了一定的兴趣。他们终于使我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再没有要求他们尊重我们的地位并使用“道德上的讹诈”来反对他们的可恨顾问，再没有难以对付的工会代表，也没有支持我的聚集在造船厂外面和大街小巷的人群。只有我一个人，供当局来研究：这就是谜底。

尽管双方都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但我们最初的会谈是在相互尊重的气氛中进行的，这为进一步的谈判创造了明确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我向他们采取主动，大胆地提出一系列建议，想以此使当局改变态度，摆脱僵局。

最初的这种游戏只玩了几天，此后政府和军方因忙着处理军管的实际问题而把这件顾及门面的工作交给了工会事务部长乔塞克。后来他们又把我转交给保安警察的专家，说是要我“习惯新的环境”，换句话说，就是要永远地折磨我。

在当局眼里，这是办理“瓦文萨”问题的最好办法。另

一种办法是让教会接触他们的囚犯帮助政府解决问题。教会派遣阿洛伊奇·奥尔舒利克神父作为军方处理这一问题的调解人。奥尔舒利克神父在红衣主教维辛斯基令人生畏的统治时期的牧师生涯，已经把他锻炼成一个伟大的实用主义者。他有很强的个性，不容易受他人的影响；不仅具有坚定的道德责任感，也十分尊重常规习俗和通过适当渠道处理事务的方法。

我同奥尔舒利克头几次会见是紧张而拘谨的。我最初似乎显得很不冷静，一下子说出了许多他认为是不现实的看法。我不能接受这种强加给我的既定环境，我在愤怒而绝望的情绪支配下，对他傲慢地叫嚷道："他们将跪着来求我！"牧师不喜欢我这种缺乏宗教谦卑感的行为，我们还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彼此了解。

我们第一次见面一周之后，奥尔舒利克神父给我带来了某些重要消息：作为波兰最近一系列事件的结果，波兰主教团已经派信使前往梵蒂冈。教皇的一名特使正在来华沙的途中。特使在同党中央书记巴尔齐科夫斯基外交秘书奇雷克的一次会谈中，得到政府的某些许诺，并把此事向教皇做了汇报："团结"工会将获许按照自己的章程继续活动，但对其他问题还需进一步谈判；不再有政治犯或审讯；所有希望离开这个国家的人将获许离开。主教的代表还建议把我转到中立场所，使我能够同那些被拘留的"团结"工会顾问和全国委员会领导人见面。他们提议的场所是红衣主教维辛斯基原在霍什乔夫卡的住地。我也要保证不利用这种机会逃走。主教团还愿意充当"团结"工会领导人同政府谈判的调解人，但却不打算直接参与谈判。

这个消息听起来与军管最近触发的一系列事件截然不

同。在西里西亚的武耶克煤矿，工人们曾为保卫独立工会惨遭杀害。在举行任何谈判之前，我有责任对这一暴行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得到某种赔偿，而那些曾派军队镇压矿工的政府官员则一味地为自己辩解。

如果我们不妥协地再坚持二个星期，“我们就会取得胜利”。这是我当时说的话。从某种程度上讲，我说这句话是给那些偷听的人听的。波兰此时已陷入一片混乱。就我所知，当局也是害怕暴力的。然而，我却深知波兰人民决不会拿起武器反抗政府：这不是我们的办法。此时，红衣主教站在布道坛上呼吁举行谈判，我赞同他的主张。当要求我明确表态时，我表示支持教会的立场，但有些人却持不赞成态度。他们认为，必须用武力打败人民，让人民知道，他们想什么时候动用武力就什么时候动用武力。然而政府最后还是同意举行谈判。

我意识到让工会顾问参加最初的谈判是一个现实的想法。我坚决要求让我在“团结”工会的亲密的帮手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和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参加谈判。然而，由于官方对这两个人大肆攻击，教会因此产生了动摇，并明显暗示最好挑选没有被捕过而又不会惹恼当局的较为次要的人物参加谈判。我在这一点上做出了让步。

在我同教会方面的交谈中，我逐一放弃了我最初的所有条件，最后竟完全接受教会的立场，但这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这也许从一开始就是当局的计划：仅仅为了面子上的需要而利用教会。

后来，我常常纳闷，有着丰富经验的教会为什么同意参与这种空洞无味的游戏，随即逐渐明白了这其中所包含的道理。教会接受强加给它的游戏规则，尽一切努力使自己成为

社会中的一支不结盟力量，即便开始时这是不太可能的。这是斯蒂芬·维辛斯基的策略，是自大战结束以来波兰教会一向奉行的政策：先按照表面意义取得没有可靠保证的承诺和协议，然后努力使其成为国家必须承认的一种道德力量。我意识到教会在处理军管状态下的局势时正是采取了这种策略。

圣诞节这天，我和我妻子、扬科夫斯基一起收到教皇的一封信，并附有一份教皇致雅鲁泽尔斯基的呼吁书的复印件：

波兰，格但斯克，弗热什奇区20－244

格伦瓦尔兹卡大街103号

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莱赫·瓦文萨先生

亲爱的先生：

我给您寄去我致波兰总理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关于我们国家目前发生的不幸事件的呼吁书。我希望能让您知道，在这种困难的时候，我是与您和您的全家以及所有遭受痛苦的人完全站在一起的。为了我们自己和赎去我们的罪过，我代您向从天堂降临人世的圣母玛利亚致意。

约翰·保罗二世

1981年12月18日　于梵蒂冈

华沙

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理

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

自12月13日宣布军管以来在波兰发生的事件已经导

致我们同胞的伤亡，这促使我向您发出紧急而又诚挚的呼吁，恳请您结束波兰的流血。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波兰民族遭受了极大的耻辱，在我们国家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多少人的鲜血洒在波兰的大地上。我们的历史在大声疾呼，不要再流血了；我们决不允许悲剧继续如此沉重地压在我们民族的良心上。为此我向将军您呼吁，重新回到自1980年8月以来以要求社会进步为特征的和平对话的途径上。尽管这可能是很困难的事，但决非不可能。

整个民族的幸福全都系于此处。全世界人民、所有关心通过尊重人权来促进和平事业的人们，都期望着我们重新回到非暴力的道路上来。全人类对和平的渴望要求结束波兰的军管状态。

教会是这种希望的代言人。圣诞节即将到来，波兰的几代儿女将被圣餐聚集到一起。必须竭尽全力使我们的同胞不致被迫在镇压和死亡的阴影下度过圣诞。

我向将军您的良心，以及所有必须对此做出决定的人的良心呼吁。

约翰·保罗二世

1981年12月18日于梵蒂冈

大约十天后，即在克拉谢夫斯基主教和奥尔舒利克神父主持过圣诞弥撒之后，我们开始谈论道德本质的各种问题。克拉谢夫斯基对于军管状态下的生活现实、那些敢讲真话的人所担负的责任和人们保持沉默的能力进行了探讨。我认为，西方将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以此来迫使将军同反对派进行对话（这正是实际发生的情况）。我们都一致认为，西方中

断援助的最大受害者是波兰人民。然后，我们的谈话又转到必须解决社会危机的问题上。我争辩说，自我被软禁以来，我无法对“团结”工会成员施加任何影响，某些激进的因素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爆炸性的无法控制的地下运动。因此，我必须获得自由，这样我才能再次约束工会，阻止局势恶化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三天后，在奥特沃茨克的哥穆尔卡别墅举行的会议上，我重申了这些理由，但只是白费力气。即使我保证，只要把我转到中立场所由教会负责监管，并允许我与顾问进行磋商，我一定尽力发挥积极影响，特别是要平息皮亚斯特和西里西亚最近爆发的危险的罢工，但主教们还是无法说服军方。

主要障碍是我们对于工会某些错误的严重性持有不同看法。当局坚持认为，对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党内斗争和“团结”工会所犯的错误应该受到同样的谴责。我不能接受这种看法，尽管我承认我们的某些领导人曾愚蠢地低估当权者的真正力量。我始终不清楚雅鲁泽尔斯基要使波兰避免什么样的“内战”。有证据表明，党内存在着分歧，并且日趋严重。如果情况属实，那么为什么要单单把工会作为攻击的目标呢？为什么只让“团结”工会面对“零点选择”的处境呢？事实的真相是，军管只不过是用以掩盖当局的真实目的：消灭“团结”工会，消灭“团结”工会和波兰人民的共同希望。政府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轻率地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

新年这一天，我交给奥尔舒利克神父一份声明，由他转交巴尔奇科夫斯基，再由巴尔奇科夫斯基于次日转交雅鲁泽尔斯基。下面是这份声明的主要部分：

我不会割断自己的喉咙。我不打算鼓动暴力或组织新的罢工。我只想帮助找到一种方法，以消除总罢工造成的可怕后果。因为我知道，在持续不断的打击下，社会只能遭到削弱。我请您释放被监禁的全国委员会成员，允许我与他们见面。即使这种见面必须对外严格保密，我也可以接受。我将提请全国委员会考虑我的下面这个意见：要求其中几个人辞职；如果他们拒绝，我就请工人投票表决。我们应该对目前的局势采取现实的态度，考虑我们的全部建议和选择，从我们的运动并不是要消灭社会主义这一原则出发进行谈判。当局清楚地知道，虽然我在腊多姆使用过激烈的言辞，但那只是我采取的一种战术步骤，目的在于控制"团结"工会内部激进主义不断增长的威胁。我很清楚，军管即使持续一年，仍可以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我们的分歧。我还认为，军管比来自外国的干预要好些。局势还没有陷入无可挽回的地步。我们还能修补缺口，但唯一的条件是要我们自己来干。

几天后，教会当局把我们一直讨论的意见写成一份备忘录，送给巴尔奇科夫斯基。后经奥尔舒利克之手转交给我，并附带一份由"团结"工会专家组起草的《谈判建议》。工会专家组当时仍有行动的自由，且与主教团交往密切。教会要等到1月13日才能知道当局对谈判可能性所做的决定。假如当局的答复是积极的，我们的专家组将向全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传达一项由我签署的文件，帮助他们为我们在菲晓尔举行的会谈做准备。

最后，我还指出，政府应该提出自己的谈判建议供我们研

究，然后政府和“团结”工会可以成立由各自代表组成的工作组，其任务是把谈判达成的条款汇总起来，使之发展成一种社会契约。

我收到那份文件后，除非另行通知，当局禁止奥尔舒利克神父再来看我。直到3月，我才再次见到他。教会当局对强制实行军管的反应使政府感到不快，这导致他们反对教会提出的充当政府与“团结”工会之间调解人的建议。

正是在这时，我受到了正式指责，政府还宣布了它批准拘留我的消息。我终于知道了自己所处的地位。

3月7日，奥尔舒利克神父最终获许再次来奥特沃茨克的维耶尔基宫看我。维耶尔基宫建于18世纪，最后一次瓜分波兰的协议就是在这里签署的。也正是在这个历史性的地方，我重申了我的信念："团结”工会是一种伟大而重要的创举，它是决不会失败的，但如果当局决意要摧毁运动的组织结构，那他们只能自己去做，而别指望会有其他人帮助。至于政府要建立新工会的想法，我建议让他们自己的工会事务部长乔塞克担任新工会的主席。这样，每个人至少能明白谁能干什么。

此后，奥尔舒利克神父又有二个月的时间没有来看过我。

宣布军管时并未完全禁止“团结”工会的活动，因此最初看起来，我们也许能达成某种协议。达奴塔仍像在我从事工会活动初期那样帮助我保持信心。我还经常自己给自己打气，像我常说的那样“窥探生活”秘密，把局势的每一变化都看作一次要去经历的冒险，看作一个要解开的谜。然而军管的实行一时间却使我手足无措。

正当军管的紧张气氛和官方的宣传似乎日益减弱时，波

兰的普洛茨克省遭到春季洪水的严重侵袭。维斯瓦河河水泛滥，洪水淹死了数以千计的人。当局在军队的帮助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救援，从而有机会做些积极的事情。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损失。当赶赴灾区的医护人员和援助的各种物资因电话通信的中断而受到阻碍时，人民起来暴动了。政府做了大量调解，但却毫无结果。接踵而来的是抗议示威和军队与人民之间的冲突。政府的努力只是杯水车薪：它的犹豫不决和平庸无能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来自地下的各种攻击一齐发泄不满：全国人民找到了捍卫自己的声音。宣布军管之后，当局已经因行动迟缓——在所有方面——而铸成大错。他们越是等待，他们距离崩溃的边缘也就越近。现在他们惊恐万分，害怕我们起来推翻他们。

我将要离开奥特沃茨克时，乔塞克来看我。我没有情绪谈话；此刻，讨论看来毫无用处。

“我在这儿已经待了好长时间了，”我抱怨说。“我对整个宫殿了如指掌。华沙的皇宫已经修好，我们还在这儿等什么呢？我们将接管华沙吗？”

我的话并没有把这位部长逗乐。两天后，我被转移到国家的一个狩猎用的山林小屋，这里重兵守卫，四周是阿尔瓦莫夫茂密的森林，接近波兰的东部边界。

尽管我对自宣布军管以来发生的事情存在着怀疑和忧虑，但我仍认为我是“团结”工会的领导人。1982年6月初，我设法将一份重要文件送到西方，希望有关当局允许“团结”工会派代表出席一次国际劳工组织的重要会议。我挑选的代表是《团结》周刊助理编辑博格丹·齐文斯基，他当时就住在国外。这个委任书要签字、盖章，然后越过阿尔瓦莫夫的

三道铁丝网和严密的保安措施送到西方。我的这一做法使乔塞克对我的态度变得有些冷淡起来。

我以前曾与拉科夫斯基有过良好关系，在当权者中他是唯一真诚对待过我的人，但现在他正向我发起猛烈的攻击。这种态度上的转变使事情变得一清二楚：我要么"支持"他们，要么"反对"他们。他们在令人厌恶的宣传中仍然对"团结"工会进行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不愿在这里点这些人的名字，因为有关人员至今仍占据着重要职位，肩负着重要责任。我能说的是他们以各种方式困扰我，最后只让我回答"是"还是"不"。

10月4日，乔塞克交给我一份将会导致"团结"工会灭亡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要我在"国家复兴爱国运动"或政府下属的负责工会事务的咨询委员会中接受一个重要职位，而这实际上是在邀请我出席"团结"工会的葬礼。如果我接受这项建议，我将会成为自由人。"释放您的钥匙就掌握在您自己手里，"乔塞克对我说。

"我要等到取消军管再考虑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我没有请别人把我带到这儿来，但我也不会乞求别人放我离开。再过两年，'国家复兴爱国运动'将会变成'国家统一战线'那样的组织"——成为另一个信誉扫地的组织，当局只是简单地改了一下名称而已；我还指出，由于当局压制自由工会并摧毁人民工作的愿望，这个国家不久将陷入一场难以克服的经济危机。"我还回答说："在我获释后，我希望到某个造船厂做一名电工，如果你们不允许，那我可以为扬科夫斯基神父工作。"

此时，我正在渡过我一生最漫长的假期。我时常同卫兵

们一起吃饭，他们总是问我，他们在场是不是对我不方便。我们从没有很多话要讲，我们吃饭时什么也不说。但我经常和他们交换菜碟。这时，我会向其中一个人说，“来，尝尝这道菜。如果他们想要毒死谁，我想那准是你了。”他们总是给我做几种不同的菜，看我最爱吃什么，然后他们就一直让我吃这种菜；直到我看到这种菜就难受，他们才不再给我做。我特别爱吃猪肝，所以除其它许多菜之外，他们每天都给我吃猪肝。我也非常爱吃鱼，尤其爱吃鳗鱼。电冰箱里塞满了食品，供我在正餐之间食用；至于香槟，那就太多了，随手可得。我是流放中的国王。

开始时，我有一个收音机，差不多可以收听到各个频率的广播；一段时间后，他们对收音机进行了改装，从此再也收不到短波了。我不停地修理，最终我设法在中波波段上收听到了自由欧洲之声的广播。第二天早晨当我下楼吃饭时，他们又把收音机搞了一下。然后我再修好。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最后，一个迷惑不解的卫兵沉不住气了，问我是怎样在中波上收到外国台的。我也说不准，我只是胡乱修理。后来的一天，有人偷偷给我送来一个微形半导体收音机。从那时起，我可以用耳机收听广播（通常躺在床上听）。我一直藏着这个收音机。当卫兵的电视机出故障时，他们总是来到我的房间，问是否能看我屋里的电视；我从不拒绝他们。他们看电视时，我就躺到自己床上悄悄地听收音机。甚至在今天，我仍不能肯定他们是否知道我有那个小半导体收音机。

我时常听达奴塔偷偷带给我的录音磁带，这些磁带记录的是1982年5月1日格但斯克抗议示威的情景。听着那些没有被军管吓倒的人们表达个人自由的真实声音，我感到心情舒畅极了。

达奴塔现在成了家里的主角。我经常在收音机里听到她的声音，这是她在对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她是那些因丈夫被拘留或被逮捕而只身一人照料家庭的数以千计的妇女中的一个。她有着与她们同样的负担；她经常以她们的名义谈论波兰人民关心的两个最大的问题：家庭生活和国家命运。当局没有对她采取任何限制。我被拘禁在阿尔瓦莫夫期间，我们的女儿玛丽亚·维克托丽亚出生了。尽管如此，达奴塔仍继续接受全世界各地广播电台的采访；她还会见来自教会、梵蒂冈的代表和西方各国的大使。她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人物。我经常想，她远比我给人们的印象深刻。

1982年秋，对达奴塔的一系列采访以《只有人民才有权力》为题发表出来，其中有达奴塔对当局拘留我以及其他问题的回答。

第一次采访，1982年9月下旬（摘录）

莱赫·瓦文萨的妻子走进房间时显得神情抑郁。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责任太重了。"我们指出，她在对手面前勇气和信心已经为她赢得光荣。

"在我看来，事情会更糟，"她回答说。"如果事情好转，我会很高兴，但一般来说，我认为事情会更糟。"

"您没有带给莱赫任何消息吗？"

"我从不把任何书面的东西偷偷带进去，因为莱赫反对这样做。他说，如果他们在我身上发现什么，他们就可能用作制造麻烦的借口。有一次我给了他一盒录有'五一'抗议示威场面的磁带，他听了，但卫兵也听了，此后他们便对我搜身，没收了其他磁带。"

“您丈夫对官方掀起的反对工会的宣传攻势有什么看法?”

“他没有向我谈到这个问题。他没有告诉我他对这些事情的真实想法。我认为隔离开始影响他的神经。”

“他的情绪还乐观吗?”

“他对未来决不会丧失信心,他一直坚信‘团结’工会最终会取得胜利。”

“实际情况似乎同他的看法相反——当局随时可能取缔工会。”

“是的,莱赫也刚刚得知这一点。我两星期前去看他,他那时正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

“‘救国军事委员会’(WRON)企图阻止所有‘团结’工会领导人参加新工会。如果‘团结’工会被取缔,而莱赫再不是它的主席,那时会怎么样?”

“谁知道这些新工会是什么样子?据我听到的情况,没有人想参加新工会。我认为,当局必须注意不要使人们太过不下去。如果我们的所有领导人都被抓进监狱,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当局是否认为只要把这些人除掉就能继续进行统治?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建立一个新工会吗?谁会参加呢?”

“莱赫害怕在一所真正的监狱里长期待下去吗?”

“我从没有和他谈起过此事。”

“您认为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有一阵子,我认为最坏的事情可能就要降临到我们头上,好像我已习惯了这种想法,但现在我认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认为我不再想这种事情了。当你

听人们谈话时，你会发现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有分歧，他们彼此间争论不休。”

“如果莱赫回到家，您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经常想到这一点，但我无法想像那是一种什么情景。有时我害怕我们变得彼此不能理解，甚至我每隔三个星期去看他时，我也这样想。我星期一启程，星期五返回，每次往返要花一天时间，因此我在那儿只能停三天时间。我担心我们之间可能起变化。我们以前从没有分开过这么长时间，但我从不认为我们彼此会变得陌生。”

“您丈夫非常想念您吗？”

“噢，当然，我想是的，每隔三星期我们见一次面。然而当我们彼此感到轻松舒适时，我就得离开了。这真可怕！”

“您对人民正以不同的方式抗议军管有何看法？”

“我丈夫经常对我说，捍卫自己的权利是‘团结’工会每个成员的责任。我对此完全赞同。人们决不应该放弃他们已经得到的权利。当然，不同的情况要求不同的策略。”

“您同莱赫谈过这个问题吗？”

“他正在机智巧妙地行事。他在很远的地方，与一切事物隔离开。假如他说‘做这个或做那个’，那他仅仅是说说而已，实际上什么也做不了。”

“莱赫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失望吗？”

“有时他认为，人们努力得还不够，或人们不该照他们目前那样去干，他们应该更果断、更积极地去行动。”

“您相信政府吗？”

“不相信，他们可以许下他们想要许的诺言，但我一点都不相信他们。只有人民才能使我们做到一切。我相信波兰人民能找到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但这并没有消除我的忧虑。今天，有一个妇女告诉我，她与运动已经没有一点关系；她对一切都感到厌倦；她的小女儿连一双鞋都没有；她们只能在面包上抹一点点黄油，根本就尝不出黄油的味来。您能听到许多这样的抱怨。我知道，我的生活也是朝不保夕的。如果形势好转，我也会好的；但如果形势恶化，我也会很困难的。”

“莱赫对发生的事感到有责任吗？”

“不，一点也不。”

“莱赫指责过他在‘团结’工会中的同事或顾问吗？”

“他不就任何事情指责任何人。他认为目前发生的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

第三次采访，1982年10月下旬（摘录）

“您最近到阿尔瓦莫夫看您丈夫，您似乎感到特别沮丧。”

“我于10月18日星期一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动身去看他。22日星期五离开阿尔瓦莫夫。通常开车送我回来的那个人本应该把我送到普热梅斯尔的牧师家。汽车晚到了；平常陪我来的那个人这次带了一个官方派的司机，我当时感到他们可能要搜查我。当我们抵达普热梅斯尔时，他们并没有送我们去牧师家，而是把我们送到了派出所。司机停车时，我问他是不是走错了路。可司机却

说：‘这正是您现在要去的地方。’我回答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我不下车。如果要我下车，我要带上我的孩子步行到牧师家。’我当时没有料到这个官方派来的司机会动武。‘别装傻了，’他一边说，一边拦住我的去路。我尽力把安娜和玛格达接下车，但我们无法走得太快。孩子们开始大哭起来，我也不能把她们撇在那儿。另一个男人攥住我的手腕，不停地叫我跟他走；这时司机已经钻进汽车。

“我记不得我是怎样走到派出所门口的；我只记得，我当时听见两个女儿的哭喊声（她们在身后的某个地方），那个男人硬拉着我往前拖，也许还有个人帮他拉。我发现自己站在一座大楼里，耳边传来孩子们的哭声。‘让我走，’我对他们说，‘我要带我的小女儿回家。’最先拉我的那个男人抓住我不放，另一个人牵着两个孩子进来。她们被带到二楼，我也跟着上去了。

“‘我们要到这儿来’，那个男人对我说。从旁边的办公室走出许多人。我尽力和他争辩，但他不让我讲话。小安娜当时站在我前面，那个男人突然推了我一把，由于用力很大，把安娜给撞到了。当有人指责他对孩子太粗暴时，他开始吼叫起来，把我推进一间办公室，在那儿有两名妇女和一个男子正等着我们。到这时，我简直气昏了。

“‘闭上你的嘴，你这泼妇’，他向我吼道。

“‘闭上你自己的吧！你认为你是在对谁讲话！难道我什么权利都没有吗？’

“其他三个人想使我安静下来。其中那个男人对我说，他们只是奉命行事。我告诉他这对我毫无意义。‘要

么你们把我当成一个人对待，告诉我的权利是什么，要么就承认我什么权利都没有！’

“那个把我猛推进屋的人叫博宾斯基，是个上尉。他离开了屋子，另一个男人对我说，我没有任何权利，但他还是喋喋不休地解释他们只是奉命拘留我。博宾斯基又回来了，几次问我是否知道他们为什么拘留我。另一个男人显得犹豫不决，好像他想让上尉代替他说，但他最后还是转向我说，要我交出身上带的一切信件和书面材料。

“‘我没有带一点那种东西。’

“‘如果你不承认，我们就要对你进行搜查。’

“两个男人离开屋子，两个女人开始对我搜身。她们哪儿都看了，翻遍了我带的所有东西，还把手伸进衬衣里摸每一处折边，甚至还检查了我丈夫换洗的脏衣服。

“‘这位夫人干吗哪儿都看呢？’玛格达问道。

“我正要向她解释，那个女人制止了我。她不想让我说出什么不该讲的话。于是我对女儿说，这位夫人之所以哪儿都看，是因为她认为你的爸爸是个好人，这句话似乎使这个女人感到放心。

“‘我以为你要说些蠢话。你不要向孩子们说这些事，她们不懂。’

“她不知道孩子们完全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身上装了一张小纸片，上面画了一只戴着帽子的乌鸦，帽子上标有红星和斧头镰刀的图案。上尉看着纸条读道：‘坚持下去。’女警察也在读，我对她说：‘还有一句哩！’他们接着读道：‘越快越好。’

“他们也搜查了我的两个女儿，只是没有把她们的衣

服脱下来。当博宾斯基回来时，他坚决要求再搜一遍。于是他们从玛格达开始重新搜起，脱下她的鞋子；这双鞋有一副用于矫正脚形的鞋底。他们想要把它拆下来。

“‘不许你们拆掉，鞋底原来就是这样的，’玛格达大声说。

“我请他们不要弄坏孩子的鞋，因为我没有别的鞋给她穿。当他们要脱玛格达的衣服时，她哭了起来。我把她抱到怀里，并对博宾斯基说，我希望有一天他女儿也碰到这种事情。

“‘我的女儿六岁了，他们要杀死她！’他回答说。

“难怪有这样的事情！当局已使它的工作人员相信，‘团结’工会要杀害他们的孩子。

“搜查进行了两个小时，他们没收了一张火车票、几张照片和宗教画片、一份《普世言论报》和两张支票，一张是20美元，一张是5美元。他们还扣了我的驾驶执照。

“‘你们没有权利拿走我的钱和驾驶执照，’我明确地对他们说。

“‘我们要记下这些支票上的号码，’那个男人回答说。‘我们知道你丈夫在西方银行存有250万美元！’

“他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但向他解释我们如何如何没钱有什么用呢？有人已经在散布莱赫有100万美元、接受贿赂或更荒唐的事。我经常听到这类传言。

“上尉一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便立刻平静下来，而且看上去颇为满意。而在此之前他的举止就像一头野兽，那时我甚至认为他会对我拳打脚踢。他曾被气得大发脾气、狂蹦乱跳。上尉说他现在要写一份正式报告，讲我如何如何骂了他；我回答说，我要对警察的野蛮行为提

出正式起诉。我在离开时对他说，不管他的军服多么威严，他仍只是一头下流的猪。

“这个男人在我们以前一起乘车去看莱赫时，曾试图赢得我对他的信任，而后来当我不服从他的命令时，他便像个疯子似的对待我。以前从没人敢公开地反对他。他认为在军管状态下我会像只羔羊那样一声不吭地顺从他。这次对我搜查之后，我充分意识到，一个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无异于任人宰割的牲畜。

“上尉曾经说‘我们的’政权差不多存在了两年，这简直太长了。我于是反问他：‘你们会怎么样呢？你们还能统治我们多少年？你们现在还统治着我们，可你们认为你们能支持很长时间吗？’这番话使他大为恼火。我想，由于我当着他同事的面这样跟他说话，他因此感到很尴尬，甚至感到蒙受了耻辱。”

保安警察对达奴塔的野蛮行为表明，人民在当局的统治下是多么的软弱无力。虽然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小心避免超越某些限制，但保安警察觉得，他们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约束。他们知道自己是当权者手里必不可少的工具。他们不在乎他们的肮脏行为会给我们这些人留下什么印象。

既然当局已经清楚不论他们考虑什么有趣的建议都不能使我产生兴趣，因此他们最终放弃了在阿尔瓦莫夫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的努力。然而，我总是谨慎地避免流露出蔑视当局的态度，因为我知道，在我们目前玩的这场游戏与一场更加残酷的游戏之间只是一石之隔。现在的这场游戏仅仅使人筋疲力尽：没有人做最后摊牌，不断的欺骗使我们无法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不论囚禁我的那些人说什么，做什么，但将军们至少许诺了一些具体的东西。他们的许诺是吸引人的，尽管雅鲁泽尔斯基旧调重弹，要求回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好岁月”中去。即使那时，波兰的民族主义也不是不具威胁人民的色彩。

他们曾指望以创造适宜的社会环境和许诺举行高级会谈，来说服我与他们合作。但我的回答只有一个字，“不”。我告诉他们：“这里重要的不是我，而是运动本身。我们不能让人民丧失希望。必须要向人民表明，一切都是真诚坦率和光明正大的，重大的问题和难题不能置之不理。我们不能背叛1980年8月的理想。”

我并不在乎自己在运动中的声誉，因为我相信这场艰苦的斗争会使我们比以前更加团结。假如我此时产生了动摇，那么肯定会有其他某个人从自己的政治派别中分裂出来，奉行不同的政治路线，以“挽救”“团结”工会。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才在“团结”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主席团。从原则上讲，主席团任何一个成员都不得分裂工会。“不诚实将导致灭亡”，这句话表达了一种高贵的情操。我就是这样对待“团结”工会的。当任何人想要在我被拘留期间成为引人瞩目的中心时，人们的回答都是一句话：“我们只拥护瓦文萨。”等我获得自由后，我们将清算“团结”工会中那些确有背叛证据的人——有几个这样的人——和缺乏政治能力的人。这件事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做。

在我被拘留的一年里，一个“临时协调委员会”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不受“团结”工会主席约束的决策机构。这个地下组织负责协调波兰人民的抵抗活动，它做出的许多决定

都反映了人民的希望。

临时协调委员会呼吁在1982年11月11日这天举行大规模的群众示威，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独立64周年。我怀疑这次行动能否获得巨大成功，而且担心这是否会导致当局对工会主要成员再次进行逮捕和防备性拘留。我担心"团结"工会将陷入耗尽其全部剩余力量和丧失对公众影响的危险。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我不积极支持这次大规模抗议行动，就可能纵容激进团体的势力抬头，导致一次流血事件，而这种流血悲剧是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的，它只能使我们的事情变得糟。各种事件都与纪念活动联系起来，委员会的一系列决定从不通知身在遥远的阿尔瓦莫夫监里的我。这种情况决非偶然。

我决定冒险采取主动，于是向雅鲁泽尔斯基写了下面这封信：

华沙

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

我似乎感到，仔细考虑一下我们的问题以取得某种谅解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为认清我们的处境和选择已经花了足够多的时间。我建议，我们能够会面就我们大家共同都关心的问题进行一次严肃的讨论。我相信，我们双方都怀有良好的愿望，我们能够达成一项协议。

莱赫·瓦文萨下士

1982年11月8日　于阿尔瓦莫夫

报纸于次日刊登了这封信的原文，并加上了下面这样的评论：

由于莱赫·瓦文萨写了信并愿意"就我们大家共同

关心的问题进行一次严肃的讨论”，“救国军事委员会”成员切斯瓦夫·基什恰克在阿尔瓦莫夫会见了他。会见结束时，内务部长下令格但斯克军区司令释放瓦文萨。

我写信的理由很简单。当我听说“临时协调委员会”已经号召于11月11日举行大规模示威行动时，我明确感到，像我上面说到的那样，他们正在犯大的错误。我感到自己越来越脱离外界环境，尤其是当我期望要来阿尔瓦莫夫看我的牧师和妻子并没有来时，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我最近决定进行绝食的消息没有传出去。我无意中听到了卫兵谈话的片断，他们都十分担心即将来临的政治示威。他们对自己家庭的安全越来越感到担忧，紧张气氛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在阿尔瓦莫夫也能感到。“事情要变坏，真正地变坏”，一个卫兵说。“我把老婆留在农村，真不知道我的孩子怎样从学校走回家，他们要用那几条街搞示威。”

从我听到的谈话中，还可以察觉到他们会派军队去的可怕征兆。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写了那封信，以阻止这次示威行动。我在阿尔瓦莫夫被完全欺骗了，因为我的信是在示威被扑灭“之后”才发表的；它没有产生预定的效果。

我曾对在信上如何署名费了些心思。如果我以“团结”工会主席的名义署名，信就不会发表，但如果我不提到工会，那人们就可能说我已经背叛了他们。我想把这封信当做一个建议，而不是一种恳求。我决定用“下士”来署名。我当然也意识到，某些人可能认为这很可笑，但我还是这样做了。

下面是扬·穆尔在秘密写作的手稿中描述的情况，这部手稿后来在巴黎正式出版。他在手稿中写道：当我从拘留地获释回来时，在格但斯克引起的普遍气氛是混乱、焦虑和期待。

11月10日　星期三

为再次显示工会立场没有改变和公众继续支持工会，地下力量号召进行一次为期八小时的罢工。但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种会使自己同当局发生公开冲突的姿态呢？当局有充分时间调动他们力量，工人根本无法与之对抗。当局正在等候时机，想要教训我们一下，我们将会被彻底粉碎。昨天的局势仍然变化不定，很难说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但今早的局势表明，必须放弃这种导致毁灭的战术，这种战术已经牺牲了我们许多勇敢工人的宝贵生命。当然，他们的牺牲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所有现在被囚禁、拘留和躺在墓地里的人已经以他们的勇气和决心增强了我们的社会责任感。今天上午，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相信这次罢工不会成功。

我大约中午时来到造船厂。我从街上看见有人在船体车间悬挂的“列宁造船厂”牌子的黑底上用粉笔写下“团结”两个字。你可以听到人们在里面工作发出的声响，一部起重机正在运转：没有任何紧张迹象。民警防暴部队已经包围了造船厂，坦克、机枪和装甲车已布满拉盖夫尼基大街街头，部队在那里严阵以待。他们还占领了格但斯克剧院前的广场，全城各个地方几乎都有部队在巡逻。几小时过去了，但没有发生冲突的任何迹象。波兰人民显然已做出选择，今天不是行动的日子。下午三时，情况已经很清楚，今天不会发生任何大的街头示威活动。进入格伦瓦尔兹卡大街的装甲车陷入人群之中，不知所措。尽管计划今天举行的罢工没有进行，但我仍然感到，人民在这一回合中已经取得了胜利。他们的对

手以武装到牙齿的面目出现，随时准备出击。

造船厂工人回到家中，同家人谈论着今天上午“救国军事委员会”的行动。他们纷纷批评他们认为的那张废纸。这是指上午发给造船厂每个工人的那张军管法摘要的传单。那张传单指出，谁如果不遵守军管企业的法令，就要受到种种惩罚。最近几天，当局一直下令车间主任以开除和起诉来威胁工人。几个较出名的鼓动者被通知离开工厂几天——不许踏进造船厂一步。全副武装的民警在那些仍然满不在乎的人群中进行巡逻盘查。要求罢工的地下组织的呼吁已无人理睬。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已丧失了同波兰社会休戚相关的联系呢？或是波兰人因当局的阻挠已放弃传统的抗议方式而正在寻找其他实现自己目标的办法呢？回答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

根据从军方无线电通讯窃听到的情况，已经有129人被捕，其中50人在24小时内获得了释放。

11月11日　星期四

我今夜很晚才回到家。我躲过了巡逻队的盘查。我去了大教堂，那里聚集了大约5000人，比希望的人数少一些。斯坦尼斯瓦夫·博格达诺维奇主教宣布莱赫已经获得自由，这个消息博得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今天发生的事情特别多。先是来自莫斯科的消息，接着是“救国军事委员会”发表公告，议会将于12月13日举行会议（可能要宣布取消军管），此后电视又播放了莱赫致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亲笔信，信上的署名是“莱赫·瓦文萨下士”。莱赫选择的是正确态度吗？我似乎觉得他是唯一对自己和军管状态保持客观态度的人。在

经历了一番艰难的心灵探索之后，他以自己的方式对现实做出了反应。这封信无疑开辟了重新进行谈判的途径。谈判定于11月8日举行，即在预计举行罢工的两天前。看来，瓦文萨好像怀疑罢工会取得成功，并为了抢先阻止罢工而写了那封信。转入地下的工会领导人的所做所为怎么和莱赫的看法不一样呢？瓦文萨的信是表明他不赞成他们的决定呢，还是他要设法挽救一种他认为因时间选择不当而注定要失败的做法？不管怎样，"团结"工会主席通过写这封信已经打出了一张重要的牌，"救国军事委员会"必须对此做出反应。"救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也许正在绞尽脑汁，想要找出某种诋毁莱赫建议的方法。他会设法避免受到他们的控制吗？他相信自己的直觉，对不对？

11月15日　星期一

我们在扎斯帕区瓦文萨寓所附近等了他三天三夜；他是在夜间到的家，有几千人欢迎他。他从住所的窗口向人们讲话，连续讲了19次，直到累得说不出话时才不讲了。人们称他为"将军"，并把他们对他的最新倡议的看法告诉他。

人们就是这样来看待他的作用的。他怎样看待自己呢？如果当局拒绝叫他调解冲突，那他将怎么办呢？特别是，当局已决心不再达成像1980年8月那样的协议。当局的宣传工具一再叫嚷，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传统协议一直是波兰脆弱的根源。他们反复谈及我们历史上的这个方面并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可能以新的方式重新提出1980年8月的那些协议吗？当瓦文萨是工会主席时，

他知道如何同我们讲话，如何在平等的基础上同那些前来格但斯克会见他的当局代表打交道，如果他现在只是个“普通公民”，他会怎么样呢？他在获释以后还有能力应付目前的局势吗？当局已向人民显示武力，并说瓦文萨的话并不是金科玉律。我们不得不眼睁睁看着自己对局势失去控制。假民主的天主教作家按照政府的路线进行的宣传，使许多人迷惑不解。“救国军事委员会”用一道道法令压制人民，并始终声称人民只要服从就会得到奖励。所有这些威胁和利诱无疑都是针对1980年8月提出的目标和莱赫·瓦文萨本人的。“团结”工会主席是强有力的，因为他讲真话。今天，在军管状态下，在民警肆意横行而人民无权讲真话的环境中，他能找到继续对话的途径吗？如果能，那么要等多长时间呢？

千斤重担此刻全都压在这个人的肩上。在他妻子那焦虑目光的注视下，他再次走到窗口，他对军管状态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蒙受的全部耻辱一清二楚。莱赫再次高喊道：“我们会胜利的！”我们以希望的目光仰头望着他，但内心也充满了痛苦的忧思。

第九章　普通公民

沉默了11个月之后，我于1982年11月16日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是西方记者考验我的一个机会。像一群医生围坐在病人床边那样，他们最关心的是病人的“综合症状”。从监禁中回来的瓦文萨是否受到了惊吓？他的身体是否有什么变化？他还是被拘留前那个样子吗？他们想知道我是否成了一枚政治上的定时炸弹，“一个神风突击队队员”，因找不到其他可行的办法只能采取称为自杀的行动，即号召进行一次总罢工。对这种罢工的后果是难以预料的，因为我觉得，内务部长基什恰克将军较早时同我的谈话的唯一目的是“摸我的底”。

下面是记者招待会的一些内容：

瓦文萨先生，您现在回来了，但问题是，您，或者“团结”工会准备怎么办呢？

我昨天夜里才到家。如果我仍然坚持1980年8月的精神，努力使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那么我首先要对政治形势进行一番仔细的研究，找出普通老百姓对形势的看法。我要找出一条对我们、对我本人都适合的道路。我想采取一种合理的方式，小心避免冲突的加剧。

请你们不要问我现在还无法回答的问题。我需要弄清我不是在损害别人或我自己的声誉。我要在第一个月里做的全部事情是，同我的家人在一起，观察形势的发展，重新投入

到我以前的工作中。

有一个您和我们都应该知道的问题：您对“团结”工会被取缔这一事实的重要性怎么看？

虽然形势已发生了变化，但“团结”工会的精神会继续存在。要坚持这种精神，我们就必须避免采取暴力反抗行动。我们还有另外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一条在这个世纪中许多人都走过的道路。这就是非暴力斗争的道路。

您的获释是否附加有任何条件？

我没有承诺任何条件，我没有签署任何东西，也没有口头上答应过任何含蓄的协议。我考虑了全部根据1980年协议提交给我的建议，我丝毫不打算抛弃那些基本原则。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只释放您而不释放其他人呢？

关于这一点，我自己也很吃惊。在那封公开发表的我给总理的信中，我曾提出一项建议，但并没有请求给我以特别对待。我本来以为，我可能是最后一个被释放的人。正因为如此，我的处境就好像一个被迫在监狱上空走钢丝人一样。我打算在钢丝上走到底。

对于何时取消军管和紧急状态以及何时释放其他被捕的人，他们向您做过什么保证吗？

到目前为止，我根本不了解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即使有人带着建议来看我，我也不会接受。监禁我的地方就我一个人。我们的工会是民主的组织，我身为工会主席无权修改以前的决定。

您能大概讲一下您在电视采访中说过的话吗？在最初播放时剪掉了哪些内容？

我不知道。我在采访时讲了很长时间——可能超过了预

先的安排。

您愿意在将来同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红衣主教格莱姆普或其他人接触吗?

当然，我打算利用一切畅通的渠道。

你们双方是否有一方建议举行会谈?

还没有。对于他们的计划我一无所知。在我有机会重新熟悉目前局势后，我会赞同举行双边会谈——这样做会使我避免犯大的错误。

从您星期五晚上获释到昨天回到这里（星期日），这期间您都在干什么?

我乘飞机到奥特沃茨克，在那儿过的夜。我感觉身体不太舒服。也许他们因考虑到我的健康而中断了旅程。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其他原因。

他们给您机会让您把回来的事告诉您妻子了吗?

没有。我获释的文件昨天才签署。我回到这里后才接到这个文件——文件上有日期和时间。昨天他们把我送回这儿以前，我一直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

那么说，您直到昨天才获得释放?

是的，直到昨天。

您认为自己现在是个普通公民呢，还是仍然认为自己是“团结”工会的主席?

我是经民主选举而担任主席的。据我所知，这方面没有什么变化。

您在信的结尾是以“莱赫·瓦文萨下士”署名的，我们应从这件事中得出什么结论呢?

我不知道。结论肯定是有的，但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去得出结论。

从您获释到昨天回家这期间，您会见过教会或政府的代表吗？

没有，我唯一见到的是那些奉命来看我的人。

从发出您的信直到您回到格但斯克，除了监狱的领导人以外，这期间您同任何政府官员接触过吗？

我接待过基什恰克将军和库特兹上尉，昨天还来过几个国家律师，给我上了一堂法律课。别忘了我发信的日期是11月8日，即在纪念活动（11日）之前。这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

您将来有什么打算？

显然有许多要紧的事要做。我要同我的妻子和孩子一起过一段时间，重新了解他们。这之后，我将注意我的国家，听听它要说什么。

您希望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同人们进行交谈吗？

我当然打算同人们交谈，但并不仅仅限于这一点。我对事物有灵敏的嗅觉，也喜欢欣赏军乐。

您怎样理解人们对您的欢迎？

人们继续信任我，我很高兴。同样，我也要继续信任他们，因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您还在监狱时，曾有传言说，您已经改变了对所能采取的斗争方式的看法，特别是您不再像以前那样反对暴力观念了，这是真的吗？

我从来没有提倡过以“打倒对手”的方式来赢得胜利，也从未主张通过暴力取得胜利。对于我，胜利意味着结交许多朋友——人们彼此理解。这种胜利是最值得我称道的，也是我所希望取得的。在过去的11个月里，我进行了大量思考，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几条可以引导我们取得胜利的道路——

这个胜利将满足双方的条件，使每个人都从中获益。

您能告诉我们，您打算怎样取得这种胜利吗？

先生，如果您对生活有所研究，您就会知道，总想预测结果是错误的。形势变了，任何人都无权把事情强加于他人。每个人都必须确信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的价值——既作为集体的一员，也作为个体。我可以有上千个想法，但可能都是不现实的。我再次重审我公开说过的话：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至少也得一个星期——来研究形势，看看我们如何才能解决全国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取得一个书面协议，除非是能产生实质性结果的协议。

刚才您已被问及最终将解除紧急状态和释放其他被监禁者的问题。请允许我以另一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您认为……？

我知道他们正遭受什么样的折磨，我将竭尽全力使他们所有人都获得自由。现实地讲，如果我们注意不采取使被监禁和被拘留的人增加的行动，他们获得自由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为他们哭泣，为他们心碎。我与他们在一起，我将始终如此，直到我们再次相会，一起在我家品尝咖啡。

您估计军管法和紧急状态还要持续很长时间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能无根据地胡说。

对于地下组织的所做所为——例如，像布亚克这样的人的所作所为，您不感到自己好像是身处另一个阵营吗？

我们的工会是民主的，工会受其章程的约束。每个成员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每个人对工会做出的决定都有发言权。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没有变化，今后也不会变。我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孤立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和其他每个人都有义务遵守工会的章程。

那些没有被捕的人现在躲藏起来，在继续秘密地开展活动，您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关于这个问题，您可以在1980年8月我们表达的理想中找到答案。

让我们回到受限制的问题上，您现在的生活受到哪些限制？

我不受任何限制。我再说一遍：在我被拘留期间，我只写过一份东西——致将军的信，在一份释放我的文件上签过字。换句话说，我签署过两份文件，我没有放弃任何东西——总之，我的释放是无条件的。

政府代表命令您不许做哪些事情吗？

当然！我已经说过，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从11点直到下午2点半。这期间，我们讨论了紧急状态法、刑法和其他法令。

这次谈话有什么结果吗？有哪些明确不许您做的事？

法律毕竟是法律。既然我违了法，他们就花时间同我谈，进行解释。我明白您想知道有关这方面更多的东西，但您要理解，我决非有意回避您提出的问题或掩盖我的恐惧。我想要干的是理智的行动。我决心忠于我们树立的目标。我不希望盲目地去行动。

瓦文萨先生，您认为"临时协调委员会"这个组织会继续存在下去吗？如果能存在，它符合您的需要吗？

我已经谈过这个问题，我仍然忠于我们的事业。忠于自己事业的人是会坚持下去的。

您曾经说过教皇的来访对"团结"工会的诞生起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教皇计划1983年6月再次访问波兰，您认为他那时会起什么作用呢？

我从不浪费时间高谈阔论，我现在也不打算这样做——我是现实主义者，一个纯粹的现实主义者。

扬·穆尔（摘自《一名囚犯的日记》）

11月21日　星期四

12点半钟，在格但斯克造船厂教区的圣·布里吉德教堂日常做弥撒的时间里，正在举行一次不同寻常的仪式：向教堂敬献造船厂的标志“团结”工会会旗。“团结”工会会旗产生于1980年，已经成为造船厂的最重要的象征；参加仪式的人们完全清楚这一点。教堂内和教堂前面的广场上聚集了差不多1万人，教堂内外拥挤不堪。有传言说莱赫·瓦文萨将出席这次敬献仪式，这条消息据说是教区长亨雷克·扬科夫斯基宣布的。这将是瓦文萨在公众场合的第一次露面——迄今为止他还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

西方的电视摄影组、报社通讯员和记者已在教堂里选好各自的位置。当原定仪式开始到来的时刻，有人开始议论瓦文萨也许不会来了。我们并不完全相信这种议论是真的，我们认为，莱赫决不会使全体等着见他的人感到失望——而且这次仪式同他自己的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

神圣的弥撒由格但斯克副主教卡齐米耶日·克卢兹和站在他左右的另外两名牧师主持。这两名牧师一个是本地的多明沃修道院的斯瓦沃米尔·斯洛马神父，另一个是来自奥尔什丁的扬·戈尔内神父。当唱圣歌的时刻到来时，扬科夫斯基神父和克卢兹副主教开始向人群讲话。他们表示欢迎瓦文萨参加弥撒，并告诉大家，虽然

他不能亲自到场，但他在精神上是和我们在一起的。这番话激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仿佛波兰的所有教堂都能听到这种声音。流传的消息说，瓦文萨已经到他所在的扎斯帕教区的一座正在修建的小教堂去做弥撒了。尽管他没有来这里，但这次弥撒仍充满着爱国与宗教的气氛。在敬献了缀有格但斯克造船厂徽章的旗帜——旗上有一只头戴花冠的雄鹰和用金线绣的“团结工会”四个大字——后，仪式宣告结束，集会群众唱起了《上帝拯救波兰》的圣歌。一万只打着“V”字形手势的手臂高高举起，人们的情绪此时达到高潮，整个人群好像唱出了人们的希望。我旁边有个人高声喊道：“他们摧毁不了我们国家的精神!”“上帝啊，给我们国家自由吧！”这种祈祷的声音在我们头顶上空回荡，戏剧般地召唤着被政府判处死刑的组织所提出的理想。

我们没有丧失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东西被埋葬。歌声激起一片掌声。人们打出一面写有“团结”工会字样的旗帜。有人喊到，“瓦文萨将军万岁！”整个人群开始跟着喊，然后他们便鼓起掌来。此时，扬科夫斯基神父提醒大家注意这次集会的宗教性质，恳请大家平静地离去。

人们不想离开。群情激昂。他们似乎正等待着什么，这种气氛因某些小道消息而增强了。

在不远处的圣•尼古拉教区的教堂(这是由多明沃修道院办的)，正举行着另一个仪式。著名的天主教记者亚采克•萨利伊神父在一种与我们这边相同的气氛中正在以公民的勇敢为题发表演说，他认为我们在道德上有义务团结起来，反对当局有计划地要摧毁我们的企图。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次在圣·布里吉德教堂举行的星期日集会。撇开我们那时激动不已的情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莱赫的缺席呢?

到晚上，我已确信他不来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这决非出于偶然，而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处境进行过审慎而周密的考虑。他避免抛头露面、引人注目,以便为他认为必将到来的新考验养精蓄锐。瓦文萨因此向我们证明,他仍然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他决不会轻易不来圣·布里吉德教堂。这是他第二次有失众望、放弃发表演说的机会（第一次是回避记者招待会）。他在冷静地观察局势的发展。

人们听说我要在12月16日的前两天发表一次演说。我许诺每年的这一天都要去拜谒纪念碑，我要用这次讲话来实现我的诺言。虽然我不能经常去那里，但我的灵魂总是同纪念碑在一起的。这次演讲的目的是要阐述自获释以来我有哪些计划,与其他人共同设想未来的前景。演讲做了录音，内容如下：

我答应来，因此我们在这里又相会了，不过我们开会的环境与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我们遭受了又一次打击，我们仍然没有实现我们的目标。

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必须再一次地说：我们仍在为工人的事业进行战斗，胜利将属于我们。

身为一个理论上已不存在的大工会的主席，我能对你们说些什么呢？

我要告诉你们，我能说的就是：工会存在于我们心中，甚至也存在于那些拒不承认工会的人的心中。工会也存在于你们的心中，你们也许感到了这一点。

我们没能像希望的那样把我们的思想付诸实践，这是我们的悲剧。我们再次没能把我们的国家与我们的希望和人民的潜力协调起来。许多人都感到他们被欺骗了。特别是工人，还有年轻人都希望有较好的生活条件。我们也许要求过多过快了。

但我们必须保持信心。我坚信，我们播下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我们已不同于8月时的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即便实现这些目的需要更长的时间和其他方法。

许多人为捍卫我们的理想、捍卫“团结”工会和它的荣誉已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决不会忘记这一点。我们这些仍然活着的人对那些在捍卫我们的事业的斗争中倒下去的人负有责任。我们必须找到实现我们目标的途径和方法。

我们曾受到严厉的批评，但历史将根据我们的行动对我们做出公正的评价，清除一切诽谤之词。

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大家：“我们现在怎么办？”在我们经历了1980年8月以来的这一切之后，我们如何坚持下去？许多人都来找我问：未来将会怎么样？对于我们的事业、对于人民以及那些永远离开我们而不能再与我们携手并进的人，未来将是什么？

我首先给你们一个大概的回答：我们必须保持信念，对我们最初的理想充满信心。伟大的波兰人约翰·保罗二世谈过这一点，他心里装着我们波兰的全体人民。他曾对我说：“不要忘记我们需要精神上的复兴，需要自由和道德尊严。”我们在制定行动计划时如何理解他的话呢？我们怎样把他的话付诸行动呢？我们应该为自己

找到答案。我们拥有巨大的潜力：我们的才智和无限的人力，我们将寻找应用它们的方法——我们将取得成功。

我有必要告诉你们什么事情是可能的，什么地方是真理所在地？所有参加1980年8月事件的人——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仍在进行我们的事业——必须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而且我们必须以一种公开民主的方式使用这些手段，使我们的工会、艺术团体和其他组织能够从内部得到改善，从我们的教训中获益。

作为一名工人，我主张进步而反对任何会使我们的经济遭受更大损失的做法。如果事情脱离正常的轨道，如果人们陷于绝望，如果经济面临崩溃，那我们就必须行动。我们将领导改革。承担这一工作，我们责无旁贷。

过去，工会被认为只适合处理技术上不属于它的活动范围的问题，但现在却必须具有我们开创的社会运动的重大含义。这场强大的社会运动好似一条汹涌奔腾的河流，它从如此多的地方把没有解决的问题卷入激流。现在，把这条河流分成几条支流的时机已到。这些支流各行其道，共同流向大海。

我们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工会将是第一条支流。就工会而言，我们赞成多元化，我也希望在捍卫工人利益方面依法办事。

第二条支流是工人自治，一切企业都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我们每个人必须懂得如何成为自己家庭的主人，成为工厂、大学、报社、集体、农庄、街道和城市的主人！独立的艺术团体和负责培养新思想的组织将组成第三条支流。这些团体和组织将调动起科学家、运动员、剧作家、电影导演的力量；他们不会允许我们受到压制

和损害。他们希望他们的知识分子能够很好地报效国家。

第四条支流是独立的公共机构（如学校、医院等）和团体，在这些部门中，青年人必须为保证新一代人的意志自由和表达自由而工作。我们不能允许我们的青年人以原来旧的谎言为生。我们决不能教育他们生活下去的唯一办法是欺骗和两面派。波兰的命运依靠我们的努力，而不是其它任何东西。

我们还必须找到协调这些不同方面活动的方法。任何一方面在没有其它几方面存在的情况下都不可能发挥作用。虽然我们知道沿这条路走将会出现许多错误和变化，但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方面。我准备把我拥有的一切全部用于这项计划。我们的事业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或一批人的。我们并不打算推翻政府，我们尊重政治事实和历史的规律。我们希望在这样的条件下为我们的国家出力。

我拥护我们在1980年8月提出的理想。作为一名波兰人和一名工人，我拥护我们波兰工人的事业。

我请你们这些盼望实现自己希望的人平静地回到家中。想一想我所说的话。然后我们或许能沿着我指出的方向开始前进——并确保我们不再蒙受新的损失。

这次演讲完全是我们当时的想法。我们生活的环境不允许我们的行动超越抽象的道德观念。所有其它道路都被堵塞；政府正采取一切办法来破坏我们的工作。政府刚刚取缔了学生联盟、波兰记者协会、演员协会和我们所有的独立工会——即“团结”工会。同样的命运将很快落到艺术家联盟和作家

联盟头上。

这是我走"钢丝"的开始，我发现我面临一系列的难题。我应该采取行动重返造船厂工作呢，还是利用我比较自由这个有利条件到全国各地继续开展活动？我应该重新和那些将"团结"工会转入地下的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呢，还是疏远他们？

我同一批重新聚集到我身边的亲密朋友公开讨论了这些问题。我不想在我身边聚集这么多人，这些人是自发地走到一起来的。结果在我身边形成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由各种人员组成的集体，这个集体反映了各种各样的经历和思想。这些人中有来自华沙的前顾问，也有"波兰青年运动"的代表、格但斯克大学和格但斯克技术大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还有一些怀有各种特殊兴趣的记者。许多人来自被查封的报社和地下出版机构；他们都是很出色的出版家。因此，我身边有经验丰富的记者、党内老手、天主教报刊编辑甚至第一流的电视导演。如果说这不是一个多种成分的联合体，我不知道它应该叫什么。

我把我家变成我们的总部，用类似于今天的方式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今天当然有些小小的变化。我们把起居室用作秘书处，由博泽娜·雷比茨卡负责。博泽娜是个看上去身体纤弱但却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妇女，她那圣母般的面容经常使我们想起1980年造船厂罢工期间的弥撒。令人高兴的是，她与达奴塔相处得非常好。这种融洽的关系使我们很容易把办公地点搬进我窄小的家。

博泽娜从1983年起开始保存我的行动日记。她把我每次同别人的谈话都记录下来，然后再用打字机打出来。这些材料现已收进我的档案。这时，各种集会、旅行、访问、会见和问题再次向我压来。幸亏有这些材料，才使我能够重新了

解这一时期已经忘记的那些细节。

我记得，1983年3月22日清早我在斯乌普斯克市区外的路上被人阻拦。事情是这样的，当我驾驶着“V W”牌汽车行驶到该城的入口处时，三辆警车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像往常一样，我们从皮洛托夫大街17号我家刚一出来，就被一辆特别的汽车（这一次是一辆菲亚特轿车，车里坐着四个穿便服的人）跟上了。我从随身携带的短波收音机里收听到了他们与民警总部的通话。显然，我们在斯乌普斯克市区外被拦并非偶然。

我要赶去参加一次对“团结”工会积极分子的审判。有六个人被控宣布军管之后继续从事工会活动；他们将由科沙林省军事法庭负责审判，该军事法庭决定在斯乌普斯克处理这个案件。这六个人中有“团结”工会斯乌普斯克省分会理事会副主席克日什托夫·谢格沃夫斯基。这是我第三次出席对我们工会成员的审判。我曾出席过在格鲁琼茨对安娜·瓦伦滕诺维奇的审判，以及在埃尔布拉格对一批拘留者的审判。

我们被迫等了一个半小时，然后终于对我们放行。其中一辆警车上的人把我们引到法院。当我们达到时，已经聚集在法院大楼周围的人群向我们热情地欢呼起来，许多人纷纷请我们签名。在大楼里，我受到一名年轻审判长的接待。他向我解释说，他与拦路之事毫无关系，没有理由使我们不能旁听这次审判。他发给我们进入审判庭的入场证。几分钟后，审判开始。

这一时期，我进行过多次这样的旅行。即使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但很难使人不回想1980年8月以前的岁月。现在的

审判采取各种形式。例如，像在埃尔布拉格进行的审判中，他们甚至不经定罪、也不提出任何证据便对“团结”工会成员进行判决。克维参监狱里的一些囚犯受到监狱看守的毒打：尽管专家的分析和体格检查表明他们是受害者，但还是被判了刑。

“仇恨”日益增加，当局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再次加深。被取缔的“波兰记者协会”前主席斯蒂芬·布拉特科夫斯基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布拉特科夫斯基现在仍活跃在地下出版界，他认为政府正陷入困境。政府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沿着以前选定的道路行进，但这条路却是个死胡同。人们的愤怒与日俱增，这使得任何在未来实现和解的想法都难以为人相信。某些有远见的党和国家官员已经预言，致命的时刻正在迫近。将军本人身陷困境，难以自拔：他失去了一次又一次机会，被迫放弃他结束军管的计划。这两次机会一次是在1982年12月，另一次是在1983年春天。事事都与他说的做对，好像实际情况已使他无能为力，使他丧失了意志的自由。

由于我一直处于监视之下，所以我不得不事先计划好我的每一行动。我的一举一动都被好几对警惕的眼睛盯着。我还要考虑到，我所做的一切都会被公众看到，而且要受到公众的裁决。

正是这种紧张的情绪使我这个领导人受着沉重的压力。在紧急的情况下，当你突然发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去做你必须做的事而且你的良好意图超出你精力和体力所能承受的限度时，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每当制定计划时，我们还必须问问自己：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做这件事吗？我们能应付即将到来的危机吗？

我在计划每一步行动时，其谨慎程度就好像我是在攀登一座陡峭的山峰。即使如此，各种事情的发生仍常常迫使我突然改变计划，结果与他人的计划发生了冲突——这些人打出的牌和我的一样合理。

这正是1983年4月发生的事情：当时我应邀出席“团结”工会地下组织临时协调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对于那些在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里不顾军管而一直坚持工作的人来说，这次会议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若出席这次会议将会损害我的顾问为我精心计划的策略。我们的目的一贯是迫使政府采取行动，改变局势，并提出它自己的计划。我们最不应做的事情是给政府提供任何借口。他们现在可该说：瞧，连“团结”工会运动的领导人也承认他的组织是地下的了。由于军管期间政府被授予的新的权力，它能够迅速把整个运动彻底摧毁，连根拔除；它现在愿意冒此风险。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去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使我们运动中的两支力量和好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论公开活动还是地下活动都是绝对必要的。因此，重要的是加强地下力量，支持那些从事地下工作的人，消除人们与暗中活动的积极分子进行接触的恐惧心理，洗刷官方宣传机器对他们的谴责之词，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运动。只要我承认地下活动是合法的，就会有很多人愿意参加地下活动。我决定参加会议的另一个原因是打算听一听他们说什么，同时也可以阐述自己的观点。我想要每个人从此都清楚地知道，我以前一直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

我们还剩下几个技术性的问题尚未解决，其中最紧迫的是如何甩掉监视我的秘密警察，并且使他们不会再次对我的那些从事地下活动的同事进行审判。

我们保持着一切必要的警惕。当我们收到第一次邀请时，

我们没有给以答复。直到我们证实这个消息和第二次邀请的来源绝对可靠时，我才接受了邀请。

1983年4月9日是星期日。这一整天我们都用来施放迷惑对手的“烟幕弹”。我在住家四周走动，大声同别人谈论着我去华沙的计划。我经常去华沙看望教会里的熟人，并与我的顾问会晤。在格但斯克，对我的监视一般是分段进行的，这一段由这一部分警察对我监视，下一段由那一部分警察对我监视。在我家周围监视我的人员一般是先把我交给路边执行监视任务的汽车。这一次，他们可能也像往常那样事先用无线电话同其城区的警察当局通了话，请求它们在沿途协助监视我们这一行人。

我已获悉，地下组织准备在通往华沙公路上的一个靠近卡尔切姆基的地方与我们取得联系。因此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在到达卡尔切姆基之前寻机甩掉监视我们的警察。我们离开我家时，根本看不见他们的影子。我的司机米耶泰克·瓦霍夫斯基开动了汽车。这时警察乘坐的汽车出现在离扎斯帕不远的立交桥上。我们绕环行路行驶，从立交桥下穿过，加大油门飞驰，以此甩掉了他们。去华沙的路线一般是从桥上经过，而我却走的是桥下。我们走了许多弯路才找到去华沙的道路。当我们驶往目的地时，跟踪我们的警察正忙着在城里找我们呢！我们自由地前进着。

我们经过一个标着换车去卡尔切姆基的地方，一直驶到策德雷·维耶尔基耶，但却一个人影也看不到。我们于是又返回到来的路上，把车停在路旁。一个男人从树后闪出，说出一句口令。公路稍远处有一辆菲亚特轿车。我坐进汽车，飞驰而去。

这里我必须指出，组织这次会议的那些人的办事效率给

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除兹贝谢克·布亚克外，他们把从事地下活动的每个人都召集到了。布亚克在华沙陷入了专为捕捉他而设的埋伏圈，虽然警察没认出他而让他走脱，但他还是遇到了很大麻烦。他脱险后躲了起来，没有再次冒险暴露自己。这样做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布亚克在我们的地下组织里已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因此必须保护好自己。

这次历时三天会议的重要意义主要是象征性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不能代替其他人的作用。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待在自己的岗位上，那里是最需要他的，也是形势要求他在的地方。他们告诉我“团结”工会地下组织各机构组成了一个联络网，还讲述了他们的活动。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地下组织有大量的工具和设备，特别是有一套精密的音响设备。在我们长期战略的这一阶段，地下组织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活生生地证明了我们的存在，也是我们继续存在下去的保证——即使像所有地下运动那样，它也不能支配自己的最后命运。像任何地下组织一样，我们地下组织的成员也应该按照当时的具体情况发挥不同的作用，但同时牢记地下工作者必须遵守的纪律。

同临时协调委员会进行会晤之后，我重返埃尔布拉格市中心。为了在路上不被认出来，我戴了一顶棉帽，放下帽子的护耳，戴上别人给我的眼镜。当我从汽车内的反光镜中看到自己的样子时，我觉得自己很像一个夜行人。我向一辆出租车招手并对司机说：“我们要去格但斯克。”我一路上默不作声。一小时后我回到了家。我身上没带钥匙，只好去按门铃。我看见达奴塔从猫眼儿的孔中正窥视我。然后，我听见她的声音：“您要找谁？”

我口袋里有一张宣布我同地下组织会晤的联合公报。我同意我应把这件事公之于众，也同意临时协调委员会在独立刊物和地下刊物上间接地予以证实。公报很简单，仅有三句话，只是公布一下消息。然而，我正期待着政府对此事的愤怒反应。

第二天，即星期四上午，电话铃一直响个不停。同临时协调委员会开过三天会之后我想多睡一会儿，所以公报是先由达奴塔，后由我的同事传达到外面的。事后，凡是见到过这份简短公报的人都被当局叫了去，受到长时间审问和各种搔扰。当局抓住一点借口便大加刁难，有的人为此被拦住去路，有的人被没收携带的报纸，有的人被吊销驾驶执照——甚至他们的家属也受到威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

在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政府发言人耶日·乌尔班给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口实，事后在民警总部我被审问时我很好地利用了他说的话。乌尔班以前一直认为我不再是“团结”工会主席，并三番五次地强调说，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公民，结果他现在落入了自己设下的圈套。当国内外记者问他我与临时协调委员会会晤的重要性时，他被迫坚持以前的看法。他不能承认这次会议有任何社会意义。他只能把这次会晤看成一次私人性质的会谈。既然他这样看待这次会晤，我也就顺水推舟。当我被问及此事时，我也坚持这种看法。

摘自1983年4月13日的行动日记

14:10 几名保安官员和一名穿制服的民警来到莱赫家里，他们要求莱赫同他们一道去民警总部，到那儿一切都会清楚。莱赫和他们在门口吵了起来。因没有适当传人手续，莱赫不愿跟他们去。一个保安官员说，如果这

样的话，他将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最后，莱赫同意去了。那个民警站在后面，守卫在门外。达奴塔大声喊着蔑视政府官员的话。

15：35 瓦文萨夫人给民警司令安德热耶夫斯基打电话，询问莱赫的消息。回答是："司令一小时后回来。"达奴塔又打电话给省检察官，询问莱赫被捕一事。检察官不在办公室，没人能回答她的问题，秘书什么也不知道。达奴塔讲述了被捕时的情况。对方要她几分钟后再打电话。

扬科夫斯基神父已经来了，他正用电话同记者交谈。

16：00 达奴塔打电话给安德热耶夫斯基将军。他做了回答。达奴塔讲了莱赫被抓走的经过，特别强调说，这几个官员不说自己的身份，等等。她问莱赫何时能回来。安德热耶夫斯基回答说，他认为达奴塔也应该去谈一次话。达奴塔不同意。她认为这是在恐吓，甚至是讹诈。她问谈话的目的是什么，安德热耶夫斯基告诉她，如果她能去谈谈，那对她自己很有好处。达奴塔没有被说服。安德热耶夫斯基不愿意透露谈话的目的。接着两个人就法律问题进行了一番争论：民警有权想审讯谁就审讯谁吗？达奴塔说，她丈夫在那儿就够了，并要求对方解释一下为什么她同意去谈话对她很有好处。不管怎样，达奴塔说她因健康原因无法同意对方的建议。达奴塔问莱赫什么时候回来，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她将以什么身分受审呢？安德热耶夫斯基没有说；他只是重复自己的建议，她应该同意这次谈话。

莱赫于次日早晨获释回家。

1983年4月18日，星期一

8:00 莱赫与扬科夫斯基神父和约瑟夫·杜雷阿什一起前往华沙，他们要去华沙向犹太居民区的纪念碑和墓地献花。他们走后记者才得知这个消息。

我们这次华沙之行是为了纪念华沙犹太人起义41周年。这充分表明“团结”工会不仅关注未来，也有义务回顾过去。在今天的波兰，反犹太主义不再像从前那样是人们关心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我们过去历史中的这种重要情况。即使这样做似乎与目前的形势关系不大，但我们觉得我们有义务为那些特别是在纳粹统治之下甚至不再能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只能有尊严地死去的人作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动身来华沙时为马雷克·埃德尔曼博士带来一封便信。他是出席“团结”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1943年华沙犹太人起义唯一尚健在的犹太领导人。

致马雷克·埃德尔曼博士

亲爱的朋友：

虽然我们的生活之路是如此的不同，但我们曾作为同一事业——人类的事业——的代表而相逢。在我们被赐于一次生命的人生之途上，我们都致力于表达共同的真理和共同的信念，按照我们的良心所指而行动——我们的头高高昂起，我们以真正的人的姿态去行动。

我曾努力想象华沙犹太人起义那些悲惨岁月的情

景，那时您面临着最困难的考验。我对您在那次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作为一名起义领导者所发挥的作用钦佩不已。我也深深地敬佩您过去发表的公开声明，您十分明确地表示，您不仅为生存而战，也为得到和平而有尊严的生活权利而战。

尽管我们的经历不同，但我们再次发现我们彼此走到了一起，作为具有坚定和不可动摇的决心的人或市民在“团结”工会这个波兰工人为能够体面而诚实地生活而建立的组织中工作。这样，他们才能够按照宗教信仰和天赋人权生活。

正是这种追求使“团结”工会得以诞生。我们正朝着共同的目标并肩前进，为地球上的人类也为波兰的同胞赢得他们真正的权利而战斗。

尽管政府实际上已把我们包围，我和我周围的人还是决定于4月22日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其目的用拳击的术语讲就是正面一拳打退政府对我们的围攻。我想让人们知道，我决心采取一种公开的策略，我不愿扮演当局一传就去受审的可疑分子的角色，我不愿使自已总有一种内疚感。我们还决定像“团结”工会合法存在时所做的那样邀请新闻界和当地电视台的记者参加记者招待会。我们的目的还在于消除新闻传播媒介对我的攻击在工人中造成的心理障碍。沿海地区各报社的编辑人员对如此出乎意料地接到出席记者招待会的邀请显然都深感吃惊。我们甚至在电话里可以感觉到他们那惊呆的神情——他们沉默了那么长时间，以致我们怀疑电话是不是被切断。

西方记者对“团结”工会已经着了迷：大多数记者想弄清，它是不是一个致力于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以颠覆政府的地

下组织。他们只热衷于报道耸人听闻的消息，例如政府对我或“团结”工会采取的镇压措施以及我们保卫自己的对策等等。他们好像认为，我们是一起国际阴谋的凶手。实际情况是，曾出现过三次试图谋杀我的阴谋。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谋杀我的阴谋是否与阿里·阿格查企图谋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臭名昭著的阴谋有关。西方记者也往往跟着政府发言人耶日·乌尔班的话转：他在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似乎总要说点关于我的事情。乌尔班只要一提到我的一些事情，几分钟后，准有记者给我家打电话。据说，全世界都想知道我对乌尔班刚刚说过的话的反应。然而，我们想要做的却是在我们认为合适的时间独立地就我们自己选定的题目发表意见，而不是不加思索地被迫对政府的谴责和含沙射影的攻击做出反应。

小时候，我常常坐在波波沃我家的那所小房子里和我继父一起收听西方电台的波兰语节目，自那时以来，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正是由于西方的这些短波广播，才使我能够了解波兰被掩盖起来的另一面。现在我自己却成了西方新闻传播媒介关注的中心之一！由于西方的新闻传播媒介，我才敢大胆地发表意见，而用不着担心自己说话的权利会不会在一夜之间被剥夺。我敢大胆地讲话，我知道人们仍在倾听着我的声音——由西方无线电短波反馈回来——即使“团结”工会已被官方取缔。对于我，报纸、广播和电视都是重要的。西方的广播和新闻机构使我的被隔绝的同胞得到了新的消息来源，而不是波兰官方的和经检查舆论工具提供的东西。西方的舆论媒介连同波兰的地下出版物一起给人们带来了波兰所缺少的东西。这是一股新鲜的空气。

新闻界经“清查”之后，报刊的工作人员中只留下曾声明严厉地批评过新“‘团结’工会制造的无政府时期”的记者。即使这样，我也没有对波兰记者关门。然而，从这时到1987年3月这五年时间里，我只记得波兰记者来过我家三次。记者想要对我采访，必须经过有关当局的批准，“你们可以写瓦文萨，但必须以批判的眼光写他。你们不能找他对某事进行评论或征求他对某事的看法。”这样，我只有依靠西方记者了。

虽然同新闻界接触有其内在的限制，但我总喜欢同记者交谈。人们都知道，同记者谈话最重要的是能表明你的立场，让对方了解你的态度和打算；要想使谈话生动有趣，你还得有点幽默，不时使用谚语和比喻。这不同于和专家、外交家或工会活动家谈话；和这些人谈话，你必须讲得非常具体。

毫无疑问，一个外交家首先是代表着他的政府和国家的利益。因此，你要永远记住，一个外交官对在这个特别的国家中，一个波兰人没有能够同另一个波兰人取得一致意见一事的兴趣几乎等于零。这个问题或许能使一般老百姓产生兴趣，也可能引起新闻媒介的注意。外交官只想知道，他的国家有什么利害，他的国家在现实条件下可以获得什么利益。谈到这里，我想对军管时期的一个主要问题谈谈我的意见。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后果。这个问题就是西方对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为首的波兰政府所实行的经济制裁。虽然我拒绝向记者谈论此事，但我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国的外交官。

那个讲猎人掉进自己设下的圈套的故事再精辟不过地说明了经济制裁这件事，不过仅用这个故事说明这个问题似乎太简单了。1980年8月罢工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为了进行他们迫切需要的改革，为了得到应该成为他们生活一部分的

公民自由，他们愿意做出牺牲。我们当时这样说过，只要某些事情将来有希望好起来，我们愿意一点一点地努力去做。1981年12月的情况也是如此。那时，作为对宣布军管的反应，西方对波兰普遍实行经济制裁。波兰几乎所有人都把此举视为对我们的明确支持，对政府的一种严厉谴责。毫无疑问，西方的经济制裁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但我们所有人都指望政府会为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感到十分震惊，或者说为经济混乱和社会不满感到深深的忧虑，从而寻找诸如同“团结”工会妥协这样的解决办法。在一个普遍要求改革而大多数人又被剥夺了影响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权利的国家里，我们无法保证西方的援助或延期的银行贷款能得到合理而有效的使用，也无法保证将来归还债务。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贷款在短期内不会带来好的结果，而可能是在将来成为一种负担。我似乎认为，在我们做些事情之后再去寻求西方的新贷款，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进行“团结”工会所倡导的社会改革。

另一方面，政府把我的话解释为：瓦文萨认为应该对经济制裁表态；他说制裁越厉害，政府的日子就越好过。

将近1983年4月底时，我终于接到了回造船厂工作的通知。这是我第三次到这个“团结”工会诞生之地工作。

我以九级电工的身分被工厂雇用。他们把我分配到一个小组去干活：这个组虽然人数少，但却是一个由各种人组成的令人感兴趣的混合体：有一个诚实可靠的班长、一个工会积极分子、一名党员和另外两名工人。我的工作是修理电瓶车，据说这些电瓶车1970年曾“推动了革命”，1980年罢工期间又被当作讲台，我在一个小车间里干活，这个车间同船

厂其它车间几乎完全隔绝，可我却感到同船厂各处很近。

第一天下班，我用了至少两小时才回到家。当我走到造船厂二号门前经过造船工人纪念碑的时候，我不得不同几千个人握手，给几百张照片签名。对此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好像重返工作岗位使我的双脚踏在了坚实的土地上。我所有的朋友都使我相信，我们做过的事情是正确的。

一开始，我在休息时总要去小卖部转转，工人们常常坐下来问我各种问题。监视我的官员总是偷听我们的谈话，与我交谈的工人不久便发现自己遇到了麻烦。我很快得出结论，这种临时的聚会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当整个世界都期望我在受监视的情况下做些事情时，我不能置若罔闻。我因此决定最好是把我的公开活动转移到工作场合以外，主要是利用我家作为活动基地，就像我从监禁回来到返回造船厂工作以前那段时间做的那样。我开始在车间吃午饭，保安人员也不再捣乱；他们只是对我进行监视。在造船厂，我们创造了一种不说话也不聚会而进行交往的方式：如果造船厂要发挥以前那种作用，我们就必须习惯这种新的交往方式。由于地下刊物、厂外聚会以及外国电台的广播，公众才得以了解我从那时起所做的一切和我想让人们知道的事情。

我的工作日变得更长了。我每天早晨5点起床。达奴塔也在这时跳下床来，做好早饭。我背上装有茶水或咖啡的保温壶，将几片三明治塞进书包，然后跑下楼去。亨雷克·马祖尔“爷爷”每天黎明骑着摩托来到我的楼下。这位来自维尔诺的优秀老海员曾经是一名水手长，自1980年8月以来一直是我最亲密的伙伴。他是那种为了友谊不求任何回报的朋友。他好像是我呼吸的空气，总是不离我的左右，不管什么样的天气，他从不考虑自己，没有一点自私之心。我们二人

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血肉之躯，他很像一个保护我的老大哥、四名保安官员照常在楼外等候我，通常是站在他们的汽车旁。有时我看见他们在那儿打盹，便走上前，拍着他们的汽车顶大声喊道："醒一醒！该出发了！"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捉迷藏游戏，他们已不在乎有什么实际结果。一次，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我竟说服他们帮我发动了汽车。

下班后，我通常要赴一系列的约会。这些约会有时是社会性的，偶尔也有一些其他的约会，如同外交官讨论问题，同国内外的工会活动家谈话和接触，同我们的顾问会面，等等。亨雷克·扬科夫斯基神父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他在大多数场合常常扮演东道主的角色，我们同外界的接触经常是在圣·布里吉德教堂。斯坦尼斯瓦夫·博格达诺维奇主教在附近的诺特雷·达梅长方形教堂也是这样。很难说我会在什么时间回到家，但通常是在下午4点以后。稍稍休息之后，我便开始下一个半天的工作，计划后几天的策略，与顾问一起起草各种声明，或是接待其他来访者。

1983年5月1日即将到来。我已决定在家里度过这一天。更确切地说，我打算在我家的阳台上度过这一天，我要站在那里向这一天从城市其他地方赶到扎斯帕区我的住宅前的人们发表讲话。人们总期望坚强不屈的达奴塔也在这种场合出现。在我被捕以后，她已体验到同大群大群的人接触的滋味；在最近为我们的女儿玛丽亚·维克托丽亚举行洗礼时，曾有4万人拥到我们家周围来庆祝这一时刻。除了去年5月1日之外，这次洗礼——是在我即将从阿尔瓦莫夫获释时举行的——可以说是整个军管时期最重要的一次群众示威活动了。达奴塔在这么多人面前像我过去一样被强烈地吸引着；她常常跑到窗口或阳台上，探出身子向人群讲话；当民警向

群众进攻时，她就大声地骂他们。每当这种时刻，她便不再是七个孩子的母亲，而是一个有领袖魅力的革命者。

5月1日这一天，示威群众同民警发生了几次激烈的战斗。当几队民警开到我家的大楼前向成群的示威者发动进攻的时候，我的邻居们纷纷从窗口向下猛掷果酱罐、花盆、破旧家具用品，向下泼倒脏水。这种场面很像中世纪的攻城战。成群结队的孩子也参加了战斗，并学会了如何防御毒瓦斯。此后的几年里，扎斯帕区的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之一就是模仿1983年5月1日的战斗场面。孩子们分成两拨儿，皮洛托瓦大街的孩子是一拨儿，斯塔尔托瓦大街的孩子是一拨儿，两拨孩子发动假想的战斗。在最热心这种游戏的孩子之中就有我的两个儿子斯拉韦克和普热梅克。我经常一声不响地走近他们，我的坚持使用非暴力手段的说教常常激怒他们；和解的思想对他们毫无意义。就这样，他们在这种有组织的儿童游戏中找到了一个发泄他们压抑情感的办法。这使我担心起关系到未来的事情。

如果说每年的5月1日是对我们的坚持力的考验，那么它同时也是我观测公众支持和士气的晴雨表。1984年的"五一"活动是采取大游行的方式，游行路线与官方组织的游行的路线平行，但方向相反。按照计划，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处来了一个大转弯，同官方的游行队伍合在一起。尽管受到民警的多次攻击，但我们还是成功地把"团结"工会的队伍带到了政府官员及其贵宾就坐的观礼台前。我们的队伍在他们面前停下来，我举起手臂，打出胜利的"V"字形手势。

1986年，格但斯克当局决定在"五一"节这一天采取特别的管制措施，以避免发生令他们难堪的事件。在官方游行

队伍经过的格但斯克市区的路线,军队和民警不许任何其他人和车辆通过。但到这时,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时代:5月1日前的那个星期六，发生了一个悲剧，它提醒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大家可能一齐被彻底毁灭，这个悲剧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大爆炸。致命的烟云从东南方向的乌克兰飘过波兰，水果、蔬菜、牲畜，可能还有人都受到了污染。面对这次突然发生的紧急事件，政府的反应可以说是极其愚蠢的：它对我们面临的危险干脆不予理睬。切尔诺贝利事件和它带给人们的无比恐惧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这种事情发生时，你禁不住要看看自己，看看你的家人，特别是看看你的孩子，并为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而感到惊叹！你会问自己，你的孩子将来是否能生出健康的孩子。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一个世界大家庭里，我们具有共同的命运。在共同面临核灾难的情况下,我们难道还要相互残杀吗?非暴力斗争难道不是对将来的唯一回答和我们的唯一选择吗?

我们现在正以一种新的认识在生活着。切尔诺贝利事件迫使我们对核政治进行思考。正像我们卷入“团结”工会的斗争一样，我们认识到，我们还就人类的未来卷入了一场同世界上热衷于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政治家们的更大冲突。

我前进的速度超过了我的预料。1983年4、5月间，我们设法振兴我们的组织，看看能否把“团结”工会的活动完全公开。我们同来自华沙省工会的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制定了行动计划，准备同军管时期被解散的工会一起制定一个共同纲领。我应该承认，在“团结”工会正式存在时期，我们曾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其它许多自由工会的存在，它们只

能默默地开展自己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军管的实行，它们也受到了政府旨在消除独立工会运动而采取的镇压措施的严重打击。我们同华沙方面的工会领导人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我们一致反对政府不给我们任何选择方案这个关键问题上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在这场复兴独立工会的运动中，每个工会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就是我们这次会晤得出的结论。

在格但斯克，这个倡议是在怀疑中被接受的。人们问道，"其他工会"是不是想要扮演中央组织的角色。这种对运动中心的迷恋曾长期折磨着波兰，而"团结"工会则一反传统的观念，断然认为，没有必要让一切意见都出自一个中心，有几个中心发表不同的观点并不是什么坏事。这是我们运动的基础。当"团结"工会最初建立时，大多数人都曾认为，在首都以外地区设立我们的总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意味着"团结"工会可以躲避政府对设在首都的大多数组织所施加的那种直接的、有形的压力。即是这样，波兰这一古老而根深蒂固的偏见仍在一些人的心里郁积着。

华沙方面的工会组织负责各种准备，组织各种讨论，起草文件，安排各种会晤。一次由波兰所有工会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即将召开，会议日期已确定下来。我的行动日记完整地记录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下面是日记的摘录：

> 1983年5月6日，星期五，莱赫乘高速电车来到造船厂。他很少乘电车——只有他预先准备不使用他那辆很容易被认出来的"大众"牌白色大货车汽车时他才乘电车。昨天他曾问我们星期六和星期日有何打算，并且问我们是否愿意立即到华沙去。
>
> "那儿有什么有趣的事吗？"我们问道。

“你们可以见到一些人，”他回答说。

米耶泰克·瓦霍夫斯基的白茹汽车于下午二点半停在造船厂三号门前。莱赫·卡琴斯基和亚采克·梅尔凯尔已经坐在里面。阿拉姆·雷比茨基和阿达姆·基纳谢夫斯基坐在另一辆菲亚特汽车里，这辆汽车是早先瓦文萨任工会主席时在正式场合使用的。瓦文萨坐进白茹轿车。我们同意在半路上一家路边旅馆稍停一会儿，然后就到华沙去。两辆车行驶到奥尔什蒂内克，我们按计划停下车，休息用餐。这里有一家旅馆，旅馆里有几间房子。我们选了一间离公路最远的房子。饭馆还不足半间房子大。女服务员没过多久便认出上唇蓄着深褐色大胡子的人是谁了，她们开始在房间的一角低声谈话。当我们在桌旁坐下时，大家的情绪好极了。莱赫拿起菜单，说他要吃饭：“我们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谁知道要等多长时间才能吃上下顿饭。”他一边开玩笑地说着，一边点了一大盘火腿。

尽管我们此时又说又笑，但实际情况却是很紧张的。透过窗帘，我们看见一辆民警的无线电通讯车从饭馆前驶过。这辆车闪动着指示灯，表示它要驶进饭馆边的停车场。我们吃饭时没有受到惊扰。当我们再次上路时，瓦文萨过去乘坐的那辆菲亚特轿车被拦住了。司机把车停在路边，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不一会儿，白茹轿车从我们身边驶过，但也被叫住了。车上所有人都必须出示自己的身分证，我们个个照办。此外，没有发生别的事情。当夜幕降临时，我们在华沙郊外通过了同样的检查。在一处环行道上，交通民警拦住了菲亚特轿车，示意它在便道上停下来。此时，白茹轿车已消失在车流

之中。民警让司机出示驾驶执照，并对驾驶执照检查了好长时间，然后说道："你不用紧张！这辆车是瓦文萨的吧？"

"是的，"司机回答说。"他刚到华沙。"

"这太好了！"民警说着，显出很高兴的样子。他的态度看来是真诚的。

"有什么问题吗？"

"你的车牌不很清楚，但既然你们是从格但斯克来的，那就请上路吧！"

我们把车停在克鲁恰大街附近距西拉-诺维茨基的住所不远的地方，我们要在那儿举行预备会议。白茹轿车停在院子里。一个年青人站在电梯前；当我们走进电梯时，他仔细地审视着每个人的面孔。我们受到主人女儿的接待，她把我们带进一个房间，其他人已经聚集在这里了：莱赫·卡琴斯基、梅尔凯克、瓦霍夫斯基、雷比茨基、基纳谢夫斯基和来自马索维亚地区工会委员会的斯坦尼斯瓦夫·鲁西内克。

在西拉-诺维茨基用作处理法律事务的大办公室里摆着糕点和咖啡。瓦霍夫斯基走到俯视大街的窗户边，准备收听一个小型半导体收音机，他把收音机调到军方和特别部门使用的频道上。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了"，他对房子里的人说道。"他们已经封锁了各个方向的道路，正向这个地区调动几个特别大队。"

坐在桌前的鲁西内克拿出一份文件，这是1981年12月13日以前存在的所有工会的代表几星期讨论的结果。这些工会包括各种自由工会、各种工会的分会、波兰教

师”工会和“团结”工会。我们全都看了文件的内容，然后又重新看了一遍。鲁西内克将身体倾向瓦文萨。他在等候莱赫的回答时显得有点紧张。

“你们认为怎么样？”莱赫问道。

其中一人说道:“虽然起草这份文件的用意是好的，但内容太一般了。如果接受这个文件，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呢？用军事术语来说，这不是在扩大阵地，而是在压缩阵地。我们有必要这样吗？这也许是官方要采取的路线。”

“我认为没有必要现在做结论，因为我们正面临着很大压力。我建议延缓签字时间。”雷比茨基说。这是他劝说别人不要仓促行事的习惯。

但瓦文萨仍在仔细看着这个文件。鲁西内克沉不住气了。

“大家如果今天不在这个文件上签字，我就要从这件事中退出来。”他重重地说。“这件事与一些重要人物有关，他们今天要对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决定。他们正在离这儿几条街的地方等着我们。”

当我们的主人瓦迪斯瓦夫·西拉 诺维茨基与扬·奥尔谢夫斯基来到时，这种对话被打断了片刻。接着，他们也坐在桌边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一切看来都是仔细考虑过的，”西拉-诺维茨基说道。“这是写给议会的一封信。其用意很明显。”他采取的是他那一贯温和说服的方法，他的话是讲给莱赫听的。奥尔谢夫斯基也表态支持这封信。

“我想听一听每个人对这个文件的看法。我们格但斯克来的人也有权发表意见。”莱赫说道，这样就推迟了

最后做出决定的时间。

“有人正等着我们，我们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即使有反对意见，我们也必须接受。”鲁西内克催促着说。

“好吧，那就决定了。我们签字。”莱赫回答道。“你们几个人同我一块去，我说的是亚采克·梅尔凯尔和莱赫·卡琴斯基，其余人在这儿等我。”

鲁西内克第一个站起来，把一份文件复本塞进公文包里。

“我们乘我那辆菲亚特小车去。车停在离这不远的街上。如果幸运的话，我们会在那里找到的。”莱赫说道。

前门砰地一声关上了。西拉 诺维茨基在他的书案前坐下，桌子上放着许多契约和翻开的档案。他正在审阅那些文件。当门铃一个劲地响起来的时候，他似乎没有听见，完全沉浸在文件之中。片刻之后，一个50岁左右的满头白发男人冲进屋子。他身后跟着一个穿便服的男子，最后面还有两、三个人。其中一人喊道：“谁都不许动！我们是内务部特别分队。”

这伙人中岁数最大的那个人脸色气得通红，开始对我们中间离他最近的一个人进行疯狂地搜查，他大声喊着：“布亚克在哪儿？”我们一动不动——我们仿佛是在一部侦探影片里；我们害怕我们的姿态会激怒这些过于激动的人。他粗暴地喊叫着，既然他如此不礼貌，我们便开口了。

“我们是从格但斯克来华沙的，一路上与民警同行，您必须知道这一点。”来自沿海地区那些人中有个人这样说。

"上校，我们认识，对吗？"西拉-诺维茨基说道。

"我们太认识了，先生！"满头白发的人答道。

"那么你们到这里来做什么呢？你们为什么这样激动呢？我可真要抱怨了。"西拉-诺维茨基说。

同时，另一靠近桌子的男人用手指在桌子上乱翻。然后他从桌布下面抽出那封信的副本，这是门铃响时有人塞进来的。

"请看吧，这不是什么秘密，是给波兰议会的信。"西拉-诺维茨基说。

"这封信由我们处理。我们要对这里进行彻底的搜查。我们要拘留所有的人。"

上校已经平静下来。他的举止和面部表情已经有所控制，只有他那双凶恶的眼睛仍暴露出他内心的狠毒。

一刻钟后，来自格但斯克的人被强行集中在莫斯托夫斯基宫的保安部队总部。他们被依次带进一间屋子：第一个是瓦霍夫斯基，接着是卡琴斯基、梅尔凯尔、雷比茨基、记者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盖莱梅克教授，以及其他在给议会的信上签名的人。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场面：深更半夜，在一间小屋里，他们把1981年12月13日副总理宣布"零点选择"之前的波兰工会运动的大多数代表人物重新聚集在一起。唯一不在的是莱赫。

当局已经对每个人的家进行了搜查。盖莱梅克教授特别沮丧，因为他们没收了他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所需的一些重要材料。一小时后，西拉-诺维茨基那笔直的身躯出现在走廊里，他由一个身穿蓝色牛仔裤和皮夹克（这种名服无疑是从外汇商店买来的，在年轻人中很流行）的年轻人领着。他拿着一捆文件，我们一眼便认出这是

他书桌上的那些东西。

据同莱赫一起乘菲亚特轿车离开的卡琴斯基和梅尔凯尔讲，他们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便到达了正在等候他们的那些人所在的一个住所。他们走进大楼，瓦文萨第一个登上楼梯，然后是卡琴斯基、梅尔凯尔和鲁西内克。刚刚上楼没几步，保安官员就到了，他们把住了门口。在一阵简短的互致问候之后，每个人都在信上签了名，每个签名者都保留一份副本。当莱赫同他的格但斯克同事一起出来时，保安人员放他们走了，但对其他人却不是这样。保安人员冲进那所住室，没收了那封信的全部副本，对住所进行了搜查，并逮捕了除了主人妻子以外的所有人；这个妇女显然不在"零点选择"行动范围之内。

瓦文萨一行人回到菲亚特汽车里，向波兰主教团秘书处驶去。当他们快要到达时，梅尔凯尔在监听警察行动的收音机里听到了下面的调遣命令："截住汽车，我们要拘留他们。"警察迅速照办。他们只把瓦文萨带到莫斯托夫斯基宫，在院子里停了一会儿，又将莱赫带回格但斯克。早晨，莱赫发现自己被带回了家。

与此同时，在莫斯托夫斯基宫被拘留者逐个被带进一间隔离室接受审讯；其中几个人还被搜了身。

在5月的其余时间里，我和我的同事受到一系列的袭击。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压抑；透过重重浓雾很难看清事态的真相。

国内外的许多人都在努力了解波兰将如何发展。我同各种人物进行了几百次会晤，使我有许多机会对这主题发表我

的看法。然而，仍然有许多人要我回答一些基本的问题。下面就是其中的几个问题以及我的回答：

问：如果您决定参加“民族复兴爱国运动”与政府妥协，您的声誉将会受到损害。另一方面，如果您不同意做出让步，您就将成为局外人，无权同政府进行直接谈判，或甚至更糟，您将无权同政府接触。您打算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答：我们这些在“团结”工会里的人不是“民族复兴爱国运动”的发起者。我们在国家许可的情况下建立了独立工会。这才是我们关心的事情。

问：党和政府的一些代表说，他们除了用剑来回答别无选择。其中一些人认为，假如“团结”工会更现实一些，社会就可能比较稳定，当局也就不会采取行动。你对此有何看法？

答：他们想让我们跪下来达成一项协议。波兰人比别人更清楚这种处境会是多么的难受。但我们也不会仅仅为了表现坚强就匆忙做出结论；我们不想让下几代人在自取灭亡的口号下长大。历史的一个篇章已经结束；我现在是呼吁进行抵抗，直至我们的某些问题得到解决，为下一代人建立起比较好的生活环境。我们需要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统治集团中简单的人事变动。波兰人只须看一下地图就会明白，我们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重建我们的新家园，新家园应该为整个世界服务。

尽管对教皇的即将来访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推测（我在同记者的谈话中对这些推测一一作了回答），但我坚信，教皇1983年的来访将给我们以巨大的帮助。关于教皇的来访，我同报界谈过多次，以消除人们的种种怀疑。在一年前的军管

期间，保安部队针对波兰主教团采取的步骤，起草了一份题为《对教皇1982年8月访问波兰所预料的危险的备忘录》的文件。他们列举了一系列所谓有力的证据，譬如他们认为波兰有350个恐怖组织，普遍地非法拥有武器、弹药和烈性炸药等。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1983年5月1日前夕，政府直率地指出，我们正在组织的“五一”示威活动可能危害教皇的访问。当时，我与红衣主教格莱姆普接触密切，我发现我们二人对教皇来访意义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也不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些教会组织对教皇的来访也抱有这样那样的怀疑）。我也考虑了临时协调委员会的看法，该组织的领导机构这次没有受到政府的挑战。我不想让我们的人民被吓得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愿望，因此我决定，最好的办法是呼吁人民自己做出判断；红衣主教格莱姆普赞同我的这个看法。

我们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了我们的立场，提请当局注意我们的最低条件：工会应该实行多元化，允许建立工人自治委员会，重新提倡个人的基本自由，彻底改革全国的新闻传播媒介。人民的回答是清楚的。

5月1日的庆祝活动并未影响教皇的访问。格但斯克方面事先并未被告知教皇来访的路线，对于我同他的会面更没有做任何安排。但我完全信任教皇，心悦诚服地愿意执行他做出的任何决定。但整个国家的士气并不单单依赖我们各自的情感和愿望。

另一方面，政府的宣传机器正在掀起一场破坏波兰人民意志的猛烈宣传，政府要尽其全力达到这一目的。在这场宣传战中，我是报刊和电视大肆攻击的目标。在这种甚嚣尘上的宣传中，只有教皇会见我的决定能够抑制政府加在我头上的种种非难。他甚至面对官方的宣传机器，直接驳斥对我的

攻击。我认为，当局十分清楚教皇这个决定的份量。

当我根据同梵蒂冈的议定书提出晋见教皇的申请时，我考虑的还不是那么多。我之所以提出申请，是因为从三年前我们举行罢工的第一天起，我便深深感到在精神上与教皇的一致。决定罢工时，我们承担了一种道德上的义务，那就是按照教皇的教导追求我们的目标。正是由于把这些教导化为实际行动，我们才达到了一些目标。经过一番思索之后，我最后决定请求教皇接见。

我回想起1978年10月那一天我们听到一个波兰人被选作教皇这个激动人心消息的情景。当他1979年首次以教皇身分访问自己的祖国时，我们都不禁感到，我们被世界选中了，好像世界最终注意到了我们，最终选中了我们。这次访问期间，我们几百万人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享受共同的欢乐。当格但斯克自由工会的成员安娜·瓦伦滕诺维奇、博格丹·博鲁塞维奇和另外几个人准备一起坐我那辆破旧不堪的汽车去看教皇时，汽车偏偏出了毛病。由于我无法获得更多的假（我当时在汽车修配厂刚刚工作不到一个月），其他人只好撇下我乘别人的车去了。安娜后来告诉我，她如何在这个被认为是波兰的摇篮的格涅兹诺城市所在地从很远的地方看见了教皇的身影，我认为自己不可能参加人们星期天对教皇的朝拜了，因为我预料那一天交通会十分拥挤。拥挤在成群的朝拜者中间我看不出会有什么作用。这样我错过了一个难得的，也许是永远不会再有的机会。

但实际上机会还是有的。1981年1月，我作为“团结”工会的代表之一来到梵蒂冈，受到教皇的接待。两年半后的1983年5月14日，我在不同的形势下给教皇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几句话：“我们不愿在过去的悲痛和悔恨中毁灭；我们

的头朝向我们国家的未来。圣父，我仅以我的国家的名义请求您接见我”。

如果说我不愿意在此公布这封请求信的全文，那是因为这首先是一件私人的和神圣的事情。在谈到国家的一些事情时，我要强调指出，我们对未来的看法是公正无私的。然而官方的宣传机器却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把我们描绘成念念不忘1980年8月事件的人；而对于政府来说，这次事件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它们还把我描绘成军管环境里的一个头脑僵化、不能确定新的目标的人，一个死板教条不能发挥新的作用的人。我认为，教会当局的某些人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我已进入“团结”工会纪念馆，在那儿我既是馆长又是主要的观赏品。

在教皇来访前的几天里，“团结”工会领导人受到严密监视，实际上被软禁起来。当局对“保卫工人委员会”还搞了一次陷害栽赃的审判，我也因受控偷税漏税被带到地方法官面前。政府甚至声称，教皇同我见面将威胁国家的安全。

在教皇到达的前一天，当我接到省民警司令的电话时，一切障碍顿时烟消云散，这位负责人在电话里说：我可以去见教皇！

我对这次会见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之间那种坦诚的气氛——他的话语是那样的恳切挚诚，以至于任何人听了都不能不把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假东西统统丢掉。

这次会见中，有件奇怪的事深深打动了我。我突然注意到教皇有一双大脚，我于是又观察他怎样行走。我惊奇地发现，他步履稳健、适度、充满信心。这双脚仿佛使我重新获得了力量。

8月13日，即8月罢工三周年纪念日前夕，我在圣·布里吉德教堂的神父宅邸——我的朋友扬科夫斯基神父的家里认识了一位来自华沙的年轻牧师耶日·波皮耶卢什科。他下穿牛仔裤、上穿白色开领短袖衫，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盒“万宝路”香烟。我拥抱了他，然后把我的同事介绍给他。

第二天，这个看上去很年轻的牧师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他穿了一件造船厂工人作为礼物赠给教区的长袍，正在一个挤满人的教堂里讲道。我们听着他布道，发现他的话简单易懂。他的道德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自由，那是因为我们屈从于错误的信仰，是因为我们没有揭露这种错误的信仰，是因为没有每天对它进行谴责和批判，是因为我们不想纠正这种谎言，是因为我们保持沉默，装出一副接受它的样子。我们就是这样在错误的信仰和欺骗的谎言中生活的。”

他讲的时间不长，但向听众提出了许多要求。他要求他们采取具体的步骤进行变革。他说，只是到这儿来听他讲讲，然后回家或去工作，继续保持沉默是不行的。他毫不客气地对这种沉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最后，他说了几句我永远不能忘记的话。那些监视他好长一段时间的人以及在过去几周中一直像蚂蟥一样死盯着他的人（这些人是从华沙远道来到格但斯克监视他的），也会很好地记住他的话的。波皮耶卢什科神父说：“正像耶稣基督在《新约》中所说的那样，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那些杀生的人，他们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办法。”

两星期后，造船厂风传副总理拉科夫斯基要来同工人们举行一次公开的会议。有人问我是否打算参加这次会议。这

次会议计划在著名的劳保大厅举行；这个大厅曾是罢工委员会总部和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所在地，也是我们签署1980年8月协议的地方。这次会议不可能在其它地方举行，拉科夫斯基需要能得到的最好的设备。电视要对这次会议进行现场直播，我们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会议；如果愿意的话，是否无意和大厅前等候我的人们混在一起而同他一起从旁门进入大厅。

会上，我们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坐在我的左边，一个官方支持的新成立的工会的代表坐在我的右边。这种座次安排很合我的意；这样就无人说我在鼓动工人冒犯拉科夫斯基了，因为从我坐的位置看根本无法这样做。实际上，工人们根本不需别人的鼓动，他们自己能够明辨是非。他们对拉科夫斯基又喊又叫又打嘘声。面对这种情况，拉科夫斯基一下子神气起来，好像电影里的演员，脱下夹克，挽起袖子，仿佛要和谁打一场拳击比赛。这种作法足以使听众感到愤怒，不过，这也可能是他想要的东西。他来到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厅讲话，想以此重温历史的旧梦。他盗用我们运动的口号。这是赤裸裸的政治剽窃，或者说是不折不扣的欺世盗名。

拉科夫斯基对造船厂工人的讲话没有赢得一下掌声。他指责我鼓动我的伙伴反对他，要我为他受到的嘘声和呸他的轻蔑声负责。他逐一举例说明，“团结”工会正式存在的16个月只不过是一个罢工骚乱、“背叛和无政府”时期。这是我们两年半以来一直听到的陈词滥调。

我最不愿做的是把会议变成一次争吵的比赛。我于是提醒他说，正是由于我们和1980年8月事件才使他和他的那帮朋友得以从盖莱克手中夺取政权；我还提醒他，他们对我们的报答却是坦克和警棍。但我不想过分地沉湎于过去，因此

我建议他和我们坐下来进行谈判，邀请他和我们一起到1970年造船厂死难工人纪念碑前献上几束花。他的回答只是嘲讽我的荣誉博士头衔。

这是我第一次经官方批准的公开露面，更确切地说，是一次由拉科夫斯基先生批准的公开露面。他需要我在摄相机前坐在他的旁边。我的简短的讲话尽管经官方审查时被改得面目全非，但还是能够使听众了解造船厂发生的事情。我们之间进行斗争这个事实本身就很有意义，它激起人们的广泛议论。

根据"公众舆论研究中心"和一个检测电视观众反应研究机构所做的首次民意测验，副总理的这次表现获得了好评。但这一印象被华沙和其它大城市以及各省的独立调查改变了；这些调查表明，这次鼓舞士气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初看起来似乎有点荒唐，而且有些人坚持认为，拉科夫斯基去造船厂参加会议并发展"坚持顽固立场"的讲话类似于我在1981年12月采取的步骤；那时我到腊多姆与"团结"工会中最激进的一派搅在一起。尽管有人抱怨他有自由主义的同情心，但他仍要表明他有能力影响我们。但他所做的一切只能是损害他自己的声誉。当中央委员会中的强硬路线派继续攻击他时，他和他的亲密同事一起陷入了困境。

我认为——一般公众也认为，拉科夫斯基一派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能克服内部的软弱无力状态，没有能公开接受"团结"工会提出的要求。他们既不着眼于波兰的未来，也不同我们联合以争取"团结"工会的数百万之众，而是仅仅满足于争夺盖莱克政权倒台后最高领导集团中留下的肥缺。这样，他们就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行军管仅仅使国家陷于瘫痪，并制造了一种没有胜利者的局面。

这是党内自由主义派因不能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发挥正当的作用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1983年造船厂举行的会议上对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说：“你们靠踩着我们的背登上了权力的上层，但你们却很少能认识到这一点！”

1983年秋天即将到来，我总是利用一年的这个季节走进大自然的怀抱。我常常和亨雷克·马祖尔爷爷一起去卡舒比湖玩，我渐渐地爱上了这个地方，它取代了我的出生地波波沃的田园。

卡舒比湖是波兰的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有“波兰的瑞士”之称，而这个美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无数的湖泊像镜子一样点缀着这里的乡村。马祖尔爷爷采野蘑菇，我去湖边钓鱼，或穿着高筒防水靴在水里走来走去，偶尔也划划小船。

我需要新鲜的空气。在格但斯克，我已成为所有宣传机器攻击的目标。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源源不断地收到匿名信，这些信全都出于一人之手，使用的信封也都一样。有一天我收到75封这种信，第二天收到100封。接着，我在电视节目预告上看到一个《金钱》的电视片，这个节目要在次日播放。片子的内容被声称是我在阿尔瓦莫夫被拘留期间同我哥哥斯坦尼斯瓦夫一次谈话的片断，并涉及当局如何发现了据说我存入西方银行的大约100万美元的巨款，还说这笔钱是我靠获得的各种奖金得来的。

当局这样干的意图是一清二楚的。他们想用“金钱之墙”把瓦文萨一家围起来，认为这样就能断绝我与几百万生活艰辛的波兰人的联系。

早在这个节目在电视上播放之前，即我从阿尔瓦莫夫获

释的第二天，当局就让主教团的一些代表观看这个节目，而且还通过梵蒂冈常驻波兰使团信使之手送给教皇一盘这个节目的录相带，这种录相带正在全国广泛散发，被政府用作反对“团结”工会的宣传运动的一部分。在我被监视期间我的的支持者搞到了一盘这样的录相带送给了我。播放这个电视节目是投向“团结”工会的一颗重磅炸弹。

电视播放《金钱》的第二天，我在格但斯克观看了一场意大利尤门图斯队对格但斯克莱希亚队的国际足球比赛。我了解了公众对“团结”工会和我的反应。4万名观众一遍又一遍地高喊“团结”工会！“莱赫·瓦文萨”来欢迎我。警察驱散了吵吵闹闹的青年人，他们最大的罪过就是挥舞带有“团结”工会标志的旗帜。当局对我的诽谤污蔑就谈到这里。

一星期之后，即1983年10月5日星期一这一天，有关当局宣布，我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金。

诺 贝 尔 奖

新闻媒介宣布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之后，我成了大批记者的“俘虏”，他们忙着以“最新报道”来纪念这个时刻。现在看起来，在这里摘录一些他们的现场报道是适当的。

> 凌晨2点，莱赫和达奴塔被一阵电话铃声从睡梦中唤醒。电话是克日斯托夫·韦什科夫斯基打来的；他的声音听上去欣喜若狂：“莱赫！您获诺贝尔奖了！”
>
> “您说什么？……是吗？……”莱赫嘟哝着，仍然是一副半睡半醒的样子，接着他放下话筒。
>
> 大约8点钟，马切克（瓦文萨的邻居）被刺耳的电话铃声惊醒。

“我是扬科夫斯基神父。告诉莱赫不要去采蘑菇了。我们知道有些人马上就到他那儿。他应该坐在家里安静地喝杯咖啡，等着他们。”

睡眼惺忪的马切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斯拉韦克，后者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其他人。

不一会儿，一队汽车在房前停下。最前面的是莱赫乘坐的伏克斯瓦根白色汽车，后面是八辆出租车和几辆轿车。

斯拉韦克走到瓦文萨的车前说：“我说，莱赫，扬科夫斯基神父刚才又来电话，说有人马上就到，建议您回家等着。”

“快，快上车，我们要去采蘑菇。”

大约10点钟，车队来到距格但斯克120英里处的卡舒比村。莱赫开的车里，坐着马切克先生和他的妻子埃乌盖尼娅（她是一位翻译）以及他们的一位女友，卡齐克（达奴塔的表兄），雷克·马祖尔（他是这种场合必不可少的人），以及斯拉韦克·雷比茨基。其他车上的人是波兰官方新闻机构的代表和一些外国记者。所有汽车都停在马祖尔爷爷的一个朋友的农场前面。

在农场里，记者们一窝蜂似地围着莱赫转来转去。只有一名德国记者在后面自己的车旁听收音机。几分钟后，他大声喊道：“诺贝尔奖，诺贝尔奖！”斯拉韦克是唯一听见他喊的人。他冲到莱赫面前说：“莱赫，德国人刚才说你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莱赫没有理他。他还是不相信这个消息。几分钟后，他们又返回公路。10点半钟，汽车喇叭开始嘟嘟地响起来。

“你真的获得诺贝尔奖了！”有人说道。

“除非我亲自听到，我决不相信。”莱赫回答说。

将近11点时，我们来到一片林间空地，在离护林人住房不远处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莱赫宣布说他仍不相信获奖的消息，但如果是真的，他将把全部奖金捐献给农业发展基金会。

11点，所有人都停下来，聚精会神地听收音机。突然间，喜讯传来。一家德国电台宣布，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莱赫·瓦文萨。马切克先生、卡齐克和斯拉韦克几个人一下子把莱赫举起来，在空中抛来抛去。马祖尔“爷爷”在一旁留心地注视，以防他们把这位主席摔着！

莱赫很紧张。虽然他很愉快，面带微笑，但仍然很紧张。他们在回来的路上沉默不语。莱赫的后面放着许多原打算用来装蘑菇的空瓶子。这时采蘑菇的事已被人遗忘。

下午4点，当他们通过祖科沃时，波兰最重要的通讯机构华沙广播电台广播了瓦文萨获奖的消息。

“他们还没来得及写完评论呢！”莱赫笑着说。

格但斯克大街上的行人都异常激动。当他们看见莱赫的汽车时，便停下来向汽车挥手。

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消逝，瓦文萨变得越来越沉默不语。

瓦文萨大约5点半回到家。格但斯克全城的人都已知道他获奖的消息。在他驱车穿过大街时，人们热情地向他招手，打着表示胜利的“V”字形手势。扬科夫斯基神父正站在靠近他的私人花园的路边等着莱赫。他的神情紧张不安：人们自中午起就一直不断地到他这儿来，

现在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还有许多警察。达奴塔没有片刻休息时间；外国记者一个接一个地打来电话。

“我们必须赶紧想办法，决定怎样使用奖金。”有人说道。

与莱赫同去采蘑菇的那群人中爆发出一阵大笑。瓦文萨回答说：“这个问题已经决定了！”

人们把莱赫从车里抬到他家的前面。人们纷纷向他祝贺，鼓掌，并祝愿他长寿。大家齐声喊道：“莱赫！莱赫！瓦文萨！瓦文萨！‘团结’工会！‘团结’工会！”到处都是鲜花，到处都是愉快的笑脸和朋友。前来祝贺的人为莱赫获奖欢欣鼓舞。

瓦文萨走进自己的家。片刻之后，他又出现在窗户前，身旁站着他的妻子、孩子、姐姐和朋友。他上身穿一件套衫，下身穿一条工装裤，还是他去采蘑菇时的装束。他用嘶哑的声音向人群发表讲话，时而带点轻微的咳嗽，几次因嗓子沙哑他竟说不出话来。但他镇静自若，没有任何慌乱的表情。他这样说道：

“我把这看成是给我们大家的奖金，是对我们每一个希望遵循非暴力和相互理解的道路获得真理的人的奖励。我深信，既然外国人都能理解我们——他们可能比我们更富才智，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笑声、掌声），那么，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我们早晚将会得到当局的承认。我也一直深信，总有一天我们将一起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就怎样做对波兰最有益达成谅解，因为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除了达成谅解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没有任何别的解决办法。我希望诺贝尔奖将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个目标。至于说到我们共同

的奖金的物质方面，虽然我没有征求你们的意见，但我希望你们会赞同我的决定，把这笔钱交给波兰主教团，再由它转交农业发展基金会。我们大家都必须吃饭；农业仍然是今天最重要的问题。

现在我想回去用晚餐，和我家人及朋友们共饮香槟，庆祝这个愉快的消息。”

但人群一动不动。人们想要在他们站的地方多待一会儿。在这种群情欣乐的气氛中，什么事情似乎都可能发生，什么样的话似乎都可以说出来。他们待的这一小片土地仿佛成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世界性权威保护下的国家，而那些四处徘徊的警察和特务却是失魂落魄、无地自容。

人们从华沙、埃尔布拉格和波兰各地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他们拥挤在楼梯上，和电视摄影人员挤在一起，都想进到屋子里，向莱赫和达奴塔献上花束和祝贺卡，请求拍照或只是为了看他们一眼。

瓦文萨知道外面发生的事；他几次来到窗前。他已经精疲力尽，但仍然多次走回来，每次和人们交谈几分钟，直至深夜。房间里的人正在制定第二天的计划，准备在扬科夫斯基家里举行记者招待会。

记者招待会摘录

问：获奖的消息使您吃惊吗？这会不会改变您的生活？

瓦文萨：我工作从不是为了获得奖金；我也从未期望获得什么奖金。为了内心世界的需要，我首先像其他人一样工作着。我不在乎被投进监狱，但我也愿意得到

对我的奖励。我对获得诺贝尔奖金这个荣誉是十分感激的。人们可以相信，无论什么东西都无法使我离开我为自己规定的道路。

问：您认为您获得这个荣誉当之无愧吗？

瓦文萨：我认为这个奖金主要是对我所代表的波兰工人的奖励，是对他们以真理和正义的名义为推动我国的变革所表现的决心和努力的奖励，也是对全体波兰人民的奖励，因为工人的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不是在同全国人民隔离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我们起草“团结”工会的要求和纲领的过程中，任何社会团体也没有置之度外。

问：您这次获奖有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您是否认为把这个奖授予您是为了迎合西方普遍的反苏情绪？

瓦文萨：我不是一个政治家，您只能向评奖委员会问这个问题，尽管我认为他们在宣布时已经把他们打算说的东西都说了。

问：过去几个月里，特别是在造船厂同拉科夫斯基举行会谈之后，您一直受到日益猛烈的攻击。您认为他们还会再耍花招吗？或者说，您是否认为尽管您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会仍然忽视您的作用？

瓦文萨：我不是诽谤运动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我从事的活动使我入狱，也使我获得诺贝尔奖。重要的是自己要知道做什么。许许多多人信任我，同时对官方宣传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为我担忧。但同时也要注意不应走得太远，一点不尊重那些你要争取与之对话的人。

问：您选择了非暴力斗争的道路。这是不是一种软弱的方式，一种您没有能力以其他手段实现自由和独立

的方式？

瓦文萨：这是一条绝大多数波兰人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选择的道路。也许正是由于非暴力我才获得了今天的成就。我是相信对话和协议的人。我坚信21世纪不会是暴力的世纪。我们尝试过并检验过各种形式的暴力。在人类整个历史的进程中，暴力手段从未产生过任何好的或持久的东西。

问：诺贝尔奖对您个人有何帮助？

瓦文萨：它给了我新的力量。它使我相信，我的努力并没有被人们遗忘，我的努力不但在波兰而且在国外都得到了理解。

达奴塔的回忆

我很高兴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总有——现在仍然有——那么多人围着他，使我没机会同他说话。

我对他说的不是他们为什么给他奖，也不是说他们的理由是否恰当。这应由别人来说，是外界观察家决定的事情。当然，对于一个波兰人来说，获得如此崇高的荣誉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还能希望得到比这更高的奖赏吗？时间将告诉人们他是否应该得到这种奖赏。我敢肯定的是他将一如既往地努力下去。这个奖赏不会使他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没有任何人能改变他。我知道，他将继续从事他一直从事的事业，宣传他一直宣传的思想，即自“团结”工会诞生那天起他一直献身的思想。

我们从来不想要名誉或光荣。我们对这一荣誉的反应很简单，我们要表明自己是受之无愧的；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受命运支配的。莱赫不是为奖赏而工作。他从未

想象过有一天他会光荣地获得这种奖赏。他是个诚实的人，诚实到了极点。他只做他认为正确的事。

诺贝尔奖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荣誉。它好像一张进入历史的入场券……也许有一天，孩子们能在百科全书里读到几行记述这件事的内容。但这对他们有什么真正的好处呢？他们现在还太年幼。他们不理解这件事的真正含义。另一方面，他们却知道他们的父亲总是那么忙，在上帝赐予他们的每一天里，他们几乎见不到他。也许命运对我们将是残酷的。也许莱赫所得到的一切将通过他孩子们的手丧失掉，因为他整天忙于公共事务，几乎没有时间教育孩子们。我常常担心这一点，想找个时间同他谈谈。我是一个维护传统的人。我想要一个模范家庭，在各方面都非常好的家庭。我想让孩子们很好地成长，我想要一个比莱赫有更多时间关心自己家庭的丈夫。我为我们及我们的孩子感到担心。只有时间将告诉人们这种荣誉是否对我们真有好处。同时，我最大的快乐是认识到这个奖赏已经洗刷去他们泼在我们身上的一切脏东西。

我建议由我的妻子达奴塔和大儿子博格丹代表我去奥斯陆参加授奖仪式。届时，他们将同波兰主教团的一名代表前往挪威，由教会代表领取奖金。我希望，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能以我的名义发表“团结”工会关于波兰应实施的方针政策的讲话，不过他总是在取得出境签证方面受到刁难。当他没能及时领到签证时，我的这种疑虑最终得到了证明。不过我们从一开始还准备另一个预备方案，即让博格丹·齐文斯基在挪威发表讲话。他曾是马佐维耶茨基在《团结周刊》

编辑部的副手；自实行军管以来一直住在瑞士。

为了回答官方宣传机器的指责——据政府发言人耶日·乌尔班讲，此次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反对自己国家利益的波兰公民”，也为了阻止官方在将来的攻击，我公开宣布，我希望避免因我如此荣幸地获奖而可能引起的任何麻烦：我非常希望所有的波兰人，不论他们属于什么政治派别，都能和我一起庆祝这个难忘的时刻。

我们曾就我在奥斯陆讲话的内容进行过长时间的讨论。我们一致同意，我应该以“团结”工会的名义谈谈波兰人民的愿望和波兰经验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但我们也全都希望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表明，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同政府之间就波兰全体人民的利益进行对话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我要在讲话中呼吁给予波兰援助。这个呼吁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给予波兰援助是必要的，也是值得做的事业……”

在12月初一次有波兰电视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上，我通过让人们注意我为颁奖仪式准备的发言，直接谈到了西方对波兰的态度。我把西方反对雅鲁泽尔斯基政府实行军管而对波兰实行的经济“限制”和给波兰以有效的经济援助明确地加以区别。我认为，对波兰给予有效的经济援助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这种援助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

“我赞成真正的外国援助，这对我们这个生活条件日益恶化的国家来说简直是太重要了。人人都清楚，在给我们正在崩溃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以前，在以波兰人民的名义同外国签署新的重要的援助协定以前，波兰的经济将不会有任何起色。外国对我们经济援助的基本条件是，援助一方有权对资金使用的方式施加影响和控制，以确保我们不再因任何不负责任的行动而使我们的国家陷入债务累累的泥潭。给予波兰

援助既是必要的也是值得做的事业。这将使我们能够利用自己的资源、推动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并完成我们作为文明国家大家庭中的一员应承担的义务。”

与此同时，达奴塔正进行着启程前的准备。她将以一名波兰妇女的身分，以诺贝尔奖获得者妻子的身分，并以我的名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以全体波兰妇女的名义去接受这个荣誉。如何使自己的穿着打扮同这种身分相符，她花了不少时间进行“咨询”。

我告诉她，她在国外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说话应特别谨慎，并告诫她有人无疑会给她施加压力。我们于华沙机场分别后，我一直关心她的一言一行。当我被问到她在挪威最初几小时的表现时，我回答说“三分以上”（中等分数），并希望记者把这一评价传达给她，以提醒她更加谨慎。

最后，每件事情都进行得非常顺利，达奴塔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达奴塔日记摘录

12 月 12 日星期一

今天，挪威、欧洲和美国的所有报纸都刊载了关于“团结”工会、莱赫·瓦文萨和我本人的报道。一家报纸报道说：我庄严地“代表着我的丈夫和我的国家”或者说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真正的女大使！当我读到这句话时，我并不隐瞒自己内心的喜悦。

一切进展顺利。假如莱赫能来，我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场面。总之，在奥斯陆有许多人谈论波兰，有许多人讲波兰语。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同胞，他们来自丹麦、德国、瑞典、法国和英国，而挪威人却“选了”我！我

甚至听到有人说，如果他的妻子像莱赫的妻子那样，他也会获得诺贝尔奖！对这样的议论，我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几乎没时间浏览一下报纸，因为9点35分我要乘坐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航班离开奥斯陆飞往哥本哈根，然后转乘其他飞机飞回华沙。当我们到华沙奥凯切机场时，莱赫与扬科夫斯基神父、挪威大使卡雷·戴赫伦正在那里等候我和博格丹。在飞机弦梯前迎接我们的人不多；警察到处设置了路障，巡逻队阻止一切前往机场的人。还有几支身穿防暴服的特种部队，战士们带着警犬坐在带篷的卡车里。天啊！这是一个多么不同的世界啊！机场的出口处有一道民警的防线，防线后面站着好几百人。他们克服了重重阻力，专程来向获奖者和带着因他们的帮助获得的奖章返回波兰的我们表示支持的。

我们在主教街稍事停留，安静地吃了一顿没人打扰的饭。教会的修女们兴致勃勃地仔细端详了奖章。莱赫有一个新的想法，他决定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直接去琴希托霍瓦的亚斯纳－古腊教堂，把诺贝尔金质奖章和证书敬献在那里。

从华沙到琴希托霍瓦的路上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到达时已是深夜。

12月13日星期二

早晨5点，我们和扬科夫斯基神父一起去教堂做弥撒。他同意负责照管奖章和证书。早饭后，莱赫同一些在琴希托霍瓦聚会的科学家和发明家进行了会晤。

我们大约上午9点动身返回格但斯克。我们从琴希托霍瓦刚动身不久便被警察拦住了。一路上这种事情共

发生13次！我在自己的旅行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警察每次阻拦的时间：9:00，9:10，9:30，9:50，10:10，10:20，10:35，10:55，11:20，11:55，15:47，17:20。在他们第13次阻拦我们时，我已疲倦得没力气写下这次的时间了。他们不只是拦阻我们，还命令我们在罗兹郊外等了一个来小时，然后把我们带到他们的总部进行搜查。他们显然在寻找什么东西，但却不知道是什么。我们不相信他们要找的是诺贝尔金质奖章和证书！他们没搜到任何可疑的东西，便没收了莱赫的收音机和小录音机；莱赫常常用收音机监听警察巡逻队与总部的联系，并用录音机录下来。他们虽然拿走了收音机和录音机，但却没有找到磁带。

将近晚上7点，我们经过12个小时的路途奔波之后终于回到了家里。有人当时说，我们从奥凯切机场经亚斯纳-古腊到格但斯克的旅程路线恰好是一个象征胜利的"V"字型。我们就是打着这样的手势向一直耐心地等候在我家外面的人们致意的。

12月10日这天早晨，我在格但斯克的家里穿上最好的衣服来到圣·布里吉德教堂。为了使我们能够清楚地听到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的实况广播，扬科夫斯基神父已经把收音机摆在一个显著的位置。我的一个助手拨动着旋钮，声音时强时弱，我们只能听到一点点讲话的片断。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可能听不懂多少！瑞典一家主要报纸的记者波森先生跑回他的车里，抱来一台有特殊装置的日本收音机。我们那时要做的一切就是找到用波兰语广播现场实况的电台。经过一番寻找，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个电台，仪式上人们发言的声音清

晰而响亮地传了出来。

我激动极了。当我听到达奴塔那来自如此遥远的地方的声音时，我的心都要融化了。她说：

> 在我的国家从欧洲地图上消失的那段时间里，亨雷克·显克威支在1905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经讲过下面这样一段话："她被宣布了死亡，但有证据表明她仍然活着；她被称作是既不能思考也不能工作的国家，但有证据表明她有能力行动；她被宣布已经为他人征服，但有证据表明她是胜利者。"
>
> 今天很少有人再谈论波兰的死亡了。但显克威支的这些话却具有了新的意义。
>
> 我要感谢挪威人民中的有识之士，他们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团结"工会主席，从而向全世界表明我们还活着，我们的理想是任何强大的东西都无法征服的。

我仍然记得当时演奏的乐曲，以及记者们在评论颁奖仪式的气氛时发出的欢快悦耳的声音。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扬科夫斯基神父给我们拿来了香槟酒，最后马祖尔爷爷和我一起乘车回家。当我们缓缓行驶在格但斯克市区时，汽车马达发出的声音是那样的柔和悦耳。

我们谈论着刚刚消失的过去和即将到来的明天。自我从阿尔瓦莫夫获释以来，非暴力的道路已证明充满着暗礁和险滩，比最初似乎显得更为危险。这与官方的诱惑有关。这座城市仍然存在着骚乱，我们必须设法消除它。我现在可以很容易地决定转入地下活动，就如同我可以在教堂设立诊所而献身慈善事业那样轻而易举。

有人对我说："我们已经走到今天这种地步，你又回造

船厂工作，真是莫名其妙。”

我回答说：“我同意您的看法；我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我为我们的第一个罢工委员会选择的行动路线的结果。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工作。现在我们有这么多人拥护我们。我们的羽毛已丰，我们可以像雄鹰那样翱翔蓝天，搏击长空。但我们必须谨慎小心，以防毁掉我们业已取得的成就。”

我们已经驶上那条与三联城相接的主要公路：格伦瓦尔兹卡大街在右侧，我们正驶向扎斯帕区；从立交桥上望去，扎斯帕区清晰可见。在我看来，这一天比平常的日子更加美好。天空中那与水泥大楼一样的灰黄色似乎已经消失，代之以湛蓝的晴空。我十分愉快，感到自己好像正奋勇向前，去迎接新的挑战。这是一个喘息的时刻，一个思考的机会，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里程碑。

第十章　我的国家

困　境

离1970年罢工纪念日还有三天。我认识到，自己刚刚获得诺贝尔奖金，决不能冒险卷入一场很容易导致暴力冲突的示威行动，从而丧失刚刚获得的崇高荣誉；须知我的荣誉是靠坚持非暴力的道路得来的。八月协议纪念日刚刚过去；除我之外，军队不许任何人通过警戒线。我只能手拿花束一个人走过造船前的广场。突然，一队身穿防暴服的警察拦住了我的去路。与此同时，我感到有个民警用冲锋枪的枪口对准我的脑门，直到我经过他的面前，走出他的射程以外，他才收回了武器。是的，这个场面是值得一看的：在格但斯克协议签署13周年之际，在造船厂前的纪念碑脚下，差一点发生意外的枪击事件。当时就我一个人。我不想再经受这种难受的折磨——我也不想让其他任何人和我一起经受这种难以言状的痛苦。

我患了感冒，正在发烧。就如何以最好的方式纪念1970年罢工14周年我进行了反复的考虑之后，建议这一次由达奴塔代替我去参加活动，并以我的名义向死难工人献花。这将是她继在奥斯陆取得成功之后的又一次重要行动。我准备了12月纪念日那天的演讲稿（像往常那样，我在稿子里对我们的运动做了总结，并为将来提出了一个计划），并提前在有

关人员中传阅。在随后的一系列会议和讨论中，人们对我1983年12月采取的行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2月纪念日之后我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下面抄写的是其中一次会议纪录的片段。这个片段既足以说明问题，又很具代表性：

"您曾好几次同意在纪念碑前同我公开见面，在11月，在12月，以后又在5月，您都是这样答应的。可当我们去到那儿时，我们发现您不是不舒服，就是被阻拦不能来。您不认为今后以更负责的方式来安排我们的会面更好些吗？"

"布拉沃！您认为我在监狱里更能发挥作用吗？

"有时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时，是不能声张其打算的。这并不是说，我在12月16日对你们隐藏了什么事情。你们知道，我在从琴希托霍瓦到罗兹的路上被拦截了13次。我也确实得了感冒。我确实有病。但从某种意义上讲，生病意味着我很幸运，因为我不能再去蒙受1983年8月那样的耻辱。当时除我之外所有的人都不能通过警戒线，只有我一个人拿着花束孤零零地通过广场。这次活动，唯一的办法是让我的妻子代替我去。当我妻子出现时大家都很惊奇，因为我答应他们即使爬，我也要去。但最后我没去，而是让我的妻子去了。我要做我必须做的事情，而且要设法避免军队或警察对我开枪。我去有什么用处呢？什么用处也没有。你们愿意看到我再次蒙受耻辱，再次被迫抛弃你们吗？你们密切地注意我的行动了吗？我有工作要做。但我不打算站在房顶上去大喊大叫，或者事事都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满意。在我负责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假如瓦文萨被警棍打回来，

假如我们全都去参加战斗，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在那种情况下我将怎么办？是一跑了事还是参加战斗？人们要我做哪一种选择呢？如果你们中间有谁羡慕我的职务，只要你们同意，让他负责好了。我认为，我正在取得进展，但也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我也有很多难题。我不能就我该做的每件事在做之前总要先征求你们的意见，我也不能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只能这样。”

自1984年初以来，我们运动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不再像以前那样注意日常的活动。第一个方面是增强全体公民的自治作用。第二个方面是重新评价我们的组织和独立工会的全面管理。在这方面，我们主要解决的是工会运动内部的多元化问题，以及决定地方工会自治是否有时候比中央工会的统一领导更为可取。读者在下文将会看到，我们要做的是与鼓励工人参与各级管理所需要的工作。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真的要实行多元化，那么我们也应该承认官方的工会。第三个方面是在工厂实行工人自治，即让工人参与工厂的与生产和广泛的经济问题有关的决策活动。第四个方面是改革法律体制。

在华沙郊外的许多学校里，当政府把学校的十字架取掉时，学生中发生了骚动，从而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必须懂得，在波兰，这不单单是把教会与国家分离开的问题，而是政府否认宗教权利的问题。1984年的头几个月里，当食品价格再次上涨时，社会相当的不安定；物价上涨往往使社会上的各种人惶惶不可终日。政府当时采取的一项积极步骤是建议实行大赦，说将在1984年夏天释放大约600名政治犯。这600名政治犯中包括所谓的“十一人”，其中有米赫尼克、

库龙和莫泽莱夫斯基，他们都是工会运动的领导人，自1981年12月13日以来一直被押。这“十一人”中，有几人拒绝当局大赦的提法（他们1986年再次这样做），并参加绝食斗争，要求对他们进行审判，以便同指控他们的人进行辩论。

大约就在这个大赦的消息传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博格丹·李斯被捕了。他当时与博鲁塞维奇一起从事地下工作，后者是格但斯克省“团结”工会地下力量的主要代表人物。根据所了解的情况，他是在一个湖边休息几天的时候被捕的。他好像有个“朋友”，极渴望金钱和出国旅行。这样，我们中间就出了一个叛徒。我们弄清是他出卖的博格丹·李斯，但没有揭露他——如果我们揭露他，就会有另一个人打进来代替他。我们设法不让这个“叛徒”参加各种会议，给他错误的情报，而又不引起他的怀疑。

最糟糕的是博格丹被荒唐地指控犯有“严重的叛国罪”而遭到监禁。审判迫在眉睫；这个事件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先例。面对这种情况，我立即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我在地下出版物上发表的声明中和对地下出版物记者的谈话中说：

> 他们将会说，您为外国间谍机构工作——对此我要说：您是一个诚实的波兰人，对自己的理想充满信心，对1980年8月充满信心，您是我最亲密的同事。您是忠诚、聪明而勇敢的人。对您所做的全部工作，我表示深深的感激。我将找一位同您一样有能力的人暂时接替您的工作。我们将继续战斗。

这种不幸的事态无疑会对当局最终宣布的大赦投上一层阴影。1981年那些最初被判拘留的人已经改判为监禁。当局

正式说明，大赦本来可能在省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以后实行。实际上，当局并不敢冒险对在押的工会积极分子进行审判，因为一旦进行审判，被押的人就会成为政府的公开控告人。尽管受着各种各样的而且常常是很阴险的迫害以及被流放的威胁，但“十一人”大义凛然、坚强不屈。他们不希望被当作政治犯来对待，虽然他们有权得到政治犯的待遇。他们认为这是要给他们特殊的待遇，因而拒绝政府的诱惑，这些诱惑总是以效忠政府的种种伪装形式出现的。他们要求进行审判，要求得到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为此目的他们才举行了绝食。

在“十一人”的合法地位恶化的时候，我加紧与主教团对话。在按照预定时间同红衣主教格莱姆普和雅鲁泽尔斯基举行会谈之前，我公开表明，工会必须实行多元化，政府必须释放而不是流放政治犯；我在这两个问题上决不让步。

在雅鲁泽尔斯基方面，他想阻止对选举省人民代表会议进行任何可能的抵制，为此他开始对许多政治上活跃的牧师进行攻击，格但斯克的扬科夫斯基神父和华沙的耶日·波皮耶卢什科神父就在他的攻击之列。

针对选举时的这种形势，我宣布参加对选举的抵制。在一封由40个工会活动家联名写给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的信中，我们批评选举所采取的方式，指出这种方式不能民主地产生省人民代表会议的候选人。这说明人民没有任何自治的权利。像波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一贯做的那样，选举委员会再次把他们喜欢的候选人列在候选人名单之首。这意味着所谓投票的结果已经确定。除了这个批评之外，我们还抗议政府当局在选举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各样的压制。

根据官方发表的通告，这次选举的结果表明，25%合格的选民没有到选举站把选票投进票箱。换句话说，600多万波

兰人拒绝支持政府。根据我们估计的数字，当时断然拒绝投票的差不多有1000万人，甚至更多。尽管当局对我们的同胞普遍进行压制，但在投票时仍有这么多人自愿弃权。面对当局的威胁恐吓，我们这么多同胞还是克服了恐惧。读者必须认识到，在我们国家，政府期望每个人都去投票。当局对那些不肯投票的人进行各种打击报复，不给分房就是其中的一种。我们的国家正在变化：人民开始起来反对双重标准的观念。人民开始抛弃口不应心的谈话方式；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迹象——一个谁也不会理解错的迹象。

尽管我们对选举进行了抵制，但“团结”工会被捕的大多数积极分子还是在夏天获得了释放。一旦他们重新获得自由，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不会离开“团结”工会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组织呢？我不能说我不担心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举行8月纪念活动期间，他们来了，接踵而至，向死难的工人表示自己的敬意。最先来的是阿达姆·米赫尼克；接着是雅采克·库龙；然后是负责罗兹省“团结”工会工作的安杰伊·斯洛维克，同他一起来的有克罗皮夫尼茨基、扬·鲁莱夫斯基、安杰伊·罗兹普洛霍夫斯基以及代表其他地区组织的马里安·尤尔奇克。在几次会议上，我们重新讨论了自1981年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敏感问题。虽然我们历经了一段艰难痛苦的岁月，但我们却培养了自己观察新事物的能力，能够较好地理解经时间考验而证明是正确的思想。

耶日神父

我的国家，我为您心疼，

您曾多少次被投入血泊之中，
今天您的伤势如此严重，
您的苦难无尽无穷。
你曾多少次寻求自由，
但每次都被刽子手掐住您的喉咙；
您总是落入异族之手，
而今天，骨肉兄弟又在对骨肉兄弟动刀行凶……

这是一支悲哀的歌，一支令人心碎的歌。当我们吟唱这首歌时，它带给我们的远不是恬静的安慰，而是对惨遭杀害的耶日神父的痛苦回忆。这是一支我们1984年岁末唱过的歌。我们庄严地高唱这支歌，来悼念被劫持遭杀害的“团结”工会的这位朋友、来自华沙佐利博尔兹区圣·斯坦尼斯瓦夫教堂的年青牧师。

正是在1984年10月，耶日·波皮耶卢什科神父走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运动同其他任何运动一样有着很多缺点，但他是一个能把我们大家凝聚到一起的人。为了揭露生活中隐藏的邪恶的真相，为了表现人们对善良、坦率和真诚的追求，也许必须牺牲一个宝贵的生命。这是波兰大主教在耶日神父葬礼上讲的话。但他的死也揭示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即我们的人民同活跃的教会之间的那种根本的、牢不可破的联系。耶日·波皮耶卢什科神父把信仰看得高于一切；他为获得独立生活的权利而战，为获得言论自由的权利而战，为获得实现1980年8月精神、“团结”工会同政府的协议和我们一贯珍视的希望的权利而战。我们中间有些人对获得这些权利是否值得奋斗不太清楚。耶日神父用自己的行动对这些人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我们是耶日神父高尚精神的见证人。

我们的任何行动似乎都难以避免对我们的野蛮审讯、搜查和对我们家属的迫害和监禁。局势一片暗淡，毫无希望。这是烈士繁衍的场所。耶日神父就是在这里被杀害的，但他仍像一个胜利者那样活着。“‘团结’工会仍然活着，因为您为我们献出了您的生命!”我在他的葬礼上庄严地这样说道。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84年10月19日，星期五，晚报上刊登的一条消息说，华沙的一名牧师失踪了——目前正在进行寻找。20日，星期六，我离开格但斯克前往华沙会见我们的顾问并证实计划同“临时协调委员会”举行的会议。星期天，我又返回格但斯克。星期一早晨，我照常于6点钟去上班。快到下午2点时，几辆军车在我平常回家经过的三号门前停下来。即使在耶日神父被绑架以来的紧张气氛中，我也不会找个地方躲起来。当博格丹·奥尔谢夫斯基和海尼奥像平常一样来接我时，造船厂门前保安部队的官员一直死盯着他们。我知道当局在监视我，因此每当与“临时协调委员会”接头时，我总要玩点小花招。我本应2点出发，而我偏不去；2点20分、2点半到了，我仍然不动……3点50分，他们以为我不去了，于是解除了对我的监视。他们走后，我启程上路了。

这次同地下组织“临时协调委员会”代表举行的会议是在格但斯克附近进行的；在这次会议上，我们通过了下述联合声明：

> 耶日·波皮耶卢什科神父被绑架一事深深地震撼着波兰。这位最忠实于工人阶级的牧师从波兰消失了。他为工人的尊严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已使他成为无庸置疑的精神权威，并为他赢得了数百万波兰人民的无限尊敬。

对耶日·波皮耶卢什科神父的绑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1981年12月13日的第二天，曾发生过许多类似的事件，受害者都是“团结”工会的成员。在军管时期曾有许多人被杀害，在罢工和教堂里的和平示威中也有许多人成为法律和秩序的所谓捍卫者所采取的镇压措施的牺牲品。今天，在这些殉难者的名单上，我们又添上了一个牧师的名字，他以“未经证实的罪行”遭到绑架。这表明，从现在起，恐怖与敲诈将成为对波兰公民实行政治镇压手段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一个法制被嘲弄的国家里，在一个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服务于当权者的利益并使他们逃避人民监督的国家里，这种绑架事件可能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

事实再一次证明，对1980年8月协议的践踏为使用暴力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签名人：“团结”工会主席莱赫·瓦文萨

波兰独立自治团结工会临时协调委员会

B．博鲁塞维奇（格但斯克）

Z．布亚克（马索维亚）

R．舒米耶伊科（全国委员会委员）

克拉科夫省和卡托维兹省的代表

同“临时协调委员会”代表会晤之后，我去华沙的佐利博尔兹教堂做了一个晚上的祈祷，然后到格但斯克。我感到非常激动，于是打电话给孔拉德·马鲁什奇克。我又邀请了几个朋友来到我家，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我们都希望并祈祷波皮耶卢什科神父还活着，但我们担心最坏的事情发生。我们还怀疑“上面”的那些人是不是在搞什么秘密阴谋。

我们在全国组织祈祷仪式，祈祷词是忏悔诗和耶日神父在全国各城市布道词的摘录。如果数百万人跪下来祈祷，我们确信我们不会毫无结果的。

第二天，人们成群成群地拥到圣·布里吉德教堂，祈祷的人群络绎不绝。有些人是下班后直接从造船厂来到这里的。当夜幕降临时，扬科夫斯基神父站到圣坛前向会众说道："在你们中间有这样一个人，他和你们有一样的思想，他希望说出你们的感受。他同你们心心相印、息息相关。好好想想这些话吧！"

虽然我曾多次来过格但斯克造船厂教区的教堂，但我在这里向会众发表讲话却还是第一次。

你们都知道，我不习惯使用布道讲坛来推动我们的事业或谈论我的思想。但现在，局势如此严峻，事态如此危急，我决定破例在这里讲话。我知道你们期待我做什么，而我也想知道，我能期望你们做什么。我不打算仅仅停留在谈论波皮耶卢什科神父出了事这个问题上——我们每个人都对这个问题感到担心和迷惑。

为了找出我们问题的答案，我们要天天在圣·布里吉德教堂和圣·尼古拉教堂集会祈祷。某些人已决定用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们。他们正千方百计地控制工会积极分子和全体人民的反应——也包括我本人的反应。这是确凿无疑的。我们从来不想夺取权力，也从不打算为垄断权力而卷入他们内部的斗争。我们要密切注意他们在这一事件中将如何利用我们。绑架波皮耶卢什科神父的人想要在全国人民中制造恐慌，他们想要加剧全国的动乱，以达到他们把我们统统变成炮灰的卑鄙目的。我

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使自己受人操纵。这种认识就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决不允许我们自己被拖进一场新的冲突，有人现在正企图这样做，因为军管显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有人正把赌注押在一场革命上，指望我们所有的人像羊群一样跟着他跑。我们是要革命的，但不是以他所希望的方式。我们选择了渐变的方式，我们选择了非暴力的道路。我们是不会上政府的当的。

要么我们去纪念碑前悼念死者以显示我们的力量——这样做就是让他们敞开对我们进行攻击；要么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跪下祈祷时显示我们的力量以解除他们的武装。我们就是这样和平解决问题的。因此，当我完全知道你们心中的痛苦的时候，我再次呼吁你们在今后的一周里不要受人挑唆。一周之后，我们看形势将如何发展。我们必须用基督徒的办法避免暴力，因为暴力让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总之，我们千万不能任人摆布，受人利用。

在耶日·波皮耶卢什科神父的尸体最终被找到的消息公布出以后，我们期望葬礼能在星期六举行。由于这一天是工作日，因此每个想要参加葬礼的人都必须请假。在我回波波沃我家的墓地去度万圣节（11月1日）之前，我请圣·布里吉德教堂派一个代表团前往华沙，并打算亲自随代表团前往。圣·布里吉德教堂所在的教区处于被包围之中。扬科夫斯基神父不断接到恐吓电话和恐吓信，警告他不久将遭到与波皮耶卢什科神父一样的下场。他不得不把此事通知格但斯克省总检察长，并为此受了半天审问。最后，他被迫寻求保安部

队的保护，不得不锁上他的邸宅通往教堂院子的大门，还暂停了他刚刚恢复的宗教探望活动。我为他感到担心：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在警察和保安部队眼里，他是追求自由的象征。

我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整个国家被恐怖的气氛所笼罩。我用一句老话安慰自己："活着干，死了算。"有人警告我晚上不要单独出去，我对这些人的回答是："我们像烈士一样是一支不好对付的力量，你们说对吗？我们将很快取得胜利。如果我们四个人出去，他们绑架的只是我们四个人。"

1月2日，星期五，我们要去参加耶日神父葬礼的全体人员下班后来到教堂神父住的院子里集合。格但斯克保安部队的一名官员早晨来告诉扬科夫斯基神父，他已奉命负责代表团在旅途上的安全。在我们的车队中，最前面的是教区的一辆蓝色梅赛德斯牌汽车，紧跟其后的是两辆出租车，扬科夫斯基神父和我坐在第二辆出租车里；秘密警察乘坐的一辆轿车像影子一样跟在扬科夫斯基神父和我坐的车的后面；车队尾部是另外两辆警察的轿车。我们在重重浓雾中出发。

在中途短暂休息时，一辆从对面方向开过来的汽车的司机对我们讲马拉瓦城外出现了堵车现象。看来警察正在拦截并检查所有去华沙的车辆，因此造成了长时间交通堵塞。而我们却一路顺风，没有受到任何拦截和检查。不过，秘密警察的行为却是不祥之兆。他们打开手枪皮套，双手插在夹克口袋里，这似乎证实了这支警察分队队长罗赞斯基上尉的话。他说如果任何陌生人突然接近他们，他们就立即开枪。

在华沙弗罗尼亚大街的主教团秘书处里，新闻办公室主任阿洛伊奇·奥尔舒利克神父以这样的话来欢迎我："我对您最近发表的演说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希望这不是说我来华沙是不适当的。"我表示事情才

刚刚开始。

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和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不久也到了。直到这最后一刻，还不知道我是否在葬礼上讲话。在这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做着准备工作和召开会议。

第二天上午，克日什托夫·斯利文斯基组织我们前往印度大使馆吊唁英迪拉·甘地夫人；这位总理不幸遇刺身亡之后，那里的气氛肃穆而悲哀。我们在吊唁簿上签了名。在对全世界发生的这类悲剧进行思考时，我们谈论了这些事件的相似性。

10点钟，我们驱车来到离圣·斯坦尼斯瓦夫教堂不远的一个地方，然后步行到教堂。我们的前面人山人海，根本无法走过去。但华沙的人民很快认出了我们，人群于是立即闪开一条路让我们过去。人们正在哭泣，年老的妇女向我喊道："我的孩子！"

"团结"工会代表团的到来把这次在圣·斯坦尼斯瓦夫教堂的悲哀集会从单纯的葬礼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人们的心情交织着绝望希望。

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团，它们代表着大型商业中心、铸造厂、矿山、造船厂和各种文化团体。他们对耶日神父的葬礼会在他生前工作的教堂里举行似乎感到惊奇。华沙市民都明确表示赞成决定把耶日神父的遗体安葬靠近他生前工作过的教堂附近（这里四周都是他的教民），而不是葬在华沙最大的波瓦兹基墓地。他从此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因此；位于华沙市中心马佐利博尔兹相邻的他的墓碑成为了首都的一个永久纪念物，它代表着这位牧师的灵魂和他倡导的思想。

到处都是"团结"工会的旗帜，到处是写有这四个字的

横幅和写有各种城市名的标语。不过在教堂四周的栅栏上，人们也可以看到指控耶日·波皮耶卢什科神父所犯全部令人作呕罪行的字样。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致于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时，他们能把自己的一部分作为珍贵的礼物留给人间。耶日神父就是这样的人。他的死把我们凝聚了起来，消除了我们之间的各种争吵和分歧；他的死使一座海岛出现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这座海岛就是真正的波兰，而波涛汹涌的海洋则是众所周知的军管。圣·斯坦尼斯瓦夫教堂的这位牧师曾在他的令人激动不已的布道词中这样说过："在我面前，我看到的是整个的波兰，是相信上帝的真正的波兰，是渴望获得自由和主权的波兰。"

这段高尚的话语确切地表达了那一天我们所看到的景象。当一年后有人在华沙问我耶日神父的死有什么意义的时候，我逐字重复了我那天说过的话：在死去的时候，他对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以及我们遥远的未来规定了任务。这个不幸的事件已经结出果实，有那么多人——我特别提到了青年人——最终明白，基督的道德和波兰的传统是那样牢固地植根于我们民族的个性中。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不可能设想未来。如果我们要想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就必须从基督的教诲中寻找鼓舞我们的力量。

在葬礼开始前，我在教堂神父的住宅会见了工会的全体代表。我等待着葬礼的主要组织者格莱姆普红衣主教邀请我讲话。

当红衣主教来到教堂时，他请我以"团结"工会的名义发表演说。我于是走到话筒前，但当我看到大街上、广场上、甚至房顶上那人的海洋时，我当即决定把准备好的讲稿做些

变动，去掉了原来的开头和结尾，临时加上了一个新的开头和结尾。我说：

受命运的驱使，我来向耶日·波皮耶卢什科神父话别。他的牺牲为我们的现在和将来提出了任务。

我们无保留地相信他的教诲，我们知道他现在对我们的期望。他期望我们继承他生前未竟的事业。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必须表明基督徒意味着什么。

在为波兰献出生命的全体烈士的名单上，在华沙、波兹南、沿海地区和西里西亚煤矿的纪念碑上镌刻的名字中，今天我们要添上这位华沙神父、这位工人的神父的名字。

耶日神父是暴力和仇恨的牺牲品；他以和平和仁爱来回答暴力和仇恨。我们站在我们这位兄弟的墓碑前，让我们保证永远不忘记他的死！让我们永远怀念耶日神父！让我们永远记住他的教诲。（喊声：“我们保证！”）他是善良而勇敢的人，是最优秀的神父，是民族事业的不朽领导者，他的整个一生证明了教会与我们民族的血肉联系。自1980年8月到现在，在华沙和格但斯克的工厂，在比托姆、亚斯纳-古腊和比得哥熙的教堂，耶日神父一直在传播基督的福音和圣·彼得的教诲，为他的国家不停地祈祷；他以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他是“团结”工会的忠实朋友。

波兰有像他这样的牧师，有无限忠诚而团结的人民，波兰永远不会灭亡。

当我们与您，啊，上帝的仆人，告别的时候，我们向您保证，我们在镇压面前决不屈服。（鼓掌，喊声：“我

们保证!”）我们保证在服务于我们的国家、以真理回答谎言、以真诚回答邪恶的斗争中保持团结。（鼓掌）我们庄严地向您告别，希望我们的国家得到和平和社会正义。“团结”工会仍然存在，因为您已经为我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喊声：“‘团结’工会!”）

站在波皮耶卢什科神父年迈的父母身旁，站在耶日神父的遗体将被掩埋的墓前，我感到人群充满了信心，我感到他们对于道德价值的信仰在增强，他们坚信有必要在全社会实现这种道德价值。这种信心传播越广，我们就越有力量反对邪恶，就越有力量保护自己不落入动乱与绝望的陷阱。

第十一章　结　论

我的故事以一个人的死、以波皮耶卢什科神父的死而结束。当这个悲惨的消息传开时，整个波兰被惊呆吓傻了，恐怖和悲哀的气氛笼罩着全国。但我们还要问自己：这个悲剧之后还会出现什么呢？

理论家们认为，如果我们在政治上陷入困境，而且又无法找到解决普遍存在问题的政治手段，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失败，并承认最近40年事态的发展已经使我们低下了头，压断了我们的腰。经验告诉我，当政治手段失败时，还可以使用其他手段。事实上，正因为在我们所处的情况下政治行动不是一种选择，我才拒绝坐下来什么也不干，静等这种选择的出现。

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看到席卷全国的改革，希望看到政府中所有腐败无能的官员被取代。如果我们的领导人能够逐渐认识到镇压是不可取的手段，如果他们能够承认我们的要求是正确的，或者即是不承认这些，但如果他们能承认自己的过失，着手改善经济，使法律名符其实，恢复公民的基本自由，那么“团结”工会的祈祷也算有了结果。如果他们不采取任何措施来满足人民的基本要求和期望，那么，他们就不是不采取任何措施的问题，而是必须与我们搏斗。即使“团结”工会失败了，那么，不管是一天还是十年，它早晚必然再次诞生。

我能想象出两种根本不同的前景。我在1987年这样写道：如果政府采取的措施极为缓慢或极为肤浅，我们的国家继续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那么将会像1980年8月和在此以前那样再次爆发合法的抗议浪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学习过去的经验，总结过去的教训。另一方面，如果政府能继续遵循以释放政治犯为开端的路线行事，如果它能开始民主化的进程，并承认工人寻求教会保护的合法权利，那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希望就能得到满足，八月协议就能得以实现。

在这两种情况中，至关重要的不是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而是实现我们的理想。我们理想的实现，要么通过合法的、自发的抗议示威的权宜之计；要么通过政府促进变革的决定。显然，在第二种情况中，有些人是没有参与权利的——首先是我，而我和我的同事关心的都不是个人的利害得失，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事业和实现我们的理想。至于我们建立的那个纪念碑，它至少能存在一两个世纪。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们不可能使时间倒转。进步也许停滞下来，但决不会开历史的倒车。当录音机开始从西方进口波兰的时候，当局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了一项规定，限制任何人未经当局批准不得拥有磁带。录音机的使用受到检查，但并没有被止住，今天这已不再是问题了。不久前，录像机的使用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自由的表达，不管是通过地下出版物还是通过录像带，都是压不下去的。

政府当局迟早不得不赞成改革。他们现在就应该使用自己的想象力设计解决未来问题的方案，但他们却仍然忙于勾心斗角、争权夺位的游戏。在我们的人民的智商普遍提高的时候，当权者的智商却停滞不前，这是我们时代的悲剧之一。

人类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可以追溯到远古的自然秩序时代；在那时的自然秩序中，人类只是一个组成部分。在思想的世界里，我们没有创造什么新的东西。世界按照人类交流的体系演变着。曾有过很多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战争的时期，但不久发展又趋于平衡，人们又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周游。世界上所有的公民最终将得到没有限制的护照，或者说也许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护照。他将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国籍，自由地决定他们去什么地方旅行和生活。这种情况已经在西方实现了，并将在第三世界实现。那里国家的差别最终将不那么明显。这是我们现在期望的事情。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是说从我希望看到我们向着我坚信的理想迈进的意义上讲，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我知道，由于童年生活、学校生活、生活条件和成年生活经历的不同，我们每个人都形成了一套自己看待事物的标准。虽然每个人看待事物的标准彼此不同，但我们在看待事物时还必须有些共同点，那就是，我们决不能回到以刀剑进行撕杀的时代，决不能回到以战争解决个人争端的时代。各个国家的青年人正越来越相像，他们正在把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忘得一干二净。

建立一个人人都可获益的个人价值体系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建立这个体系使我花费了多年时间，至今仍不完全。我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知道自己主张的东西。现在我可以把精力和时间用于其他问题。

精神上的均衡并不会使人免于忧虑。忧虑有多种：有对痛苦的忧虑，有因没有充分时间的忧虑，有因说不清自己的想法的忧虑，有怕把事情做不好的忧虑，还有对死亡的忧虑。怎样对付忧虑呢？我从前认识一位牧师，他节省了不少钱，

以便在他老得不能照顾自己时，能雇一个保姆。我对他说：“您白白攒了几百万，”“如果您因某种可怕的疾病而卧床不起，尽管您有钱，也没有人会来照顾您。如果您在健康时表现得仁慈慷慨，许多人将会不图任何报酬来帮助您。”

一个献身于使人们交流思想的人并不必然能摆脱孤独。我所从事的大多数工作都包含着许多人的共同努力，达奴塔总是和我站在一起，支持我的工作。我总是处在其他人的陪伴中，即使这样，我仍然几乎总感到孤独。

我有时感到，自己好像属于过去的一个时代，那是我们的国歌《波兰不会灭亡》所召唤的时代。这首歌预示的新时代曙光的条件同我们今天生活的条件非常相像，它表达的希望和价值观同我们今天的也完全一样：勇敢、蔑视、自豪。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这是我在有生之年看不到的时代。那时，波兰本身的问题早已解决，全球到处是和平和团结。我期望，我们的孩子或我们孩子的孩子那时能唱一支更为积极的歌。直到那时，我们仍然要努力工作。

1987年3月

于格但斯克

